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

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

乔尔·S.米格代尔 阿图尔·柯里 维维恩·苏 主编
郭为桂 曹武龙 林娜 译

CAMBRIDGE

PHOENIX LIBRARY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通过一系列密切相关的主题和方法，对既往的“国家理论”建构做了检视，并指明其未来必须遵循的精进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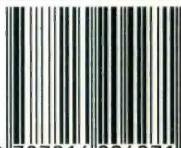
作者们超越此前广为流传的“找回国家”模式，代之以自己的“社会中的国家”方法。他们认为，为了进行有意义的比较研究，国家应该被分解来观察，最好应被当作社会的组成部分来分析。国家可能有助于形塑自己深嵌其中的社会，但也不断地受到社会的塑造。更进一步说，国家能力强弱差异取决于国家与其他社会势力的关联。而社会势力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以成为政治竞争的动员对象。国家与社会势力之间的政治竞争，有时可能相互削弱，有时也可能相互强化。

且不论竞争双方最终是相互强化还是相互弱化，本书的研究都揭示了：对国家—社会关系相互转化特质保持更高敏感度，为何以及如何能够提高我们的理解力。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



ISBN 978-7-214-20427-1



9 787214 204271 >

定价: 60.00 元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凤凰文库

政治学前沿系列



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

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

乔尔·S.米格代尔 阿图尔·柯里 维维恩·苏 主编
郭为桂 曹武龙 林娜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PHOENIX LIBRA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
(美)乔尔·米格代尔,(美)阿图尔·柯里,(美)维维恩·苏主编;郭为桂,曹武龙,林娜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2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书名原文: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ISBN 978-7-214-20427-1

I. ①国… II. ①乔… ②阿… ③维… ④郭… ⑤曹… ⑥林… III. ①国家—关系—社会—研究 IV. ①D03
②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9079 号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1st] ISBN: 9780521467346 by Joel Samuel Migdal, Atul Kohli, Vivienne Shue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8-259

书 名 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

著 者	乔尔·S.米格代尔 阿图尔·柯里 维维恩·苏
译 者	郭为桂 曹武龙 林 娜
责任编辑	石 路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4 插页 4
字 数	330千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0427-1
定 价	60.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凤凰文库·政治学前沿系列

项目总监 韩 鑫

项目执行 石 路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这本论文集始于各位作者的个人写作。所有十位参加者都曾就世界某个地方的国家权力有过撰述,也都注意到这些国家是多么容易受其所在社会的影响。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这些作者协同工作——先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了一次预备会议(本书编者加上凯瑟琳·布恩[Catherine Boone]),接着在西雅图和奥斯汀举办了两次富有成效的研讨会——探索出一种共同的方法来研究国家与社会。本书就是上述协作研究的成果。

虽说我们的学术背景不同,所研究社会的特质也大相径庭,但还是达成了社会中的国家这一研究方法的共识。在第一篇中,乔尔·S. 米格代尔的文章作为开篇之作,确定工作团队的学术框架,引出我们之间的争论,彰显我们之间的分歧,厘定我们之间的共识。我们一致认为,为争夺社会主导权的斗争并非一贯始于——当然也不是终于——国家威严的鼎盛时期。同样,斗争并非一贯都是大范围地发生在庞大的社会势力(作为整体的国家机构、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各个社会阶级、公民社会,等等)之间。许多最为重大的、决定谁将支配社会以及社会将怎么改变的冲突,远非发生在学者和记者们通常所认为的行動的中心地带。

这种方法被学者们用于研究特定社会时是否有解释力,就是对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否管用的检验。在第二篇“国家:嵌入社会”中,弗朗西

斯·哈根皮安(Frances Hagopian)、维维恩·苏(Vivienne Shue)、阿图尔·柯里(Atul Kohli)以及凯瑟琳·布恩运用并强化了本书的研究框架,以此审视特定国家、审视社会势力和社会过程对这些国家权力所施加的限制。在现实世界背景中的这些社会势力,是第三篇“社会势力:接触国家权力”的关注焦点。裴宜理(Elizabeth Perry)、雷萨特·卡萨巴(Resat Kasaba)、迈克尔·布拉顿(Michael Bratton)和内奥米·哈占(Naomi Chazan)集中关注社会中的不同群体,考察他们在与国家互动中怎么被改变,以及他们反过来怎么影响国家的性质。在结束篇,柯里和苏除了讨论整个主题之外,还以贯穿本书的方法为参照,讨论了文集集中的个别论文。

国家与社会结构委员会的几次小额基金资助,才使得我们的研讨会得以召开;此外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也提供了资助;提供帮助的还有位于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的政府系和研究生院、华盛顿大学的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和研究生院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关系学院。米格代尔的论文部分得到世界社会基金会的资助。我们对上述资助表示感谢。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 Akhil Gupta 也参加了我们的研讨会,并发表了精辟的评论。论文的每一位作者都受益于其他所有参与者富有见地的批评。这的确是一个精诚协作的项目。

编者

凯瑟琳·布恩：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系助理教授。她的旨趣是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西非的食利主义。她是 *Merchant Capital and the Roots of State Power in Senegal, 1930 - 198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一书的作者。

迈克尔·布拉顿：密歇根州立大学政治科学系和非洲研究中心教授。他的著作包括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in Africa* (Lynne Rienner, 1992) 以及 *The Local Politics of Rural Development*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0)。他现在的研究兴趣包括非洲政治变迁的比较研究，赞比亚民主制度巩固的政治文化功能。

内奥米·哈占：目前正在休假，暂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岗位，她最近被任命为该大学杜鲁门和平促进研究所主任。目前，她是以色列活力党的议员。她是 *An Anatomy of Ghanaian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1982) 一书的作者。她最近主编了 *Irredent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ynne Rienner, 1991) 一书。

弗朗西斯·哈根皮安：塔夫茨大学政治学教授。她是 *Traditional Politics and Regime Change in Brazi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即将出版) 一书的作者，她还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巴西和拉美民主化的论文。

她目前的研究兴趣聚焦于拉美国家——尤其是智利和巴西——国家退出经济领域的现象以及后威权主义时代的政治代理形式。

雷萨特·卡萨巴：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副教授，社会学兼职教授。他是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UNY Press, 1988) 一书的作者。他目前致力于探究中东地区国际移民的国内根源，研究土耳其现代性计划。

阿图尔·柯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他是 *The State and Poverty in India* (1987) 和 *Democracy and Discontent* (1990) 两部著作的作者，两书都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目前的研究集中于后发工业化中的国家作用。

乔尔·S. 米格代尔：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研究院教授、国际研究项目负责人。他的著作包括 *Palestinian Society and Politics: Peasants, Politics, and Revolution*，以及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上述著作都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还与 Brauch Kimmerling 合作出版了 *Palestinians: The Making of a People* (Free Press, 1993)。

裴宜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她最近的著作包括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1993) 和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Westview, 1992)。

维维恩·苏：康奈尔大学政府学教授。她是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一书的作者。她还就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问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她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今中国的个人慈善、社区福利以及阶级关系和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

罗伯特·维塔利斯(Robert Vitalis)：克拉克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他的著作 *When Capitalists Collide: Business Conflict and the End of Empire in Egypt* 即将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目 录

前言 1
撰稿人 1

导论 探索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视角

第一篇 理论与方法

第一章 社会中的国家：一种控制权之争的研究方法 9
国家 15
社会 24
国家与社会的接合点 31

第二篇 国家：嵌入社会

第二章 传统政治对巴西国家转型的反动 43
军政府的计划 49
国家转型的限度 53
军政府计划受限：寻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节 57
军政府计划的调整 65

变化的前景: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延展性 70

结论 73

第三章 中国的国家权力和社会组织 75

国家权力和公民联合体 75

中国的社会组织与革命性政党—国家 76

社会细胞化 78

特殊主义调适 80

自上而下的改革 83

公共生活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社团主义 87

案例和演变:一个连续体? 89

第四章 集权与无能:比较视野中的印度民主 100

集权趋势的反复出现 103

无能的反复演化趋势 111

结论 120

第五章 后殖民时代非洲的国家与统治阶级:持久的权力矛盾 123

引言 123

农业社区、商业资本与“间接统治” 127

农民、商业国家与后殖民政权的巩固 139

结论 155

第三篇 社会势力:接触国家权力

第六章 劳工分化:现代中国国家形成的起源 163

概述 165

争夺上海劳工的斗争 166

上海劳工与国民党政权 177

上海劳工和共产主义国家 188

结论 193

第七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埃及的商业冲突、合作与特权	196
埃及工商业集团和补贴性进口替代部门的扩张	200
建立威权统治:商界与希德基政权	207
商业冲突与希德基政府的垮台	215
“承包商—政客”的统治	220
总结评论	229
第八章 非国家的一段时空:“长十九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迁	234
引言	234
城市、商业和社群	239
土地和劳动力	249
国家和非国家领域的意识形态	255
结论	259
第九章 后殖民非洲的农民—国家关系:接触与脱离的模式	262
引言	262
组织权力分析	265
非洲的农民—国家关系模式	273
结论	287
第十章 接触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社团生活	290
公民社会与国家—社会关系	290
非洲公民社会的动力学分析	296
公民社会与国家巩固:一些启示	327
第四篇 结论	
第十一章 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竞争与妥协	333

社会中的国家的研究方法 333

知识背景 337

一般主题 347

共同的见解 368

导 论

探索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视角

发展中国家比较政治研究是一门分支学科,近四十年来一直在寻找理论内核。现代化理论学派和依赖理论学派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论,一度喧嚣,如今沉寂。在过去十到十五年中,一种更注重国家取向的方法取而代之,并引起相当大的关注。本书是上述学术传统的延续,提供一种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视角。本文集的作者们既有从一般层面、也有从具体国家层面切入运思,希望说服其他人转向几个相互关联且推陈出新的理论方向:超越“找回国家”,将国家研究重新定位于它们的社会背景之中,进而采用一种更具平衡感的社会中的国家视角;将国家分解成各种研究对象,既视之为目的,也视之为更好地理解国家和政治变迁的手段;重新思考那些惯常用来界定发展中国家变动不居的社会势力的范畴;对国家—社会关系相互转化的特质持续保持敏感。

我们的理论视角是作为对一些主流学术取向的反应而发展起来的,这与以往的知识变迁模式没有两样。尽管本书并不着力于对其他思想流派进行批判性评价,而是探索出一种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视角,但如果我们对学术先驱做一些简要回顾,将会有助于读者看清楚我们的进路所在。现代化理论学派与依赖理论学派之间的争论在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中间广为人知,因此在这篇简短的导论中无需赘述(第十一章有深入

探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更富韦伯主义色彩的国家—社会研究文献,是一种对支撑早先这些方法的结构—功能命题和马克思主义命题依次回应的产物。更进一步来说,国家—社会学派是以两个独特的“第一命题”开始的。在方法论层面,他们放弃了那种总体性的政治或社会理论目标,代之以瞄准那些以经验研究为依托的中层理论。其次,在分析层面,他们对结构—功能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那种将政治归约为社会、将政府和国家的性质主要看成是特定社会模式产物的倾向都不以为然。相反,他们强调在进行个案研究之前,应从分析层面将国家和社会(权威和社团)分开。(这一理论立场的早期观点见 Reinhard Bendix: *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第一章。)

本书认同这些“第一命题”。不过,最近一些国家取向的研究文献——它们构成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一个更大的韦伯主义流派的分支——将某些国家主义的主张推得太远。(这一类型学术取向的一个突出范例是 Peter Evans, Dietrich Reuschmeyer 与 Theda Skocpol 编著的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主张国家回归的理论家正确地指出,国家一向是社会经济变革关键的、直接的推动力量,这一点在20世纪尤为突出。而且,国家权力如何组织影响到社会和经济主体的活动动机,进而间接影响经济社会变革的模式。这些重要的判断支撑着“找回国家”的诉求。然而,我们的观点是,这些主张有些反应过度了,并且对发展研究有误导之嫌。现在是对其进行修正的时候了。

国家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国家可能有助于塑造它们所嵌入的社会,但它们也持续被社会所塑造。一旦国家的重要性得到强调,人们的认知兴趣便会立即转向下述问题:国家为什么会那样行事?在什么环境下国家是有效的?为什么各个国家的角色和效能会有差别?随之而来的这些问题,如果不去审视社会,不去看政治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便无法得到满意的答案。故而,尽管现在人们对“国家事务”的重要性强调很

多——再说一遍,也应该这么做——但对国家—社会互动的相关性缺乏关照;社会对国家的影响与国家对社会的影响旗鼓相当,或者社会的影响可能更多一些。

进一步具体来说,本书提出几种相互关联的主张——我们这里讨论其中的四种,希望藉此将研究国家—社会的文献,从对国家主义的强调转移到社会中的国家的框架下进行。

1. 国家效能变化的基础在于它们与社会的关联。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各个国家现实发生的事情不要误用分析框架,如社会变迁进程中国家的中心作用,或国家独立于社会。在真实的世界中,国家很少是社会唯一的核心主角,也几乎从来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国家取向的理论家用这些分析框架进行经验研究,不能正确判断哪些问题是重要的,比如,将社会中的国家及其角色的研究凌驾于社会对国家影响的研究之上。他们3也模糊了各种具体阐述理论的进展,比如,国家对于社会的独立性被有些人误认为是国家有效性的一个根源。*国家的有效性在于其与社会的关系*

相反,我们认为,即使是那些国家被认为无处不在、压倒一切和无所不灵的地方,比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军政府统治下的巴西,仔细观察就会看到,国家的触角也是有限的。国家的这些局限,反过来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丰富多彩的社会场景对低收入国家社会变迁进程的影响上来。我们转换视角也有助于改变各种具体阐述理论。比如,我们发现国家“独立性”的概念通常是一种幻觉,对解释现实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国家同某些社会群体表面上的独立,被证明在有些情况下是“紧密的”联系(比如一些快速工业化国家),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松散的”联系(比如一些非洲国家)。我们进而认为,国家的相对有效性是相互交织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体现。*230*

2. 国家必须被分解来观察。第二个相关的主张是第一个主张的延伸。如果国家必须在社会语境中被观察,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仅要研究通常位于首都政治中心的国家最高组织,而且要研究边缘地带的国家—社会互动关系。我们的观点是,在它们与分散化的社会各个层面

分分合合的关系中,国家的不同部分同样面临着各种力量的牵扯,面临着诸多模糊地带,面临着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被他者操控的可能性。国家在社会中的总体作用以它的不同部分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众多的结合点为转移。本书各章都强调将国家分解观察的必要性,尤其注重国家的各个部分,而不是人们寻常所关注的权力顶峰;也强调观察国家与社会之间模糊且流动的边界的必要性;还强调体察国家与社会相互改造转化的必要性。本书的一些经验研究表明,采用这种分解视角,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发展中社会的国家权力。

3. 社会势力的大小与国家一样依具体的现实环境而变化。如果说将国家重新定位于社会背景之中是重要的,那么我們也需要考虑我们惯常所使用的那些范畴的合适性,这些范畴凸显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政治意蕴。这是我们的第三个主张。我们认为,社会集团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能力是有条件的,至少局部如此;换句话说,从社会集团在社会结构中的相对地位来看它的政治行动和政治影响力,整体上是无法预测的。
4. 比如,本书好几篇论文都对社会阶级的范畴和经验特点做了修正,还有几篇考察了低收入背景下公民社会的发展。我们主张,阶级,比如无产阶级或农民阶级,并没有历史预定的社会角色,它们有无权力也不是简单地取决于他们对财产的控制程度。虽然财产权明显是一种潜在的政治资源,而且财产权也确实经常插足政治,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一定范围的政治权力平衡还是有可能的,甚至是可欲的。类似的,非阶级的联合行动水平也不是简单地或者直接地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应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并不是必然的,而是需要深入的经验研究。

4. 国家与其他社会势力可能会相互赋权。最后,我们规劝学者们要尽力避免一种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研究方法,不要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看作是一种权力的零和博弈。现实世界的政治斗争很少是被叫做国家的大集体与被叫做社会的大集体之间的对垒。我们承认,对于一些社会集团而言,这种情形确实是他们与国家互动的状态。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甚至不是通常如此。国家组成部分与社会组成部分的某些互

动,可能都增加了双方的权力。当然,也有一些互动导致强化一方面削弱另一方的结果,有些则互相削弱。还有其他的情形是,国家行动者与社会特定部分联手对付社会其他群体。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提示我们,最初的分析立场最好避免一种国家主义的视角。这种视角将国家置于社会的对立面,而不是将国家看作社会的一部分,从而造成严重的误导。

总之,我们建议,在比较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时,采用一种国家中的社会研究视角。

第一篇

理论与方法

第一章

社会中的国家：一种控制权之争的研究方法^①

乔尔·S. 米格代尔

从 17 世纪托马斯·霍布斯写作《利维坦》起到资本主义全盛时期的 150 年间，思想家们就一直关注着日益增长的国家权力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工业革命之后，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埃米尔·杜尔凯姆以及其他许多思想家，都致力于研究他们的后来者卡尔·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②与霍布斯一样，他们也关注国家，但更在意它与欧洲世界中所发生的重大社会与经济变迁之间的关系。

有些思想家，像黑格尔主义者，将国家——以及有关国家的观念——置于风靡欧洲的各种社会潮流的中心。其他人，包括马克思，则在他处另寻历史变迁的根源，一个著名的论断是将它溯源到生产组织身上。不过，即使像马克思这样在正式的国家领域之外寻找历史变迁基本动力的思想家，仍然觉得有必要吁请人们重视国家变革能力的观念。新国家毫无疑问是现代生活的一个主要构件，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潜藏在惊

① 感谢 James Caporaso, John Keeler, Michael Keren, 以及几次论坛的参加者，感谢他们对本文富有教益的评论。促成本书的专题研讨会的所有参加者对这里探讨的思想都有贡献。Atul Kohli 对本章倾注了更多的时间和心力。

②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

人的时代变迁背后的推动力。

在 20 世纪末,这个观点依然在理,就像它在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那样。那么,毫不奇怪的是,本书所研究的主题与重大社会变革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古典争论类似。国家是在何时及如何建立起全面政治权威的?无论是在保持现有模式还是在建立新模式意义上,它们是何时成功地勘定主流道德秩序或决定全方位的日常生活关系的?国家又是何时并且如何为其社会确立经济议程——调度资源及形成投资、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的?还有,其他的社会势力,无论是全部社会阶级还是小集团、大族群或少数民族或形形色色的氏族,它们是何时阻挠或拥护国家并用它们自己的方式设计有效的符号系统、塑造日常社会行为和形成经济生活模式的?

二战以来,学界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就像在古典辩论中一样,在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之间来回摇摆。在过去十年左右,理论家更倾向于国家中心论,明确认可国家在塑造统治模式中所具有的核心功用。^①尽管许多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人员已对全球各地的社团和权威作了细致入微的解释,但更多的理论取向却一股脑儿地用相当一致的措辞来看待国家。一些学者在将国家作为整体呈现时,给出了令人误解的印象:认为在历史的关节点,国家列车只会单边停靠。一些研究人员走得更远,将国家具体化与人格化,将其视为单一的行动者,对形势做策略性评估,然后依利益最大化原则采取行动。不幸的是,在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并赋予其本体论地位时,这些学者模糊了国家形式,也搞不清楚国家在社会中争夺控制权的动力。

① 我使用“控制”指的是通过命令权力获得服从。韦伯在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中使用这一定义。参见 Max Rheinstein, ed., *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322–337。服从的动机可以是强制或当一个人将规则制定者视为合法权威时的自愿服从。(韦伯以稍微不同的术语谈起控制的来源,将控制视为居于垄断地位的控制者的自身利益的一种功效,或凭借权威行使命令的权力和服从的义务【p. 321】)。“控制”,就像在这里所使用的,因此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术语,不仅仅指强制或合法性权威。控制可以被本地化或在整个社会广泛行使。欲参考主要侧重讨论国家的文献,请参见韦伯此书的“结论”,尤其是注释一所引用的参考文献。

本书诸位作者尽管理论视角多种多样，经验研究的区域也各不相同，但都强调要摆脱极端的国家中心论。我们所追求的要远多于仅仅在学术上建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关系。我们还要打破无差别的国家概念——以及社会概念——以理解国家与社会的不同部分在不同层次上如何相互牵扯，以及由此带来的难以逆料的控制和变革模式。一旦用更加细化的术语进行思考，我们就可以设想国家与社会之间非常不同的互动关系，而这一点是已有的理论做不到的。

运用这种拆解国家的手法，我们确实无法达到那些规整的权力理论——如实在论或理性选择理论——所具有的那种雅致。这些理论置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于不顾，将国家或特定社会群体通往主导地位之路看作是一个逻辑连贯的过程，好像国家拥有专一的动力以谋求更大的收益。^① 尽管逻辑如此诱人，但这种包罗万象的理论将争夺控制权的斗争过度简单化了，以至于掩盖了它在不同的社会中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同时，这种理论通过淡化历史偶然事件以及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内在斗争，从而也淡化了国家形成问题。

本章及以下各章都着力于阐明一种理论上更加饱满、更有具体历史感的看待权力的方式。实际上，随后的章节重申了人类学家曼宁·纳什(Manning Nash)所谓的“密切观察关键事例”的必要性——反映学者扎根社会的案例研究——以便做出有说服力的比较概括。^② 对权力进行具体历史的细致分析，为我们审视国家与社会的关键构件打开了空间，也为我们审视导致不同控制模式的社会势力之间的各种互动留出了空间，即使社会势力的不同组合在不同情况下导致了不同结果。^③ 我的中心论点是，这些控制模式是由散布于我所说的社会多个领域中控制与反制的

① 最近的一个好例子，参见 Margaret Levi, *Of Rule and Revenu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② Manning Nash, *The Cauldron of Ethnicity in the Modern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 viii.

③ 出处同上，第5页，文中写道，“哪些构件……被用来建构一种控制类型，以及打造什么边界来区分不同的控制类型，是具体的历史的”。

重大斗争决定的。在这些斗争中,国家不同层级的官员是关键角色,(他们)与不同领域的社会势力的整体展开互动——有时发生冲突。国家任何单一单位对它在特定领域面临的独特压力所做出的反应,都有可能与其余国家组织的反应一样多(或更多)。

国家内部的不同反应,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作为整体的国家以理性且连贯的方式行事,或是在策略上遵循一套明确的利益法则。学者和记者都对谁控制了国家最高领导权给予了过多的关注,好像那些处在权力顶峰的人就是整个复杂的国家机构的代言人和代理人。同样地,他们过分强调了在一些宏大层面上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势力(整个国家,社会阶层,市民社会,等等)之间的重大较量。在许多社会中,把注意力投向多领域中的斗争,远比简单地设想一种统一体(如国家和社会阶层)要更具解释力。例如,一名在印度奥尔萨邦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官员,可能不得不至少像对待远方的主官和议会一样认真考虑当地的地主、宗教领袖和商人的意见,并且,这种考量可能导致与在新德里预先设想的完全不同的计划执行方式。重点是,为探明控制模式,人们必须聚焦于社会诸领域中斗争与妥协的累进过程。

只有首先通过在概念上拆解国家、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这种聚焦才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大量的斗争可能会使一个社会走向整体性控制,其中国家作为整体(或者甚至可能是其他社会势力作为整体)建立广泛的权力并以连贯的方式行动。而在其他情况下,众多领域中的冲突与合谋可能导致社会的分散化控制,其中国家(以及任何其他社会势力)无法实现全国性的控制;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器的各个部分可能被引到非常不同的方向。

一些领域的斗争可能仅限于萧条的城市贫民窟或无人问津的边远村庄,其他斗争则可能蔓延全国并危及国家权力本身。不同的背景产生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递归关系,产生了国家不同部分与其他社会势力不同部门之间相互转化的交互作用——这是本书的核心主题。冲突在具体的碰撞与避让中爆发:国家增加税收的企图,地方大佬控制特定国家

办事机构和资源的努力，国家机构为规范特定行为所发起的动议，地方强人扩大势力范围的企图，等等。发生在这些多样环境中的斗争，以重塑国家和社会告终。

国家驱动或社会驱动的首创精神，通常是由与大转型——城市扩张，化石燃料使用增加和其他技术革新，农业在国内总生产中比重下降等——密切相关的重大变革激发的。这些变化已经超越欧洲，席卷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资本主义和欧洲的强国家模式在每一个大陆都获得回应，促发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大量错位和混搭，也促发了对它们的反对以及它们对当地环境的调适。这些进程已对既有重要资源——土地和其他财富之源，人脉关系以及有象征意义的代表权，等等——的配置构成威胁，引起了遍及全社会的一轮又一轮的斗争与妥协。在某些情形下，也即在国家起主导作用的地方，这些斗争导致了集中控制，但在其他情况下，这种集权已被证明难以实现，最终是控制权的分散化。

无论一轮又一轮斗争的动力是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的传播还是其他因素，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这些新情况所引发的冲突与调适。我们寻求找到一种能够揭示社会控制模式之性质的方法，借由这种方法，人们可以富有成效地观察这些模式的维系与变迁。我们也提出一些有根据的推测，以便观察我们何时何地可望找到某些普遍的控制模式。

第三世界背景投射出争夺社会控制权的激烈情形。^①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随着欧洲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变成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所谓的单一资本主义世界“依赖的支持区域”，既有的社会关系和机构在上个世纪遭受重大压力。^②特别是二战以来，对各个社会应该如何融入更大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一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国家

^① 在这里，“第三世界”这一术语的使用并不是特别精确，逻辑也不严密。对这一术语及其效用的界定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参见 Christopher Clapham, *Thir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第一章。

^② Eric R.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 296.

结构处在这场争论的漩涡中心。争论不仅涉及对外经济政策,更重要的是,涉及这些社会是如何被构建以及应该怎样构建的实质性问题——其规范和规则,规章和法律,符号和价值。国家组织在国内斗争中的控制地位,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不会自然而然地将国家看作解决关键问题的合适权威,国家甚至不是各个群体争论社会未来走向的合适场所。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本身就是争论的对象。

让我们想想西欧封建主义最后余烬消退时英国和法国的类似情形
11 吧。蔷薇战争^①和投石党乱^②与其他众多的斗争一起,彰显了企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之上的国家与抵抗这种强权的社会群体之间强烈而又立场迥异的纷争。马克斯·贝罗夫(Max Beloff)说得好:“在 16 和 17 世纪,政治主权的现代思想,即在每一个人和每一寸土地之上必定存在某种单一最高权威的概念,仍然是有争议且需要争夺的观念,远非所有政治行动背后的主导观念。”^③

在当代第三世界,被一些理论家如此自然而然甚至可能从目的论上假定和预期的国家自主权和国家能力,根本还是未定之数。

社会科学需要一种方法,将研究者引到为争取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上,这种斗争处于 20 世纪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中心。本书作者们孜孜以求的正是详细阐述这种方法。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将在控制与反制的畛域内探讨国家、社会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些畛域中,所有类型的社会组织,包括国家各组成部分,彼此关联,都想在日常生活、日常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对周遭世界的理解方式上刻上自己的印

① 蔷薇战争(英语:Wars of the Roses;1455 年—1485 年)是英王爱德华三世(1327 年—1377 年在位)的两支后裔——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支持者为了争夺英格兰王位而发生断续的内战。——译注

② 投石党乱(法语:Fronde;1648 年—1653 年),一场紧随着西法战争而爆发的法国内战。该运动源自投石器(Fronde),系源于当时的摄政——马萨林枢机主教的支持者遭巴黎暴民以投石器发射石块破坏窗户。——译注

③ Max Beloff, *The Age of Absolutism, 1660 - 1815*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Harper & Row, 1962), p. 20.

记。简言之,我的目的是提请那些关注国家与社会问题的人,在研究时进行恰当的对焦。我们强调将国家和社会分解研究的方法,也强调国家—社会互动的递归性质与相互转化特性。因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斗争在第三世界国家比在高度工业化国家很可能更为明显——正如 17 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希望本书各篇章也将有助于理解那些类似的斗争经常被遮蔽的欧洲(包括前共产主义国家)和北美的国家与社会。

国家

许多学者都给出了国家的正式定义,其中多数都高度依赖于马克斯·韦伯的国家概念。^① 这些定义彼此之间大同小异。它们往往强调国家的制度特征(作为一个组织或一套组织)、国家的功能(尤其是规则的制定)以及国家对强制力的依赖(“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② 这些定义的核心是国家疆域内的控制或权威问题,以及国家机构预期其规则得到自愿遵从的程度(合法性)或需要诉诸强力的程度。

例如,一篇文章认为,“国家是有权为人民做出具有约束力决定的一系列组织,并且是特定疆域内在必要时使用强力执行这些决定的裁决组织”。^③ 另一篇文章将国家看作致力于“对社会关系的诸多方面进行集中化、制度化、区域化调节”的权力组织。^④ 至于现代国家的“权力”,作者们 12 一般指的是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谓的基础权力,即“国家实际

①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vol. 1, P. 64; and Rheinstein, ed., *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p. 342.

②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78.

③ Dietrich Reuschmeyer and Peter B. Evans, “The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oward an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 Underlying Effective Intervention”, in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euschmeyer, and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46–47.

④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 D.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6.

渗透市民社会的能力,以及在整个疆域内统筹做出政治决定的能力。”^①

学者们将国家理解为以往制定规则的地方性社会组织被不断战胜过程的结果。它是“一种施之于特定社会疆域之上的更加非人格化和公共化的规则体系,而规则的实施是通过一套复杂的制度安排和官职得以实现的。这一点跟以往大相径庭。在以前,规则的实施主要是通过地域性和特殊性的权威完成的”。^②

理论家们认为,16世纪以来拥有庞大常备军和强大官僚机构的新型公共权力的出现以及成文法的出现,都使旧的统治规则显得不合时宜。国家把众多以往只是地方群体的松散联合体的人群锻造成紧密联系的民族。人们简单地认为,国家作为规则制定的权威机构已没有任何争议了。“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一种形式的政治单位得到承认和许可,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民族国家’的形式。”^③

这些定义尽管有可称道之处,但它们也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它们往往只描述国家的一个维度——它的官僚特性(或规则强制性)。对国家这方面的强调,凸显了国家的能力,凸显了国家善于完成一套固定目标,精于实施正规政策。但这些定义没有捕捉到国家存在的另一个维度:目标的形成与变动。国家一旦与各种社会群体接触,就会与不同的道德秩序产生冲突,就要对其目标进行调整。这种不胜枚举的交叉接触,既改变了社会基础,也改变了国家目标。国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实体。毋宁说,它是动态前进的,它的目标是变动不居的,因为它要与其他社会群体不间断接触。这种接触可能是通过正式代表(通常是议员)

① 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in John A. Hall, ed., *States in Hist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 113. 还可见 John A. Hall and G. John Ikenberry, *The Stat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p. 1-14.

② Roger King, *The State in Modern Society: New Direction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Chatham, N. J.: Chatham House, 1986), p. 30.

③ Anthony D. Smith, “State-Making and Nation-Building,” in Hall, ed., *States in History*, p. 228.

的直接接触，更经常地是通过政党的接触，后者与国家是密切相连的。

其他社会势力对国家目标的抵制，以及各种群体对国家机构的渗透，在在改变了国家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国家政策形成，既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所追求目标的单纯结果，或者立法过程的直接表现，也是这种动态过程的产物。同其他社会势力的接触（与抵触）的结果，可能从实质上改变国家的议事日程；事实上，它们可能改变国家的性质。^① 即使像革命后中国这样一个自觉的观念实体——一个维维恩·苏所说的矢志改造社会的国家——在同其他社会势力接触中，也发现自己被改造了。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阶级斗争的话语框定国家政策，以捍卫社会主义和提高革命意识为职志。但是，用苏的话说，国家的目标和行动，被渗透到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种种社会网络所改变，由此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都影响了国家的特征。裴宜理以上海为实例的研究，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之后所建立的国家）是如何在吸收工人阶级最熟练成员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特征的。同样，如雷萨特·卡萨巴所示，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同主要是非穆斯林商人的接触，从根本上改变了自身的目标和性质，导入了许多新的角色和程序。 13

现有国家概念的问题，远远不止于此：对国家目标赖以形成的基础的流变性视而不见；问题甚至存在于国家能力方面，而这正是此类定义的核心与灵魂。这些作者们有一个令人困惑的倾向，那就是对国家做出对人民有约束力决定的能力过于乐观估计。这种过分夸大国家能力的倾向，源于国家在控制与反制领域中几乎无所不在，也源于国家官员本身的自以为是。

在20世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地方——无论是在非常偏远的村落还是在省会城市的中心地带——的国家机构没有成为争夺控制权的关

① Alfred Stepan 对他从葛兰西那里改写来的“政治社会”这一术语的使用，开辟了考虑国家的符号系统及其行为的不断变化的基础的道路。Stepan 认为，政治论争处在“政治社会”的框架之内，并且是关于“控制公共权力和国家机构”的论争。Alfred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Brazil and the Southern Co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

键角色。有时,国家的动议引发了剧烈的社会斗争;在其他情况下,它只能被动应付其他社会势力的冒犯。有时,它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再分配而奋斗;而在其他情况下,它的政策议程只涉及维护现有的经济支配方式。在过去几代人里,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其中一些发生在非洲),国家才会在争夺社会局部的控制权中缺位。^①可以肯定的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科技进步,国家具有变革能力的思想已经是现代世界的一个明确特征。事实上,现代国家与历史上许多大型政治组织(如帝国)的区别在于:前者暗含国民的身份认同(因此要强调民族国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以其他身份(像父亲或农民、法国人、巴基斯坦人或巴西人)来考虑自己。事实上,转型国家并不满足于建立人们的身份认同,它们还想塑造人们的整个道德秩序——它包含了人们最切身的象征和符号。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这种渗透意味着转型国家根本不会听任疆域内任何一场控制权之争自行其是;^②领导人希望国家的影响力能够发挥到极致,多多益善。

除极少数例外,政治领袖一直试图引领转型国家。他们将国家视为一个可以(或至少应该)主导整个社会的组织。它应决定日常行为规则,或至少授权和保护其他社会组织来承担一些任务。例如,即使在最近的市场私有化、自由化的背景下,主流的见解仍认为国家不应完全将经济问题交由市场处理。国家应该为那些市场的自治划定边界,同时还要授权、规范与维护市场的运行。^③

简言之,绝大多数政治领袖都强调,国家应该在他们所宣称的整个

① Victor Azarya and Naomi Chazan, "Disengagement from the State in Africa: Reflections on the Experience of Ghana and Guine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 (January 1987).

② 使用转型一词,并不一定意味着进步。甚至一个寻求维护现有秩序的国家也必须变革,如果它想在国际变化横扫其整个边界的背景之下保持自己的方式的话。

③ Evans 和 Stephens 指出,“国家不单是政治的中心,而且是发展经济的中心”。Peter Evans and John D. Stephens, "Studying Development Since the Sixtie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Society*, 17 (1988), p. 723.

疆土上处于统领地位。在某些情况下，那就意指对那些与国家领导人结盟的强势社会团体以及这些团体所支配的组织（如市场组织和教会）授予特权。但是，更普遍的要求是直接行使控制权——将国家的意义系统以及可接受的行为边界（包括从性别联盟到劳工关系管理在内的每一件事）集中强加给人民。

国家领导人试图营造一个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国家越是貌似全能，人们就越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接受它。借此过程，国家减轻了执行指令的负担。事实上，那些有意无意夸大国家能力的社会科学家，已经成为国家把自己抬到无往而不胜地位的图谋的一部分。国家主权，也就是最高国家权威所施加给疆域内的控制权，经常太过轻率地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①

尽管竭尽全力并屡屡受挫，国家领导人还是没有找到一种控制——他们的意义系统、他们控制社会行为的规则以及他们的经济计划——社会的简明方法。像任何其他组织一样，国家权力有实际的界限：它们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它们何时可以收税和何时不可以，它们可以制定哪些有约束力的规则和不可以制定哪些规则，都有定数。国家雄心勃勃的目标——完全渗透整个社会，规范社会关系的特质，收取税收，分配资源以决定经济生活性质，以及控制人们最为珍视的象征符号——很少得逞；第三世界大多数新兴或复兴国家当然更不容易得逞。

近来的文献表现国家的方式，一再地导致高估国家权力和自主权。（这些文献）总是经常将重点放在国家最高领导层上，好像领导层独自构成了国家，好像它的集体意志在迷宫般的国家分支和官僚机构中得到一体遵行。“我的主要兴趣”，曼说，“放在那些通常称为‘国家’的中央政府机构上，并且放在较高层次的、一般被称为‘国家精英’的人员所行使的

1. King 写道（*The State in Modern Society*, p. 51），“宪政国家的特点是有单一的主权，这表现在单一的货币、统一的法律体系和使用单一的‘民族’语言的国家教育体系上。这一‘民族’语言的文学传统侵蚀了文化特殊主义和国家的兵役制度，而这一制度取代了古代军事单位的地方募兵制，同时也逐渐克服了‘边缘的’或地方主义的身份。”

权力上。”^①

然而国家的含义显然远超于此。与意识形态和政策形成一样,政策执行也表现为国家与其他社会势力的交叉互动。为研究这一点,我们必须通过一种新的“国家人类学”视角来观察国家的多重面相。一门真正跨学科的政治人类学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一些著者已做了详尽阐述。^②尽管国家作为一个机构很少成为这些作品关注的中心,但他们的见解对那些重新理解国家的著作却十分有益。国家人类学研究至少可以带来三大好处。

首先,研究重点将从人类学家劳拉·纳德(Laura Nader)所谓的“研究上层”^③(注重组织和机构的顶层),向国家不同层次转移,包括对经常直面社会的最低层组织的研究,以及对国家不同层次相互作用的研究。总之,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将国家分解研究,有助于我们观察国家与社会的多层次互动。

其次,国家人类学将创新国家机构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参与式研究方法。现有研究国家官员及其他人的常用方法,“在应付那些能言善辩、敏于思考的受访者时非常有用,但只有在这些人介入社会政治活动时才是如此”。^④参与式研究则可聚焦于国家官员与国家组织内外的其他人争权夺利的斗争过程。

①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p. 112. 国家对其顶层精英或领导人,以及对其自身独立于特定的其他社会经济利益的独特利益的认同,并不意味着作者不承认 King (*The State in Modern Society*, p. 53)所认为的国家的“聚焦的多元化”。但是这些聚焦很大程度上并不被看作为一个相当单一的意愿的有差别的制度化表达。

② 例如,参见 Almer Cohe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The Analysis of the Symbolism of Power Relations”, *Man*, 4 (1969): 215-235; Clifford Geertz, “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David Apter, 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pp. 55-72; Max Gluckman, *Politics, Law and Ritual in Tribal Socie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5); 及 Marc Swarz, Victor Turner, and Arthur Tuden, eds., *Political Anthropology* (Chicago: Aldine, 1966)。

③ Laura Nader, “Up the Anthropologist: Perspectives Gained from Studying Up”, in Dell Hymes, ed.,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pp. 284-311.

④ David C. Schwartz, “Toward a More Relevant and Rigorous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of Politics*, 36 (1974): 130 (emphasis in original)。

最后,这种方法可以超越通常对权力关系的理论研究,而关注国家—社会关系中权力与象征符号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监控其所有规则,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彼得·伯杰和托马斯·勒克曼(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所称的“合法的体系”^①,即证明国家统治合理性的象征序列。正是这种需要,促使国家努力塑造人民的道德和思想秩序。阿布纳·科恩(Alner Cohn)指出,政治人类学“善于揭示表面上非政治的象征性形式与活动——现代社会的繁文缛节——的政治意蕴。”^②

国家人类学所阐明的正是适应国家象征符号的人民转型以及融合社会象征符号的国家转型——二者表面上都是“非政治性”过程。

正如阿图尔·柯里在印度的例子中所揭示的那样,国家组织的不同层级在结构环境中的行为差异很大。国家人类学将我们引向这些独特的环境,引向各层级之间的互动。想理解印度中央政府为什么费尽心机集中权能却事与愿违日渐无能,学者需要将目光放得远些,除了看看他们在新德里的困境之外,还要审视该国各地区各层级的政治状况。只要运用这种方法,就不至于妄想国家在危机局面前越来越束手无策时,会做出单一的具有战略性和合理性的反应。事实上,政治结果可能完全不符合表面上所看到的那个整体国家“利益”;相反,它可能是国家不同层级复杂的互动以及各个层次面临的特殊压力所导致的结果。

这样看来,国家人类学让我们将国家分解开来进行剖析,也让我们得以辨析国家不同组成部分的不同结构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一个可能的解剖国家的方式是将其分成四个层级,它们各自所面临的来自国家其他组成部分与非国家行动者的压力明显不同。这四个层级从低到高分别是:

(1) 基层。处在基层一线的官员,必须执行国家的直接指令,同时要

①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66), p. 171.

② *Two-Dimensional Ma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4), p. 17.

面对社会可能的强烈抵制。他们是税务人员、警察、教师、士兵以及其他有权直接运用国家规则和条例的官僚。他们接触的是特定的当事人、服务对象以及官方政策的受益者。监督者往往远在行政区或区域首府。

(2) 地方机构。处于更高层级的是区域性和地方性机构,它们对国家政策和指令做出修订,因地制宜地组织实施,或者制定和实施纯粹地方性的政策。这些地方机构包括各行政单位、立法机构、法院以及军事和警察单位,在整个大范围国土之中的特定区域内工作,对通过国家部委划拨或者当地收储的资源的在地化配置做出关键决策。公立学校建在何处?当地邮件配送如何组织?哪些村庄需要挖掘新管井或建设灌溉水渠?谁将被聘到基层机关中工作?比起那些基层机关,这些地方机构更有可能面临实力强大、组织良好的区域社会势力的压力,也更有可能面临首都的直接干预。

(3) 中央国家机关。首都是国家的决策和立法中枢,还是执行政策法规所需资源的聚集地。从法理上说,这些机关应该对最高政治领导层负责,但它们之间也经常陷入激烈的讨价还价境地,并常常成为组织严密的全国性大型利益集团游说的目标。

(4) 最高决策层。国家的顶峰便是最高执政领导层。尽管最高层领导在从征税到治安的一切事务上都得依赖较低层级的官员,但他们却不完全等同于国家机关的任何其他部分。在众多国际国内大型利益集团中,其他部分俨然是寻求影响最高决策层的另一类压力点。

暂时抛开影响国家各个部分的非国家势力(国内的和国外的)的议题不论,在国家组织内部,每个层级都直接承受着三大压力。这些压力首先来自上级(至少对那些既不是经由选举产生也不是处于官僚等级最上方的官员来说);其次来自下属,来自那些他们直接或间接监督的下级官员;第三来自同僚,包括其他机构的同僚,或者级别差不多的同僚。鉴于国家的每个层级都要面临一系列不同压力,何况还有非国家势力的压力,所以国家很少能够对一个议题或问题做出整齐划一的回应,甚至连制定一套有差别但彼此协调的应对之策都不可能,就丝毫没有有什么奇怪

的了。国家各部分所面临的不同压力群，意味着不同单位有不同的遭遇，并由此导致各自的团队精神、决断性和偏狭性也大不相同。政治结果——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一系列不同行动的累积反映，这些行动基于国家每一层级的各个部分所经受的特殊压力群。

可以确定的是，几乎无法确保这类政治结果会有多少协调性。它们很可能只是一些不合宜的回应的大杂烩，这些回应来自国家不同组成部分，是各自对来自国家内部或更广泛环境的各种压力作出的回应。比如，苏(Shue)写道，“尽管他们是国家代理人，但一线官员经常发现，将自身命运与当地人民和部门员工连在一起，抵制上级官僚机构不人道的要求，这样做是明智的，或者更舒坦、更自然、更符合他们自己的信念。”

在国家机构的不同部位上，国家官员身上面临的交叉压力差异极大，压力大小取决于各自领域内特定势力群体及其相对重要性。像新近一些理论那样强调国家的整体自主权，根本就不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最好出发点。研究人员必须首先问诊国家各组成部分的自主权，问问为什么交叉压力的差别这么大。人们还要问问，在国家不同层级上，哪些社会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盘根错节的压力允许国家官员及其代理人有自由决定的空间吗？一线管理者对国家机关的决定有影响吗？或是，其他社会势力的影响超过了他们？

总结来说，本节是对社会科学中一种不幸倾向的检讨，这种倾向将国家看作一个有机的、未分化的行动者。学者们赋予国家本体论地位，将国家与社会其他部分隔离开来。结果，争夺社会——在其中，国家各组成部分在各个领域扮演不同的角色——控制权的斗争的动力被模糊了。那些斗争不仅关乎谁取得了向社会发号施令的政治领导权，它们也涉及国家各组成部分与社会其他力量在多个领域中的合作、结盟与冲突。来自非常不同领域(在其中国家各组成部分与社会势力相互作用)的刺耳的声音，经常导致国家行为背离领导人或国家机关原初设想的计划和政策。

国家各组成部分在其各层级遇到的一系列压力越是多样、越是复杂，尤其是当各种强大的压力来自国内外的社会势力时，国家不同部分

18 之间的反应就越不可能协调互补,成功传输连贯一致的“合法化体系”的可能性就越小。尽管国家在国际上有地位,在国内社会中算个庞然大物,但它很可能是在寻求统治中的一个跛脚巨人。它的大块头能够确保自己在争夺社会控制权的冲突中不被忽略,但更多有价值的动议、更协调一致的行动——如果有这种行动的话——可能来自其他社会势力。

社会

我们可以从里亚·格林菲尔德和米歇尔·马丁对社会的描述开始讨论:社会“唯一确定的特点是,它是特定人群最表层的结构,不管人们对它的态度如何,都自认为是它的成员,并且体认它对自己身份的界定”。^① 这一描述失之宽泛,忽略了那种引导社会不同部分的核心力量存在的必要性。事实上,对国家—社会关系分析的诸多难题,都来自于理论家施加某些一般性分析框架的倾向,以为这些框架可以辨别所有(或大部分)社会不同人群的分化模式。由此,借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将统治阶级或由统治阶级和国家勾结而致的霸权,描述为整个社会的支配力量,并且深刻塑造了社会形态。只要一个社会被发现有多方势力互相牵扯,那么其间的斗争就会被理解为是在统治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之间进行的。

与马克思主义者类似,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家通常也接受这样的公理,即社会的存在,内在地质预设了某种类型的霸权力量或统摄性支配势力的操控。对他们来说,统一的框架是规范的共识,这是个人和群体在谁得到什么的问题上展开的竞争过程的共识,这种共识部分表现在或多或少都有强制性的国家的权威结构之中。^② 多元利益群体为竞争公共政

① Center, *Ideas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viii.

② Vincent 指出,自由主义理论家假定的共识是一个集体的利益。但是,他抱怨道,“多元论者有时看来是凭空召唤出这一集体利益”。并不是所有群体都可以接受这一基本框架。“群体可以同任何国家一样具有压迫性,有卑鄙龌龊的思想,打破坏自由的勾当。” Andrew Vincent, *Theories of the Stat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p. 216.

策影响力而开展的社会斗争，都是在既定游戏规则的保护之下进行的。近期的国家中心理论或隐或现地倾向于接受统摄性支配力量或霸权的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们比马克思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更明确地将研究重点放在由该社会的国家组织所产生的制度架构和权威上。^①

这里提供的社会研究方法接受了国家中心论者所做的一些假定；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我们所知道的社会——其轮廓和边界，其经验分享感——是国家形成的产物。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理论家的统一框架的命题（无论是统治阶级、有关竞争的规范共识还是国家）提出质疑，以解释第三世界社会的整体控制和分配模式。我们必须问一个前提性问题：多个领域斗争结果的累积，是否已经在事实上产生了广泛的阶级并具有 19 统一的计划以塑造社会、塑造广泛共识的规范框架，或者塑造可以容纳竞争的国家组织？而且，如果我们确实找到了这样的阶级、框架或国家，我们是否必须假定该计划在短中期之后依然还能维持不变？

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例，诸社会阶级的内部团结以及它们之间为争夺控制权的广泛的社会斗争——阶级斗争——往往只是理论设想，在现实社会中很难找到。就像 E. P. 汤普森所指出的，一度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启发意义分析工具的阶级，事实上只是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内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阶级产生于 19 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其后在启蒙性的阶级范畴上留下印记，事实上并不具有普遍性。”^② 汤普森以 19 世纪

① 见 Evans et a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Vincent 提到自由主义多元论者时指出，“他们试图将一个观点理论化，即国家包含群体生活的最大多样性和某种形式的中央权威”。他还指出，一些人认为“国家从后门偷偷进来”。Vincent, *Theories of the State*, p. 210.

②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 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 *Social History*, 3 (May, 1978): 150. Stedman Jones 关于启发式方法和在历史中的发现之间的脆弱关系，最终采取了不同于 Thompson 但是更加坚定的立场。“在‘阶级’作为官方社会描述的一个相对的事物，‘阶级’作为分配或生产关系的理论话语的一个结果，‘阶级’作为在文化意义上具有重要性的一组实践的概括总结，或者‘阶级’作为一种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自我界定的假设上，一个人不应该继续前进，所有这些假设在一个先前的社会现实中都具有一个单一的参考点。” Gareth Stedman Jones, *Languages of Class: Studies in English Working Class History, 1832–198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7–8.

英国资产者和大批农民并存现象为背景指出,“像其他每一个真实的历史情景一样,阶级产生于特定的力量均衡;它只是貌似无穷的社会突变之中的一种(然而,每一个突变都与其他源自类似结合的突变保持着亲缘性),而实际历史的变革类型要丰富得多。”¹

在欧洲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能够引导社会或围绕着它能够解决基本斗争的统一阶级可能存在,或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当其确实存在时,它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成功地实现某种广泛的阶级计划。那么,无论“阶级理论”的一般用处有多大,我们的案例似乎都表明,要警惕那种以偏概全的理论倾向。

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埃及商业精英,如罗伯特·维塔利斯(Robert Vitalis)所指出的那样,可能会在有限的情形中参与形式广泛的集体行动。但是,在一些涉及国家培育市场的关键问题上,商业领袖尽管有诸多特权,也不能形成统一的阶级支配。相反,敌对的商人联盟与国家的不同部分结盟,每一联盟都努力寻求获得国家的投资资源。结果不只导致商业精英之间的矛盾加深,也导致国家权力及其政策措施的削弱。伊斯迈尔·希德基(Ismail Sidqi),1930年接管政府的铁腕领导人,需要商人的程度与商人需要他的程度不相上下。然而,最终两者都未能实现目的:希德基被迫于1933年辞职,而商人继续在多个领域里追寻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没有迹象表明社会被引到单一方向。维塔利斯指出,统一的社会阶级为宏大的阶级计划而努力以重塑社会的理想,可能只是一个美妙的隐喻性构想,这些隐喻“所揭露的惯例、策略和资本权力的性质同它们所掩盖的一样多”。

同样,对自由主义理论家来说,围绕权力分配的斗争,通常并不能产生主导竞争的具体规则。社会中的斗争往往围绕由谁来建立程序的问题,并不涉及社会整体合法架构之中的公共政策过程竞争。与统一的阶

¹ 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p. 255(emphasis in original).

级一样，在广袤领土上可供多元竞争开展的合法性权威的建立，在 20 世纪只是例外现象，并且是独特历史条件的产物。^[1] 柯里指出，即使在建立了民主制的印度，一体化的权威架构至今仍未实现。事实上，由动员性民主提供的机会，为新的群体、尤其是中低阶层开辟了扩大政治参与的道路。其结果出乎预料：民主非但没有为管控冲突提供长期的“解决方案”，反而日益促成碎片化政治，几乎没有生发出能够容纳日益增长且日趋激烈的竞争的制度架构或规范体系。

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一旦假定国家机构的实力和内聚力足以推动社会，便会遭遇类似的困境。同样，这种主张不仅需要经验证明，而且其理论假设经常导致剥夺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活力或动力的倾向：将后者描绘为社会中最强大部分——国家手中任意拿捏的橡皮泥。^[2] 这种观点使我们在解释塞内加尔的例子时无所适从。按照凯瑟琳·布恩的观察，在塞内加尔的后殖民时代，能力日益强大的国家并没有出现，政治实践反倒削弱了该国的国家行政能力和资源基础。国家本身逐渐建立在一种庇护制度之上，其中酋长和其他地方官员在地方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些地方化统治模式日渐扎根于国家肌体之中，挖国家的墙角，使国家无法处理日渐疲弱的国民生产问题，国家的税收基础急剧削弱。社会中的强权势力和自主力量对国家的塑造，不亚于或者更甚于国家对它们的塑造。

社会势力为合作行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些势力既包含非正式

[1] 在 Gramsci 的语言中，这些历史事件是“接连的”。*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自由主义理论家往往否认在有明确游戏规则的一个综合性框架不存在的情况下一个真实社会的存在。例如，Shils 将这些情况说成是“原始社会”。但是那样只是接受了社会的有界性及连接关联行为和共同记忆的事实，而否定了在行动框架上仍然存在冲突的社会的现状。见 Edward Shil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p. 68。

[2] “国家的居民还具有像语言、文化遗产和共同历史等社会特质……不同于国家的政治结构，社会的共同属性并不具有为整体代言的代表机构。”Reinhard Bendix, John Bendix, and Norman Furniss, “Reflections on Modern Western States and Civil Societies”,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3 (1987): 2 (emphasis in original)。

组织(如塞内加尔的庇护网络,或者其他社会中的社交群体和同学网络),也包含正式组织(如企业组织和教会)。社会势力也可以是社会运动,包括那些因为理念投合且动机强烈而聚集起来的社会运动(即便该运动缺乏明显的组织纽带)。^① 此类社会运动范围广泛,从致力于捍卫私房权利的运动到关涉生态问题的运动。所有这些类型的社会势力行使权力的能力,都始于其内部的组织。其科层制的效率,其支配资源的能力,其创造或建立象征符号以吸引大众的技巧,都影响着它们影响或掌控人们的行为和信仰的能力。

- 21 但还存在着另外一面。社会势力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在它的领袖努力动员追随者以及行使权力的环境中,还有其他社会势力做着同样的事情。而且,抑制多元社会势力冲突的人群或议题,很少是泾渭分明的。这里的焦点恰恰在于环境——那些支配与反对的领域——中各种社会势力围绕着物质的和精神的问题互嵌互动,在斗争与妥协、冲突与联合中争夺裁决权。^② 这些都不是各种群体努力塑造公共政策的单纯“政策领域”。除了政府政策的论争,斗争和妥协还发生在基本道德秩序问题上,这恰恰是决定日常社会行为正当与否的结构:谁有权解释圣典? 谁的地位更尊贵? 何种产权制度应占主导? 在主导性产权制度中,水和土地应如何分配?^③

① 一个社会组织的存在,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必然暗含着控制。Weber说:“习惯服从于领导命令并凭借自身的参与在持续的控制中有其个人利益的一群人,以及他们从控制中获得的好处,已经在他们中间划分了这些功能的行使;这些功能的行使将有助于控制的延续以及使他们为自己的行动时刻做好准备。这整个结构将被称为组织。”Rheinstein, ed., *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p. 335. 我使用“社会势力”这一较为宽泛的术语来表示组织中这种统治关系,同时用于那些在活动中存在服从但没有出现明确组织的地方。

② 一个领域未必是空间上受到限制的,相反,它是一个概念场所,在那里重要的斗争和妥协在社会势力之间发生。

③ 因此,统治和反抗的领域在一些基本的方面不同于 Lowi 的权力竞技场。他写道,这种权力竞技场包括“事件、问题和领导者,(这些应该)在政府活动的特定领域内研究。实际上,这些领域是一个比单一的机构更广义,比一个有单一政治过程的政府更狭义的政府的职能”。Theodore J. Lowi, *At the Pleasure of the Mayor: Patronage and Power in New York City, 1898-1958*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p. 139. 与此相反,统治和反抗的领域不是政府的职能(尽管它们可能包括政府行动者),它们也不仅限于政府活动。

多元社会势力在一个竞技场內各显神通，各自向其他势力表达自己的诉求，对其他势力的目标及相关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目标可能各不相同且互不相容。有的利用社会势力抽取尽可能多的盈余或收入；另一些则指望顺从和尊重，或按照上帝旨意行事，或将控制他人行为的权力作为目的本身。无论动机和目标如何，统治的企图总是遭到同样寻求统治的其他人或试图规避统治的其他人的抵制。很少有社会势力能够在不寻找盟友、建立联盟并接受妥协的情况下实现其目标。君不见，地主和牧师、企业家和酋长，都打造过这样的联盟，以获得足以号令各方的实力。例如，弗朗西斯·哈根皮安的考察表明，在巴西，军事独裁政权在建立了自认为可以使巴西政治摆脱传统地方寡头精英势力的政治统治制度之后，仍不得不重新向他们妥协。“军政府在清除庇护政治体系方面，并不比清除国家中的传统政治精英方面来得更成功。”传统庇护者有足够的力量操纵资源以支配地方，这迫使当局领导人与他们暗地里建立了联盟。

结盟和妥协可能会改变并强化一方社会势力实现目标的能力。随着一方社会势力拥护群体的变化，它可能会吸收新的支持力量，也可能将新的理念和价值纳入其纲领。换一种稍微不同的说法：一方社会势力在一个领域同其他势力互动的结果，除了能力的变化之外，其社会 and 思想基础（其所服务的对象及其目标和议程）也可能发生根本改变。时至今日，仍有众多的社会科学将社会势力的行为结果理解成是从一套固定的目标中推导而来的。这真是无稽之谈。目标本身很可能是变动不居的。在中国，20 世纪 30 年代的国民党政权和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开始的共产党政权，为了获得上海工人阶级中不同阶层的拥护，不断地调适目标。本书由裴宜理所写的那一章，显示了国民党使用黑帮势力来吸收来自北方的半熟练工人对自身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也注意到共产党国家在吸引南方熟练工匠的同时，是如何采纳劳动精英的目标的。

22

为扩大社会势力的统治，权力或社会控制可以通过三个层面扩张。首先，在某一领域，社会势力能够支配日益增多的议题，从决定种植何种

作物,到提供信贷,再到社会救济。其次,领域自身也可以扩大,以容纳更大的人口比例和更大的领土。例如,围绕人们应该使用何种语言而建立的社会势力联盟,可能会从某一城市开始,接着蔓延开来,吸收更多的支持力量,扩张到更大的地域范围。第三,一个社会势力可以用它在任何一个领域获得的资源,来控制其他有着不同社会势力的领域。例如,后殖民时代,非洲某些国家的酋长,利用其在部落中的控制力,在诸如计划生育之类的全国性议题中崭露头角。

社会势力尽力调度手头资源和符号以促进目标实现,而且它们之间这方面的能力有很大差异。一个领域内重要要素的组合——自然禀赋、物质资源、人力资本、社会组织形式及信仰系统——是决定社会集团之间互动模式的原材料。诸社会势力一旦用它们本来就不平等的能力和资源来寻求对区域环境中这些重要要素的利用和操纵,支配模式便形成了。某一领域中如外来资本、强势观念等新要素的引入,或社会组织形式的创新,或传统资源的耗尽,都会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助益或削弱社会势力。这些新因素引发了某些领域内的反复斗争,斗争可能缓慢而平静地进行,也可能充斥暴力和持续骚动。

社会势力在所有地方性或区域性的控制和反抗中所发生的那些斗争和妥协,也不是什么秘密了。为了影响斗争的结果,资源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调度。社会势力通过运作外来资源,通过人事调整,或通过操纵具有强大渗透力的象征符号,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像社会生产的总体结构、既有的制度安排和某些突出的象征符号等因素,在各个领域都影响着谁处于配置资源和符号的地位。

23 社会统治地位的创造及维系——社会内部的权力再生产——是多
个领域持续斗争和妥协的产物。我们研究社会的方法,要分析特定社会势力是否能够建立统一的统治。就是说,它们能够在特定领域内占据资源和支持——一个是物质基础,一个是规范框架——的优势以统治地方,并扩展到其他领域以建立全社会的统治吗?或者,通过抑制可支配全社会的权威与合法力量的产生,会出现一种分散统治的模式吗?

国家与社会的接合点

在当今世界，离开国家理解“社会”这一术语是不可能的。国家的形态创造和激活了社会。如果说社会是人们身份的最表层边界，那么最初确定那些边界或社会边界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单纯地塑造了构成社会的人群。事实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是双向转化的。国家接近与疏离其他社会势力的结果是可观测的，甚至是重大的，但结果很少反映双方的目标和意愿。包括国家在内的社会势力的冲突，是通过社会诸多领域中的斗争和妥协得到缓和的。社会科学家面临的挑战，是理解这些分散的斗争是如何改变社会资源配置、社会分层性质、性别关系特点^①以及集体认同内容的。最后，那些地方性的互动逐渐重塑了国家或其他社会组织，或者，最常见的是，重塑了二者；这些互动是国家和其他社会势力之间递归关系的基础。

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说的那样，诸领域中各社会势力之间接近和疏离的累积结果是：社会呈现出“所有的形态”^②。

乍一看，史密斯的观察平淡无奇；社会当然最终呈现出无所不包的形态。但是，就像史密斯所注意的那样，很多流行的社会理论对显而易见的事实却视而不见。在当代社会科学著作中，国家和社会被大而化之一笔带过，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呈现诡异的千人一面。因此，

① 在有关身份和国家的所有要素中，研究最少的可能是性别。一个好的例外是一本最近由 Parpart 和 Staudt 写的书。她们写道，“对于我们来说，性别处于国家起源、通向国家入口和国家资源分配的核心位置。国家是由性别斗争塑造的；它们随着时间流逝获得了鲜明的阶级意识形态，而其以塑造物质现实的方式指导着资源分配的决策。通过它们的意识形态的、法律和物质的努力，国家推进动员了某些群体和议题。这种动员通常有益于男性而非女性。在长时间中，国家活动可能淹没和模糊性别冲突，而在短期内，男性特权受到鼓励显而易见会加剧这种冲突。”Jane L. Parpart and Kathleen A. Staudt, “Women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in Parpart and Staudt, eds., *Women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89), p. 6. Also, see chs. 2, 3, and 10.

② Smith, “State-Making and Nation-Building”, pp. 229–230.

许多当代学术研究模糊了众多社会诸多领域中所产生的多样性。国家和其他社会势力之间接触的基础是单一的,冲突与其谋,敌对与联合,腐败与选举,决定了全国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的形态。它们决定了统治是整合性的还是分散化的,以及不同的集中性统治或分散化统治形态。

24 在不同地方的不同时期,支配和反抗的诸多领域在其社会势力之间获得了周期性的稳定关系。但这与其说是规律,不如说是例外。一次尼加拉瓜地震,一次孟加拉海啸,黎巴嫩南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合并,墨西哥出生率的变化,以及遍及第三世界的全球经济渗透,所有这些都造就了成功者和失败者,并且因此改变了诸多领域内的力量平衡。通过其特有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现代国家一直是扰动 19、20 世纪诸多旧秩序的核心力量。转型国家领导人意识形态的共同的核心理念,是在众多领域、甚至在社会的偏僻角落,建立起霸权秩序——单一权威统治的秩序。这一目标渗透社会如此之深,乃至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塑造个人的社会身份,并且,国家的组织也一直有效地助推着这种支配,触角既深且远。它包括建立垂直机构以汲取境内所有纳税户的财税资源,也包括建立专门化组织以提升国家体系的意义与合法性(比如学校)、制定通用法则(立法机构)、执行规则(行政机构)、做出裁决(法院)和实施强制(警察和军队)。国家所推行的重大政策举措,已导致新要素四处散布(从新观点到人员到硬通货),同时经由税收、征兵、搬迁、大屠杀或其他手段,造成其他既有要素消失殆尽。即使是最仁政的国家,都对其所声称的国家主人提出额外要求:每周 30 个小时将他们的孩子隔绝在国家批准建立的学校之中,人体排泄物只能以规定的方式处理,病人只能接受国家许可的医生医治,产权关系只能通过国家颁布的法令认定。不管其具体施政方针如何,国家都已经撼动了既有的社会关系,激发了新的为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

在国家和其他社会组成部分之间众多的交界地带,一些社会势力将自身的命运同国家联系在一起,或者认同国家,视之为确立全社会行为

规范的合适组织。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赋权的。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势力之间的交集表现为一场争夺代理权的斗争,以取得特定领域最终的动议和决策自主权。这样,斗争不是表现为相互赋权,而是表现为各自目标的相互排斥。例如,一些社会势力以争夺合意的资源、职位、人事权甚至整个国家官僚机构为目标。社会中还有其他人群,如已经被其他社会势力控制的农民或贫民窟居民,也时不时或积极或无声地抵制官员所强加的新的国家控制意图。

国家各部分和其他社会势力之间在交集时所发生的这些斗争与妥协,产生了一系列后果。我们可以用四种理想类型来描述这些后果。第一是全面转型。在这里,国家的渗透导致地方社会势力被破坏、被吸纳或被征服,导致国家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各组成部分成功地 25 改变了特定区域人民的身份认同。强制移民,用移居人口代替当地人,暴力的广泛使用,以及其他严厉的手段,可能消除或破坏当地的社会主导力量,改变身份认同。在社会没有严重失序的地方,全面转型不可能在一代人之间就实现。裴宜理和苏的两章中讨论的中国转型,最接近这个理想类型。经历了长期的内战和动荡,抗日战争雪上加霜,再加上后来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为中共政权控制地方势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是,即便这一案例也提醒我们,对转型国家要慎重看待;正如裴宜理和苏所揭示的那样,中国达不到这种理想类型。国家在融入新团体、接触旧团体的同时,发现自己在塑造社会的同时也被社会塑造了。

第二是国家对既有社会势力的吸纳。在这种类型中,国家在一个领域中所注入的新的社会组织、资源、符号和暴力,固然使其能够挤占既有的社会势力和象征以建立新的统治格局。但是,对国家各组成部分来说,当它们在顺应该领域的具体情况和各种势力时,也被迫做出改变和妥协。全国各地的这些变化,可能会影响国家的整体一致性——其重新分配资源、建立合法性及实现一体化统治的能力。哈根皮安有关巴西研

究的章节,是第二种类型的典范。在巴西,1964年的军事政变产生了一个决心推进社会转型的政权。但是,即便尽其所能,国家仍发现自身在省级层面要与旧寡头同流合污,并且由此将关键领域的资源配置权拱手相让。

第三是既有的社会势力吸纳国家。在这种类型中,为顺应既有的社会主导势力,国家各组成部分的面貌发生了变化,虽然其统治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新国家的出现产生了新的统治模式,但却是新的非国家社会势力上升到社会顶端的统治模式。无论哪一种情况,个人认同和道德秩序并不按国家领导人所预想的那样建构。各国家组成部分的组织和符号,是由当地社会主导势力支配的。在这种情景下,地方政府转型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严重妨碍了国家实现其整合控制的整体机会。例如,迈克尔·布拉顿在他所写的篇章中指出,在非洲国家,由购销管理局和农民合作社的建立所促成的制度安排,完全超出政治领导人的计划和想象。农民通过建立他们自己的非正式贸易网络,来应对国家政策。布拉顿并不认为,部分国家机构同民间经济体的相互渗透就是国家的统治形式。

26 当公职人员收受贿赂而对非法行为视而不见时,他们不是在扩展国家权威而是在损耗它。并且,当官员从事私下囤货和贸易时——即使只是通过亲戚、中介和雇工——他们也认识到他们的行为是不受法令管辖的。国家官员从事副业,意味着他们置日益紧迫的社会需要于不顾,破坏国家的正式结构。

同样,我们对于这一理想类型,必须保持谨慎。非洲的案例,像布恩一文所讨论的塞内加尔,往往表现为国家被特定的社会势力所吸纳。即便如此,这里仍有国家与社会的接触甚至相互赋权的方面,这一点在内奥米·哈占的篇章中有很好的体现。

最后是国家在努力渗透(社会)时完全失败。国家脱离地方或者很少介入地方事务,将导致社会转型徒劳无功——同时社会对国家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国家介入地方斗争的失败,哪怕是最偏远的地方斗争,都

会对中央政府产生影响，那里的国家机构无法获得从更大范围社会中汲取的资源和支持。

现实中只有很少的案例接近两种极端的理想类型，即完全转型或完全脱序。大部分的案例是两种极端类型的中间变体，其中国家组成部分和其他社会势力卷入循环关系，亦即，表现为相互转化的斗争。事实上，国家和其他社会势力不仅彼此改变，通过日侵月蚀，它们还可能会影响另一方的整体面貌。在斗争和妥协领域的中间地带，国家和社会其他部分的边界会持续迁移，要么是强有力的社会势力侵蚀了国家，要么是地方国家机构拉拢收编了有影响力的社会人物。尽管国家领导人可能会努力表现出超然于社会的姿态，然而，国家事实上只是社会中的另一类组织而已。并且，作为众多组织中的一个，国家受制于社会势力的牵扯，国家与其他社会势力之间的界限也会改变。

例如，在部分非洲殖民地，英国就曾试图通过将部落首领吸纳为带薪官员以扩大殖民地范围。许多酋长在欣然接受工资及其他津贴的同时，却经常不理睬来自国家官僚科层制中的上级指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界限就是流动不居的，很难定位。酋长是国家官员，但有时——事实上经常——只是利用国家机关及其资源来强化他们作为首领的角色。

像近来许多社会理论家那样讨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似乎二者总是有确定的界限，这种思路将会忽略转型斗争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动力机制。^① 酋长，像其他国家雇员和官员一样，扮演多种角色。国家组织或许可以在他们履行国家义务时成功地压制他们使用不同规范的角色（例如，作为亲属或部落群体的成员）。塑造特殊的国家规范、抑制其他社会角色规范的强烈意愿，是国家试图为其官员创造自己的空间（如独立的

① 我很感激 Timothy Mitchell 在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流动界限时指出了这一点。见 Timothy Mitchell, "The Effect of the State", 这篇论文提交在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 Committee o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关于 "Stat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的专题研讨会上, Istanbul, September 1-3, 1989.

办公楼或新首都)的原因之一。其意图是,在国家设定的空间内,官员不太可能屈服于特殊领域里激烈上演的斗争逻辑。但是,国家可能无法“俘获”酋长或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结果是其他社会势力的规范反倒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样一来,社会势力在一个又一个领域中重新组织起来,以应对雄心勃勃的国家新实体。只要一个地方的社会势力有能力建构或发现空间及方法以维持(有时甚至增强)自身的社会和经济实力,不受国家的道德秩序和规则框架的约束,社会便会呈现分散统治之特征。在此类社会里,无论是国家还是其他社会势力都无法建立统摄性霸权;任何一个社会势力的统治,只会局限在一个领域或有限的多个领域内,但不会覆盖整个社会。这样,社会生活的特征便会表现为多元社会势力之间的斗争或僵局,其所争夺者,从个人和集体的身份认同及显著的象征符号问题,到财产权和暴力使用权问题,不一而足。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的身份认同和道德准则保持着明显的多样性。

即使在分散统治的情形下,国家也很少是微不足道的角色。国家同其他社会势力的接触发生在社会中的诸多领域,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机构表现强势,强促地方势力重新组合。但是,在所有或多数情况下,国家组织无法促使地方强势势力实现全面转型,甚至无法成功吸纳这些势力。这种模式与包容性的或广覆盖的集中统治模式明显有别。在集中统治模式中,国家无论是表现为权威的法律体系还是强制性的阶级统治机器,都是建构和维护社会控制过程的核心力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高度整合,步调一致,足以在既定霸权统治的所有层面发挥核心作用。这种统治既覆盖那些直接由国家规制的生活领域,也包括在有限的范围内由国家授权的社会组织和活动。

在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许多理论家只是简单地假定集中统治的存在。公民社会的概念被许多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及统计学家广泛用来界定国家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而强化了社会集中统

治的推定。^①可以肯定的是，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中（例如，在黑格尔和葛兰西的著作中），公民社会的概念内涵是不一样的。^②尽管概念有差别，但对许多理论家来说，公民社会俨然已是有着惊人共性的可信手拈来的术语。不同的作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虽然承认社会多元利益的存在，²⁸但依然觉得整个社会（在许多著作中，甚至包括国家力量）被拉到一个单一的方向上去。^③让我们看看斯特潘在其关于军事政治的书是如何以拟人手法谈论公民社会的：“公民社会必须考虑自己如何能够对军事和情报系统的民主控制做出贡献。”^④

公民社会理论假定，在社会势力之间，甚至在竞争团体之间，存在着规范性共识或主导性观念；这一共识体现了普遍的道德秩序或社会秩

① 黑格尔提出的公民社会概念，是一个从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他们的冲突和需要中出现的概念。这些需要产生了国家，并且正是法律和公正的原则将公民社会与国家联系在一起。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2), pp. 122-123, 134-135. 马克思回应黑格尔的概念，认为国家仅仅是保护公民社会中享有特权的有产阶级利益的机器。他从物质意义上理解公民社会，即特定财产权利的表达：“‘官僚政治’是公民社会的‘国家形式主义’。”David McLellan, ed., *Karl Marx: Early Text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9), p. 68. 葛兰西指出，除了国家的教育机构帮助维持霸权以外，“在现实中，许多其他所谓的私人倡议和活动也往往出于同样的目的——那些塑造政治机构和统治阶级文化霸权的倡议和活动。”对葛兰西来说，这就是公民社会。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p. 258.

② 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在于因果关系的方向：是国家建立公民社会，还是公民社会创造国家？黑格尔认为，社会为国家创造了需要，而其他人，包括Stepan，认为国家可以创造市民社会。Otto Hintze提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这种相互关系以及国家在创造自己的公民社会时的角色时，使用了“民族群体”这一术语而不是公民社会：“欧洲人民只是逐渐发展了他们的民族；他们不是自然的简单产物，而本身即是国家建立的一个产物。”Hintze, “The Formation of States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 Study i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Felix Gilbert, ed., *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61.

③ Bendix等人指出，“公民社会只包括人口的一部分”。那些不在公民社会中的人往往是边缘群体——被父母遗弃的人，不参与市场的无家可归的人，非法移民，等等。“Reflections on Modern Western States and Civil Societies”, p. 23. John Keane看到了被排除在公民社会之外的欧洲社会的更多要素（这些人大部分不是自种的、异性恋的男性公民）。*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On the Predicaments of European Socialism,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and the Problem of Controll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Power* (New York: Verso, 1988), p. 14.

④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p. 128.

序。对许多学者来说,公民社会是联结整个社会或者几乎整个社会的纽带,这种纽带或是财产权的,或是内心相互需要的,或是任何其他因素的。直到最近 10 年左右,大多数理论家都认定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所存在的亲密关系。^[1] 这一解读并不意味着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不存在紧张关系,或者两者之间不存在边界问题。权力中间人,即调解机制,被用以表示公民社会,其中各种组织捍卫相对于国家的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为国家与非国家团体之间的一些差异留下了可能空间。

但关键点是,在大多数社会科学著作中,国家和公民社会是相互强化的,即便在二者的差异占主导时也是如此。全社会无数组织中广泛认同的规范、产权关系或社会行为模式的存在——亦即,公民社会的存在——强化了国家的统治,使得国家无需时时诉诸强力或无需耗费可能削弱自身的资源来实施统治。在特定议题上可能存在冲突,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互动和竞争规则中所暗含的共识。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国家所制定的用来框定组成公民社会的组织和行动的自主边界的法律框架。如果这一框架被广泛接受,那么国家和其他社会团体的行为就有可能是相互赋权的。

只是最近在拉美、东欧甚至西欧,才出现更加严肃对待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潜在可能性的话语。^[2] 甚至在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中间,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张力,整体上仍被视为两个统一体之间的张力。

[1] Bendix 等人指出,“私人协会的独立是公民社会的同义词”,并且为了公民社会的存在,国家和社会之间需要一个“共识”,“Reflections on Modern Western States and Civil Societies”, pp. 14-15.

[2] 在上世纪 80 年代,“公民社会”这一术语逐渐被东欧的分析家使用。他们正寻找一种打破国家与社会之间理论脐带的方式。对他们来说,公民社会暗指一个充满勇气的社会,通过组织反对国家发展自主权。例如,见 Andrew Arato, “Empire vs. Civil Society; Poland 1981-82”, *Telos*, 14 (1981-1982): 19-48。要找一篇批判文章,见 Zbigniew Rau, “Some Thoughts on Civil Society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Lockean Contractarian Approach”, *Political Studies*, 35 (1987): 573-592。关于西欧的内容,见 Keane,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例如,见 pp. 31-32)。关于拉美的内容,见 Alfred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公民社会仍被看作多元利益的总和，在一定层面上朝着单一方向聚合。同时，它们试图反对国家的道德秩序，把自己的道德秩序强加进去。

以这种公民社会的视角分析国家与社会的接触，存在许多问题。其一，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讨论的那样，即便在公民社会内部，各种社会势力也并非总是聚合性和包容性并导致一种根本思想霸权地位的。¹

对于公民社会，我们应当更加审慎地理解其构成要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是由单一利益集团和私人自愿组织构成的，并指望它在社会上 29 营造和谐共识的局面。同时，这种公民社会的整体化视角完全忽视了分散统治的情形。社会 and 公民社会不是同义的；在社会多个领域进行的统治与反抗的各种斗争中，社会势力在彼此牵扯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国家。公民社会概念最常见的使用方式，对这些围绕社会道德秩序的分散化斗争没有留下解释余地。正如哈占在她的章节中所指出的那样，“公民社会只是复杂而多元的社团场景的一部分。使那些融入公民社会的社团与其他社团区别开来的东西是前者的局部性：它们虽与国家分开，但又与国家接触。”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可能包括其他有机组成部分（不只是边缘的个人），后者努力制定自己的规则并建立自己的道德秩序，而不直接与国家对话。在这里，群体的目标与国家的目标是相互排斥的。

当代许多社会中都存在不少重要的人群，对国家作为社会最高权威组织的全部主张或多数主张，持续抵抗。一些社会势力对国家的普遍性要求不予支持，或者，在这件事情上，甚至连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竞争的主张也不予支持。它们与国家的关系，要么抵制（公开的或秘密的），要么为自身目的而努力改变或占有国家的局部。类似地，它们对组成公民社会的其他势力的态度，从漠不关心到公然敌视，不一而足。

社会的众多领域及其相互作用俨然是一口大锅，锅里一直在为每个

1. Joel S. Migdal, "Civil Society in Israel", in Ellis Goldberg, Resat Kasaba, and Migdal, eds., *Rules and Rights in the Middle East: Democracy, Law and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3).

社会及其国家烹煮着各种偶发的、各具特色的历史菜肴。政体(民主或其他政府形式)、其目标、其能力、其范围、其被特定社会势力的牵制或者其自主权,连同其他社会势力的形式、意义体系、能力和自主权——所有这些,都已被在社会诸领域中以及诸领域的关系中所发生的这些重大斗争所决定。国家不经试错是无法成功树立统治权威的。事实上,试错的结局很可能是,国家也被社会改变了,其程度不亚于有变革能力的国家对社会的改造。

简言之,学者需要探究的是,一个领域的斗争是否以及如何转移到其他领域。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追问这种斗争是否以及如何蔓延到全社会。一个领域内的斗争与妥协所产生的资源与支持,是不是被带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并由此产生一种集中统治?集中统治,无论来自国家、社会阶级、公民社会或者任何其他团体,都是资源和支持成功再分配的结果,这种资源和支持产生于一个领域的行动,并转移到其他领域。^①西德尼·塔罗所谓社会中“重大的议题、扰人的冲突、深层次的社会经济裂痕”,离开小范围的冲突是无法理解的。人们是在小范围冲突发生之后,才开始“构建自己同国家的关系、调和或解决利益冲突并且从政治着眼顺应更大的社会压力的”。^②

任何社会势力,包括国家,要培养凝聚力、提高获得物质和象征性资源的能力并用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展示自己的正面形象,都取决于其在更小领域内的表现。在小范围领域中,它必须十分成功地取得支配地位(近乎全面改造或至少是吸纳既有社会势力),适以在其他领域乃至最终全社会的斗争中有足够的资源。任何社会势力,从社会各阶层到国家,是否能够因而构成集中统治的根基,远非定论。

① 在美国,社会理论家特别谨慎地承认,国家实际上行使着最高权力。其注意力时常被放在自我调节的社会组织上,很少注意到国家是如何创造了市场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权威性的法律框架。见 Gary C. Hamilton and John R. Sutton, “The Problem of Control in the Weak State”, *Theory and Society*, 18 (January 1989): 15-16。

② Sidney Tarrow, “Introduction”, in *Territorial Politics in Industrial Nations* (New York: Praeger, 1978), p. 1.

第二篇

国家：嵌入社会

第二章

传统政治对巴西国家转型的反动^①

弗朗西斯·哈根皮安

不久之前，拉丁美洲南锥体国家的军政府纷纷承诺要进行深刻的变革，也赢得了重要力量的支持，但在现实中变革却进展甚微。自1964年在巴西开始，随后1966年在阿根廷，1973年在乌拉圭和智利，以及1976年再度在阿根廷，军人发动政变后就不想把权力移交给对手文官派系——国家的传统模式——而是直接进行统治。尽管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让国家重回文官统治（但没有时间表），但他们并未将自己的政权视为过渡政权，而是视为转型政权。^②通过重组经济和政治生活，通过国家的去政治化并削弱社会提出要求的能力，他们期望构建改良的、更“可行的”民主政体，可以更为有效地应对将来可能复发的经济和政治乱局。他们采取的步骤特别而新奇：他们将权力集中在国家行政分支的各部分

① 我很感激以前的同事 Jorge Domínguez, Ashutosh Varshney 和 Jennifer Widner，他们对这项工作的早期版本做出了评论；感谢参与本书写作的每个同道之人，感谢他们对改进本章草稿的有洞察力的批评和有用的建议；而且尤其要感谢本书的编辑们。我很感谢 Joel Migdal 鼓励我更加深入地思考国家—社会的关系，并感谢 Atul Kohli 坚持要我澄清“军事项目”。

② Cf.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The Chilean Political Process*, trans. Sharon Kellum in collaboration with Gilbert W. Merkx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Arturo Valenzuela and J. Samuel Valenzuela, “Party Oppositions Under the Chile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J. Samuel Valenzuela and Arturo Valenzuela, eds., *Military Rule in Chile: Dictatorship and Oppositio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84–185.

和各专业行政机构手中,并把重大决策权交给技术官僚。技术官僚短时间内就获得了高度的国家自主权,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种自主权甚至掌握在那些曾经支持军事政变的文职人员——传统的经济和政治精英——手中。^①

20 世纪 80 年代,拉丁美洲朝着有益于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南美大陆大部分国家结束了军事统治。军事统治者们未能通过快速的社会政治改革达到更深层次持久性变革,在这一进程中越发明显。^[2] 在各个国家,民粹主义者、庇隆主义者、社会党及其政党领袖——这些军政府试图一劳永逸将他们逐出政治舞台的人,从军事统治中幸存下来,并在大批支持者的簇拥下回到政治舞台,同时回归的还有军政府期间对之态度暧昧的 38 的此前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享有垄断权力并敢于采取大规模镇压行动且不乏(至少最初)大量中上层阶级支持的战略国家精英,^[3] 无力改变国家重组社会,最终也无法维持政权,这一事实以戏剧性的方式凸显了国家—社会关系的弹性。

本章探讨的是被称为“官僚—威权主义”先驱的巴西军政府，在改造

①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ssociated-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Alfred Stepan, ed., *Authoritarian Brazil: Origins, Policies, and Fu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46-147, 最好地阐述了一个共识:“旧的统治阶层(传统农业精英,不能适应的工业和商业利益集团以及认同前政权中的主导阶级的职业政客)在总体结构中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相对权力地位。”

Garretón (*The Chilean Political Process*, p. 108) 认为, 这些军事独裁不能解决他们掌权后动手处理的国家问题 (停滞、失业、依赖、不平等), 也不能够改变政治。断言他的政权只带来经济失败是有问题的。巴西政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速度, 而智利政权被广泛认为产生了痛苦的结构调整。尽管几乎没有重组政治和社会, 但是实现重大政治变化的秘鲁军事政权, 显然是个例外。Abraham F. Lowenthal 认为, 虽然它未能刺激经济增长, 减少了外部依赖和重新分配经济财富, 但是贝拉斯科政权通过土地改革确实伤及了寡头政治的要害, 并且它加强了一个“贫血的”国家。 “The Peruvian Experiment Reconsidered”, in Cynthia McClintock and Abraham F. Lowenthal, eds., *The Peruvian Experiment Reconsider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415-430.

③ 在阿根廷，一项 1966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的调查中，66% 受访者赞成政变，而只有 6% 的人反对政变。在另一项调查中，布宜诺斯艾利斯 77% 的受访者相信政变是必要的。Guillermo O'Donnell,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Argentina, 1966 - 1973,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39.

国家、重塑国家和社会之间互动关系上遭遇的失败。^① 巴西军事独裁者在实施其转型计划方面的失败尤其令人费解,因为人们以往都认为巴西社会一向逆来顺受。^② 事实上,在走“温和路线”的总统翁贝托·卡斯特略·布朗库(Humberto Castelo Branco)(1964-1967)的短暂执政之后,军方似乎能绕过它以前的政治盟友,单独由技术官僚统治。况且,巴西军方比其他南美威权政权有更长的时间——21年——来重写政治版图。然而,军事统治的政治成果并没有比邻国维持更久。^③ 今天,尽管取得合

① “官僚—威权主义”是由 Guillermo O'Donnell, 在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73) 一书中提出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是进口替代型发展模式的“好日子”走到尽头、诸多问题随之而起的产物。进口替代型发展模式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压力,而压力是由这种模式所催生的国家支出平衡紧张以及工人阶级作为民粹主义联盟合伙人得以不断索取高工资造成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权掌权而“关停”公共部门,以遏制通货膨胀和吸引外资,并且技术官僚处在了政变联盟的核心。

如果阿根廷启发了 O'Donnell 的模型的话——的确,这是 O'Donnell 最了解的情况,而该模型描述的民众普力夺主义和进口替代工业化衰竭的表现在那里最明显(见 Albert O. Hirschman, “The Turn to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Search for its Economic Determinants”, pp. 70-71, and Robert R. Kaufman, “Industrial Change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Latin America: A Concrete Review of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Model”, p. 252, in David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对于该地区其他军方和那些在严酷的威权主义与损失阶级特权之间偏好前者的民众来说,巴西都是一个现实的模型。

② 虽然关于在巴西国家内部权力中心位于何处,它的区域和地方分支机构权力是取代还是服从于中央国家的权力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很少有人会怀疑继承自葡萄牙君主政体的国家机器比社会强得多。葡萄牙王室曾渗透和主导稀疏的移民殖民地,而当巴西在 1822 年取得独立时,中央并没有像其在西班牙控制下的美洲那样产生分裂。一些把巴西国家视为一个叠加在虚弱组织的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的学者,继 Weber 之后,将其称之为“世袭的”。见 Raymundo Faoro, *Os Donos do Poder: Formação do Patronato Político Brasileiro* (Porto Alegre: Globo, 1958); Simon Schwartzman, *São Paulo e o Estado Nacional* (São Paulo: DIFEL, 1975), and *Bases do Autoritarismo Brasileiro* (Rio de Janeiro: Campus, 1982); Fernando Uricoechea, *The Patrimonial Foundations of the Brazilian Bureaucratic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and Riordan Roett, *Brazil: Politics in a Patrimonial Society*, 3rd ed. (New York: Praeger, 1984)。

③ 的确,军方成功地进行了一些快速和持久的政治举动。它在国家中增加了军事存在并夺取了对国家警察部队的控制,使其远离政客。州长、经济政策仍然由正式负责经济的内阁部门和国有银行的高层制定和实施,鲜有来自被选出的代表的输入,并且几乎没有公开辩论。通过 1988 年宪法,国会获得了审查行政部门预算的权力,但是它还没有超越它的次要合伙人身份的界限。而且甚至在它退出之后,军方能够威逼制宪会议采纳其选择的政治体制:总统制。

法地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只吸引了极少数选民,但是其他左翼分子和民粹主义者却十分活跃;事实上,尽管在威权统治期间他们是被严厉镇压的对象,但如今他们可能比在政变前夕更强大。第二,也是更令人玩味的是,军政府一开始就欲除之而后快的传统政客以及传统政治行为方式,也比军事统治活得更长。实际上,不仅政治最终没有朝着军方希望的方向转型,相反,经过二十多年的威权统治和快速的经济发展之后,政治几乎根本没有变革。

军方转型计划的失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它是利维坦分裂的结果——换句话说,在国家内部,尤其是军事机构内部,出现了分裂。根据这个观点,政府中主张温和路线的人,设法通过政治自由化和“向市民社会求婚”来压制安全部门中的强硬派。^[1] 第二种解释是,指望军方经过长期努力可以成功重构政治,犯了分析性错误,低估了巴西市民社会抵制国家威权统治的能力。志愿活动、社团生活蓬勃发展并且被政治化,市民社会获得赋权,这可能是巴西历史的第一次。^[2] 如果不否定军方的分歧使得威权统治的最初“松弛”成为可能,尤其是威权统治结束对于巴西市民社会觉醒(和英雄主义)的非凡意义,那么无论“来自上层的自

[1] Alfred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Brazil and the Southern Co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2 - 40;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art 4: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见 Karen Remmer, *Military Rule in Latin America*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p. 34 - 43, 关于为什么这些裂痕在某些情况下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容易形成的一个有趣的制度分析。

[2] 在威权政权期间关于巴西公民社会兴旺发达的大量文献出现了。志愿协会的最重要的活动和新的形式是“新工会主义”,被称为 Ecclesiastical Base Communities (CEBs) 的地方教会团体,生态与妇女运动,以及社区协会。关于承担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主题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取样工作,特别见 Ralph Della Cava, “The ‘People’s Church,’ the Vatican, and *Abertura*”, pp. 143 - 167; Scott Mainwaring, “Grassroots Popular Movem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Nova Iguacu”, pp. 168 - 204; Sonia Alvarez, “Politicizing Gender and Engendering Democracy”, pp. 205 - 251; and Margaret Keck, “The ‘New Unionism’ in the Brazilian Transition”, pp. 252 - 296, in Alfred Stepan, ed., *Democratizing Brazil: Problems of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在他的编者介绍中,Stepan 将这两种观点——国家主导的自由化和公民社会的力量——结合进一个单一概念中:政权让步和社会征服的辩证关系。

由化”还是“市民社会复兴”的命题,都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下述相关的、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军政府计划的制订和修改的方向是什么?在巴西,由于没有一届官僚—威权政权最终实现制度化,一个改造国家的雄心勃勃计划让位给了一个不太可能的继任者:传统政治。^①事实上,当这一改造国家的计划越出轨道时,军方让其转向回到国家庇护主义轨道,主政者乃是传统精英。即使在今天,在军方启动的快速工业化四分之一世纪后,传统政治和传统政治精英被证明仍然支配了工会、劳动党和市民社会的自治协会。^②

本章探讨一个战略性国家精英——巴西军方——的变革计划,如何逐渐被修改的问题。本章审视的是威权统治之前及期间国家与社会调节的性质。研究策略是:“国家”和“社会”在概念上必须被分解,它们之间的交叉领域必须被仔细鉴别。我的主要观点是:在拉丁美洲军事威权政权之下,政治变革的可能程度和方向受到历史遗产的抑制,这一遗产关乎社会的政治化组织方式以及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方式,也关乎威权政体如何被先前存在的社会与国家关系所规制——就是说,

① 采用“传统政治”,我指的是一个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通向决策的机会受到限制,政治代表的渠道按层级结构排列,以及政治竞争受到严格监管的意义上是威权主义的政治组织体系。我使用“传统政治”大致指代经由寡头政治、侍从主义和地方强人主义支配的统治,但是在巴西政治这一题目内,显然种类繁多,包括从在东北偏僻内陆(内地荒漠)中的极端人格政治到在威权统治期间在里约热内卢州由官方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MDB)实践的更现代的侍从主义等形式。在所有传统政治的形式中,突出的政治分歧的基础是建立在特殊的问题而不是大众关注的问题之上的,并且派系是由个人小集团定义并且认同个人小集团的。

② 我把这种说法部分地建基于1990年选举的结果上。在工人党候选人 Luis Inácio “Lula” da Silva 在1989年总统选举中获得不少选票的一年之后,传统政客强势回归拿下一系列州长选举,工人党的候选人遭受了不成比例的选举下滑。Bolívar Lamounier, “Brazil: Inequality Against Democracy”, in Larry Diamond, Juan J.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s.,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ol. 4: *Latin America*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 153, 把1987年后攫住联邦政府的“野蛮的侍从主义”描绘为巴西的“杰克逊时代”。此外,目前的研究证实,巴西侍从主义的系统实践还是像以前一样普遍。Barry Ames, “Electoral Strategy and Legislative Politics in Brazil, 1978–1990”, 进度报告, 3 April 1991; Scott Mainwaring, “Clientelism, Patrimonialism, and Economic Crisis: Brazil Since 1979”, 论文发表于 the Congress of the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 C., 4–7 April 1991。

威权政权的政治和经济计划是助长还是破坏了国家—社会调节网络的遗产。

在巴西,军方一开始所继承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特殊模型,就限定了它的政治计划。它举行选举、缓和高压统治的最初决策,可以追溯到庇护主义的事实——通过向国家依赖的人群选择性输送国家资源,确保社会对寡头政治和半竞争性政体的支持,这一经典的调节方式直到政变发生时一直运行良好,有效控制了社会和政治冲突,支撑着半竞争性政体的运转。因为既有的国家与社会调节网络可以被修复,所以军方要在不同基础上重建它们的努力受到了抑制。

随后,军方的政治优先策略和经济政策强化了既有的网络。即使允许选举政治发挥功能时,军政府也要下大力气瓦解民粹主义,镇压并有效关闭了曾在战后竞争性政体中调节劳动权益的社团网络。与此同时,通过扩张国家在经济领域的生产和分配角色,扩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范围,军政府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代理人阶级。在其统治的第二个十年,军方调节网络乏力,并成为一个大问题,导致在选举中遭受重大挫折。迫于重建政权的社会支持动员方式的需要,军方释放了庇护网络的活力,而这些曾是其政治遗产的组成部分。此外,军方的经济计划助长了那些传统上曾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特别有效调节方式的庇护网络,并使它们更普遍、更有效、更顽强。由于巴西军方不能有效管制国家的庇护网络,所以要复兴这些网络,便要求重建能够按政治上有利的方式分配国家资源的团体——那些老练的、传统的政治精英,他们在官僚—威权统治的第一个十年,曾被有意弃用,但仍然在国家政权的较低层级上幸存下来。最终,擅长调解并且掌管着接触社会的那部分国家机器的传统政治精英,在军事精英——他们虽然在战略层面位居国家等级高位,但缺乏跟社会的联系——掌控的国家里,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鉴于区域政治在联邦政体的国家—社会关系中具有突出地位,本文选取米纳斯吉拉斯州的政治和行政生活,作为论点的经验支持。该

州传统上是巴西最重要的州之一；有学者观察到，该州发生的事件是全国层面事件的一个缩影。^①但是，该州的许多例证无法在一个章节的篇幅中呈现；^②为了将理论观点放在经验背景之中阐述，细节被省略了。我的行文路线是：勾画军政府的计划，它的局限，以及它的修正。

军政府的计划

巴西军方掌权时所继承的是一个正在运行的以包容为基础——农民被引人注目地排除在外——的民粹主义体制。军政府当局最初的优先目标是解散这一民粹主义体系。在这方面，它是成功的。实际上，军方很快就驯服了工会，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其手法是开除或关押“激进的”工会领袖；工会的行政管理权和社会保障分配权——后者是被称为 *pelegos* 的工会领袖的权力基础——转移给国家的技术官僚部门；民粹主义政党，其中包括巴西劳工党（the Brazilian Labor Party, PTB）和进步社会党（the Progressive Social Party, PSP）的领导层被解散，其手法是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尤其是担任公职的权利。^③1968年，军政府残酷镇压了奥萨斯库市的大罢工，这是之后十年内发生的最后一次大罢工。社团主义者劳工立法的整体安排，被威权政权当作国家控制劳工的大棒。

① Maria das Graças Grossi, “Minas Gerais: del Estancamiento al Boom; una Replica Local del Modelo Brasileo”,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ia*, 39, no. 1 (January-March 1977): 251-267; Luis Aureliano Gama de Andrade, “Technocracy and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Minas Gerai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② 对这一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的书: *Traditional Politics and Regime Change in Brazi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即将出版)。

③ 关于对工会的镇压，见 Kenneth S. Mericle, “Corporatist Control of the Working Class: Authoritarian Brazil Since 1964”, in James M. Malloy, ed., *Authoritarianism and Corporatism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7), pp. 303-338; 关于社会保障分配向技术官僚部门的转移，见 James M. Malloy, *The Politics of Social Security in Brazil*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9), pp. 122-128。

与军政府在遣散劳工、稳定危机中的经济并恢复政治秩序以实施其“防御性”计划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静专注相比,它在追求为国家—社会互动新模式所设计的“进攻性”方案——用加雷顿(Garretton)的术语说,它的“基础性”计划——时,却显得游移不定。军方努力实现国家的去政治化,相信为了提高国家的行政能力和效率,必须将其从那些将个人野心置于国家利益之前的政客的掌控中解救出来,必须将国家同这些政客的心血来潮隔绝开来。然而,怎么推进国家—社会关系重组以实现这个目标,军政府却从未清晰明了地阐述或者毫不含糊地执行过,部分原因是军政府的主张前后并不一致。军方总统翁贝托·卡斯特略·布朗库主政期间(1964—1967)的政治盟友是1945—1964年间三个主要政党和两大精英统治政党之一的国家民主联盟(National Democratic Union, UDN),这一“温和派”给总统所吹的耳边风是该党信奉的反庇护主义和反民粹主义话语;他们的主要意图不是将所有的政客都赶下国家政治舞台,而是让这些政客与根据民调已无法赢得选举的UND结盟,共同执政。另一方面,在1967年到1973年得势的强硬派,对形形色色的职业政客,包括1964年支持政变的那些政客,极端不信任;这些政客被强硬派指责对经济管理不善,未能防止政治分裂和冲突,四处拉帮结派,腐败猖獗,牺牲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最终,两派之间的差异消失了,所有的军方派系都同意采取一项改革计划,以清除国家和政治体系中的所有传统庇护政治的残余。通过强迫地方政治精英放弃对政治体系的控制权,军方统治者希望实现一个百年军事强国梦:摆脱由诸州拼接的政治,缔造一种全民政治,摒弃区域认同和忠诚,建立巴西“强国”(grande potência)。

改造国家—社会关系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策略,既追求政治集权又追求财政集中。在执政的几年时间内,军方掌控了政府的行政部门,扩大了其相对于立法机关的权力,有效地隔绝了来自大众和选举的压力,并使其免于合法性的宪法审查。通过一系列修宪,国会被禁止制定预算,国会对行政部门起草的普通法案和宪法修正案的约束范围受到

严格限制。^① 行政当局被赋予在众多场合便宜行事的特权，颁布的法令完全绕过国会。^② 更有甚者，士气低落的国会的任何反抗行为都会迅速受到惩罚；那些胆敢公然挑战政府的参议员和国会代表，都被逐出国会，剥夺政治权利。

在政府行政部门中，经济控制权集中在由联邦内阁各部、银行和部际委员会组成的一个精选的集团手里——包括计划和财政部门、国家货币委员会、价格委员会、工业发展委员会、巴西银行和中央银行。被任命为这些部委和政府机构首长负责经济决策的是文职和军事技术官僚。^③ 在埃米利奥·厄内斯托·梅迪奇(Emílio Garrastazú Médici)主政期间(1969—1974)，只有29%的联邦内阁部长曾在立法机关中任过职(相比于1946—1964年间的60%)，而超过一半的部长曾是技术官僚，11%是军官。^④ 总统 42 顾问的关键岗位，“内群体”，几乎完全由军事和技术官僚精英所占据。精英

① Brazil, *A Nova Constituição do Brasil* (Rio de Janeiro: Gráfica Auriverde, 1981), pp. 40—45, and Roett, *Brazil*, p. 128. 根据 Robert Wesson and David V. Fleischer, *Brazil in Transition* (New York and Stanford: Praeger an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3), p. 82, 在 Médici 担任总统期间 100% 的行政部门发起的议案都获得了通过。Olavo Brasil de Lima Júnior, “Mudança política e processo decisório: análise da política orçamentária brasileira”, *Dados*, 14 (1977): 141—163, 论证了对预算的控制向行政部门的有效转移。

② 在 Castelo Branco (1964—1967) 执政期间，颁布的六千条法律都获得了通过，而在 Costa e Silva (1967—1969) 执政期间，有四千条获得了通过。Philippe C. Schmitter, “The ‘Portugalization’ of Brazil?” in Stepan, ed., *Authoritarian Brazil*, p. 190; and Ronald M. Schneider,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Brazil: Emergence of a “Modernizing” Authoritarian Regime, 1964—197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00.

③ Thomas E. Skidmore, “Politics and Economic Policy Making in Authoritarian Brazil, 1937—71”, in Stepan, ed., *Authoritarian Brazil*, pp. 3—46; Peter J. McDonough, *Power and Ideology in Braz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Schneider,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Brazil*; Barry Ames, *Rhetoric and Reality in a Militarized Regime: Brazil Since 1964*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3); Luciano Martins, *Estado Capitalista e Burocracia no Brasil pós 64* (Rio de Janeiro: Paz e Terra, 1985); Cândido Mendes, “The Post—1964 Brazilian Regime: Outward Redemocratization and Inner Institutionalizatio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15 (Winter 1980): 48—74; Luiz Bresser Pereira, *Development and Crisis in Brazil, 1930—1983*, trans. Marcia Van Dyk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4); and Malloy, *The Politics of Social Security in Brazil*.

④ Edson de Oliveira Nunes, “Legislativo, Política e Recrutamento de Elites no Brasil”, *Dados*, 17 (1978): 61.

招募模式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卡多索(Cardoso)把国家机器的顶层描述为军方和官僚的围猎场。^①

军方强化全民国家所采用的第二个主要手段是通过财政集权来清除国家行政管理中的庇护主义。传统上,地方社区的经济生活依赖于国家的发展项目、公共部门就业和社会服务的支持,这种依赖性促发了一种有利于传统精英的政治庇护主义方式。这些精英控制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分配国家资助资源的部门,如教育和公共工程部。军方集中国家财政的意图是使庇护网络的资源枯竭,使联邦—州—地方的关系去政治化。为达此目标,军政府在1965年通过了一个彻底的一揽子财政改革计划,将财政收入集中到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的收入则通过一个收入分享项目获得,其中转移支付的支出预先受到严格的限制;换言之,军政府此举将市一级政府从对州的依赖转移到对中央的依赖。总的看来,经济部门中技术官僚的出位连同财政改革,都一心想消灭传统政治,把传统政治精英从国家舞台上清除出去。

然而,在军政府实施其改造国家计划的同时,军方仍允许政治像往常一样运行。在南美军事统治者中间,只有巴西军政府急于为自己的统治披上一层合法面纱而允许国会和州议会——虽然作为立法机构的功能已经被阉割——在威权统治时期继续召开;^②而且,绝大多数国会和州议会议员的职位,以及所有地方官员(除了总统、州长和州首府与国家安全区的市长之外)仍然是直接选举,尽管选举规则被不断操弄,徒有政治竞争和代表权的表象。^③1965年在两个重要的州“输掉”州长选举后,军

①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utoritarismo e Democratização* (Rio de Janeiro: Paz e Terra, 1975), pp. 178-179.

② 国会会有两次被短暂关闭:一次是在1968年12月,国会拒绝为它的一名因“侮辱了军方尊严”的演讲而触犯了臭名昭著的 Institutional Act No. 5 的议员 Marcio Moreira Alves 解除国会豁免权后;另一次是在1977年,当局颁布旨在保护政府党占多数的选举措施的“四月一揽子方案”时。

③ Cf. Bolivar Lamounier, “O Voto em São Paulo”, in Bolivar Lamounier, ed., *Voto de Desconfiança: Eleições e Mudança Política no Brasil, 1970-1979* (São Paulo: Vozes/CEBRAP, 1980), p. 48. 在1974年选举之后,1/3的参议院席位不再由直接选举产生,而是成为指定席位。

政府取缔了现存的政党并创建了两个新政党：一个是亲政府的国家革新联盟(the National Renovating Alliance, ARENA)；另一个是官方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the Brazilian Democratic Movement, MDB)。MDB的选举前景实在不妙，以至于它在接近十年的时间里没有认真将自己当作一个政党。尽管政治剧场如此荒诞无稽，但绝大多数议员职位和一些行政职位的定期直选，对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调节仍有重大的意义。

43

国家转型的限度

在军事统治行将结束之时，很明显的现象是，尽管政治在国家层面发生了变化，但是官僚—威权制在巴西各州和各地方政治中几乎纹丝不动。州内阁的组成多多少少是政变前的翻版；政变前的传统精英在军事统治环境下依然官运亨通；庇护主义在实践中持续存在——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国家资源以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方式进行分配。

国家精英

在首都巴西利亚以外的地方，技术官僚对国家机器的篡夺是有限的。大多数州长即使是由军方任命的，都是职业政客。在1970年和1974年被任命的22名州长中，14名曾担任过民选职位；1974年那一届的州长比1970年的同僚享有更好的政治关系，尽管两组人都是从既定的区域政治圈挑选出来的；并且，1970年任命的州长中有三名是军人，而最后一拨人中则没有一个行伍出身。^①同样，州内阁成员因政变而发生的变动只是暂时的，而且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当时大部分内阁部长的提拔，都是因为家庭关系或通过政治渠道。在米纳斯吉拉斯州，政权更迭后，

① Margaret Sarles Jenks, "Political Parties in Authoritarian Brazil", 博士论文, Duke University, 1979, pp. 335, 361 - 362, 380, 385; and Nunes, "Legislativo, Política a Recrutamento", p. 60.

“技术官僚”——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其他那些有着良好教育或工作经验的技术能手,进入州内阁的比重提高了:1971到1975年间达到顶峰,占55%,之后便开始下降。^①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职业政客再一次因他们的政党服务和投票动员能力而获得了回报,当时被任命的州内阁成员64%来自民选官员行列。在军政府统治期间,并没有出现技术官僚精英持续地、决定性地取代职业政客的局面,也没有哪一种新的精英招募模式在军事统治结束后继续存在。

在后政变威权体制中,米纳斯州1964年政变之前的许多政要,根本谈不上被政治中立化并赶出州政治舞台,反而在军政府统治的环境下混得不错。五分之二的前政变政治精英在政权更迭后的州政府行政部门中任职,另有15%在州和联邦立法机关与亲政府的国家革新联盟党的高层中任职;并且,当潜在的“政治幸存者”领域开始缩小以反映人口统计学的变化(在1974年以前,10名政治精英过世)时,前政变精英的政治存活率上升到三分之二。此外,政治精英曾是并且多数仍是传统精英。后政变时期,几乎四分之三的州内阁成员、副州长和州首府的市长可以被归为传统精英:他们拥有“寡头政治遗产”(都出自该州的27个“政治世家”之一)或在政界的年长亲戚,或者已经组织“寡头”政党^②。在政变后,传统的政治精英甚至比“非传统的”政治精英过得更好。前政变精英传统分支的存活率(61%)明显高于前政变精英非传统分支的存活率(47%)。最明显的也许是,后政变精英的所有成员,除两人以外,或是拥有前政变时期的完整的政治履历,或是其年长的亲戚有这样的履历。如果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例子是典型的话,那么军政府所倡导的巴西精英更替计划便惨淡收场:这个精英阶层比1956到1964年的合理竞争时期更

① Hagopian, *Traditional Politics*.

② 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二十七个统治家族”被大胆地界定,见 Cid Rebelo Horta, “Famílias Governamentais de Minas Gerais”, in Universidade de Minas Gerais, *Segundo Seminário de Estudos Mineiros* (Belo Horizonte, 1956), pp. 45-91。来自 Rebelo Horta 已出版的关于这些家族的成果,以及在区域报纸上关于这个故事的更新(*Estado de Minas*, 18 January 1981),我能够追溯属于这些家族的官员的家族世系。

加封闭。

财政改革,庇护主义复兴

军政府在清洗政治体系中的庇护政治方面,并不比清除州内的传统政治精英更加成功。军政府雄心勃勃的财政集权计划,既没有剥夺州政府的资源,也无法让各州遵从联邦开支的优先次序;来自地方层面的大量证据表明,税收集集中征管并按联邦政府的指导方针固定转移,对于地方的开支模式几乎没有影响;1971年,各政府机构的开支模式差异非常大。^①特别是在米纳斯吉拉斯,通过州的资源、转移的资源以及购买的资源,该州寡头保持了集结充足资源以维持其庇护活动的能力。^②在威权政权期间所引入的财政集权和决策集中,并没有使区域资助的控制权从地方传统精英手里转移到联邦政府和技术官僚决策者手里。充其量,它在州和联邦的精英之间形成了一个僵局,市一级政府的依赖性依然是双方都要争取的一笔政治资源。

在军政府统治期间,这些项目的管理并没有被去政治化。尽管全国性政策由技术专家制定,财政和计划部门也由他们控制,职业政客仍把持着或者重新获得了大多数资源资助部门负责人职位;并且,各州资源配置到市政府及市民的渠道,继续分别由职业政客出身的州长与联邦或州议员管理和运作。议员依靠其输送国家资助资源的能力来赢得选民的支持;一旦当选,不论是议员自身还是他们的支持者,都认为议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庇护选区选民。一项有关米纳斯吉拉斯州议员于1968

①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Administração Municipal (IBAM), *O FPM e a Política de Receitas Vinculadas* (Rio de Janeiro: IBAM, 1976), pp. 41–57, and *Municípios do Brasil: Quinze Anos Depois* (Rio de Janeiro: IBAM, 1975), p. 53.

② 在20世纪70年代,该州借债开始经常超过其总收入的10%,在某些年份,借债多达该州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Secretaria de Estado de Planejamento e Coordenação Geral (SEPLAN), *Comportamento da Economia Mineira Período 1960–1977*, vol. 6; *Setor Público* (1978), pt. 2, pp. 355, 356. 根据来自该州财政部门的数据,在1980年该州21%的收入以及在1981年该州19%的收入来自借债,一些来自国外的开发银行。

1969年间(威权政治的顶点)活动的调查显示,83%的议员报告说,帮忙找工作是他们收到的最频繁的诉求。^①类似地,“多数代表”机制作用于整个威权统治时期:多数代表——特定城市中获胜政党的候选人中获得最多选票的那个代表——在该市赢得“政治指挥权”,或赢得安排公职和做出其他公共部门决策的特权。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国家计划的资源分配是如何政治化的。在米纳斯吉拉斯州繁华的南部中心地带,有一个大约有10万居民的特别有活力的城市——瓦尔吉阿市。在1976年选举中,该市时任市长抵挡住了来自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MDB)的强力挑战;该市副市长在1981年自夸称,他所在的城市被纳入到中级计划,或“堤城”(“Dike Cities”)计划,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一大批公共工程。^②他透露,瓦尔吉阿一开始并没有出现在初选城市名单中,但在市长埃杜尔多·奥托尼(Eduardo Ottoni)的力争下,该市最终被纳入该计划。^③在库尔韦卢(Curvelo)这个一度强大现在日趋衰退的农业中心城市,一位颇受欢迎的反对派市长,在第三个任期(非连续任职)内,无法抗拒州长的提议和贿赂,而投向了亲政府的政党——当时称为民主社会党(the Democratic Social Party, PDS)一边。正当他所在的城市及其郊区遭受经济停滞时,他被邀请到州长的周末会所,得到了一系列新的公共工程项目的承诺——包括一个新的公共汽车站和一个低收入住房计划——前提是他改变政党倾向。这位贫穷市长同意了。在他投向民主社会党之后,有关低收入住房、电气化、电信通讯、道路、桥梁和城市发展的协议便马上由州政府递送到了市政当局。马图斯将库尔韦卢市从州和联邦政府那里受益水平立竿见影拉升的巨大变化,归因于他向民主社会党的

① Tocary A. Bastos and Thomas W. Walker, “Partidos e Forças Políticas em Minas Gerais”, *Revista Brasileira de Estudos Políticos*, 31 (May 1971): 147.

② 堤城是所谓的阻止从中心—南部的东北地区 and 农村地区向州首府和圣保罗的大城市地区移民浪潮的预期角色。通过在住房、城市基础设施和创造就业中的投资,希望这些城市可以吸引过往移民永久定居。

③ 对 Ronaldo Venga 的采访, Varginha, 13–14 October 1981.

投诚。他实事求是地解释：“如果我继续站在反对党立场上，将会一无所获。”^①

军政府计划受限：寻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节

为什么军方在试图清除州传统政客和庇护政治时失败了？在威权政权鼎盛时期著述的多数学者被说服接受以下观点：即军政府可以完成计划，因为它指挥着州的专政力量，指挥着那些掌控着经济资源和决策的政府机构，迄今为止对军政府计划“失败”的解释，都被归因于军政府的选择或错误。^②这个观点说透彻了就是，军政府除了最初采取财政集权之外，并没有真正想清除州政治中的庇护主义和传统政客，或者说，由于没有利用精英内部的争斗，军政府未能抓住现有政治良机。深入地看，这个理论视角忽视了一个问题，即掌控“州政”的精英，怎么获得社会支持或者克服阻力；并且，这一视角也未能理解军政府必须在其中做出战略决策 46 所受的限制。

为什么巴西军方无法如其所愿改变国家、改造社会？如果我们把视角集中于军政府求助于国家—社会的调节以实施计划时所受到的限制，或者通过检视国家—社会关系互动的历史模式中所体现的激励和机会结构，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更好的解释。十多年前，吉列尔莫·奥唐纳(Guillermo O'Donnell)就洞察到，由于官僚—威权政权限制公民权，排除大众参与政治体系并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他们为整个国家执政的说

① 对 Olavo de Matos 的采访，Curvelo，9 October 1981。

② 至少有三个重要的例外。Juan J. Linz, “The Future of an Authoritarian Situation o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Brazil”, in Stepan, ed., *Authoritarian Brazil*, pp. 233–254, 预计巴西军方将缺少一个依靠其使得统治合法化的方案。在对关于在阿根廷使翁加尼亚政权制度化的困难中，William C. Smith,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Argentine Political Econom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60, 指出了“消除调解机构和排斥民众既构成了阿根廷威权计划明显不容挑战的权力，也造成了它的极端脆弱和异常僵化”的悖论。Garretón, *The Chilean Political Process*, 也提供了关于这些“新的”军事政权演变的复杂论述。

法显然是空洞的,他们的统治表现为赤裸裸的控制。^①他警告说,这对于他们的统治制度化来说是个不稳且最终不当的方案。在巴西,这种张力更为紧迫,寻求解决方案势在必行,因为该政权大量增加了国家接触社会的机会。它扩大了国家的生产、监管、提取和分配能力,即使是在军事镇压的高峰期也允许政治运作。^②军政府确定其政治制度和经济战略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它的政治遗产的塑造和约束,那些初始阶段的局限反过来迫使军事计划做出修正。

历史遗产

巴西政治体系是精英统治的。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大多数巴西公民被纳入政治生活,即便此言不虚,那么也是通过被州严格控制的社团主义和庇护网络招纳的。正式的社团机构建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意在规范所有阶级代表尤其是劳工阶级代表的功能网络。社团主义劳工法禁止组织成员之中出现多元代表而彼此竞争;由此,公民社会的诉求被分割,涣散无力,受制于国家。^③庇护主义则控制并扭曲了政党以及国家与社会中间地带的绝大多数组织形式。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旧共和国时期的共和党、战后时期的社会民主党

① Guillermo O'Donnell, "Tensions in the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State and the Question of Democracy", in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pp. 294-298.

② 从1967年到1973年,有108家联邦国营企业被添加到了国家部门。Braz José de Aratijo, "Intervencao Econômica do Estado e Democracia", in Carlos Estevam Martins, ed., *Estado e Capitalismo no Brasil* (São Paulo: Hucitec-Cebrap, 1977), p. 238. 到1983年,有683个公共部门公司(195个联邦公司,372个州公司和116个市公司),其中许多支配着石油、运输、采矿、冶金和经济中的公共事业部门。此外,超过一半的巴西金融机构是国有的。Visao, "Quem é Quem na Economia Brasileira", 32 (31 August 1983), 35A; 431. 关于国家的财政、监管和生产作用的扩张的概述,见 Werner Baer, Richard Newfarmer, and Thomas Trebat, "On State Capitalism in Brazil: Some New Issues and Questions", *Inter-American Economic Affairs*, 30 (Winter 1976): 69-96.

③ Philippe C. Schmitter, *Interest Conflic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Brazi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and Kenneth P. Erickson, *The Brazilian Corporative State and Working Class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SD)以及威权统治时期的国家革新联盟,在履行代表功能和利益聚合功能方面,都表现糟糕;它们和区域性寡头的庇护机构无甚差别,而且从历史上看,巴西政党体系的重要分化,是在有机会获得国家资助的“内党”(situação)和没有机会获得国家资助的“外党”(oposição)之间的差别。

历史上,巴西庇护主义首先是由传统政治精英所践行的,这群精英是区域寡头的成员,既享有全国性声望,又得到地方性盟友——市和内陆镇的政治头领——的拥护。¹ 与其他所谓职业政治家和非传统或现代政治精英不同,传统政治精英彼此关联,世代相交,并通过高度人格化的、47最主要以家庭为基础的庇护网络来实现控制。“典型的”传统政治家,可能是一位参议员或州长的孙子或孙女,就学于一所著名的预备学校,随后从联邦大学获得法律学位,作为大学毕业生进入政坛,在地方政治中赢得第一次选举,接着,在州议员选举中,展示了他们雄厚的地方实力。他们家族的土地通常要么出售要么再分,家庭财产已转移到金融和其他现代经济活动部门中去。传统政治精英包括并代表农业精英、出口商、工业家和银行家,而从顶层寡头到偏远的地方大佬的政治权力,建立在获得国家资源渠道之上。

即便在公权力尚未能渗透整个国家的发展初期,大多数区域的私人精英也没法自主掌握政治权力资源,只有通过公共领域行使权力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只有在他们对该州的寡头有用时才能保住政治地位。在最著名的称为 coronelismo 的政治庇护主义形式中,地方政治大佬 coroneis(他们多数是地主),在农村充当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

1 这些区域性寡头是政治的,并且不应该与在该世纪之交占据主导地位的“出口寡头”混淆,虽然他们的成员可能出于那一精英集团。他们的数量相对较小,他们的队伍相对封闭,并且他们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调解者。^[1] coronéis 为庇护对象提供生计、公平并保护他们不受警察和当地敌对势力的侵害,由此要求他们在政治上效忠自己;反过来,coronel 将这种效忠转移给自己的领主——无论是当权的国家寡头还是他们的反对派,以换取国家资源或对他们未来的承诺。地方政治大佬和他们的竞争对手不得不支持国家寡头或其竞争对手,因为他们的城市在财政上依赖于国家、军事上受制于国家的干预。因此,即使最大的地主也需要国家支持以继续在本地掌权,唯恐在国家直接或间接干预下,自己被对手所取代。

经济发展未曾破坏国家精英与普通公民之间传统的恩庇关系。与此相反,政治庇护主义在旧共和国时期曾被传统精英用来输送选票,在二战后伴随民主过渡而出现的政治参与激流中幸存下来,在巴西国家主导的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化社会过程中更是无处不在。当然,政治庇护主义也变得现代了,从原本的领主与农民之间的私人事务,转变成一项以国家为基础的体系。^[2] 在过去 30 年的农业现代化革命中,农民被驱逐出农村地区,产生了一大批城市移民;他们多半没有进入工业和现代服务业,而是变为季节性农业劳动者、建筑业和个人服务业的临时工以

[1] 见 Antônio Octavio Cintra, "Traditional Brazilian Politics: An Interpret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Center and Periphery", in Neuma Aguiar, ed., *The Structure of Brazilian Development*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Books, 1979), pp. 127 - 166; Eul-Soo Pang, "Coronelismo in Northeast Brazil", in Robert Kern, ed., 在 Ronald Dolkart 的协助之下, *The Caciques: Oligarchical Politics and the System of Caciquismo in the Luso-Hispanic World*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3), pp. 65 - 88; 还有经典作品, Victor Nunes Leal, *Coronelismo: The Municipali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Brazil*, trans. June Henfre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起初以葡萄牙语发表,名为 *Coronelismo: Enxada e Voto. O Município e o Regime Representativo no Brasil* by Revista Forense (Rio de Janeiro, 1949)。

[2] 类似的观点已经提出,见 Ronald H. Chilcote, *Power and the Ruling Classes in Northeast Brazil: Juazeiro and Petrolina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更一般的观点见 René Lemarcha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Clientelism: Structure, Process, and Optic", in S. N. Eisenstadt and René Lemarchand, eds., *Political Clientelism, Patronage, and Development*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81), pp. 7 - 32。

及其他“边缘性”低报酬的第三产业劳动者。^①对于这些介于农业和工业之间的阶级,公共机构提供了部分或全部物质支持,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和临时的工作,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卫生、交通、住房),提供转移支付、信贷支持等等。随着受庇护人口的依赖性从土地转向国家,地方政治大佬的权力越来越立足于他们作为政治调解者的角色,他们的统治地位要靠与国家精英结盟的效力。在区域层面,建立阶级统治最重要的物质资源是分配公共资源的特权,而这一点转而来来自于对国家机器的控制。

在巴西,这些历史和现代形式的国家—社会调节的有效性,有助于解释巴西军政府为什么要推行选举,这也许是官僚—威权政体在其存续期间最为温和的表现了。^②巴西军方对冲击巴西社会总体上保持克制,尤其是对政治精英保持克制,这不仅仅因为军方对于威权主义态度暧昧,缺乏政治锋芒,而且内部意见不统一;或者,甚至也不仅仅因为一个政治多元主义传统所施加的民间精英对独裁的限制,迫使军方想方设法保留其统治的合法性(这是对军方举行选举决定最常见的理由了),^③而且因为传统的由精英主导的庇护网络按南锥体的标准仅略微有些功能失调而已。不像在智利,那里强大的意识形态化的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

① 巴西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36%,上升到了1980年的73%。Vilmar Faria, “Desenvolvimento, Urbanizacao, e Mudancas na Estrutura do Emprego: A Experiencia Brasileira dos Ultimos Trinta Anos”, in Bernardo Sorj and Maria Herminia Tavares de Almeida, eds., *Sociedade e Politica no Brasil Pós-64* (São Paulo: Brasiliense, 1983), p. 131.

② 相比在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失去政治权利和生活的人数较少。根据由São Paulo的总主教收集的军事法庭记录的军事镇压报告*Brasil: Nunca Mais*,巴西政府是造成从1964年到1981年“只有”333人死亡的原因,按人口平均死亡人数计算,只及邻国阿根廷的百分之三。该政权还显示出宽大:在镇压的鼎盛时期(1969年—1973年),最高军事法庭对它之前承接的4511案子,和从1965年到1977年整个时期的6811的案子作出无罪宣判。Thomas Skidmore,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 1964-8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32. 只有约500人失去了他们的政治权利。

③ Bolivar Lamounier, “Authoritarian Brazil Revisited: The Impact of Elections on the Abertura”, in Stepan, ed., *Democratizing Brazil*, pp. 45-51.

最终使政治体陷入阶级斗争；¹也不像在阿根廷，庇隆主义经济政策和政治策略催生了以公民社会内部持久冲突为标志的“大众普力夺主义”；²在巴西军事政变前夜，社会动员和社会冲突规模适度，原有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节渠道预先阻止了政治多极化和阶级斗争。巴西劳工没有被很好地组织起来，工会运动对既有秩序的威胁相比于邻国官僚—威权政权中更激进的工人协会来说也更小。跟乌拉圭也不一样，在那里，20世纪初由巴特列·奥多涅斯（Batlle Ordóñez）总统建立的“早熟的福利国家”把广泛的社会阶层纳入国家的分配网络，并且第二代和第三代“受庇护者”逐渐把国家福利看作应享权利，而不是要求互惠的政治代表施予的恩惠——这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手伸得太长的国家在遭遇经济停滞时无法阻止合法性的衰退，以及“保姆式”国家为什么会被消耗殆尽。³在巴西，新生受庇护者对国家以定向方式提供的所有福利都表示欢迎，这种福利品类越多越好。经济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十分强劲，1964年政变引发的经济危机也不是源于结构性滞胀。事实上，“深化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已取得长足进展——而是

49 源于一种完全可治愈的通胀。⁴在巴西，“民主实验”的失败非但不是不

1 Arturo Valenzuela,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hil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2 关于“大众普力夺主义”是高度政治化氛围的描述，见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80, 88, 196。见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and Carlos Waisman, *Reversal of Development in Argentina: Postwar Counterrevolutionary Policies and Their Structural Consequen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关于这一观点对阿根廷的应用。

3 该术语来自 Juan Rial, “Continuidad y Cambio en Las Organizaciones Partidarias en el Uruguay: 1973-1984”, in Marcelo Cavarozzi and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eds., *Muerte y Resurrección: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en el Autoritarismo y las Transiciones del Cono Sur* (Santiago: FLACSO, 1989)。

4 José Serra, “Three Mistaken Theses Regard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p. 117, and Michael Wallerstein, “The Collapse of Democracy in Brazil: Its Economic Determinant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5, no. 3 (1980): 3-40.

可避免的,而是被归咎于两个完全可避免的现象:一个无能总统的愚蠢行为和政党体系的过度分化。^①

难以调节的威权统治

巴西军方在其政治遗产的重压之下做出的战略决策,反过来限制了其未来的政治选择余地。由于举行选举,巴西军政府就不能像智利、阿根廷以及至少在士兵开始考虑规划民主过渡之前的乌拉圭军方所做的那样抛弃政客。在乌拉圭政变后一年,左翼广泛阵线中的派系遭到系统铲除,他们的印刷机被没收,领导人被逮捕,而传统的政党——白党(the Blancos)和红党(the Colorados)——被“暂停”。^②在1976年,一万五千名政客被剥夺政治权利15年。在智利,军政府关闭了国会,取缔了民选地方政府,并且不允许开展政党活动,甚至私人组织和协会内部的选举也遭到当局的限制或监视。^③在阿根廷,至少有9000名工会负责人、政党干部、教师和学生积极分子死于一场“肮脏的战争”。^④军事镇压行动特别瞄准庇隆主义者。^⑤而巴西军政府采取的即便是“温和”的镇压行

① Alfred Stepan,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Regime Breakdown: Brazil", in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eds.,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Lati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20 - 133; Wanderley Guilherme dos Santos, "The Calculus of Conflict: Impasse in Brazilian Politics and the Crisis of 1964",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79, *Sessenta e Quatro: Anatomia da Crise* (São Paulo: Vertice, 1986).

② Charles Guy Gillespie and Luis Eduardo González, "Uruguay: The Survival of Old and Autonomous Institutions", in Diamond, Linz, and Lipset, eds.,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atin America*, p. 220.

③ Arturo Valenzuela, "Chile: Origins, Consolidation, and Breakdown of a Democratic Regime", in Diamond, Linz, and Lipset, eds.,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atin America*, p. 159.

④ 一些非官方的估计规模高达两万。

⑤ Marcelo Cavarozzi, "Peronism and Radicalism: Argentina's Transitions in Perspective", in Paul W. Drake and Eduardo Silva, eds., *Elec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1980 - 85* (San Diego: Center for Iberian and Latin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86), p. 155.

动,也只是迟疑不决地指向政客,而且几乎完全没有指向传统政治精英。

起初,巴西军政府举行选举的豪赌看上去很值得。随着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MIDB)士气低落和组织紊乱,并且趁着非凡的经济增长(然而其果实分配不均)浪潮,国家革新联盟(ARENA)在1970年的国会选举和1972年的市政选举中都取得完胜。在许多农村地区,国家革新联盟候选人都未受到巴西民主运动的挑战。出于对1974年选举必胜的信心,军政府决定举行相对自由的选举,力挽合法性于既倒——不断下降的投票率显示了这一危机,并挑战传统精英。^①然而,在1974年的国会选举中,军政府遭到了意外的挫败。巴西民主运动在参议院选举中赢得了22个议席中的16个,并且增加了在众议院中的席位份额,从28%增长到44%(该党当选议员有172名,而国家革新联盟则是192名)。它还控制了5个额外的州立法机关(在选举之前,它仅在瓜纳巴拉州持有多数议席)。^②巴西民主运动发起的有效的宣传攻势,采用的抗议民生经济问题的策略,使之获得了以往在投票日闭门不出、投空白票或破坏选票的那些选民的支持。总而言之,该党利用了一股强劲的抗议潜流。

50 军方被1974年的选举惊呆了,并把失败解释为自身政治孤立的证据。为避免重蹈覆辙,军政府对其政治计划大动手术。虽然并没有面临

① Linz, "The Future of an Authoritarian Situation"; O'Donnell, "Tensions in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State"; Barry Ames, *Political Survival: Politicians and Public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Lamounier, "Authoritarian Brazil Revisited"; Scott Mainwaring,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Brazil" (Kellog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66, 1985); Bolivar Lamounier and Alkimar R. Moura, "Economic Policy and Political Opening in Brazil", in Jonathan Hartlyn and Samuel A. Morley, eds.,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Financial Crisis and Political Chang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6), pp. 165-196.

根据 Margaret Sarles, "Maintaining Political Control Through Parties: The Brazilian Strategy", *Comparative Politics*, 15, no. 1 (October 1982), 45, 70, "技术专家导向的军方,因恶传统的腐败选举实践,系统清除了选举名单中的虚假选民,这不成比例地剥夺了国家革新联盟的许多选民"。在一些东北部州,剥夺了差不多25%到50%的选民。

② Roett, Brazil, pp. 116-117; Maria Helena Moreira Alves, *State and Opposition in Military Brazil*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5), pp. 144-145. 直到1975年,瓜纳巴拉仍是包括里约热内卢州。

彻底失败,也没有到交出权力的地步,军政府还是迅速且果决地采取行动捍卫了自己的选举优势。它首先通过操纵选举强化国家革新联盟(ARENA);它指定了参议院 1/3 的议席(若非如此,军政府所在的党便会失去参议院多数),并限制政党使用大众传媒的机会。^①然而,它也认识到,长远之计在于提高政治支持度,也采取了相应战略来提高政治支持度。随着巴西精英社会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天主教会和资产阶级,脱离威权政府联盟并加入了对威权政府攻击的行列,这个需要便愈加急迫了。^②面对内部分裂、日益激进的工会运动、敌意日涨的公民社会以及中心城市日益下降的民意支持,军政府只能寄希望于延长“撤退中的影响力”。^③一旦接受了这一命数,军政府就放弃了改造国政的政治宏图。

军政府计划的调整

军政府受政治遗产的掣肘而做出的修改计划的策略选择,与一开始的政治决策没有两样。为挽回人心,军政府所采取的第一步是刺激经济避免衰退,即使是到海外大量举债来填补第一次石油危机和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窟窿也在所不惜。^④历经多年的压缩工资以吸引外资、促进增长和对抗通货膨胀的努力告吹之后,埃内斯托·盖泽尔(Ernesto Geisel)及

① Alves, *State and Opposition*, pp. 144, 147.

② 关于来自执政联盟的资产阶级的背叛,见 Luciano Martins, “The ‘Liberalization’ of Authoritarian Rule in Brazil”, in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art 2: Lati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72 - 94;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O Colapso de uma Aliança de Classes* (São Paulo: Brasiliense, 1978); and Philippe Faucher, “The Paradise That Never Was: The Breakdown of the Brazilian Authoritarian Order”, in Thomas C. Bruneau and Philippe Faucher, eds.,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Brazil's Contempora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McDonough, *Power and Ideology in Brazil*, 是聚焦于“在巴西权势集团内部导致威权主义毁灭的紧张局势”的第一批作品之一(p. xix)。

③ Ames, *Political Survival*.

④ Lamounier and Moura, “Economic Policy and Political Opening”, pp. 167 - 185.

若昂·菲格雷多(João Figueiredo)政府当局都卖力增加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盖泽尔的首倡没有成功,但菲格雷多在1979年实施的一项修正案,事实上是掏高收入者的腰包补贴低收入者。^①

然而,这一策略很快就显得不切实际,把国家革新联盟(ARENA)重新拖回庇护主义宿命中去。通过庇护体系收买选票,要比通过涨工资收买低收入人群,在经济上来得合算,对政府反通胀政策的伤害也更小。^②在政治策略上,诉诸大规模的庇护关系之所以可行,要归因于当局的经济计划,这些计划早已壮大了庇护网络。巴西军方所追求的经济模式,首先是国家在生产 and 分配中的角色扩张,这既扩大了国家庇护体系运作的资源基础,也扩大了依赖于国家赞助的项目的受益人的数量。在米纳斯吉拉斯州,1960年至1977年之间州政府的人均支出在扣除物价因素后翻了近三倍,^③州立机构和半官方机构的数量也翻了三倍,^④单单州政府的直接雇员也几乎翻了一番。涉及政府活动的间接就业量也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在与住房相关的建设工程中。^⑤

本着这一新策略,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后期,盖泽尔和菲格雷多政府扭转了政府在社会项目上的优先支出次序,并完全卸下了通过州来操弄庇护关系的伪装。农业信贷重新导向小农户,为穷人和中下收入阶层提供的公共住房数量大增:新建单元房从1971年的7831套增加到1980年的近20万套。^⑥通过各州政府,这些庇护项目惠及广泛的社会阶层。在米纳斯吉拉斯这个城乡发展计划加速推进的地方,住房计划的目标是为该州大约15%人口提供住所。最雄心勃勃的城市发展计划是“堤城”计划。该计划为16个中等规模城市200万低收入居民(占该州1/7的人

① Ames, *Political Survival*, p. 198.

② Ames, *Political Survival*, p. 206.

③ Fundação João Pinheiro, *Análise da Evolução da Despesa Pública do Estado de Minas Gerais: Administração Direta, Autarquias, e Fundações*, vol. 3 (Belo Horizonte: Fundação João Pinheiro, n. d.), pp. 141, 145.

④ SEPLAN, *Comportamento da Economia Mineira*, pp. 252, 254.

⑤ Ames, *Political Survival*, pp. 157, 168.

(1) 提供基本卫生设施、基础设施、健康和教育、劳动培训、信贷和收入增长机会。为小土地所有者提供的农业信贷使约 7 万人受益,占该州所有小农业生产者的 1/5。^①在米纳斯吉拉斯州,1980 年 90% 的农业信贷是由公共机构放出去的。^②

分配这些城乡项目资源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的选举利益。它是通过特定政治人物的居间调配实现的,而不依循任何可预测的选举门道。争取受欢迎的反对派人物到自己的阵营,是国家革新联盟 (ARENA) 为获得选举支持惯用的一种政治伎俩。在 1972 年的选举中,巴西民主运动一派的当选市长倒戈到国家革新联盟的比例,高达 1/2 到 2/3。这一现象在巴西被称为 *adesismo* (政客的机会主义潮流)。^③ 引诱反对派市长加入政府阵营是当局的核心策略,这一策略旨在扩大原本只是同非党派市长建立的执政联盟。那些非党派民选市长的支持者,要的是政治人物提供的服务,才不管他的政治色彩。巴里·艾姆斯研究过国家住房银行 (BNH) 的住房及配套基础设施投资 (污水处理、供水等) 的资源分配模式,他总结说,“当局从未依其政治需要调整这些项目”,原因是,“政治上游移不定的州所获得的好处,对坚定支持政府州和无望争取的反政府州没有损害”。毋宁说,联邦政府拨款的模式,反映的是各个政治人物的政治实力。^④ 换句话说,为实施基于州庇护的选举策略,军政府重新起用传统政治精英,把他们的代表提拔到国家最高层的职位上。与梅第奇当年提拔技术官僚和非政界人士、政治新人出任内阁职位和州长职位相反,盖泽尔在 1974 年任命的州长都是文官,并且都是在州和地方政党机构中处于高位的人。传统精英也被邀请出任多个州部门的首长

① *Estado de Minas*, 24 May 1981, p. 14.

②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Geografia e Estatística (Fundação IBGE), *Censo Agropecuário*, 1980, Minas Gerais la parte (Rio de Janeiro: IBGE, 1984), p. 52.

③ Paul Cammack, “Clientelism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in Brazil”, in Christopher Clapham, ed., *Private Patronage and Public Power: Political Clientelism in the Modern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p. 68.

④ Ames, *Political Survival*, p. 205.

和中央内阁职位,而曾几何时,他们正是从这些职位上被赶下台的。

52 起用传统精英的庇护网络并使其受益有必要吗?为什么军方不动用国家资源借势精英内部的分化,以消除那些把国家基层分割成自家领地的传统精英的相对自治状态?它一开始正是这么干的。想当初,军政府就曾以牺牲其在社会民主党中的传统对手为代价,支持那些来自已经停止运转的国家民主联盟(UDN)的州长。然而,在威权统治最严厉的年代,政治精英在最不可能的集结点站到了一起:由马尔西奥·莫雷拉·阿尔维斯代表在国会发表的侮辱军方尊严的1968年演讲。不论这一精英阶层对温和的威权统治和公开的政治竞争的态度是多么举棋不定,也不论在整个威权统治时期社会民主党—国家民主联盟的敌对是多么突出地存续于精英阶层内部,传统政治精英还是把自己与军方相左的利益定义为共同利益。^①

军政府转向地区寡头寻求支持不是一时糊涂,也不是随意选择。尽管军政府最终控制了国家资源,也能够经由任何官员分配赞助资金,但它无法在州的层面上用新的、也更忠诚的精英取代传统政治精英。传统政治精英控制了亲政府的党的全国性选举网络,并且,党本身就是地方大佬和州寡头的私人支持网络的混合体,外人根本无法渗透。在基层维持这种网络的大佬,可能一辈子都忠于某一特定家族。掌控州权并不能确保控制这些分散的庇护网络;作为私人网络,它们属于组织它们的人。此外,军方建立的“人为”政党,强化并激发了巴西政治的庇护主义;鉴于无望培养基于党派归属的选民忠诚,议员便有机会得以保留个人的追随者和拥护者。^②

正如它复兴了传统政治一样,军事统治也有利于传统政治精英持

① 对 PSD、UDN 的持久分裂,地方报纸在 1981 年(它们被美停 16 年之后)评论道:“PSD 和 UDN 在我们的政客中唤起了深深的渴望。此外,在两个党改革之后(1965 年,1979 年),它们便藐视每条法律并产生久远的威胁。”Estado de Minas, 18 January 1981.

② 以在米纳斯吉拉斯的 20 个城市为样本的四次地方选举(1966 年,1970 年,1972 年,1976 年)中,个别政客如何加盟进政变后各政党,更强烈地与当地 MDB 的胜利有关联,甚至在 1974 年“重新调整”选举之后也是如此,而较少与像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比重这些更经常被引用的因素关联。Hagopian, *Traditional Politics*.

续维持优势地位。其作用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公共部门的扩张，提升了占有联邦和州内阁以及其他高级行政职位的政治价值。第二，在威权体系中，控制庇护网络对传统政治精英来说是一种更宝贵的财富。作为在位的州精英，他们受益于威权政体所采取的措施——重新规划政党制度，重新任命或“间接选举”州长——这些措施大大削弱了政治竞争。政变后，每一位州长的党派归属都会产生一定影响，会使以往流变不居的州与地方政治的结盟变得稳固。对大多数希望掌权的地方竞争者来说，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便是加入官方的政党，即国家革新联盟（ARENA）。不过，要想在这个1965年组建、由寡头实行强势管理的政党内爬到高位，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政党在政治体各个层级上发号施令，寡头便可以得心应手地驾驭那些想挤进政治舞台的新人。^①地方传统大佬轻易地控制地方政治，打压任何对其统治提出挑战的苗头，助选联邦和州议员，助推州精英派系的稳固。即便在威权政体统治时期，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参与政治生活和分享经济成果之外，对州庇护体系的操控使得地区寡头不仅在小城市和农村这些本来就没有悬念的地方赢得选举，而且在人们不曾意料到的许多中等城市也赢得了选举。^②在威权统治期间，米纳斯吉拉斯州每一次选举产生的亲政府的联邦议员（或他们的父亲或哥哥）中，90%的人之前曾担任过联邦或州议会议员。因此说，政治集权只是把庇护体系转变为一种寡头垄断体系。

虽然从长远来看，传统政治精英是军方为维护自身权位而推出的计划的最终受益者，但是被修正的策略仍如预期起作用了。在选民以庇护准则投票的背景下，州庇护体系的有效配置，不仅确保了军政府在地方

① Eli Diniz, *Voto e Máquina Política: Patronagem e Clientelismo no Rio de Janeiro* (Rio de Janeiro: Paz e Terra, 1982), pp. 90-91, 表明通过“有组织党派法”，“Chaguista”集团（以州长 Chagas Freitas 为首并忠实于他）控制了 MDB 在该州的分支机构的新成员接纳工作。

② 我在1981年进行的研究表明，在像瓦尔吉阿和蒙蒂斯·克拉鲁斯这样的新兴城市中，尽管有着城市和工业的快速增长，但选民会返回支持当地传统精英的政治代表。

选举的胜利,而且确保了在州议会和下议院中的多数地位。州庇护网络的分配结果,不仅确保了地方的胜出者,而且确保了州议会的多数派。^①军方一旦成功激发庇护主义,并且,只要它还能获得政治精英的支持(总共维持了11年),它就能在位掌权,最后还能全身而退,在政府事务中还能插得上嘴。^②

变化的前景: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延展性

国家—社会的关系是有弹性的,而非一成不变。我已经表明,变化的可能程度和方向,都受制于威权政体被国家—社会关系塑造的方式。在智利,军政府的经济模型的主要成就——国家从生产和分配职能大规模退出,破坏而不是强化了国家—社会互动的既有模式。但是在智利,军政府主政时间太短,无法确定持久变化的性质。

与乌拉圭做一个比较,可能会更有用。在乌拉圭,一种更具压制性的官僚—威权统治,就像巴西一样,被强加于受庇护主义支配的政治体之中,这种统治消除了国家层面权力变化的可能性。尽管在1973年失去对政府和公共资源的控制权,^③但乌拉圭传统的政治党派在局势缓和以后再度现身,不过许多老派政治精英人物并没有恢复地位。在1984年的选举中,乌拉圭精英的更替率自1971年以来首次高出巴西许多;参

^① Lamounier, "O Voto em São Paulo," p. 78; Eli Diniz, "Máquinas Políticas e Oposição: O MDB no Rio de Janeiro", *Dados*, 23, no. 3 (1980): 335–357. 当国家的资源可以被用于支持 ARENA 候选人,以及选民可以明显看到国家援助的优势时,他们投了 ARENA 的票;当他们因高昂的生活成本(穷人的一个突出问题,他们的与生活指数挂钩的工资,在两位数和后来的三位数通货膨胀之后六个月才进行调整)希望抗议这些地区的政府绩效时,他们投票给了 MDB。

^② 见 Stepan, *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关于在文官统治下由军方保留的特权;和 Frances Hagopian and Scott Mainwaring, "Democracy in Brazil: Prospects and Problems", *World Policy Journal* (Summer 1987): 491–493。

^③ 这些政党幸存原因已经被归纳出:(1) 它们在社会中的长寿和“稳固的根基”;(2) 军事政权没有创立敌对政党,而是明确指定传统政党作为其唯一继任者的事实;(3) 军方无力复原社会并切断各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见 Rial, "Continuidad y Cambio", pp. 259–263。

议员有 1/3(30 个中的 10 个)更换了,当年参加选举的 70% 的众议院候选人(99 位)之前未曾有议会经历。以党派或者党派内部的思想派系来看,这些比率也没有什么差别:总体上,白党的 60%、红党的 69% 以及广泛阵线的 70% 的议员,之前都没有在立法机关中任过职。^① 里亚尔(Rial)甚至声称,老派领袖和庇护恩主已经出局,被政治素人取代,在省一级尤其如此:“这些新的政客”,无论多么“想用老办法,但他们在传统政治实践方面都将遇到严重的限制”。^② 在随后 1989 年举行的选举中,老牌政党摔了个大跟头,大败于左翼非庇护主义政党——他们获得了 30% 全国选票。

乌拉圭和巴西的庇护主义与威权统治的情景相似,但精英更替率不同,甚至庇护主义能否存续的前景也不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呢?原因有三。第一,因为“精明的乌拉圭人早已将福利看作与生俱来的权利”,^③ 乌拉圭军政府当局无法像巴西军政府那样用国家福利计划来换取选票。在巴西,军方释放了大量的国家资助项目,以支撑它在州雇员阶层中不断下降的支持度;愿意离土但不愿离乡的农民撑大了这一阶层。第二,乌拉圭老牌政党的政治精英在军事威权统治期间被切断了庇护来源:威权当局完全关闭了政治和选举舞台,使得中介性的庇护网络死气沉沉。里亚尔早就观察到,当乌拉圭政党在 1980 年再度出现时,它们是以名流圈的面目出现的,它们还没有政党组织。^④ 第三,这些网络也缺乏经济资源:虽然国家财政支出每年增长 3%,但是一些有限的私有化确实发生了,并且,公共预算赤字被削减了。^⑤ 一旦庇护网络不起作用,国家—社会关系就会“生锈”。它们一旦再度出现,“生锈”的品质便会妨碍其正常发挥功能。

① Rial, “Continuidad y Cambio”, p. 257.

② 同上, pp. 257 - 258.

③ Gillespie and González, “Uruguay”, p. 223.

④ Rial, “Continuidad y Cambio”, p. 269.

⑤ Remmer, *Military Rule*, pp. 175 - 176.

不像乌拉圭的政治精英,巴西传统精英在财政和政治集权的早期年月,就能够维持其庇护网络的运作,并且,甚至在官僚—威权统治的后期,在军政府用大规模的资助资源注入私人庇护网络的时候,还能够扩展其庇护网络。在巴西,连接国家与社会的网络如常运作,选举时尤其管用,但不等于不选举就不运作。“竞争环境的改善”迫使传统政治精英使出拿手好戏,尤其是在政治体的下层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反过来使得庇护势力更加强大,即便在工会和其他公民组织也同样壮大的情况下。在执政党荫底下的老派政治人物一旦不能够再为军政府当局输送胜利果实,那么,官僚—威权政体早期行之有效的传统精英与技术官僚之间权力分享的制度安排便会最终崩溃,而新的统治联盟内部的权力分配就会倒向老派政治精英。再度出山的他们现在是老大了。

在巴西,由于传统政治精英势力强大,并且其中大部分人都很有预见性,及时赶上民主化的大潮,避免被贴上独裁主义的标签。所以,在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众示威重压之下推动的政权转移过程中,传统政治精英阶层依然能够扮演领导角色!甚至在军方倒台之后,传统政治精英仍然在台面上主持新政权的创建工作。^① 由于政权转移是在这些老派中介者掺和选举安排和制宪会议的情况下进行的,由此产生的民选政体即便有了真实的宪政变革,但在政治实践方面还是掺杂了大量的类似前政权的威权统治和半竞争性选举特质。^② 传统政治精英在塑造后威权秩序的政治制度方面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在巴西的政治体系上留下了特殊印记。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这一精英阶层比起其他任何势力,都更深地塑造着政治与国家—社会关系。

① 见“The Compromised Consolidation: The Political Class in the Brazilian Transition”, in Scott Mainwaring, Guillermo O'Donnell, and J. Samuel Valenzuela, eds., *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New South American Democra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2), 我充分讨论了在巴西转型中传统政治精英的作用。

② 1988年批准的民主宪法高度强调公民、社会和政治权利。

结论

大部分政治学研究文献都以国家和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来考察巴西式威权政体及其长期转型。这一视角坚持聚焦国家层面,把国家等同于一军政府——并将国家与社会视为在威权统治之下井水不犯河水的分立实体——这无法充分地解释军方的政治计划是如何以及为何被修改的。用一种分解性视角观察国家——就像乔尔·S. 米格代尔在本书导论中提出的那样,检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节,有助于阐明巴西官僚—威权政体何以在改造表面上被自己控制的国家时失败了,也有助于解释威权统治之下政治演变的方向何在。如这种研究视角所示,在巴西——一个州政府具有强大实力的联邦国家,如果仅仅掌握顶层权力,无法通过资源整合推动经济增长来改变社会与政治组织。它在历史上所具备的实力,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它抢得先机,知道如何组织社会利益集团,也立足于它把这些利益集团吸附到自己一边,自己又依赖于他们。军事统治者再怎么使用酷刑,也无法替代他们当初所采取的这些对社会的调解措施。

军事政权如何获得合法统治,或者如何失去合法统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政权所继承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在巴西,传统政治先是把巴西式的军方计划抛入水中,接着把一个救生筏扔给挣扎着要浮出水面的军方,最后又按自己的方式把军方带回岸边。巴西军方无法运行既有的中介渠道,无法独力行使国家统治或建立新的统治结构。当被迫恢复56
到它可借此遏制社会冲突——庇护主义——的最好的反阶级方案时,军方发现,它和它的技术官僚都没有自己的政治—组织结构以此取代寡头派系来配发福利;军方不能从分配国家赞助中获得选举增益;并且,它没有组织民意的其他基础。它需要支持一伙政治精英。作为唯一一个在现实中能够在巴西广大地区操纵州庇护网络并满足确保选举胜利需要的集团,传统政治精英是军方防止政体激进化、防止阶级政治与利益

政治发展的最佳选项。军方甚至无法扶持一种更合其胃口的新的政治精英,因为在这样一个按照庇护主义逻辑来组织和分配代表和国家政策的恩庇—扈从体系中,限制政治竞争的威权政体让在位的传统政治精英坐享其成。在威权统治期间,他们凭借着既有的网络,在一种排除了各方势力重组、因而精英更替率被降低的选举中获得竞争优势。如果政治阶级的重要部分为保住自己在州里的职位能够与军事独裁者合作,就像在巴西发生的那样,那么这种联盟在民主转型期进行合作也是有可能的。曾经受到威权政府扶持、起初被指望充当威权政府刽子手的传统政治和传统政治精英(在威权政体垮台后)幸存下来,对巴西向民主制过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巴西的经验表明,国家—社会的关系虽然应经济和政治关系而生并受其塑造,但能够比经济发展和政权更迭持续更长时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这些中介渠道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最终甚至可能比“国家”和“社会”对它们的重塑来得更频繁,也更深远。

第三章

中国的国家权力和社会组织

65

维维恩·苏

国家权力和公民联合体

国家建设的研究者有时谈论起来,好像强大而集中的国家权力的巩固,势必要取代社会中已有的其他权威和控制主体,或者,至少也会削弱它们。国家权力和社会势力被看作是相互对立的,通常要经历一个旷日持久但最终非输即赢的竞争,真正目标是获得发号施令的权利和能力。然而,以生机勃勃的公民公共生活领域为一方,以相对强势或坚韧的国家组织中的社会权力的巩固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确实表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关系——一种值得社会科学更可靠探索的关系。简单地说,我们认为,至少在特定的情况下,强大而有活力的公民联合体可以同强大而坚韧的国家“融洽相处”,一个证据确凿的案例亦可帮助我们作如是观。

或者,更简洁地说,在公共生活机构相对强势且发育良好的地方,国家权力一开始可能会更加难以组织;但是,一旦得到巩固,国家权力便会变得更加有韧劲,会朝着保持并扩大统治权能的方向演进。乍看之下,此类国家很容易被错误地归入“弱”国家行列,因为它看起来更多地受制于社会妥协,在富有进取性的社会利益和社会机构面前也显得更脆弱。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就是一个为人所熟悉的例子,一个生机勃勃的

公共生活与一种强韧而富有拓展性的国家结合的范例。

相反,在公共生活机构相对发育不良的时候,觊觎国家权力者可能更容易出现,甚至可能更有能力巩固其政权,即使不是十分轻松的话,至少很少遭到反对。但是,如此建立的政权也往往是脆弱的。由于在规范的和历史建构及谈判的社会土壤中扎根不深,这种统治结构可能成长很快并且姿态甚高,但容易在社会骚动的风潮中折断并吹走。尽管这种政体可能会显得很“强大”,甚至可以归类到威权一类,因为它们确实能够运用权力“对抗”社会。但是,正是它们所宣称的独断意图的范围,可能恰恰掩盖了诸多无能,带来严重后果。

将许多战后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划归这种类型可能是有用的。由是观之,这些国家的治理困境就不能主要归咎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失败,或者指令性经济的失败,或者甚至是过度国家控制带来的危害。相反,这些政体的困境应被归结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接触的问题,归结于国家权力和社会组织紧密衔接中的问题。本章探究一种分析方法的适用性,以此做出评判。

中国的社会组织与革命性政党—国家

中国人的传统公共生活机构在 20 世纪上半叶遭受严重抑制和侵蚀。五十年间,中国见证了快速但不平衡的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王朝的无能及崩溃,帝国主义的军事和财政干预,军阀混战,传教士及基督教的教化,鸦片走私,匪患,饥荒,难民潮,日本侵略以及最后的内战。事实上,中国农村和城市中的传统公共生活形式,在此过程中几乎被糟蹋得面目全非。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过时了,面临适应性挑战。而新的规范——并非总是有益的——总是应景凑成的。¹ 崩溃的程度不必过分夸

1 裴宜理在本书第六章关于上海帮派流氓和工会主义的研究中,提供了许多好的商业和工业实例。农村源自传统的临时拼凑,有点类似于都市犯罪,包括秘密社团、结拜兄弟、妇女的婚姻裙带关系以及土匪帮派和协会。

大,总体情况绝不是传统社会制度全然一塌糊涂地衰退。令人吃惊的是有一些传统社会制度强有力的调整和复苏。从清政府 1898 年最后挣扎时的严肃的维新计划到 1949 年共产党的最终胜利,整体情况大概应被视为悲哀的断裂;表现为那些仍有生命力的传统社会组织、新生的被断言为更加“现代”的社会制度和其他在此期间多个政权中显眼的社会力量(比如军事权力)之间,没有形成建设性的联系。

当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取得全国性政权时,它面对的基本是由土崩瓦解、名誉扫地、残缺不全的机构所组成的社会。事实上,最活跃的社会组织往往是由党自己动员而形成的。例如,农会、合作社、妇联及工会。当然,这些机构与新建立的国家组织衔接完好。很明显,它们受控于并且十分容易服从于党一国权威的意志。 68

之后,新兴党一国便将改造中国社会作为其头等重要的任务。它将自己的阶级分类强加给几乎每一个公民和社会机构身上。富农、贫农、中农,以及地主、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工人、知识分子、宗教人士、犯罪分子,如此等等。每个中国人的过往经历都受到调查,并且被划定成分;然后重新调查和重新分类,最后成为官方承认的类别中的一员。^[1]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分类过程在 1949 年之后的几年内就完成。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氛围中,当间谍、破坏分子及国民党特务仍然被认为会在每一个社会组织中被发现时,阶级分类过程不仅有重构社会结构和社会地位的作用,它也有助于识别国家内那些能成为朋友的公民,以及那些潜在的敌人。

中共统治初期,除了个人和家庭的成分划分,社区和其他基本社会单位的边界也被重新划分。在农村,在宗族组织、寺庙、小村庄、大村镇、集市这些以往构成乡村社会空间的地方,构建出互助组以及随后的初级

[1] 中国北方农村发生的这样一个分类过程的经典记述,见 William Hinton, *Fanshe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6)。以及 Vivienne Shue,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esp. chs. 1 and 2。

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①而在城市中,个人被永久地分到特定的工作场所中,并在官方指定的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单元的特定街区中被赋予居住权。

旧精英就这样被扫地出门,并且旧的社会单位被重新界定。土地改革、集体化以及工商业的国有化,剥夺了前社会经济精英的财富、特权、政治影响力及社会地位。事实上,旧制度的社会等级被倒置了。以前的穷人和底层民众,被抬高身价,成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意识的高贵拥有者。以前的富人和绅士,被重新定为反动的剥削者和阶级敌人。可以确定的是,在某些方面只不过是改头换面而已,基本的社会现状和社会关系仍在延续。不过,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社会革命给其带来了宏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

社会细胞化

随着革命后的社会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重新配置,它也被分割成无数小型而且极端分散的细胞或板块。例如,农业生产集体化——通过共享土地、共同劳动及共同收获,将每个家庭的福利非常紧密地同集体中其他家庭的财富和行为捆绑在一起——有效地将中国农民划分到小型的、综合性的以及彼此分离的生活和劳动单位之中。传统农村的自由贸易,单个家庭可以通过它增补收入并因此减轻对集体的依赖,受到严格规制和抑制。农民很少有机会从事任何离开其集体生活以外的社会交往。他们的物质流动和社会流动的机会受到严格限制,尤其是1958年之后,依靠户籍制度,他们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被有效地禁止出行,无论是寻找额外工作还是任何其他原因。这种对流动的限制几乎将全部农业人口锁定在工作和生活的狭小社区之中,尤其是切断了与其他社区的简单的社会交换。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国家政策所促进的地方自力

^① 关于这些制度变化与创造的更多细节,见 Shue,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chs. 4-7.

更生、经济自给自足以及社会细胞化,使得贸易和交换、宗教崇拜甚至婚姻和家庭的旧网络——传统上起消除小农社区隔阂作用的网络——受到非常有效的削弱,甚至消除。^①

在城市,人们赖以谋生的工作分配在单位,而且工作单位在贵重物品、服务及各种机会的分配中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放大,这些都强化了个人对小而全的单位细胞的依赖。人们被区隔在这些单位细胞之中。^② 即使生活在貌似现代的大都市中心地带,一个普通中国工人所能接触和体验的范围,也受到社会生活极端分化的惊人限制。

可以肯定的是,贯穿社会细胞并尽最大努力对其渗透的高度集中的国家机构,其设置的目的是协调和联系这些社会细胞的活动——甚至为发自社会的“需求”代言,发挥效力。但是社会利益和社会问题,由于通过国家机构的加工处理,不得不以国家自己的意识形态范畴来构想和阐释——这一范畴包括阶级斗争和革命纯洁性,反帝国主义和反修正主义。党 国依靠其群众动员机构——农会、工会、妇联及共青团,等等——将这些社会分析和社会关注的范畴灌输到大众的脑中。在社会组织的原生机构没有充分发育的地方,或者说它们在其发展过程中被人为束缚的地方,由国家控制的大众动员的组织和技术,有时可以充当更真实或自发的国家—社会互动的替代品。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民间协作机构与其说被弱化了,不如说被微型化了。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整个一生的社会经验都是极其有限的,或者更准确地说,都是被限定的。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经验几乎完全是地方性经验。因此,发自社会本身的议题和利益,势必也以地方化以及高度限定的方式表达。幸存下来的那些真正的、非国家支配的民间联合机构,同样受到高度限制;它们没有跨界

① 关于这些政策及其影响较长的讨论,见 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 例如,见 Andrew G. Walden,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或加入到社区和单位中。故而,源于社会中的利益和需求不能轻易地在政治体的超地方层面上聚合与表达出来。在政治系统中间层次上参与国家事务的真正区域性民间协会基本不存在。

不足为奇的是,国家机构本身的形式和功能也与社会势力的这种分散化配置类似。当然,它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官僚机构。所以,真正的权力是在最顶层。正是在那里,社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斗争的宏观范畴中得到孕育和传播。然而,真正的权力同样掌握在大多数地方官员手中,这些官员负责实际政策执行以及向上级准确报告当地情况。他们的人数有数百万之巨,正是在他们中间,社会议题和社会利益以地方化范畴和个性化价值观得以构思和阐释。这些小单位领导和地方官员,规避、忽略、修饰或扭曲中央指令的集体能力——在地方利益受威胁时他们隐瞒和欺骗上级的能力——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央政府的实际统治能力。在这两个掌握实权的地带中间——处于体制的中间层次——多的是行政管理,缺的是政治权威。毛泽东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宏观概念范畴不适合区域主义或地方主义政治。产生于细胞社会的时代性真实利益没有被采用,也没有被聚合,以进行区域性的利益表达和政治行动。

然而,这不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被动地受控于国家政策和实践,或全然听任国家政策和实践改造。国家的意图只通过社会无条件服从得到部分满足。部分国家意图也遭遇社会的调整和改造。在社会细胞化和社会联合体权威性中间机构缺位的情况下,个人和群体的调适方式是多样化的,既狡黠又顽强。我们这里只能举出两种重要的调适方式:恩庇—扈从网络和地方保护主义。

特殊主义调适

个人影响力网络(关系网)的经营——或多或少是一种典型的由互助激发的恩庇—扈从网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通过它,那些有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议题的人们,可以将这些议题连带自己对其结果

的偏好,抛到可以就这些议题做决定的领域。在没有公共生活机构存在以筛选和表达具体利益和需求的地方,个人关系网络和义务互惠网络充当了替代品。^①

这些复杂精巧的恩庇—扈从网络的偏袒,虽然一直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特征,但在革命后变得更加明显了,渗透到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各个方面。个人关系网也成为小型社区与国家层面政治派别的基础和支柱。国家政策总是按照阶级斗争、捍卫社会主义或者提高革命意识的范畴制定,但现实的政治往往落入各种算计和斗争的窠臼。这样,恩庇—扈从网络和派系,就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在其中并由此展开互动及调适的关键领域。

在小单位的下层官员和公务人员方面,地方保护主义——有时称作“本位主义”——也出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作为对社会细胞化和跨单位经验、机构和忠诚缺失的调适。下级官员找到了很多保护他们所在单位的农民、工人或技术人员的方法,以对抗他们认为不必要的或不公正的、由上级机关做出的限制和要求。毕竟,这些由同事或街坊邻居组成的单位,是上述官员可以安心地期待度过其职业生涯的剩余时间、实际上是他们整个一生的地方。这些社会细胞中所体现的忠诚,尽管不同的群体和派别之间会有所差别,但往往都是强烈的。

尽管拥有作为国家代理人的地位,一线官员还是经常发现,将自己的命运与当地群众和部门员工连在一起以化约上级官僚机构的某些要求是明智的,或者说,这样做更轻松、更自然,也更符合他们自己的信念。他们在执行不受欢迎的政策时拖泥带水;上交虚假数据和其他误导性资料;囤积资源;修改账簿;屡屡破例;在上级特派员的询问之下隐瞒事实。当然,他们在从事这些活动时,往往也发现许多个人腐败的机会。但是,无论最终是由邪念和贪婪激发,还是只受同情和友爱的鼓励,这些地方

① 关于最近中国的社会生活强调人际关系网和策略的记述,见 Jean C.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官员的活动,构成了权力斗争的新领域;而且,这些领域的活力逐渐地重构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在党—国辞令中不被认可的政治可能性设置了界限。

72 于是,恩庇—扈从的派性主义和地方主义瞒骗,成为革命后中国现实政治的一种成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存在于几乎所有政治体中的成分。但是,它们在1949年之后的二三十年间变得越来越突出,恰恰是对社会细胞化的国家政策的反应。然而,派性和地方特殊主义,无论在现实中多么盛行,都不能在毛泽东时代的规范性秩序中找到道义支撑。尽管绝对管用,这些社会调适都不得被视为污点。尽管广泛实践,它们不得不遮遮掩掩。国家的社会哲学与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现实之间的裂缝不可谓不深。

这一鸿沟的两种重要政治后果尤其值得关注。首先,在日常事务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国统治的实际能力被派性和地方主义官僚的活动大量侵蚀。在毛泽东时代后期,国家收集准确信息以制定政策的能力、政策动员支持的能力以及想推行政策时的政策执行能力都下降了。^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革命胜利后早期阶段社会对国家政策的热烈追随和执行,到一定时候却削弱了国家同样的规范化管理和政策实施活力及能力。

其次,在更特别的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事务中——例如,动员性群众运动,或“文化大革命”本身——这种不被承认的鸿沟,使得国家哲学同真实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日趋弱化,甚至日益虚幻。反复的群众动员在岁月流逝中进行着,目标是使人们各安其分,使个人档案纳入官方的社会分类,这种分类与人们真实的生活底色越来越不相干。国家与社会如此这般的接触方式,就这样使得这种接触成为仪式化的东西。并

① 在1949—1979年之间国家能力下降的模式沿着几个不同的方面得以探索,在我的“Powers of State, Paradoxes of Dominion: China 1949—1979”, in K. Lieberthal, J. Kallgren, R. MacFarquhar, and F. Wakeman, eds.,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ur Anniversaries*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1), pp. 205—225。

且,我们最终在“文化大革命”所见证的,是国家辞令与社会行动之间几乎完全的脱节。

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发出一次又一次的号召,要求人们采取以阶级为基础的统一的激进的无产阶级行动。然而,随之而来的实际斗争,却发生在学校与学校之间、工厂与工厂之间以及派系与派系之间。彼时彼刻,政治斗争的真正领域表现在细胞式个人化的微型空间之中,而国家的权力中心却不谐调地持续要求开展一场史诗般的普遍性斗争。

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已经非常明显的一点是,中国的党—国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方式,已经无法产生赋权的结果。国家和社会最有效联系的地方,恰恰是那些由地方利益或派系利益操纵的领域;是那些在道德上和意识形态上受到污染、其合法性不被国家规范性观念所认可的领域。这样,党—国机器动员其社会的真正权力已被严重侵蚀了。并且,在政治斗争中,分散在全社会中的真正权力,被深度碎片化了,并且几乎被耗尽了。 73

自上而下的改革

显然,要重新调整和重新组合中国的国家权力和社会组织,需要一个重大的改革计划。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审慎指导下,确实有了改革计划,其目标正是指向社会的重组和国家活力的恢复。重新焕发国家权威成为邓小平改革的一个核心目标,这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也没有任何神秘。相反,改革举措的这个核心前提近年来一再被强调,以安抚掌权者的神经,并且为变革的需要进行辩护和解释。例如,权力下放给下一级国家官僚机构,或者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甚至是许多压制性社会限制的放宽——这些仅仅是发动改革所用的手段,而非目的。党—国在后毛泽东时代自上而下改革的目标,从来不是以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也从来不是以其他制度代替一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厘清、修复和重建社会中分散的权力与国家中集中的权力之间业已遭到侵蚀的联系纽带。

改革计划只是到了 1979 年才开始正式生效。从那时起,改革的推进就一直不平稳,跌跌撞撞。在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的不同地方和不同部门,根本性改革的实际实施程度,呈现巨大差异。尽管如此,经过十五年多的这种应景式体制改革,在部分领域还是产生了一些非常明显的变化;在这些领域中,国家机构和社会势力通常要为权威展开争夺或者达成妥协。在这里,不存在综合性的改革计划,甚至关于综观性的改革观点都没有。但是,正在进行的体制变革的某些方面,那些对国家—社会互动的性质和领域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方面,还是可以简要阐明的。

官僚控制的权力下放

1979 年以来官僚—行政体制方面的某些重要改革,有效地将决策权和财务责任从北京的中央部委和各局手中下放到国家科层机构的中下级。官僚体制的渐进重建——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以及同时进行的体制内分权,实际上在整个 70 年代都在进行着。但是,80 年代的国家财政、计划、信贷以及投资改革,非常急促地加速了权力下放的趋势,以至于到了 80 年代末,大多数观察家问的问题已不再是中央当局何时或是否应该克制,而是中央是否有足够的权力以恢复对严重过热、管理不善以及过度通胀的国民经济的控制。^①

至此,官僚制大幅度分权的最大受益者,是党—国体制的中间及以下层级。在乡镇和县政府工作的干部,以及那些在大中小城市机关工作的干部,比在地区和省级部门的高级官员,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和自主权。在改革之前主要充当行政工作“传送带”的县、市及地区官员,最近获得了作为关键看门人和规则制定者的新角色,同时还在大规模资源配置方面充当起承售商和经纪人的新角色。

① 刚好有一个例子,见这篇头版文章,载 Nicholas D. Kristof, “Beijing Authority Being Challenged by Local Powers”, *New York Times*, 11 December 1988.

扩大的市场关系

与此同时,经济体中更多类市场(marketlike)体制和关系的广泛引入,对日常生活细胞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带来强烈冲击。在商品、劳务、服务、资金和知识领域,市场的扩大,给几乎所有行业的人们提供了在本单位范围之外工作或投资进而增进福利的新机会。全国性的农业生产去集体化,官方解放长期束缚在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自由参与到由此变得更大也更统一的商品和服务经济领域的决心——这些都是农村劳动力和农村投资大规模重新配置的必要前提,而这正是过去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的特点。极大提升的出行自由,调配职业自由、换工作自由、在个人洽谈合同与协议基础上参与广泛交易网的自由和在独资或集体企业中开展交易和投资的自由——这些新的自由,切切实实地彻底改变了农民的机运,也切切实实地打破了以前死死约束他们的社区和集体的牢笼壁垒。

国有企业和其他许多城市职业市场改革则进展缓慢。但是,在城市,脱离社会细胞化的趋势同样剧烈。许多城市居民现在干两份工作; 75 一些人带着从国有工业企业中学习到的宝贵技能,在周末的时候到郊区工厂上班,这样他们不仅有额外收入,并且可以在当地市场购物,打听各种小道消息,获得当地政治信息,与此同时还可以为他们的亲戚朋友留意额外的工作、关系和机会。近年,反向就业流——农民进城务工——已成为主要潮流。而所谓的流动人口,那些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寻找机会的人们,现在估计数以千万。最近这些人员和就业的流动,如果不总是丰富了,也是大大增加了普通中国公民的社会阅历。

得益于所有这些伴随着社会关系市场化的极好机会——以及所有可怕的风险——今天大量的中国人,对于此前不久仍是中国人社会生活标志的、限制重重的地方共同体的依赖减少了。而且,必须补充的是,随着所有这些在福利、就业以及投资体制和优惠政策方面游移不定的变化,那些地方共同体和小单位往往变得更没有能力让人依赖。人们现在

能够、实际上也必须开始将自己当作有着共同利益(很可能有着共同要求)的社会群体的成员,这些社会群体跨越传统细胞化的社会分界,从过去的小地方延伸到大都市或整个地区,乃至更大的范围。

国家—社会互动的新中介领域

因此,在中国政治体的中层和中下层将会发生力量聚合的可能性便是显而易见的了。就像更广泛的国家权力栖身在政治体的中间地带一样,具有聚合及表达利益、需求和偏好功能(至少是潜能)的新社会群体和社会力量在同样的地带产生了。以往,在改革前,国家—社会的斗争和妥协最激烈地发生在体制的最底层——在小单位和小地方,或者在私人恩庇—扈从和其他特殊主义的背景中;现在,在国家社会互动的新领域,即政治体的更高层面,存在着重大的斗争和妥协——至少有这种可能性。过去,在改革前,几乎没有社会精英不被确定身份并被吸纳到国家权力体系之中;现在,在国家机构之外,更加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成形——至少有这种可能性。^①但是,国家权力和社会组织在政治体的中间层级聚合的趋势如果确实在中国发生的话,那么这种趋势是否(以及如何恰当地)赋权于新的组织化的社会利益,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在努力疏导和控制新崛起的社会力量过程中,说不定只是对党—国自身赋权?或者,当双方开始学习在国家—社会互动的这些新领域内怎样彼此

① 因此,改革为在国家组成部分和社会组成部分之间的斗争和妥协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可能性。如果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确实倾向于在体制的中间层级达成聚合,那么正如本章节接下来进一步考虑的那样,这一聚合过程可能在国家能力和社会影响力这两方面都有成果。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组成部分和社会的组成部分不一定能公平地“获益”。事实上,老的划分系统中的中央政府官员和小的地方强人都会遭受自由裁量权的减损。因此,一些国家官员会将经历的改革作为国家权威的净损失,而栖身在体制中中级地带的其他人,则会将经历的改革作为为他们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开放的新领域。同样,非正式人际关系网和旧式地方保护主义的社区领袖中的参与者,会发现他们在社会中的影响力的广度受到了较广划分的集团的挑战,而这些集团试图通过不寻常的政治渠道压制它们相对于国家的利益。自然而然,一些社会团体比其他社会团体在施加这种影响力上具有更强的能力。而那些不受优待的、远没有感受到改革环境增加了自身自主权的人,会很容易将改革视为危险的和剥夺个人权利的举措。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有证据表明,在中国政治的变动中,所有这些交叉倾向都可能会起作用。

对待时,这种聚合最终也许被证明是双向赋权?

76

公共生活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社团主义

目前值得密切关注的持续变化的一种模式是,更加多样化的民间社团广泛出现,其规模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 1949 年以来我们在中国所见。^① 这些民间社团覆盖范围广泛;从本质上与政治无关的共同兴趣协会,如体育俱乐部和专业技术协会;^② 到专业协会,如律师协会^③ 和记者协会;到具有社会或经济议程含义的群众性界别协会,如宗教协会^④、老年协会^⑤ 以及消费者协会^⑥;再到非常广泛的经济利益团体,如城市商会^⑦,或者更加特殊的利益团体,如贸促会^⑧ 或个体经营者协会^⑨;甚至还有政治上无法定性的开放的实体,如由青年技术和专业人士组织的各种

① 这些协会的出现,以及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种社团生活扩大的范围与社会经济分层和社会利益变化中的模式之间的潜在的联系,是已被许多中国学者和教授所关注的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家对这些走向的初步分析,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往往是洞察力深且相当广泛的。

② 例如,见“Rural Specialized Technical Associations Get off to Good Start on Mainland”(“*Dalu nongcun zhuanye...*”),*Liaowang Weekly* (Overseas Ed.), 25 January 1988, pp. 15–16.

③ “The Evolu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Lawyers”(“*Zhongguo lushi...*”),*Liaowang Weekly* (Overseas Ed.), 10 October 1988, p. 12.

④ 见 *China Yearbook*, 1988 (*Zhongguo Nianjian*, 1988)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Co., 1988), p. 641, 宗教组织类型和数量的细分。

⑤ “The Current Situation with Regard to Elderly Affairs in China”(“*Zhongguo laonian...*”),*Liaowang Weekly* (Overseas Ed.), 17 October 1988, pp. 11–12.

⑥ “Mainland Consumers’ Associations Exceed Seven Hundred”(“*Dalu xiaofeizhe...*”),*Liaowang Weekly* (Overseas Ed.), 15 February 1988, p. 40.

⑦ “Xiamen Chamber of Commerce—Good Friend to Taiwan Investors”(“*Xiamen shanghui...*”),*Liaowang Weekly* (Overseas Ed.), 21 November 1988, p. 19.

⑧ 例如,“Conscientiously Support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Unions”(“*Qieshi weihu...*”),*Liaowang Weekly* (Overseas Ed.), 10 August 1987, pp. 3–4. 还有,“New Changes in the All 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Quanguo gongshanglian...*”),*Liaowang Weekly* (Overseas Ed.), 19 December 1988, p. 15. 同时还有,“Promoting Trade Associations: Urban Reform in Nanjing”(“*Hangye xiehui...*”),*Liaowang Weekly* (Overseas Ed.), 7 December 1987, pp. 15–16.

⑨ “Xiamen Establishes Association of Privately Ru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Enterprises”(“*Xiamen cheng...*”),*Liaowang Weekly* (Overseas Ed.), 31 October 1988, pp. 15–16.

讨论小组和“沙龙”^①，他们定期集会，讨论感兴趣的社会哲学、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

这些组织中有一些是全国范围的，其他的是区域性或者仅仅是地方性的。如我们所预料的，最密集的活动出现在大城市中心。^②但很显然，在小城市和城镇，甚至许多基层的农村社区，都同样有这些活动。此外，显而易见的是，至少其中的一些团体，虽说在最初设立时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政治经济功能，却能够并且热衷于介入政策事务和治理事务。例如，1986年在陕西省，一直有谣传说苹果出口需求将下降。面对此景，一个起初只是为本县果农提供技术信息和帮助的自发性农民协会，自发地与地方和区域对外贸易官员接洽交涉，主张立即与果农谈判签订购买合同，以避免不必要的农作物损失。^③合同很快就达成了，那一年的产量不降反升。报道这一事件的杂志，仅仅强调这种专业组织“作为农民和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是如何有益的。

来自中国的许多报道对社会组织不加分类。尽管如此，却很明显地将它们全部视为有价值的、能够并且应该充当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桥梁”的机构。正如《人民日报》1990年1月的一则头条报道一再指出的那样，“社会团体要为维护国家的稳定发挥积极作用。”^④该则报道
77 标题之下的内容很清楚地表明，在中国政体中，社会团体的适当任务是，“自觉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正确处理社团所代表的利益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关系，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社会团体还承担“积

① 例如，见“Liaoning Province ‘Theory Salon’”（“Liaoning sheng de…”），*Liaoxiang Weekly*（Overseas Ed.），19 October 1987，pp. 11–12。还有，“Dynamic ‘Salon’ of Beijing Entrepreneurs”（“Huoyue de Beijing…”），*Liaoxiang Weekly*（Overseas Ed.），19 September 1988，pp. 17–18。

② 见“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an Important Force for Establishing a Democratic Socialist System”（“Shehui tuanti shi…”），*People’s Daily*，29 April 1988。据报道，1980年到1984年之间在上海“所有类型”的社会组织的总数量从628个上升到2627个。

③ *Liaoxiang*（Overseas Ed.），25 January 1988，p. 15。

④ “Shetuan yao wei weihu wending jiahu jiji zuoyong”，*Renmin Ribao*（Overseas Ed.），11 January 1990。

极向党和政府反映群众的愿望、意见和需要，并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拉近党群关系”的责任。它们还被寄望“解决社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有效推动社会稳定发展，为经济建设营造最良好的社会环境”。

这一官方路线，是一个明显的国家—社会主义视角，指出了中国社团生活的独特性，强调密切磋商、持续协商，并对社会和谐及整体上对党—国领导和控制的价值。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变化上的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是研究这一官方理想的国家—社会主义视角，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体现我们现在所注意到的在国家与社会变化了的交汇地带出现的社会团体新主人的实际运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这些新的社会组织看作是独立的角色，在国家领域之外表达利益和态度？另一方面，它们在充当化解潜在的重大社会冲突的缓冲器方面受到多大的限制？多大程度上可以准确地把这些新组织仅仅看作党—国权威的助手及社团主义意图的促进者？^①

案例和演变：一个连续体？

在1990年下半年，我在两个总体上仍是农村的地方——辛集（在华北平原上围绕着铁路枢纽成长起来的收入水平一般的一个河北小城镇）和安溪（一个官方划定为“贫困”的位于福建山区的人口稠密的产茶县）——采访了许多社团代表，收集到几十个不同类型的民间社团组织及其运作的信息。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由西方研究人员所做的系统收

^① 一些在中国出版著作的学者已试图在他们关于新的“中间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和非独立性的研究中做一些区分。出现在宁夏社科院的刊物上的这样一个研究将这些组织分成了三类：一类是国家发起和运行的组织，一类是半官方半民间组织，还有一类是完全独立的民间组织。见Chen Tongming, “On the Origins,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and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mediate Organizations in China”, *Ningxia shehui kexue* (May 1988): 52–58, reprinted in *Zhongguo Renmin Da-xue Fuyin Baokan Ziliao* (June 1988): 35–40。

集农村草根社团资料的田野调查,^①并且,坦率地说,尽管案例太小,也远非经过科学抽样,但所收集的材料还是足够多,足以说明当下中国地方层面的民间社团最引人注目的问题——社团自治与国家—社会主义渗透——的大量变种。

所调查的大多数社团活动中既不是完全自主组织的,也不是完全独立于国家领导和指导的。从结构上和哲学上,我所采访的所有社团在组织层面和现实合理性层面都有国家—社会主义影子。然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同样足够显著,足以提供一个关于社团结构和经验的可能连续体:以那些相对融入国家并由国家控制的社团为一端,以那些相对自主成立、自我管理和自治的社团为另一端。

辛集的个体劳动者协会可以作为这个连续体中国家控制一端的例子。这是全国性个体劳动者协会的一个地方分支,其两个基本职责中的首要任务被描述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为人民服务宗旨教育”。^②在全国各地,由于民事和刑事法律制度以及必要的地方司法机关的发展,明显跟不上近来自由市场经济关系的扩张步伐,所以公众对被“自私的”商人欺骗的恐慌最近达到新高度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一个在全国范围被热烈讨论且高度敏感的问题,而且,毫无疑问,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及其所有分支,主要是作为党—国教育小商小贩守法经营、规范其市场行为的手段而存在的。事实上,该协会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的初衷,必须被理解为国家预感到自由市场的危险和混乱时所采取的一项监管对策。该协会的第二项基本任务是“代表和维护成员的合法权益”,^③大概是对他们被怀疑或被指控存在不法行为的情形。

该协会在乡镇政府的工商管理所的监控下运行。(事实上,该协会

① Gordon White 曾进行了一些对城市协会的研究。见 Whit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Rise of Civil Society”, manuscript, n. d.

② Interview, 9 July 1990, pp. 173–174.

③ Ibid., p. 174.

与政府机构一起办公。在我提出邀请协会一位代表接受访谈时,到会议室接受访谈的是工商管理所的一位干部,身着制服。他解释说,他对协会非常熟悉,能够回答与协会相关的任何问题。)镇政府工商管理所负责向所有在辛集开展业务的个体工商户颁发执照。按照该所代表的说法,尽管协会会员资格并不是颁发执照的“强制要求”,但是不存在个体劳动者在获得营业执照时不加入协会的情况。个人会费是每月四毛钱。在协会月度小组会议上,据说成员“学习党的有关市场经营活动的文件,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①

辛集的个体劳动者协会,其宣传教育和监管功能与毛泽东时代典型的“群众组织”如此相似,不免让人怀疑把它归到“新”民间社团的序列上是否合适。它可能不是“新”民间社团,但是它仍被归为新民间组织,是因为这一点值得注意,即协会成员确实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委员会委员不必是党员或政府官员),还因为另一点同样值得注意,即并非所有的协会活动都是明显政治化的。就以辛集个体劳动者协会为例,它曾经出手帮助一些经营针织品商店的会员,原因是他们连续两年亏损。该协会亲自出面(而不是工商管理所)联系第二轻工业所(另一个政府机构),邀请工人和技术员,教给苦苦挣扎的企业家一项更好的编织技术——显然,结果令人鼓舞。

在同一地方——但处在国家—法团谱系的另一端——我们可以考察总部设在辛集镇军齐村的韭菜合作社。^②该合作社发端于基层,尽管时不时与政府部门有所合作,但它似乎也尽量跟官场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毛泽东时代后期,军齐村农民被迫按国家计划指令,在几乎所有的土地上种植粮食和棉花。但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建立,^③人们发现自己又可以自由地种植韭菜了。韭菜是军齐村的传统特色作物,这里的土壤特别适合种植韭菜。20世纪80年代初,韭菜种植利润丰厚,到1984年,

① Interview, 9 July 1990, pp. 175–176.

② Interview, 21 July 1990.

③ 直到1982年才在辛集实行。

韭菜种植专业户就与村委会成员以及农技人员举行非正式聚会,总结经验,学习相关技术手册,分享各种信息。(下文中就会看到,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有许多新兴的民间协会与农技团体或科技团体以及官方机构有联系。)

到1984年,军齐村种植韭菜的农民和农技员,决定成立自己的组织,他们到(辛集党委)农业技术中心咨询怎样建立一个正式合作社。一开始,合作社有51个会员,成分复杂,有农民、农技人员和村委会成员。合作社早期的活动中,有些完全是独立开展的,有些则接受了当地党委政府的帮助。例如,合作社就曾自己负责派出一些代表到辛集以外的地方(像东北三省的一些地方和西安地区,那里韭菜消费量比较大),带回外地韭菜品种。不过,此后不久他们就再一次来到辛集农业技术中心,请求专门援助,因为他们的作物受到严重的病虫害。在第一次运送韭菜前往东北各城市以打入当地市场时,合作社成员还接受了来自村委会的财政支持。(尽管种植韭菜利润丰厚,但一开始,菜农在蔬菜运输环节没有申请加入保险渠道,而且如果没有来自村里的补助,也承担不起长途销售所带来的风险。)

军齐韭菜农民合作社与其他地方的韭菜农民合作社建立并保持着独立的“横向”联系,只要外地的协会生产技术比较先进,他们就愿意交往。他们交换各种材料,甚至尝试互换一些种子品种——遗憾的是,这些种子都水土不服。该合作社的主要职责是为其成员解决生产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一任务还会扩展到必要时对当地官员和半官方机构施加一些压力。例如,对那些想贷款购买额外塑料薄膜用来遮盖早种韭菜地的会员,合作社会出面向当地信用社施压,帮助洽谈贷款协议。而且,该合作社有时还利用其外部联系,绕过当地国家供应系统,为其成员储备额外化肥,以防当地供给短缺。

因此,该韭菜农民合作社是一个自主成立并且基本上独立运行的组织,代表和促进辛集农民中某一部分人(相对富裕者)的利益。它有时同地方政府合作,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也会接受来自国家机构的少量财政补

助和其他资助。但其功能都不是政治化的,许多活动涉及同辛集以外的种植农民和农技人员的类似协会的自愿联系,也就超出了辛集当地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外。

在国家—社团谱系上,安溪商会的状况处在刚刚描绘的两个辛集协会中间的某个位置。该协会是在政府倡议下于1987年成立的,代表着安溪县工商业的利益。它约有540名会员,多是该县制造业、商业和金融机构方面的头面人物。该商会组成形式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成员企业打破现有中国通行的所有制格局,在同一组织中容纳了国有、集体和私营企业。与改革开放前产业的垂直分割相比,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①该协会公开的目的有好几项。第一,为当地企业在省外和国外寻找市场,吸引投资和广泛扩大商机。(特别是,它致力于吸引海外华商与安溪企业进行投资和贸易合作。)第二,搜集国内外市场及商业信息,以提供给其成员。(这些信息有些是通过正规出版物搜集的,但也有很多是通过与海外华人的非正式交流来搜集的。)第三,协会能反映成员企业的 81 “意见和建议”,代表会员同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协调,帮助它们解决原材料短缺问题,为它们的产品寻找销路,等等。第四,在与境内外企业的合同争端中,为会员企业代言,甚至必要时代其采取行动。同样,商会还会采取行动帮助其会员中的银行和信贷组织,向贷款拖欠者施压,或者帮其制定更改还款时间表。第五,商会被授权经营企业实体,既赚取利润,也为成员提供“便利”。从1990年起,它就已开始运行自己的信贷机构,代为泉州市政府在安溪境内发放商业贷款。

该商会的代表不愿讨论其信用机构的资本化水平,也不愿意具体透露其年度预算细节。但他们解释说,商会的花销,包括薪水、差旅费和业余津贴,购买交通工具、订阅报纸和杂志的费用等,全部由县政府开支,没有向会员收取会费。因此,该商会用的是公家的钱。不过,尽管在工

① 对于那些对细节感兴趣的人来说,安溪商会包含37个国营企业、21个乡镇集体企业、47个乡镇企业、10个乡村企业、11个私营企业和5个个体企业。Interview, November 25, 1990, p. 126.

作上明显地与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关系,但商会并没有接受来自县政府任何部门的直接命令,并且不时地接洽地方官提要求和需要——这些要求可以被说成事关安溪商人长期或短期的利益。

国家—社团谱系上还可以确认更多不同的点。全国内燃机气缸套行业协会——其主席碰巧是辛集缸盖厂的工程师^①——在某些方面有点类似于个体劳动者协会。它同其他相似的全国性行业协会一样,自然是为了舒缓潜在的冲突和“市场混乱”。在各企业利润而不是计划优先的情况下,此类协会以同业生产协作和竞争调节为底线。^②但是,全国内燃机气缸套行业协会显示出比个体劳动者协会更有“自主性”的迹象。而且,像韭菜农民合作社一样,它同国家科技部门存在一些有趣的联系。^③

另一方面,在培育当地经济作物过程中,安溪县茶叶研究会在其提高生产技术、解决当地生产问题的主要目标方面,与韭菜农民合作社十分相似。^④不过,茶叶研究会是在县政府的一个机关倡议下成立的,而不是种植者和田间农艺师自己的主动创意。同时,它与县政府相关机关有更多的互动,有点类似专业化的咨询关系。而且,尽管茶叶研究会同韭菜农民合作社一样与各层级的国家性农业技术机构有类似的联系,^⑤但它缺乏与类似的小团体自发的横向联系,而韭菜农民合作社在这方面则有不小的长进。

这一系列小案例根本不可能穷尽现在可观察到的社团模式的范围。

① Interview, 28 July 1990, pp. 344–349.

② 对指导该协会和其他类似协会的原则和程序的解释,见“Some Points of Information on Industrial Trade Associations” (“Guanyu gongyeying hangye xiehui. …”), *Zhongguo Jidian Bao*, March 4, 1989.

③ 见 Interview, 28 July 1990.

④ Interview, 26 November 1990, p. 148, 以及, Interview, 30 November 1990, pp. 175–176.

⑤ 同时带来的技术说明,以及与那么多的新的民间协会展示的中国科学技术网络和组织的真实联系可能值得一些持续的研究。除其他原因外,这一组织生活的事实目前看来给在农村和城市环境下的社团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白领”或“专家”。

甚至不能穷尽上述两个地方的社团类型。^①然而,对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农村新型民间社团的构成、活动及自主性来说,这些例子足以提供客观的观测变量。

后毛泽东时代的官僚和市场改革,业已引发了许多复杂且相互交织的变化进程。在当下中国,国家机构之间以及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重新厘定,并且很可能将长期调适。以往国家与社会之间熟悉的互动领域,正在被重新划界。随之而来的是大多数竞争和协调规则正在被重写。国家权力的持续下放,伴随着社会组织的大型化,业已创造了一些条件,在向新兴社会力量授权的同时也要求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然而,鉴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博弈过程是如此的不确定,国家与社会最终能否都得到强化,谁都说得不准。本章所提供的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农村民间社团的有关素材明显过于单薄,除了为我们指明些许初步的假设方向之外,不能说明更多问题。但是,即便如此,只要我们抵住诱惑不轻率地妄下结论,它们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例如,对于本书其他章节被富有成效地使用的“公民社会”概念,我们在这里可以用来分析明显十分类似的社会变迁过程,^②而不是用来描

① 辛集镇比起安溪县有少得多的人口,但在任何程度的发展上都是两地中更先进的地方。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辛集似乎比安溪有更多的发挥作用的公民协会已在运转中。例如,大约有 28 种不同的协会——包括一个消费者团体,一个青年和青少年教育协会,一个果园和林业协会,一个兔子饲养者研讨会,甚至一个乒乓球俱乐部——松散地集合在该镇政府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之下。而该镇政协代表抱怨道,新的协会涌现出来得太快,以至于很难从总体上掌控(Interview, 27 July 1996)。辛集镇的政协委员会主席是该镇的前镇长。通过政协,民间组织便有一个向体制内的党委政府表达其诉求和利益的现成渠道,这一明显的事实对这里讨论的议题可能证明是相关和重要的。但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探讨必须推迟。

② 而且,这被一些试图建立一个关于发生在俄罗斯明显相似的过程的严格分析的学者同样采用;例如,见 M. Steven Fish, “The Emergence of Independent Associa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Political Society since 1987”, 这篇论文提交在 1996 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会议上。

述中国当前流行特征。应该指出的是,一些专家已得出结论认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一个新兴的“公民社会”实际上可能正如我们现在所见证的那样正在中国形成。^①然而,这里涉及一些十分关键的概念问题,可以为我们上述简要介绍的素材提供某些洞见。公民社会的理念,在社会科学文献中有一个长远但不太纯正的血统。^②它已经并且将继续被以各种方式定义,其中一些可以说与当前中国的现实相当一致,但其他的则相当牵强。然而,即使是最宽泛、适用性最强的定义,^③也倾向于强调,在相对于国家及其利益的自治关系中,公民社会的组织必须是自主的,目的是表达和追求自身的利益。即便是如此宽泛的界定,一旦与我们在当前中国所做的有关农村社团组织的访谈材料以及其他素材相对照,也会使下述想法充其量显得过于早熟:中国秩序正在进行的改革所带来的是公民社会繁荣的无可置疑的条件。

这些素材所能支撑的结论更为有限。可以肯定的是,近来中国社团生活的范围和强度大大扩展了。并且,我们还可以猜测,这种趋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尤为明显。我们也注意到,这些新兴的充满活力的民间社团,是建立在政体的地方层面之上的,并且与国家机关的中层有直接联系,也与半官方机构如科研机构有直接联系,并由此与更高级别的国家机关有直接联系。部分归因于所有这些新型的、视野更加开阔的、成员更加多样的社团组织的活动,使得以往社会组织的原子化特征似乎正在消亡。部分归因于所有这些社团在政治舞台上的现身,国家和社会互动的领域正被显著地重新规划。

① 见 Whit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and Clemens Stubbe Ostergaard, “Citizens, Groups and a Nascent Civil Society”, *China Information*, 4 (1989): 28-41.

② 对这一血统的一个有用的评论,见 Michael Bratton, “Beyond the State: Civil Society and Associational Life in Africa”, *World Politics*, 41, no. 3 (April 1989): 407-430。在这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中,Bratton 还提出了在何种条件下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的相互赋权才可能发生的讨论。

③ 其中一个就是 Stepan 的理解,被内奥米·哈占在本书的第 10 章所采用。她引用 Stepan 将公民社会定义为“多方面社会运动的一个活动领域……以及所有类别的民间组织……试图为他们自己构成一个总体的安排,以便他们可以表达自己并促进自己的利益”。

但是,这些社团大多数不是自主的,它们在表面上也不寻求或享受相对于国家的更多自主权。不同社团组织,自主程度各有高低。然而,所有社团组织都戴上渗透着社团主义修辞的封套,包裹在自我界定的、强调在行动上与国家及其目标相协调的社团主义式磋商、合作的概念胶囊之中。无疑,正是在克服过去强迫性的小型化行动中,这些社团扮演着为它们所代表(或代言)的社会团体在中国体制中强化影响、赋权增权的角色。同样可以明确的是,党—国本身在信息搜集、政策规划甚至政策执行模式方面,也因为这种新的安排得到强化(即赋权)。无疑,在国家官员及官僚改革者看来,国家及其权威的恢复活力和重获赋权,是这些安排所要服务的主要目标。如果没有服务于这些目标,那么对新型社团某些活动的容忍度很有可能会降低。事实上,仍然热衷于追求自身形象以及行政结构之活力、现代化、合理化和可信度的党—国,可能是这些新型社团诸多活动的主要受益者。毕竟,在自上而下改革进程中应运而生的社团所带来的这种类型的国家强化,还是一个十分值得称道的结果。

不过,在刚刚勾勒的国家—社会谱系的各节点上,仍然可以瞥见某些公民社会的“胚芽”,正如我们所见——有些组织在行动上相对自主,相对独立于国家的渗透和控制。尽管现在它们在整个体系中并没有什么分量,但它们也许就是未来枝繁叶茂的内核。同时,党—国对它们的容忍程度的波动也值得观察。然而,我们应该再次提醒自己,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角度看,此类社团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并没有多少必然性,反倒有很多的偶然性。

弗朗西斯·哈根皮安在本书第二章中指出,不管多么雄心勃勃多么毅然决然,不管权力多么稳固,不管多么明显地不受反对,绝大多数威权—转型政体都不会去完全重构其社会中的政治基础,即便该政体执政几十年之后也是如此。即使是高度发达的威权政体,其变革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并且,如果仔细审视它们,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种政体所创造的(有人曾用“所完善的”)国家机器,其真正的、实际的能力也是如此

的有限。她的观点对左翼威权政体和右翼威权政体同样适用。

在寻求理解可能导致威权政体终结的力量以及后威权政体政治变革的真实范围时,我们必须再次审视各个国家的历史,再度审视那些可能替代威权政体的变革政体所赖以建立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但是,同时需要提醒的是,当我们以这种重要的谨慎态度来比较少量现在正同步地(但并不总是同样地)着手进行制度改革的左翼威权政体时,30年、40年或50年激情燃烧的社会试验,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经历。

比如,像匈牙利、罗马尼亚这样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和民情跟中国比较自然差异非常大。但是,两国人民也有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经历。东欧国家中,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上台靠的是农民革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一种历史经历。在比较研究时,必须把不同方案的特殊性纳入视野。几十年的试验当然不会完全再造其所施行的国家和社会。但几十年的不同经验,对
85 不同地方的政治面貌肯定会带来一些不同的重要改变。

未来改革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过去特定的历史成就和历史教训。这些独特的历史——国家的、地区的和种族的等等——虽然可能共享一些重要的相似性,但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同的社会之间的差异却是巨大的。无论我们对欧洲“公民社会”的前景作何考量,但对中国的考量肯定要另起炉灶。

究竟具体的国家结构如何成型,其能力如何演化,究竟各个社会中既有的所有组织形式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究竟当代国家—社会的互动范围和性质如何呈现——恰恰是所有这些特质规约着未来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的可能空间。对我们所见证的激发和导向那么多体制快速变迁的重大进程,如果我们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兴趣的话,那么,在本文(以及本书的其他章节)所用的专业词汇框架内的上述分析,应该是最适宜的。这种分析路径注重国家结构与能力问题,注重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问题,同时也注重国家—社会之间的斗争和妥协空间的变迁问题——这样的研究路数,对于提高我们对正经历快速转型的体制变迁之驱动力量

的理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起迄今为止所做的研究,这种路数将使我们大幅度地接近现实以做出更恰当的解释,至少比那种草率地宣告国家主义的消亡和民主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的分析路数,更加靠谱。

集权与无能：比较视野中的印度民主

阿图尔·柯里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印度的政治变化反复表现出这样的模式:政府决策的控制权往往集中于借助个人声望进行统治的领导人手里,但领导人发现很难将个人权力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政治资源。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典型的政治后果。政府合法性变得难以维持;在最高层之下频繁地更换领导者;国家持续在一个低效率的层次上运行——在调解利益冲突和解决发展问题两个方面都是如此;政治暴力以及贫困持续上演。本章尝试解释集权与无能的倾向在低收入民主的印度并存的根源。

有人认为,这种集权和无能并存的倾向,是由国家顶层与广阔的社会边缘之间几无权威性关联引起的。在过往的岁月里,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印度的民族主义政党国大党,与区域和地方权贵建立了恩庇—扈从关系,从而打造了一个从首都延伸到乡村的权威链条。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权威结构中的这些联系弱化了,原因是诸多力量的牵扯:民主政治的传播削弱了区域和地方传统精英的影响力;民族主义政党组织被精英之间的内部冲突和贪恋权位的国家领导人的顽固不化所破坏。

鉴于印度的多样性,社会结构中传统权威以及民族主义政党的衰败,产生了一个高度碎片化的政治社会。在这样一个碎片化的政治场域

中,带有民粹主义和个人魅力色彩的领导人为锤炼一种微小的政治凝聚力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机制。然而,一旦掌权,民粹主义领导人不会轻易觉得需要建立政治制度;像政党这种组织的规则和程序,仅仅在个性化领导人的自由裁量权方面设置了限制。然而,缺乏政党或其他政治机构,领导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之间的联系便是脆弱的。选举是靠笼统的、非菜单式的承诺取胜的,因此很难将这种一般性授权转化为具体的政策。重要决策一再遭到强烈反对,甚至是遭到以前支持者的反对,于是,同样一再出现的是,政府的举措摇摆不定。政策失败反过来为其他民粹主义挑战者铺平了道路,从而继续上演集权和无能之间的周期循环。 90

这里所阐述的有关印度的观点,可能也具有总体的参考价值。首先,印度是仅有的维持了40年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其内部的政治模式因此可能有助于分析其他低收入民主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发生的事情。具备总体参考价值可能性的一个见解是,在前工业化社会之中,民主政治的传播破坏了传统的“上级”与“下级”之间的支配关系。这种情形一旦发生,控制和反对的斗争便会在地方和社会领域产生,并进入全国性的政治领域。这时候人们便需要估计到,全国性权威的新的统一模式是不容易形成的。这样的政治背景反过来促使那些依靠个人魅力和民粹主义诉求的领导人的出现。然而,这种性质的个人统治多半将导致令人失望的结果。在没有政党和政纲的情况下,民粹主义领导人承诺太多,而践诺的能力太弱,尤其是对底层人民而言更是如此。就这样,塑造统一权威的问题持续存在着。除了印度的英迪拉(Indira)和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之外,这一分析可能也适用于其他最近的例子,如菲律宾的科里·阿基诺(Cory Aquino)或秘鲁的加西亚(Garcia)。

一开始就应该注意的第二个总体性参考观点是,本章的方法如何与其他盛行的方法联系起来。这里所提出的问题,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早期关注的问题类似。后者认为,集权与无能的

问题,是制度发展与动员性需求之间不平衡的一个内在方面。^①然而,此中的原因分析是不一样的。与把动员看作经济社会变迁的一个主要功能不同,本章把政治激进主义蔓延归咎于民主政治传播所带来的附带后果。^②这一修正有助于理解大量的政治激进主义,即使是非常贫困的前工业背景中的政治激进主义。此外,由于那些贪恋权位的印度国家领导人已经破坏或抑制了制度重建,那些控制各邦的领导人,就不足以胜任政治秩序和公共利益代理人角色了。

最后,本章强调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递归关系”——恰当地补充了由乔尔·S. 米格代尔在本书导论部分所提出的观点。一方面,如果离开更大范围的社会政治背景,尤其是区域和地方层面的背景,印度国家领导人的集权和民粹主义滑稽表演将是无法理解的。另一方面,如果不考虑印度民主的和干涉主义的国家如何形塑地方和区域行动者的动机,那么权威日益破碎化所由以发生的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也是难以理解的。

在本章三个部分的第一部分中,我将分析当代印度集权统治和个人统治反复出现的趋势。第二部分将探讨,为什么个人化集中化权力在让领导人成功阻挡其他人掌权通道的同时,不容易转化为发展的效力。结论部分探讨了集权与无能趋势反复出现的后果,同时也探讨了印度的研究素材所蕴含的其他一些更广泛的含义。(一开始就应该指出,这篇文章所使用的经验材料,是建立在我的其他一些研究基础之上的;有关印度研究的详细材料,可以在这些作品中找到。)^③

① 参见他的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esp. ch. 1。

② 这一观点有一个很长的知识谱系,自 Tocqueville, 经 T. H. Marshall, 到 Reinhard Bendix and Charles Tilly. 例如, 见 Reinhard Bendix, *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esp. pp. 62-65, 419-434。

③ 主要参见 *Democracy and Discontent: India's Growing Crisis of Governabi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还可参见 *The State and Poverty in India: Politics of Refor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以及一本汇编作品, *India's Democracy: An Analysis of Chang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v. paperback ed, 1990)。

集权趋势的反复出现

这里“集权”的意思是全国性关键决策控制在极少数(甚或单个)政治精英手中。照此理解,印度一直都是一个十分集权的民主国家。即使在20世纪50、60年代期间,重要决策控制高度集中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他身边的亲信手中。不过,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印度与20世纪70、80年代的印度之间的重要区别,还是有助于界定我所寻求解释的分析问题。

化繁为简,印度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的政治动员水平还是相对较低的,精英政治忙于应付精英内部的竞争。尽管尼赫鲁(Nehru)绝对是“同侪之首”,但事实是,他主政的早期阶段,内阁政府是实体,议会起到重要的协商和辩论论坛的作用,反对派受到尊重,国大党拥有内部民主,独立于政府,各邦首长常常拥有自己的政治基础,其他像宪法、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这些国家建制都享有一定程度的超党派的完整性。因此,对尼赫鲁的个人权力有着重要的制度制衡。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早期阶段的政治斗争主要发生在相对较小的精英群体内部,特别是民族主义团体与其他富裕的城市和乡村精英之间。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尤其是农民,到那时为止还不是被动员起来的积极政治行动者。因而,主要种姓的成员和其他乡村中有影响的“大人物”,往往能够支配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们——农村中下阶层——的政治行为。随着这些乡村精英经由庇护纽带被纳入国大党的队伍之列,印度民主表现出构建相对良好的精英民主气象,其中,相互竞争的精英努力寻求合作,精英们也表达了主动融入印度大众的希望。

接下来20年的政治变化则呈现出一种令人迷惑的悖论:社会结构 92
中——尤其在农村——权力关系越是民主化,政治金字塔顶端的决策就越个人化和集中化。能够把这两个变化过程看作是系统的联系吗?在这个论点确定之前,需要先简述日益集权的事实。

研究印度政治的专家应该同意这样一个大略的观察：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印度的决策越来越集中于英迪拉·甘地个人手中。旧的国大党被边缘化了，并且英迪拉的新国大党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英迪拉·甘地反而赢得大范围的支持，她以民粹主义的姿态示众，与群众建立了直接联系。她转而以大众选举基础为权力资源，进行关键性的政治任命。越来越多的个人，既有党内的，也有政府中的，被任命而非经选举而掌权。个人忠诚和偏好问题因此在这一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中变得至关重要。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几乎所有的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国大党官员以及各邦首长，都失去了自己的政治自主性；这些职位最终都被那些英迪拉·甘地认为忠诚和有用的人所占据。随着对这种个人擅权的挑战日益增强，就连公务员和警察也被政治化了。最终，甚至军队和宪法也不能自外于党派政争。

该如何解释英迪拉个人集权日甚的趋势？一种分析方法是将其视为一场英迪拉·甘地获胜的精英内部冲突的产物，获胜的部分原因是她的政治手腕，部分原因是迎合印度多数人口——农村贫困人口——的民粹主义诉求。这种研究路数接着分析，这种胜利于是被用来创建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这一体系服务于英迪拉·甘地个人权力的维持和强化。^① 这种说法没有错，但不完整。说它没有错的意思是，一个有着更开阔视野、更强烈事业心的领导人将会认识到，这种统治策略不仅会削弱民主，而且从长期看将被证明是自掘坟墓：正如后面即将讨论的那样，由于国家的制度基础已经被破坏，当英迪拉·甘地在实施自己的施政计划需要制度时，她发现国家权力已经变得软弱无力。施政计划的失败反过来造就了她的政治失败，以及她的不幸遇刺。

然而，单单强调英迪拉·甘地贪恋权位是不够的，因为其他印度领导人也最终创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个人化、集权化、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

① 例如，参见 Paul R. Brass, *The Politics of India Since Independ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例如，拉吉夫·甘地在1985年上台后，就曾试图扭转这些趋势，但到1989年他就放弃了这方面任何不切实际的努力，重建了一个个人化、高度集权的体制。^① 印度许多邦的例子同样也能说明问题。像由行政人员变身为政治家的泰米尔纳德邦的M. G. 拉马钱德兰(M. G. Ramachandran)和安得拉邦的N. T. 罗摩·拉奥琪(N. T. Rama Rao)，这些非国大党领导人也未能使他们的权力制度化。他们把权力集中到自己人手上，把忠诚的仆从任命到权位上，只要还能维持个人声望就一直统治。

印度内部广泛存在的集中化和个人化的趋势显示了，在当代印度，某些更为广泛的政治势力助长了那些靠个人声望进行统治的领导人的崛起，这些领导人循着个人统治逻辑，常常反过来集中权力，并建立自上而下的官僚制度，雇佣听话的人署理政务。这些势力在1960年代某个时候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影响力更大了。直白地说，1960年代印度农村的中下阶层和下层就已经是重要的独立政治势力了。中下层人民越少受占主导地位种姓的头人的影响，由一连串有影响力的“大人物”组成的旧国大党体系就越无法利用选举工具。作为一个聪明的政治家，英迪拉·甘地很早就感觉到了这一政治变化，一旦面临精英对手的权力竞争，就马上将精力投入到拉拢新兴社会势力中去。在一个日益碎片化的政治社会中“消灭贫困”的民粹主义口号所瞄准的正是赢得多数选民，因为传统势力在这些选民中正在失势。英迪拉·甘地的连番选举成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假设。她的压倒性胜利反过来使英迪拉·甘地摆脱了联合执政的责任，并使她能够创建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体系。

来自印度政治腹地的众多地方的例子进一步印证了这个观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印度的政治社会变得日益碎片化。在这里我只是十分简单地引用来自印度不同区域的三个案例。^② 第一个例子取自古吉拉

① 见 Kohli, *Democracy and Discontent*, chs. 11 and 12.

② 有关详情，请参见 Kohli, *Democracy and Discontent*, chs. 3-7.

特邦西部的科达县。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该地区政治和社会仍由拥有土地的占主导地位的帕提达(Patidar)种姓所控制。纵然帕提达种姓的人口在数量上不占优势(占当地人口的大约 20%),但是他们的权力既基于对土地的控制又依赖于在种姓等级中一个相对高的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异种姓的中间团体刹帝利——人数约占当地人口的 40%——逐渐意识到,自己种姓的数量优势可以转化成政治权力。这些“落后种姓”作为选举集团被动员得越多,他们的领导人就越想控制地方政权——在印度农村,控制一个地方,就能获得精神上的奖励和直接物质的奖励(赞助)。对刹帝利精英来说不幸的是,直到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尚未分裂的老国大党的县级党部和地方政府机关,还是由帕提达种姓所控制。由此产生的政治冲突引发了一个相当经典的民主政治问题:像英迪拉·甘地这样的国大党全国性领导人,如何在地方党部和政府部门仍被像帕提达这样少数派控制的情况下,去吸纳像刹帝利这样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团体的支持?

第二个例子取自处在印度南部安得拉邦的贡都尔县。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这一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团体是雷迪斯(Reddys)。它经常与另一个拥有土地、种姓地位较高的团体卡玛斯(Kammas)争夺权力和影响力。只要权力冲突仅限于这两个精英种姓团体之间,旧的国大党就经常能够成功地吸纳相互竞争的精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像在印度其他地方一样,雷迪斯和卡玛斯的领导人影响原来那些落后和特定种姓团体的政治行为的能力下降了。随着许多旧的国大党领导人(如一个重要的民族政治家桑吉瓦·雷迪[Sanjiva Reddy],他曾在国大党内反对过英迪拉·甘地)在 60 年代失去选民支持,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对贡都尔县占主导地位的种姓团体权力的挑战,不如在科达县那样引人注目。不过,整个 60 年代日益明显的事实是,领导者需要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吸引“落后种姓”的支持。无论如何,该地区部分农村贫困人口最终被印度共产党成功动员起来了。新的国大党该如何去回应这些日益增长的权力挑战呢?

权力日益受到挑战的第三个也是最富戏剧性的例子，是印度东部的孟加拉邦。比起印度其他地区，该邦一向更容易受到激进诉求的影响。60年代，该邦部分地区发生了许多激进运动。发生在该邦北部的著名的纳萨尔巴里运动，一度成功地组织部落农民没收土地，直到最后被残酷镇压为止。旧的绅士精英(*bhadralok*，拥有土地财富的孟加拉知识分子)的政治重要性在城市和农村下降的事实虽不太引人注目，但可能是更大的威胁。同时国大党选举的能力也下降了。随着多个共产主义政党影响力的增加，同样的政治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权力挑战日益增长的政治背景下，国大党新中央领导层如何重新赢得选举多数？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但总体的观点是很简单的：民主政治和竞争性动员的引入，逐步削弱了印度传统社会结构的总体凝聚力。一旦到了这个地步，旧国大党体系中的大人物恩庇—扈从链条便没有能力动员一个日益碎片化的政治社会了。在1967年全国性选举中，国大党选情急转直下的命运，一定也让包括英迪拉·甘地在内的更精明的印度政治领导人想到了这一点。很明显，需要一种新的统治策略。反过来，当代印度的许多政治变化，只有被看作是这一新的统治策略的副产品，才可理解：这一策略就是，民粹主义要致力于在一个高度分散的政治社会背景 95 下建立和维持多数联盟。

回过头来看这一点就很清楚了，英迪拉·甘地在70年代早期采取的政治姿态是强调把消减贫困作为关键议题。这种民粹主义策略为她赢得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带来大量的支持选民。不过，在进一步研究这一策略的影响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倾向穷人的民粹主义绝不是变化了的政治环境的必然产物。其实它只是几个可选择的战略中的一个而已。例如，随着70年代消减贫困变得日益困难，随着诸如此类的空洞许诺不能继续带来选举利益，国大党在80年代就诉诸操弄民族议题——例如，挑动印度教徒对抗印度其他少数民族——来赢得选举多数，当然，这种选举策略在90年代曾被其他印度政党过度追捧；当然那是另一回事了。

仍有一个问题让人困惑：既然有多种统治策略可供选择，为什么英迪拉·甘地不去尝试系统地重建制度——比如成立一个改革党——以便能够推行自己的改革承诺并同时帮助巩固选举基础？对此永远不会有确切答案，但可以提出三个可能的解释。第一，这可能需要一个比英迪拉·甘地更具公益感、更富远见的领导人。第二，建立政党和其他机构，既花时间，又要持续耗费政治精力；事实上英迪拉·甘地将其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阻遏权力威胁上，这种威胁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也可能是她想象出来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政党不能便利地由上而下发布政令。政党往往会发展成为权力捕获的工具。那些业已掌权的人，尤其如果他们的权力是基于个人声望的话，往往会发现规则、程序和许多强有力的下级领导人显得碍手碍脚；掌权的人通常视机构为障碍，而不是有效统治助推器。

回到主题上来，60年代的日益增长的政治分裂激发了个人民粹主义的崛起。我们现在需要来简要探讨一下那些曾推动政治分裂的力量以及个人化的、民粹主义的统治的后果。

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推动了日益高涨的社会动员，尽管总体来说印度民主的特性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发展的学者经常预测，“现代化”背景下社会动员将日益高涨。商业的推广、经济活动的新模式、识字和城市化通常与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所谓的“社会动员”有关。¹ 由于造成混乱或形成新的利益集团，社会动员反过来被认为会侵蚀传统统治，会涌现一批追求新的政治承诺的社会行动者，会导致政治激进主义升级。研究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现代化”的这一分析路数是一致的；它也强调经济变迁的侵蚀作用，尤其是被认为导致赤裸裸的阶级不公以及由此而来的阶级冲突

¹ 见他的“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55 (September 1961)。

和激进升级的资本主义经济,会使这种侵蚀作用更加突出。^①在当代印度,有足够的证据支撑这样的分析,它强调日益高涨的政治动员的基本动力是社会经济变革。例如,在孟加拉邦、安得拉邦和比哈尔邦部分地区贫穷农民的激进行动,以及印度西北部新近富裕的绿色革命农民日益增长的政治效能感,基本都发生在社会经济的变革进程中。

一般文献中没有理解到位的一个问题是,低收入水平环境中的民主特性本身,是如何推动高水平的政治动员的?对于这一点,印度的经验可以帮助解释。例如,在印度,国家在寻求推动发展中,变成了高度干涉主义的国家。这就意味着,一个贫穷社会的相当数量的流动性经济资源,基本上要经过国家才能获取,这种资源因此就成为政治强烈关注的一个目标。此外,由于国家权力是以民主方式取得的,赢得或输掉选举的赌注就变得很高。反对派精英因此动用所有的手段——无论正当与否、无论是和平的或暴力的,来动员各自团体的支持,以确保掌控社会的主要产奶牛——国家。印度多元社会结构的多元性本身很容易招致竞争性动员。由于政党一直都是软弱的,并且也没有去组织制度化的参与,所以精英之间的政治竞争很容易变为“需求群体”数量的与日俱增;鲁道夫(Rudolphs)曾经正确地指出了印度的这一特点。^②这个过度政治化过程背后的动力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平等主义价值观的传播,以及印度低收入民主和干涉主义国家背景下竞争性政治的扩散,使得社会冲突政治化,极大地促进了印度政治社会的碎片化。

在前面引用的一些地方案例中,可以找到上述观点的一些证据。我们还记得,古吉拉特邦部分地区的刹帝利的动员,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它的目的是赢得选举和夺取国家权力;它是由党派政治精英领导的;它的主要诉求是国家的经济报酬(例如,给“落后种姓”更多的“预定”职

① 例如,见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esp. p. 276。

② 见 Lloyd and Sussane Rudolph, *In Pursuit of Lakshm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esp. Part 4。

业或国家补贴)。印度各地都有落后种姓争取“预定”的运动,都遵循着或多或少类似的模式。不同族群的动员也没有多大差异。无论是规模小一点的运动,像西孟加拉邦的廓尔喀人或卡纳塔克邦贝尔高姆地区(Belgaun)讲马拉地语人的运动,还是影响更大一些的运动,像旁遮普的锡克教徒运动,或甚至在印度各地的印度教徒—穆斯林教徒冲突,问题争议背后的政治动力学都是相同的:领导人为增强自己的政治需要而动员社群。需要一旦满足,运动往往就会消停。然而,经常出现的情形是,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运动愈演愈烈;或者情况更糟,尽管做出让步——如锡克教徒的例子——运动的领袖对动员起来的追随者的控制力却下降了。结果是,运动碎片化了,运动的进程反复无常,难以预测。

政治激进主义愈演愈烈背后的动力不是德国式的“社会动员性”的,而是政治经济性的,支持这一说法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自印度内部的多种区域模式。例如,在繁荣如古吉拉特邦与贫困如比哈尔邦在内的各邦,在过去的10年中都经历过大量的政治激进主义运动。如果说经济发展是主要的驱动力,那么该如何解释在像比哈尔邦这样一个经济低迷的邦却有极高水平的激进主义和政治暴力?更好的解释是:在经济不景气时,不断变化的政治意识和竞争性民主动员,让政治要求变得不容妥协,因此强化了政治要求所施加的威胁感,以及政治要求所导致的周期性政治暴力的威胁感。同样,被高度动员起来的孟加拉邦从1977年以来已经相对摆脱了暴力和纷乱的事实,必须归因于该邦有一个相对组织良好的改革党的执政。因此,政治和组织变量对理解印度的政治激进主义模式至关重要。

联系到主要观点就能看到,把民主引入一个高度刚性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已经缓慢地但确定无疑地释放出动员的不同模式。在60年代的某个时候,这些动员活动开始增加,并且在过去20年持续不断。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后果是,难以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有节制的权威;政治社会越是分化,越难以形成一个民主产生的有凝聚力的权力中心。这种政治境况转而激发了个人化的民粹主义。那些承诺给每个人都分一

点好处、甚至好处是什么都很模糊的领导人，那些具有个人吸引力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往往在政治分裂的背景中显示出强大的实力。

反过来，个性化和民粹式的统治，往往具有集中化和去制度化的内在特性，不能为构建民主权威的问题提供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由于权力链条把分散的大众与领袖个人联系在一起，在权力顶端的个人并不像其他民选领导人那样受到多元力量的约束。当然，这样的领袖势必慑于强大的社会力量，但他们在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而不是重构社会时，也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由上面任命的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高级官员越多，政治体内部存在的独立权力就越少，而政治金字塔顶端就越集权。由此出现了当代印度第一个重要的悖论：传统权威、尤其是在农村社会结构中的传统权威的民主化，为最高层的集权铺平了道路。然而，悖论并未就此止步。我现在关注的与此相关的第二个悖论是，这种最高 98 层的集权和控制，为何难以转化成解决问题的现实权力。

无能的反复演化趋势

“无能”这个词指的是统治者在实现自己既定目标上一再地落空。有能力集中控制决策的领导人往往表现得非常强势。然而，这可能并且往往是误导性的，尤其在低收入民主社会中。因此，我们需要区分集中性权力和发展性权力。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集中性权力牵涉到决策控制权日益掌握在少数领导人手里，由此类推，把第二层和较低层的政治精英排除在决策之外。相形之下，发展性权力指的是一项不仅做出决策而且使其得到贯彻的能力。发展性权力因此是政治领导人成功地改变社会行动者和团体行为的能力。

第三世界一些威权政府有能力把集中控制转化成发展效力，主要是通过施加强制来改变社会团体的行为。但是，正如弗朗西斯·哈根皮安和维维恩·苏在这本论文集中所展示的那样，即便威权政府再强大，这

种情形也是罕见的。一旦政治体按民主方式组织起来,强制肯定不能作为领导人用来影响社会经济变化的硬通货。相反地,以强力威胁——合法统治——为后盾的正面和负面激励、说服和选择性使用法律显得越发重要。因此,在民主政体内,由高层发起的重大发展的变革能力,首先要依靠领导人制度化“集团共识”的能力,或者,为支持特定的变革道路而建立多数联盟的能力。多数联盟不仅要选择特定领导人,而且要为领导人计划的贯彻执行提供持续的支持,这转而要求统治者和支持者之间、或政治中心和社会边缘之间的联系应该是坚固持久的。如果领导人和支持者的关系是透过像政党这样的机制而得以制度化的话,这一持久性很有可能就会存在。就这样,民主领导人依靠其组织良好的政党,在实施发展计划方面,比起那些依靠分散化、民粹式支持的领导人而言,处在更加有利的位置。

99 这些总结可以用来自印度的一些实证材料来佐证。不过,这需要做一个总体说明。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通常需要多个选区的支持,并因此通常追求多重目标。这个简单的道理对接下来的讨论有两方面重要意义。第一,在最好的情况下,民主政府也很少采取果断行动,反倒是和稀泥应付。这将提高人们对民主国家发展成效之“正常”水平的容忍度。例如,在朴正熙统治下的“果断而灵活”的韩国与“软弱而糊弄”的印度,就部分地反映了政体类型的差异。在印度,政党和其他机构尽管虚弱,却能将国家与社会有组织地联系起来,这一例外的变数有助于进一步解释一个集权的、拥有个性化领导人的国家为什么是软弱的。第二,实现目标的能力通常因目标的差异而不同。无论政党是虚弱的还是强大的,取决于联盟支持性质的不同,一些目标比其他目标更容易实现,而另一些目标则比其他目标更难实现。

有了这些附加说明,当代印度的几个例子现在可以被用来解释为何日益提高的集权并没有强化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权力。我们将讨论两种不同类型的实例:英迪拉·甘地兑现其消减贫困的重要承诺的落空;拉吉夫·甘地在试图改变印度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使其朝向一个更“自

由的”方向时所遭遇的政治困境。

英迪拉·甘地与消减贫困

消除贫困(*Garibi hatao*)或“消减贫困”是英迪拉·甘地在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主要政治口号。然而,我们通过回顾知道,英迪拉·甘地在缓解印度农村贫困中并没有获得多大成功,当然是因为没有通过国家再分配的干预机制。因为口号与实际之间的落差在第三世界屡见不鲜,因此甘地的落差并不令人惊讶。不过,为什么这种境况引发了一个值得玩味的研究难题?原因如下:英迪拉·甘地以她的民粹主义口号为基础,赢得了相当多数的选举;她日渐对印度的关键政治决策拥有巨大的个人控制力;在短暂时间内(1975 年—1977 年),她甚至接近拥有独裁的权力。为什么把这些权力资源转化为推行像土地改革之类的再分配计划的能力,被事实证明是如此困难?

原因部分在于,任何国家想把触角伸进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各个缝隙,并且以牺牲社会强势力量造福弱者的方式调整社会关系,都是非常困难的。再分配改革可能是国家仅次于战争的最困难的任务。如果领导人使用标准的操作程序,像通过法律并且希望官僚机构去执行,那么土地改革的执行就无望了。考虑到那些土地所有者往往都是有权有势的,国家官僚机构的下层很少能够有效地代表弱势群体对抗强势阶层,在官僚监督一向松弛的社会的边缘,尤为如此。更有可能的情形是,下层官员和农村社会有权有势的精英建立起惬意的工作关系,并把再分配的法律丢一边不管不顾。这种改革想要得到执行的话,更需要的反而是更多的政治干 100 预,在强化弱势群体或组织弱势群体的同时,利用政治化的执行机制。通常是党的干部,这种机制更愿意响应领导人的而不是官僚的决策。

我在别处曾用一本书的篇幅证明,印度低收入民主的再分配干预由组织良好的中左翼政党来实施效果最好。^① 没有这种工具,英迪拉·甘

① 见 *The State and Poverty in India*。

地几乎不可能兑现其消除贫困的竞选政纲。那本书的观点是通过对印度不同区域的素材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的。那项研究表明,再分配改革的执行,在像孟加拉邦这样的邦比在其他邦,包括英迪拉·甘地所在政党执政的邦,要更为成功。我把这种成功追溯到孟加拉邦执政党的作用上。该党自称是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PM)——但从意识形态上实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尽管与其他列宁主义政党一样,都有一个严密的组织。该党的权力基础是农村中低层阶级联盟。这种社会基础,加上该党有良好的组织,使得印共(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印度的个别区域成功地推行温和的再分配租赁改革。

最近,来自印度的更多证据进一步支持了组织良好的政党作为再分配机制的重要性,尽管重申该政权的社会基础问题同样重要。在过去的10到15年间,孟加拉邦继续成为租赁改革得以成功实施的几个邦之一。不过,在实施这些改革后,印共(马克思主义)当局并没有推行进一步的土地再分配改革措施,俾使真正的穷人、那些没有土地的雇农受益。印共(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把雇农组织起来以提高其工资收入水平。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印共(马克思主义)难以把中农和雇农撮合起来形成联盟。由于中农通常是这些雇农的雇主,而且激进的土改会影响到中农的土地利益,所以印共(马克思主义)只能放慢改革的脚步。这个分析点是很明确的:政党组织只是成功的再分配改革的一个重要变量而已。执政党的社会基础是制约当局政策倾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不让人们说我对权力的社会基础与当局的政策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言过其实,那就以80年代占吉拉特邦的案例来做一次现成的检验吧。辛格·索兰基(Madhev Singh Solanki)领导下的国大党在占吉拉特邦所整合的获胜联盟,与印共(马克思主义)在孟加拉邦的权力基础几乎是一样的。就像在孟加拉邦一样,索兰基成功地排除了精英、拥有土地的群体——帕提达(Patidars),将他的权力基础建立在刹帝利和阿迪瓦西(Adivasis,指印度的原住民——译注)这类中下层之上。然而,一旦

掌权，与孟加拉邦不同的是，索兰基根本就没想过要进行土地改革。当他试图推行像“保护”政策——一项确保中下层获得公共部门几千个工作岗位的政策——这样一些温和的改革时，古吉拉特邦便陷入了一次大骚乱之中。帕提达人发动了这场骚乱，并且严厉地控制索兰基哪怕是象征性的重新分配的权力。接下来，索兰基既不能把自己的支持者搞成联盟，也没有任何的成就可拿来对抗反对派。软弱的根源是缺乏一个组织良好的政党。没有这样一个政党，政府的支持者就不会深度认同计划，统治精英仍然宗派林立，就不能产生一支凝聚力量以对抗社会的强势力量。很显然，一体化的社会联盟不足以支撑执政当局的再分配事业。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仍是理解当代印度再分配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变量。

缺乏一个组织良好的中左翼政党正是英迪拉·甘地无从将她的中左翼的政治目标付诸实施的原因。换言之，没有一个将国家与社会系统地联系起来的工具，单凭个人权力有可能造成集中局面，但实现目标的权力不会由此产生。重要的是还要加上一点——虽然这一点相对明显——即使拥有特定类型的工具，也不意味着领导人完成所有类型的目标的能力都会增强。例如，一个组织良好的中左翼政党，可能会提高领导人的再分配能力，但对其处理民族冲突的能力却无关宏旨，或者恰恰对经济增长起负面影响。因此，国家什么时候有能力实现目标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不仅国与国之间有差异，而且一国内部也不同。

拉吉夫·甘地与经济自由化

认识到印度产业增长相对缓慢，尤其是与像韩国这样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更显落后，拉吉夫·甘地便着力改变印度的发展战略。这是在英迪拉·甘地遇刺之后、拉吉夫·甘地在1985年初趁着一股“同情浪潮”在选举中大比例胜出掌权之后的事情。现在回顾，拉吉夫在实施自由化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的同时也遭遇许多挫折。最终，他不得不回到

民粹主义色彩更浓的方向上。此外,他曾经所取得的成功可能正是他1989年选举所付出的代价。^①因此,简短讨论他的例子,便能凸显一个不同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以再分配为参照的分析视角。基本观点仍然是相同的,即无法把个人权力转化为发展结果;不过,我们这里想强调的具体的观点是,想把非特定的选举授权转化成具体的政策目标,很快就会碰壁。

102 这里需要解释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印度最近的选举都完全是在非特定的授权下获胜的?对于那些不理解印度政治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从1967年起,印度多数全国性选举都是在某些特殊事件的阴影下进行的。例如,1971年大选是在民族主义狂潮肢解巴基斯坦(以及孟加拉国成立)的背景中举行的,而且当时英迪拉·甘地急剧转向民粹主义也曾燃起许多人的希望。1975年,在政治反对派声势日隆且发动暴力抗议的情况下,当局实施了全国性的紧急状态。英迪拉·甘地在1977年选举中的败北,主因是紧急状态,但反对派组建联合政府的戏剧性失败,使她在1980年重新掌权。1980年代初期,人们普遍认为,要是英迪拉·甘地没有在1981年遇刺,她在1985年的全国选举中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她的遇刺,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陷入动乱的普遍担忧和对她的儿子的同情,使得拉吉夫在1985年初以相当大比例的多数走上权位。1989年的选举是印度自1967年以来为数不多的“正常”选举之一,而且不足为奇,就像1967年,国大党再一次失去了其执政地位。1991年选举,国大党重新执政,再一次表明国大党的反对派在开展合作方面的无能;同时,拉吉夫·甘地戏剧性遇刺,也使国大党得益。

人们普遍认为,国大党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失去了全国性的霸主地位,并且从那时起,国大党领导人就一直难以整合起执政联盟。尤其是人们对国大党未能兑现其民粹主义诺言记忆犹新,就使得组建执政联

① 在1991年年中开始的自由化尝试某种程度上是更加成功的。然而,对那场实验的经验教训的分析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

盟变得更加困难；同时，民粹主义大概已经失去了其选举功效。因此，在没有政党、纲领和稳定联盟的情况下，选举的胜利不得不通过创造或者利用极端事件——其所产生的像狂热或危机之类的国民情绪决定了选举结果——“被制造出来”。因此，以非特定的以及近乎耸人听闻的授权为基础赢得选举多数，就不仅是偶然的事情，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印度构建一个权力凝聚中心的内在组成部分。既然这样，那么我们所要分析的问题是，通过这样的手段赢得权力的领导人，执政时如何施政。

拉吉夫·甘地赢得选举的授权是十分泛化非具体性的，而他在位期间的表现也是十分蹩脚。他的印度经济“自由化”的方案，十分重视发展的潜在动力。印度的自由化主要被看作为私人生产盈利提供激励——或者至少消除障碍，并希望借此提高投资的水平和质量，带来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虽然，从提高私人投资产出的角度看，这种政策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拉吉夫·甘地在实施这种政策措施时却遭遇重大的政治问题。

拉吉夫·甘地的胜选，并不是靠组建一个寻求印度经济自由化的以经济增长为取向的执政联盟。事实上，他的选举胜利没有或几乎没有经济因素。他一开始尝试把他的一般性授权转化成一个具体的经济方向，第一个主要的障碍来自他自己的政党。尽管国大党不再称得上是一个政党了，许多从英迪拉·甘地时代开始就被任命的人，还是规避了拉吉夫的改革企图。这一阻力背后的动机是形形色色的：一些人担心，放弃“社会主义”政策而支持“自由主义”政策，这条路可能会丧失该党在印度的多数支持——农村贫困者的选票；其他人则担心，“自由化”最终会使印度经济暴露在外部开放经济影响之下，进而威胁到主权安全；还有一些人则把新的政策体系看作新的高级官员主导该党的信号，因此想方设法阻止任何重大变革，以此保住个人权位。无论动机是什么，无论各种动机是如何混杂的，基本点是这样的：因为重大政策动议从来就不是促进政党胜选的党纲的一部分，因此对该动议缺乏整体的支持，甚至在执政党内部也是如此。

由于拉吉夫·甘地站在了如今已经是集权的政治体系的顶端,所以该党的阻力可能会减缓他的动议,但这种阻力并不是决定性的。拉吉夫撤了那些抵制者的职,用一些更忠诚的人取而代之,继续推进他的自由化政策——至少在 1985 年和 1986 年期间如此。

不过,他的新政策的反对压力很快增加了。例如,拉吉夫减少印度在扶贫计划上的公共支出的尝试,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其中就包括来自国大党内部高级政治官员的再次反对。拉吉夫退缩了。而拉吉夫当局宣布废除像煤油这样的必需品的价格补贴计划之后,许多反对党威胁要在印度城市发动一场总罢工。拉吉夫再一次退缩了。当邀请日本汽车厂商在印度生产汽车的计划被泄露之后,印度那些偏爱进口替代的商人对政府施加了压力。于是,印度外商投资政策改革的计划被搁置一边。显然,“自由化”的一揽子计划的不同部分,招致可能受其影响的所有社会群体的反对。

最后,真正对拉吉夫·甘地造成伤害的反对者是农村群体,他们开始把新的政策措施视为支持城里人和富人。尽管这种解读是没道理的,特别是因为像货币贬值这样的措施能够改变贸易条件而有利于农民。这是一个政治管理的问题。在缺乏政党支持的情况下,拉吉夫·甘地根本没有政治资源以说服和融合他的计划背后的农村人口群体。实际情形恰好相反:在政体的较低层级,政治行动者成功地反制动员。拉吉夫的新经济政策,曾导致工业生产增长,特别是在耐用消费品方面。由于
104 担心这些商品可能打不开市场空间,政府曾推出诸多刺激措施来使城市消费者消费更多。这种发展战略所导致的结果很容易被认定为是造福城市富人。农民领袖利用新机会并成功地动员起农村群体来反对国大党。直到 1987 年的选举,当国大党在关键的印地语中心地带的哈里亚纳邦落败时,拉吉夫·甘地才意识到新经济政策的合理性所付出的政治代价有多么高昂。

1987 年之后,人们越来越少谈及经济自由化,至少一直到 1991 年为止都是如此。那一年,新一届政府开始推动自由化议程;不过,那是一个

不同的故事。1987年到1991年间,没有重大的政策逆转,但也没有重大的政策进展。相反,拉吉夫·甘地重新推行了民粹主义色彩更浓的经济计划。顺便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和政治合理性冲突的张力对他牵扯越大,他就越少使用经济政策作为选举动员工具。可以说,国大党重新投放精力进行宗教动员,正是源于这个矛盾。英迪拉·甘地的民粹主义曾赢得了多数,但是扶贫政策从来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当拉吉夫·甘地试图在一个支持增长的方向上重新安排经济政策时——可能最终使印度穷人受益——短期内如何确保胜选却成问题。在印度,如果多数派—少数派不是沿着穷人—富人的线索划分的话,那么另一个明显的线索就是印度教徒对少数民族、尤其是穆斯林。国大党表现得日益倾情于印度教徒,以及其他有类似倾向的政党的选举成功,都部分地源于当代印度的这种政治张力。

拉吉夫·甘地确实实施了一些自由化措施,但是也被迫缩减其他计划好的行动。在他的自由化政策贯彻成功的地方,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是损害重要政治支持。因此,很明显的是,虽然选举的赢面相当大,但拉吉夫·甘地不能把这种一般性的支持转化成助推其政策偏好的动力——主要是因为他在1985年初获得的支持是非常分散的,缺乏推进任何具体政策变革的强授权。如果说拉吉夫·甘地为之奋斗的是经济自由化的话,那么它的试金石应该在选举政治市场上。如果他因此整合一个支持自由化、支持增长的多数联盟,并且通过把它的代表纳入一个政党组织给予这一联盟一些韧性的话,那么上述自由化政策的贯彻实施问题就会大不相同。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没有政党、纲领和稳定联盟的情况下,非特定的选举授权在当代印度已经近乎变成一个必需品。反过来,选举胜利转化成具体新政策的努力,也变得非常困难。因此,如何赢得权力与如何使用权力之间的落差越大,印度政治体从相对低效水平的泥潭中脱身所需的时间就越长。

结论

本章试图确定并解释印度政治中反复出现的一种集权和无能的趋势。它的目的既是分析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也是展示本文文集所提出的国家—社会研究路径的应用性。至此,我们要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通过对实证分析难题所涉观点和本章所用方法进行综合考量,并进行总结。

本章尝试分析的难题也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全国性决策权逐渐集中到一个领导人或几个领导者手里,但是领导者发现很难把这一控制权转化为发展的效力。我提出的关于印度的观点可能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能不适用。我的直觉是,它很可能与其他低收入民主国家有一些相关性,但威权体系内部的动力学是不同的。

在政治中心与社会边缘之间缺乏强有力的系统性的权威联系,这一基本状况有利于解释印度集权与无能趋势并存的局面。民主的传播已经破坏了传统社会结构中的统治模式。许多团体因此被动员走上政治舞台,但是这种动员并没有伴随着对新近被动员力量的系统重组。政党本来可以充当这种重组的一个重要制度化手段。然而,政党需要时间才能堪当此任。印度的情况更糟,渴求权力的领导人大肆摧毁旧有的政党。社会结构中,政党的虚弱和权力的分裂,使得打造有效政府——一个不使用暴力就能解决冲突并兑现其政策承诺的政府——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

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政体中建构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中心,可供选择的余地不大,而拥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是其中之一。依照领导人追求权力的逻辑,这样的领导人通常都会构建自上而下的由忠实的追随者组成的政治体系。由于规则和程序会限制个人的自由裁量权,有个性的领导人并不总是把——尤其是当他们是目光短浅的领导人的话——建立制度的需要视为可欲的。就这样,印度权力的碎片化,为激发个人化和集

权领导人的出现提供了背景。

我们也注意到,印度的个人化控制已经被证明很难转化为实现政策目标的权力。对再分配目标和增长目标,都是如此。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在这两种情况下,领导人都需要一个将他们的目标转化为政策结果的政治工具,但这一工具缺失了。像政党这样的工具本可以帮助把领导人和支持者整合进一个持久的“权力集团”中。这一制度化的权力,反过来可以被用来追求特定的目标。

剩下的问题是:假设拉吉夫·甘地的权力曾经建立在一个良好组织的
增长联盟之上,那么这种权力结构对再分配目标的意义又如何呢?从 106
理论上说,这种影响很可能是负面的。相反的情形可能也是正确的:一个组织良好的再分配执政联盟很可能会损害经济增长。那么,国家如何能够同时追求有冲突的目标呢?没有简单的答案。不过,以下不啻为一种可能的思考方式。

由于社会行动者的利益是多样化的,那么社会中的政党也应该强调不同的目标。许多成熟的民主国家很好地实现了增长与再分配联盟之间的轮流执政,这不是偶然的。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体内部,政治团体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并且国家必须履行重要的经济功能,对具有竞争取向的组织良好的政党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了。组织良好的政党是少有的一个既能够代表利益又能够在高层集中利益、一旦赢得选举还能够促使其领导人追求民主式发展的政治工具。创建组织良好的政党因此仍然是第三世界政治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长期目标。

结论的最后一点涉及我们这里所用的分析方法。第一,如果本章所提出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那么它就能强化本论文集的一般主张,即国家与社会持续地彼此制约,而且,理解政治变革的模式,必须集中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第二,本章的研究表明,要揭示国家领导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背后的动因,不顺着政治和社会等级向下追溯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在“边缘”地带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构成了规约统治中心的性质的背景。最后,这种分析推导出这样的观点,即我们对国家和社会

应当有深度的政治思维。与用官僚主义视角观察国家及把社会结构看成既定的思维定势不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政治和社会行动者都希望在社会变迁中影响权威的运用,而国家和社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反复地塑造。为控制和反对而进行的斗争是生活机会的斗争,进而往往产生政治斗争。由此导致的政治斗争如何被吸纳、如何被抑制或如何被利用,是理解发展中国家政治变革如何推进的根本。

第五章

后殖民时代非洲的国家与统治阶级：持久的权力矛盾¹⁰⁸

凯瑟琳·布恩

引言

戈兰·海登(Goran Hyden)曾经评论说,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国家似乎像“悬浮在半空中的气球一样”。^①有关非洲国家的许多研究文献都传达了类似的图景。不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欠发达理论,都强调了当代非洲政治权力的外源性或强加性。诸如“西化精英”“附属性资产阶级”和“过度发达的后殖民国家”这些强调当代国家和统治形式影响之程度的概念,都被移植到非洲社会之中。国家自主性的假设与这样的观念携手并进,即国家权力的最基本的来源是外在的,而不是植根于非洲社会的。隐含在现代化理论之中的是这样的信念,即政治领域接近绝对自主,热带非洲新政治精英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向重塑社会。政治经济学家用新殖民主义和依附关系理论,对现代化论者的国家自主观念提出挑战。欠发达论者则强调,非洲统治阶级面对新殖民利益集团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权,在有组织地采取行动以反对全球资本逻辑方面也几乎没有什么

① Goran Hyden, *No Shortcuts to Progress* (London: Heinemann, 1983), p. 19.

么自主权。然而,依附论者和欠发达论者跟现代化理论家一样,倾向于认为,后殖民主义的国家 and 统治阶级对于他们所领导的社会来说,显然不受约束。^①

基于这样的观点,许多政治经济学家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的统治精英将会以把自己转变成资产阶级的方式来巩固和保障自己的权力。^② 比起长期的经济停滞,某种形式的外围资本主义或依附式发展,更有利于非洲统治阶级(和国际资本)。“资本的逻辑”以及统治者的利益驱动,都似乎指向由相对自主的后殖民国家所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

109 这种解释脚本的问题是,在政治独立大约 30 年之后,这种状况似乎并没有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中实现。统治者使用国家权力的手法,经常是伤害而不是促进了经济增长。吊诡的是,政治实践模式运行的结果是侵蚀了行政能力和国家的资源基础。这种现象在农业发展领域尤为突出,当局在农业领域所追求的似乎是限制农业盈余增长、抑制或甚至降低农业生产潜力的政策。这两种趋势都损害了统治阶级和国际资本的长远利益。

许多分析家笔下所描述的非洲国家日益增长的“功能失调”,提出了这样的新问题,是什么力量塑造、抑制和破坏了后殖民背景下的国家权力?是什么导致非洲国家的“弱化”和各种形式的经济滞胀?这可辜负了依附发展理论的期望啊!

答案的一个要点在于分析非洲国家的权力是如何立足于社会的。

① Bruce Berman 提出的这一点见“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the Bureaucratic State of Colonial Afric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5 (1984): 166。还可参见 J.-F. Bayart, “Le politique par le bas en Afrique noire: Questions de methode”, *Politique Africaine* (January 1981): 53-82。

② 例如,参见 Nicola Swainson,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Capitalism in Kenya: 1918-1977*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Bjorn Beckman, “Whose State? State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Nigeri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23 (1982): 37-51; Richard Sklar, “The Nature of Class Domination in Afric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7, no. 4 (1979): 531-552。

尽管有这样的印象和部分的事实，即非洲社会的统治规则和统治者是外在强加的，但根本塑造当代非洲所表现出来的统治形式和经济剥削方式的，是被统治者意欲治理的那些社会。本章把注意力引向后殖民社会的农业基础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政治结构。简要概述殖民国家和后殖民国家在那些国家权力无力染指的社会机构间树立权威——以及从农业中掠夺财富的权力——所用的方式。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制度联系、政治融合与社会对立，都提高了后殖民时代非洲早期的政权巩固水平。与此同时，它们限制了统治者加快推进农业转型进程的意愿和能力，而这一进程原本有望提高生产力、销售最大化、增加农业投入以及使农业盈余集中到资本主义生产者手中的。本章认为，考察国家权力植根于农村社会的方式，有助于解释政府当局随农村资本主义兴起而发生的变化时欲迎还拒的矛盾心态，有助于解释他们在榨取农业财富中所使用的自相矛盾的事与愿违的策略，也有助于解释执政联盟持续的脆弱和无能。

我的观点部分取自对殖民统治的研究。有一派研究认为，在非洲殖民地，国家在促进非洲土地和劳动力开发中的利益与其在政治统治中的利益不能完全调和。安妮·菲利普斯(Anne Phillips)和布鲁斯·伯曼(Bruce Berman)就属于这一派。¹ 为强化统治而兴起的支配模式，阻碍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一重要洞见，关系到对后殖民政权巩固的理解。为巩固政权，在独立之时掌权的人要付诸努力以巩固执政联盟、扩张自身权力和奠定某种统治基础。这一过程受到社会势力的塑造，后者折冲分化了新兴政治阶层的领导权和凝聚力。最重要的是，横跨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小规模经营农民，保留了对土地的直接控制，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国家和资本的自主性。农业社会和经济

¹ Berman, "Structure and Process"; Anne Phillips, *The Enigma of Colonialism: British Policy in West Africa* (London: James Currey, 1989). 还可见 Michael J. Watts, "Class in Northern Nigeria, 1900 - 1945", in Paul Lubeck, ed., *The African Bourgeoisie*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87), p. 69 inter alia.

结构的这一特征,导致殖民政府以及后殖民政府当局只能通过与农村社会关系和交易网络中的强人和政治当局开展“政治合作”来“间接地”治理农村。后殖民政府当局由此而采取的治理和开发策略,便再现了其殖民前辈的政治控制模式,这种模式抑制了他们推动资本主义转型的意愿和能力。

本章第一部分主要研究殖民地时期,集中研究其间的经济和政治矛盾。这一矛盾塑造了殖民政权。我这里借鉴了一些对南撒哈拉非洲殖民统治和非洲出口商品小规模生产者研究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讨论整个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政权巩固的相似性奠定了基础。本章第二部分转向 20 世纪 60 年代的权力和平转移。其中,探讨了庇护主义和国家赞助人在维护支离破碎的执政联盟掌控国家权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认为,这些政治实践模式,深深植根于殖民地时期创造和支撑农民阶级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中,并且具有再生性。随后,将研究重点放在超越殖民前后时期的连续性上,放在横跨非洲时空背景中所呈现出来的规律性上。

这种揭示国家与社会权力基础形式之间联系的研究方法,强调了制度和经济结构以及各种支撑它们的政治和社会关系。在这种研究路径中,处于特殊地位的关系是围绕以权力为控制基础(而不是以市场为控制基础)获取物质资源而发展起来的庇护关系。庇护关系与阶级范畴的分析边界盘根错节。庇护关系也模糊了国家—社会的边界。庇护等级、派系和宗族既在国家机器内部也在地方层面形成,暴露了存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内部所存在的分化、竞争和权力斗争,也暴露了他们之间的结盟和冲突模式。我认为,存在于农村社会机构中的权力等级被用来扩展现代非洲的国家权力,正是这一进程抑制了各个国家政权促进农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转型的意愿和能力。

研究非洲的流俗观点,整体忽视了非洲语境之中背景、环境和风俗的多变性,同时对这些社会和政治现实在当地演化竞争的无穷多样性,也缺乏分析。只有明确了既有研究的这些局限,才能对非洲的背景和环

境特征保持清醒认识。如果把殖民非洲与后殖民早期非洲放在更为宽广的历史和比较语境中进行研究,这些特征汇总起来所产生的特殊性便会凸显。

从更广阔的历史语境就会十分清晰地看到,后殖民早期的权力格局已经被证明难以维持。我在本章结论部分提出,殖民时期出现、后殖民早期再现的国家权力运行的内在矛盾,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危机中达到了顶点。本书中,内奥米·哈占和迈克尔·布拉顿所贡献的研究成果,是考察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出现的相关的新政治实践模式。

农业社区、商业资本与“间接统治”

非洲新独立国家和新兴统治阶级,是被打上殖民统治深深烙印的社会势力所塑造的。后殖民政权的巩固需要努力构建新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与此同时,政权巩固还要努力使既有的立足于社会的权力(再)臣服于国家。这些既有权力结构所赖以深植的那些物质条件,并没有被 60 年代已被承认独立的政权所改造。

殖民计划本身既是政治性的也是经济性的,因为进行治理是进行经济剥削的必要前提。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双重使命之间的内在张力,是如何塑造殖民国家的性质、殖民统治的模式和殖民计划的成效的。提出这一问题的分析家们认为,双重使命从根本上说是矛盾的,因为不断强化的经济剥削对殖民者寻求统治所凭借的政治安排具有削弱的威胁。殖民统治和剥削始终是不稳定和不完整的过程。政治独立并没有解决这些矛盾。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殖民国家实施的计划是把私人资本局限在有限领域:利用非洲的土地和劳动力,为欧洲市场生产廉价的农产品。该计划需要大力促进进出口作物生产的快速扩张,也要大力打压那些妨碍欧洲人的利润和野心的非洲政治当局和贸易商。达到这些目

的所诉诸的胁迫和政治控制——即殖民统治——是一种累赘的手段。

112 为实施殖民计划而公开或隐蔽使用的强制手法,使殖民当局的任务变得复杂。他们被指控卑鄙地把国家权力当作欧洲人获取经济利益的剥削工具,同时为达此目的构建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①在殖民地和种植园飞地之外,一战时期采取的措施是努力调整而不是撇开被征服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和前殖民时期的农业生产体系。^②

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殖民地国家逼迫非洲农民拿出更多的生产性资源来种植庄稼以运往欧洲。殖民地国家往往依靠强力来削弱自给自足的农户和社区,由此使农民服从殖民市场的需求和压力。强制耕种出口作物和抽税是首选的工具。罗伯特·珊顿(Robert Shenton)描述了尼日利亚部分地区的运作方式:

193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尼日利亚北部)扎里亚省的农民……将他们总收入的41%用于支付税收,而其他人则将他们现金收入的70%用于支付税收。由于出口作物是现金的最大来源,很明显,农作物的生产几乎完全是为了满足国家的需求。在一些地区,甚至不得不变卖口粮以支付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③

各个社区回应这些要求各自所采用的方式,同非洲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组织方式以及人与土地之间关系的组织方式一样五花八门。在出口作物产区,农业技术人员想了种种办法增加新用地:调用休耕地或口粮田用以生产出口作物,调配家庭劳力或从社区以外吸引家庭生产劳力。这些过程改变了农村既有的社会结构。在出口作物产区,产生了非

① Berman, "Structure and Process".

② 在移民殖民地(肯尼亚、罗得西亚和南非),这一策略是通过非洲当局被“间接”统治的“保护区”的建章而发挥出来的。这一保护区的经济围绕着粮食作物生产和向移民农业区提供劳动力而得以组织起来。

③ Robert Shento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Northern Nigeria* (London: James Currey, 1986), pp. 102-103.

洲农民。^① 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在现有的生产方法和技术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却实现出口作物增产的地方——在像咖啡和可可这种要求低劳动力投入的木本植物可以在现有粮食作物旁边或在其间生长的地方——这一过程是最成功的。^②

作为出口作物生产者，非洲农民通过商品市场、进口消费和农业投入被动卷入世界经济之中。作为农民，他们仍然是独立的家庭生产者。安妮·菲利普斯写道，遍及“该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前殖民时代的财产关系幸存下来——至少为大多数非洲人提供获得土地的机会”。^③ 获得土地是关键，因为它允许非洲生产者可以保有对主要的生产资料、家庭劳动力和生产过程本身的控制。家庭仍然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家庭能够提供部分生活必需品。种植农民对土地的控制是对在非欧洲人权力的一个最重要约束。

在推动非洲农业技术人员农民化的过程中，殖民当局充当了欧洲贸易公司控制殖民地进出口贸易的工具。在欧洲殖民区和种植园飞地等有限的区域之外，农业生产中没有欧洲资本的投资。欧洲商业公司通过

① “农民耕作”是家庭组织的农业生产的一个变种。我对这一术语的定义强调了这里提出的论点是农民耕作的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农民是使用简单的工具并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来为他们自己生产食物并生产被卖到社区之外的作物盈余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第二，这些农民生产的商品盈余很大部分被其他（非农业）社会群体所占用。他们是“独立的”农民，是在对他们劳作的土地的控制，对他们的劳动的控制和他们使用的大多数工具的所有权属于社区或家庭，而不属于能够积累由商品生产产生的大多数盈余的社会群体意义而言的。关于这个定义我使用“小农”“农民阶级”“农民化”和“小农经济”这些术语。关于此，参见 Jonathan Barker, *Rural Communities Under Stress: Peasant Farmers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6 - 43, 54 - 69; Gavin Williams, “The World Bank and the Peasant Problem”, in Judith Heyer, Pepe Roberts, and Gavin Williams, eds., *Rural Development in Tropical Afric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pp. 16 - 51; and Goran Hyden, *Beyond Ujamaa in Tanzania: Underdevelopment and an Uncaptured Peasant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esp. pp 9 - 16.

② 例如，参见 Jannik Boesen, “Les paysans et l'exportation du café: Une région exportatrice de café en Tanzanie”, in Samir Amin, ed., *L'agriculture Africaine et le capitalisme* (Paris: Editions Anthropos-IDEF, 1975), pp. 107 - 142.

③ Phillips, *The Enigma of Colonialism*, pp. 2 - 3.

殖民地经济的商业路线提取农村盈余,即贱买贵卖。^① 殖民地国家通过对交易线路施加控制(通过操纵价格、垄断作物采购和其他形式的行政命令)来保障这些业务的盈利能力。然而,对非洲商品感兴趣的欧洲公司对像咖啡、可可、花生、棉花或棕榈坚果的产量或质量没有直接的控制,这些都由非洲农民自主决定。^② 由于没有直接控制非洲的土地和劳动力,欧洲实业公司和商人对生产过程本身无法做到重新组织,无法通过改进生产技术以满足自身需要,无法通过投入资本来提高生产效率,无法将土地和劳动力从粮食作物生产中转移出来,也无法强迫劳动者工作得更快、更有效率或投入更多精力。强制和行政命令这时候提供了部分解决方案。通过暴力、法律、税收和劝说,殖民管理者对非洲人施加更大压力以为出口市场生产更多商品,并使用被认为提高产出质量的方式调整耕作方法(使用化肥、新的种子、连作,等等)。

殖民当局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创建一个有利于巩固出口作物产量稳定的政治秩序。这不是简单的任务。对前殖民时期非洲社会的征服,殖民地国家的强力干预,以及农村社区的经济剥削,易于招致各种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的抵抗。在非洲的欧洲殖民历史上,起义、叛乱、蓄意破坏和人口迁移不断上演。按菲利普斯的观点,同样重要的是欧洲人对反抗混乱的恐惧。“殖民统治的脆弱性达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哪怕有最轻微(政治)灾难嫌疑的动议,都会被放弃。”^③ 抵抗和抵抗的威胁往往出于非洲人保护既有社区凝聚力的努力。相比之下,在像黄金海岸和科特迪瓦

① 关于在非洲殖民地的商业资本的分析,见 G. B. Ka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onialism in Ghana*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and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A Marxist Analysis* (London: Macmillan, 1975)。

② 正如 Shenton 写道,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商业资本“在性质上基本上是寄生的……其试图依靠盈余提取的先前存在的形式来获得成功,并且……其试图以非常保守的方式保存而不是改变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先前存在的生产的力量和社会关系”(Shento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Northern Nigeria*, p. xiii)。还可见 Michael Cowen, “Commodity Production in Kenya's Central Province”, in Heyer et al., eds., *Rural Development in Tropical Africa*, p. 128。

③ Phillips, *The Enigma of Colonialism*, p. 158。

可可产区这些地方,殖民经济计划的成功反倒挑起了挑战殖民统治的念想。在殖民非洲最繁荣的地区,商品生产的不断扩大,催生了一批当地农民和商人。他们跃跃欲试,想挑战殖民国家即“地方当局”或欧洲人的垄断组织以扩大自己的积累领域。正如菲利普斯和伯曼所说的那样,殖民主义本身产生的社会力量,很难融入殖民地政治经济框架之中。然而,非洲如果变得难以治理,那么也就难以剥削。

欧洲人借由统治的政治秩序是什么?在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殖民统治的根基是“合作政治”。^[1]在非洲农民从事小规模经营以生产出口作物的地方,殖民者都力图渗透和调整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而不是去破坏它。一旦殖民统治摧毁了原有的国家、王国或部落,殖民统治者通常努力建立某种带有传统形式的“本土权威”。罗德·卢加德(Lord Lugard)在阐释引导这一过程的原则时,创造了“间接统治”这一术语。间接统治的目标是,在没有完全摧毁地方当局控制其臣民能力的情况下,削弱既有的政治结构,并使其服从殖民当局。

通过征服和盗用非洲国王、宫廷、酋长和议会既有的诸种决策和经济权力,殖民统治完全妥协于前殖民时期的政治权威形式。在农村生产和对经济盈余的控制领域所发生的变化,也打破了前殖民时期政治结构。一般来说,在殖民当局的庇护之下,社区上一级的地方当局的权力趋于增长,代价是类似王权之类的总体性和集中化政治制度的削弱。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殖民者深思熟虑的策略。埃利奥特·斯金纳(Elliott Skinner)引用一位一战之前驻扎在独立之前的布基纳法索的法国军官的话说:

“我们没有兴趣强化本来就集中的权力,也没有兴趣增加各种那巴(Nabas)的权力;相反,我们必须寻找一些支点,借以分化这个国家……莫高·那巴自身的权威将被弱化,因为我们可以轻易认可

[1] 见 Lonsdale, “States and Social Processes in Africa: A Historiographical Survey”, *African Studies Review*, 24, nos. 2-3 (June-September 1981): 139-225.

这些王公贵族的独立地位,使其摆脱那巴的影响……这就是一直被遵循的方针……它已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要的是源源不断的税收。”^①

对奴隶制和典押的抑制,手工业行会的消亡,欧洲贸易垄断的强加,以及出口作物生产的扩张,都削弱了旧的政治结构。在资源动员和分配上,非洲当局变得越来越依赖于殖民国家。

与此同时,间接统治巩固或支撑地方当局(如酋长)对其辖下的土地和劳工的诸多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间接统治从其出现于非洲殖民地开始,就植根于并维系于农业社会的物质条件之中。正如贝弗利·格里尔(Beverly Grier)所强调的,这一关联清晰地表现在英国殖民当局所关注的“土著土地所有权”之中。成立于1912年的西非土地委员会,意在审查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和冈比亚的土地所有权政策,其章程就明载:“土著统治取决于当地土地制度。如果政府的政策是在欧洲人监督之下由当地人在保留其有用的制度框架内实行自治的话,那么就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土著土地所有权制度。”^②

在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农村,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只是在有限范围内获得发展。这意味着大部分农村经济是围绕着分配生产资源的非市场机制组织起来的。家庭通常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其内部资源的分配受权威关系再造及维持家庭“生存底线”的种种努力的影响。特定社区中家庭之间的土地分配,是通过前殖民时期的法律与实践的不间断修改、而不是通过开放和竞争的土地市场组织起来的。一个社区所有成员的用益物权(土地使用权)通常是有保证的。酋长、长老和族长在公有土地

① Elliot P. Skinner, *The Mossi of Burkina Faso: Chiefs, Politicians and Soldiers*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1989), p. 156.

② 引用的是 Beverly Grier, “Contradiction, Crisis, and Class Conflict: The State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Ghana Prior to 1948”, in I. L. Markovitz, ed., *Studies in Power and Class in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5.

的调控上持续行使权力(获得殖民地国家的认可)。^① 这些条件通常支撑着像酋长这种地方权贵的权力,因为它们延缓了市场力量对现有社会结构的切割速度。“土著土地所有权”确保了以权威为基础的生产性资源的控制权继续在组织农村生产中发挥作用。虽然这些安排重现了农村不平等的一些旧形式并创造了新的不平等形式,但通常情况下它们也阻碍了更大的生产单位以及随之而起的无地劳动者阶级的产生。在像黄金海岸这种西非繁荣的出口作物产区,英国殖民政府努力扭转土地商品化的趋势,反而致力于巩固酋长和家族在土地分配和土地使用权转让上的权力。

因为大多数人都保留了一些获得土地的机会,所以劳动力市场只得到局部非均衡发展。非洲殖民地“缺少其他地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条件:自由雇佣劳动力”。^② 在二战前,殖民地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例如,用于公路和铁路建设)是通过强迫劳动制度满足的。国家权力这种赤裸裸的工具性行使,是通过“土著当局”进行的。法属西非酋长将每个村的工人定额工资集中起来,从殖民当局那里领取劳务工资。在其他地方,酋长征收房产税和人头税,并为自己截留一部分。他们行使罚款、征兵、监禁和放逐的权力。乡村一级的地方当局就是这样非常任意地行使强制权力的。事实上,酋长手握依赖性的、权威性的甚至恐惧性的个人关系,在极端强制的条件下维持地方层面的秩序。

如果说间接统治为从农村社区提取税收和劳动力提供了一套机制的话,那么它也为国家加强出口作物的小农生产的努力提供了渠道。殖民政府往往在分配加强出口作物生产所需要的农业投入(更好的植物品种、化肥、工具)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再一次,殖民地国家被迫面对自相矛盾的政策,因为低廉的生产价格(通常由政府亲自设定)和作物采购中缺乏竞争(往往由负责官方采购的垄断组织强迫所致),减弱了大多数

① Phillips 写道,凭借在英属西非的殖民法律,“酋长在其作为拥有公有土地上的持续权力的政治权威的地位上获得了确认”,*The Enigma of Colonialism*, pp. 156-157。

② 同上,pp. 2-3。

非洲农民在出口作物生产中承担风险或高额投资的能力和意愿。土地所有权法也使得土地难以作为贷款抵押品。在这些条件下,许多殖民政府诉诸非市场手段来提高产出的数量和质量。通过村级权威和村农业合作社完成工作成为一个选项。^① 在最具活力的出口作物生产区,相反的力量产生了相同的反应。在债务缠身迫使农民放弃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权、拱手转让给潜在的地主或资本家的地方,合作社被看作一种在家庭生产者和放债者之间调解不和的方式,以此减缓令人担心的农村阶层形成进程。^②

二战后,殖民地国家在广泛基础上建立了农业合作社。这些机构被用来将农民生产者和大型出口作物采购商(即,欧洲进出口公司或国家销售局)联系在一起。合作社限制了非洲放债者和中间商的活动,减少了作物采购中的竞争,并因此努力将出口贸易的利润聚集到欧洲贸易集团和国家手中。^③ 二战后,殖民政权曾试图通过村合作社分配信贷和农业投入来提高生产率(和产量)。为给这一项目筹措资金,合作社以集体的名义获得了贷款。向家庭施压以偿还债务,分配国家资助的信贷,分配投入,以及称量和采购作物,是村级合作社干部的任务。这一系统加强了这些机构的权力,农民家庭在国家设在地方层面的代理人的决策中无足轻重。经销管理局从收购的谷物中扣除偿还债务的款项,财务流程便告完结。合作社给了地方当局另一种控制社区内部生产性资源分配的手段。与此同时,它们为国家和欧洲商业公司提供了另一种从农民那儿提取盈余的机制。

间接统治在为推动农民化过程构建一个政治结构的同时,也有助于遏制农村经济转型进程,确保既有的权威、法律和习俗体系继续管用。

① 见 Shento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Northern Nigeria*, p. 126.

② 在像黄金海岸这样的地区,农民负债确实导致了土地转让并因此威胁到了农民本身。信贷和营销合作社在1930年代被引入以“扶持农民”(Grier, “Contradiction, Crisis, and Class Conflict”, p. 47)。还可见 Phillips, *The Enigma of Colonialism*, p. 131.

③ 见 Shento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Northern Nigeria*, pp. 107, 127 inter alia.

这为社区内部建立以权威为基础配置生产性资源的体系起了一种不可或缺的作用。农民社会的物质基础迫使殖民地国家通过与地方当局或“强人”的合作、并依赖于这种合作来完成任务。酋长和其他地方当局负责维持秩序与推进殖民经济计划。他们在代表殖民地国家或以传统的名义实施强力过程中行使自由裁量权。在动员、分配和保留属于社区的117资源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同时，他们还调节着国家要求或分配的资源的流向。强人体现了一种分权化与特殊化的地方行政模式，这正是伯曼所描述的那个分而治之的殖民版本。

非洲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是分散的、孤立的，并且受地方行政框架约束的，这种状态既阻止了殖民地国家机构不断地介入地方议题和冲突之中，又防止非洲人在广大殖民地中联合起来，反对和抵制殖民统治，挑战殖民秩序。^①

像其他地方的酋长和庇护人一样，非洲农村的强人是由各种形式的“个人统治”所构成的层级链条中的链环。^② 物质条件和反抗的威胁使殖民管理者除了按这种方式行使权力之外别无选择。在殖民指挥链中，处在酋长之上的是欧洲的外勤管理者、区域官员和周期更换的司令官。像酋长一样，这些管理者发现自己赤裸裸地行使工具性权力。这些没有直接掌握兵力的孤立外勤官员，是如何能够保持和施加对其辖区控制的？伯曼认为，他们的成功取决于他们在行使个人自由裁量权和特权时所具有的操控那些依赖于殖民当局的乡村和社区权威的技能。出于必要，中

① Berman, “Structure and Process”, p. 187. 正如内奥米·哈占在本书第十章所陈述的那样，“在这些框架中的社会秩序是支离破碎和分散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统治者严格划定地方社区以便于行政控制……英国，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法国，通过当地有权势的人进行统治，并且依赖于他们的持久性就像这些强人依赖于殖民地国家一样”。

② Jackson 和 Rosberg 将“个人统治”的概念用于描述在后殖民非洲的统治。有趣的是沿着跨越殖民和后殖民时期的这一维度的连续性。这一连续性提出了关于正如 Jackson 和 Rosberg 所说的“个人统治”扎根于一个明显本土的“政治风格”所达到的程度的问题。这一连续性表明，“个人统治”可能深植于潜在的、结构的条件中。见 Robert H. Jackson and Carl G. Rosberg, *Personal Rule in Black Africa*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央不得不授予区域主管充分的自主权和操纵空间。反过来,外勤官员运用这种特权以培育与辖下的那些官员的庇护关系,迁就那些他们担心自己难以控制的社会力量。通过这一过程,强制“渐渐融入日常治理的背景之中,虽然从未从中消失”。^① 对于殖民者来说,家长式统治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必要性变成了一种美德。^②

通过个人权力层层统治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普遍模式。个人自由裁量权为地方当局根据当地情况或促进和保护个人利益来调整中央政策提供了空间和机会。^③ 伯曼写道,对于“中央当局来说,问题是(欧洲)外勤代理人对地方社会力量的迁就要保持在可容忍的限度之内,不让后者在事实上成为那些反抗中央的利益集团的代理人”。^④ 殖民政府在应对他们的非洲同盟中面临类似的困境。

在卢格德(Lugard)将“间接统治”看作可行的统治策略时,他也承认欧洲统治在非洲殖民地的局限。殖民地国家对地方中间人和盟友的依
118 赖,在非洲社会内部造成了新的特权集团,或者允许已有的掌权者维持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合作者利用他们在殖民体系中的职位谋取私利,其方式并不完全符合殖民者的野心。伯曼写道,

酋长们显示了从民众那儿勒索钱财的一贯做派,尤其是在他们负责收税并提成部分收入作为报酬的地方;也显示了不择手段地积聚土地和其他财产并成为地方激烈政治斗争焦点的做派。随着日益被民众看作国家的走狗,酋长们的权威也江河日下。^⑤

殖民地的酋长和旧寡头通常也有能力控制基本土地,调派臣民在他

① Berman, “Structure and Process”, p. 175.

② Phillips, *The Enigma of Colonialism*.

③ 个人自由裁量权给了临场官员“大量的机会以修改或忽视来自中心的他们不喜欢的政策”。Berman, “Structure and Process”, p. 181.

④ 同上, p. 176.

⑤ 同上, p. 189。例如,见 Robert Bates, *Rural Responses to Industrialization: A Study of Village Zamb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82-87.

们的土地上劳动,通过生产出口作物敛财。他们通过投资商业和城市房地产、资助子女接受西方教育等来使他们的资产多样化。格里尔写道,这些过程使黄金海岸的酋长们置于“同时破坏和保护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中心位置上”——并因此也处于标志农村经济整体矛盾的中心位置上。^① 殖民主义的“合作者”所积聚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财富,足以让许多人的几代子嗣继承,而且常常不完全依赖于国家赋权。

对于经济转型所造成的与间接统治相关的社会控制体系的松动,殖民政府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心态。^② 出口作物生产的扩张——殖民政府如此渴望的一项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和政治变革,通常不符合殖民者所期望的以“本土权威”牢牢控制顺民的理想愿景。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导致一些地区农村经济比较繁荣,谷物出口快速增长,但也使农村社会阶级分化日益加深。而其他地区则烙上农村衰败、农业生产下降和日益依赖向发达地区“输出”劳力的印记。^③ 自大萧条时期以降,殖民政府就面临着城市化穷忙一族阶层不断固化、人数日益增多的窘境。从这些转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导致农村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瓦解,并由此动摇了“本土权威”和间接统治的根基。“通常的后果是政治动荡,表现为地方阶级冲突和反殖民主义情绪。”^④

① Grier, “Contradiction, Crisis, and Class Conflict”, p. 35.

② 这种矛盾心理标记于英国和法国在西非的,以及甚至据 Lonsdale 和 Berman 所说的在肯尼亚的混合移民——农民经济中的殖民项目上。见 J. Lonsdale and B. Berman, “Coping with the Contradic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onial State in Kenya, 1895 - 1914”,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20 (1979): 487 - 505. Giovanni Arrighi 得出了一个关于二战前罗得里亚的一个相似的观点,见“Labor Suppl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Study of 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the African Peasantry in Rhodesia”, in Giovanni Arrighi and John S. Saul, eds.,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pp. 180 - 231.

③ 税收被用来从殖民非洲的“劳动力储备”经济中抽出流动劳动力而不是出口商品。在东部和南部非洲,刻意的国家行动阻碍了“保护区”中的商品生产,以确保给矿山和欧洲人拥有的农场持续的劳动力供给。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保护区的土地的过度拥挤和枯竭有相同的效力。在西部非洲,萨赫勒地区(例如,上沃尔特)演变为“劳动保护区”,为靠近海岸的出口作物生产区供应流动劳动力。

④ Grier, “Contradiction, Crisis, and Class Conflict”, p. 28.

更有甚者,农村经济中生产和生产力的不断扩张,势必瓦解农民的生产方式。土地的普遍获得和农民身份的恢复,抑制了通过投资、土地兼并和劳动力重组来获得最大化产出及降低实际生产成本的空间。殖民管理者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从农业部门提取更多盈余需要经济变
119 革,但由此导致的政治后果让他们寝食难安。欧洲人担心,冲击非洲农业家庭最根本的利益,会带来他们难以承受的政治反弹。他们也担心无地化和无产阶级化的政治后果。安妮·菲利普斯所引用的卢吉的总结认为,

今天的问题是确保对欧洲人的服务不会导致当地社会的过早解体。对那些已经对先灵的赞许或愤怒不报敬畏之心、对部族不再忠诚、对家庭或家族土地的权利不再伸张并对急难之中的同伴不假援手的没有文化的工人来说,现在已经没有自我控制的动力,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个威胁。^①

殖民政府对此的反应是想方设法找出“阻止或延缓农民阶级瓦解”的途径。^② 积累和政治控制的双重目标之间的基本矛盾就体现在这一层面上。指引欧洲殖民主义内在政治观念的正是一剂经济停滞的处方。

然而,对于殖民地国家和非洲生产者来说,这里没有稳定的平衡。殖民地经济和社会必然催生的社会力量,难以被农民社会和间接统治结构所容纳。欧洲人理想化的殖民秩序视野中,没有非洲职业阶层、商人、商品粮大户、无产阶级化的人群(包括日益独断的工人阶级)以及“失业人口”的位置。二战后,在殖民地治理架构内,难以容纳或解决政治和经济危机,非洲殖民地遭受重创,动荡不安。

战后早期的危机和转型标志着去殖民化时代的开始。更宽泛地说,

^① Phillips, *The Enigma of Colonialism*, p. 139.

^② Grier, “Contradiction, Crisis, and Class Conflict”, p. 28. Phillips, Grier 和 Shenton 都以西非土地委员会的案例来阐释殖民政府显示明显不愿支持或促进开放的土地市场、追求农村信贷的私人市场以及城市中工人的永久定居这一论点。

二战可以被视为开启了欧洲在非洲殖民主义从“全盛时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滑向当前去殖民化时代的漫长过渡的肇端。眼下，去殖民化的政治革新正步入轨道，如火如荼。一些分析家认为，去殖民化为资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提供了第二次机会，因为新的政治秩序给它带来了超越政治困境和政治约束限制的可能性。曾几何时，这种困境和约束使殖民地国家陷于瘫痪。但是，我并不认为去殖民化是个分水岭。相反，去殖民化为在一个新的立足点上重建殖民统治和剥削模式创造了机会。独立后的第一代非洲人，通过向旧的政治控制结构和剩余分配结构注入更多的、精心组织的新鲜血液，成功地化解了20世纪40、50年代的即时危机。最终，后殖民政权的巩固和统治阶级的形成，同样受制于当年危及殖民计划的诸多矛盾。20年的发展光景清晰地显示，非洲农业未经改造的地基，难以承受政治新建筑之重。

120

农民、商业国家与后殖民政权的巩固

二战后殖民地国家遭遇的资本积累和政治控制危机，强化了来自各方要求去殖民化的压力。在大约10年的时间内，英国和法国纷纷以有序而可接受的方式移交和委托权力。它们设计新的机构疏导那些曾经危及殖民国家的社会力量：合法工会、立法会议和政党。这些机构将迄今为止“未被捕获的”成分吸收进国家的怀抱，并为国家资源的分配创建了新的渠道。^①在殖民当局相当成功地将激进社会势力清除出政治领域的过程中，一批称职的继任者也被推荐上位。投票动员——一个由殖民势力及其雄心勃勃的继任者操纵的过程——使各国总统、总理和议员走上了掌权之路。

① “（营销局）价格稳定基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被引入在那些很快就会继承国家权力的尼日利亚人主持下的‘发展’中。通过这一行动，政治的闸门被打开了。在北部和南部，区域营销委员会的盈余被提取出来作为‘发展’支出，而这一称谓成了在独立政党的建立中使用这些基金作为一种主要工具的同义词。” Shento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Northern Nigeria*, p. 115.

对于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来说,机构和行动者不是关键问题。在那时,人们看重的是统治阶层的政治人物以及后殖民国家的内在功能,而这些常常被认为是由新殖民主义政权转移权力时的环境所决定的。通过将非洲新的统治阶层定义为买办阶级、国家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分析家使这些利害攸关的问题理论化了。这些概念突出强调了掌权途径与新兴政治经济统治阶层出现之间的密切联系。然而,在把这些新兴社会阶层看作完全成型的社会阶层时,分析家们忽视了那个时代的政治不确定性和经济矛盾。

罗杰·默里(Roger Murray)是这个强调历史时刻流变性研究传统的第一人。他认为,去殖民化给“未成形的”社会阶层带来权力。^①当然,那些上台掌权的人都是精英。但正如默里在分析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早期加纳执政党的领导层和干部时所看到的那样,这种政治精英是一个“混合阶层,关注许多……殖民社会的紧张局势。正是这一阶层在社会构成上的交叉混杂和不稳定性,帮助我们理解其在政治舞台上的相对自主性和流变性。大会人民党(CPP)是‘政治阶级’并体现和反映一个确定的经济阶级”。^②如果说组成大会人民党及其领导层、普通成员(职员、小学教师、店主,等等)的是“小资产阶级工薪阶层”的说法是可信的话,那么对诞生于民族主义时代的其他政党来说,也是如此。“民族主义运动……在非洲殖民地不可避免地是混合物,包容其间的是一个由各色人等构成的、由外力强加的统一体。”^③

121 透过民族主义时代的冲突,便可以看出独立后雄心勃勃的精英在其不同的权力基础和政治需要之间所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最明显地表现在围绕联邦制与单一制的政争之中,也表现在扎根“间接统治”政治的

① Roger Murray, “Second Thoughts on Ghana”, *New Left Review*, 12 (March-April 1967): 25-39. 关于背景和评论,见 John S. Saul, “The Unsteady State: Uganda, Obote, and General Amin”, in John S. Saul,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East Af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esp. pp. 350-366.

② Murray, “Second Thoughts”, p. 29.

③ 同上, p. 27.

非洲当局与城市新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中。然而,仔细研究表明,以地域为基础的政党和运动,是建立在具有多重交叠的和潜在矛盾来源的政治权力和影响力之上的。领导民族主义政党的政治家,通常把他们的个人财富和影响力建立在由望族或贵族家庭所汇集的权力和财富之上。由此,部分体现了既有社会等级的扩展和分化。^① 出于同样原因,望族和贵族成员在提出其“正当权力诉求”时,不仅经常诉诸传统,而且诉诸他们与其他富有的农民和商人利益集团的共同目标。^② 在地区内部和国家一级,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领导人的政治基础主要是通过合并已有权力结构而建立起来的。“大众”民族主义政党将城市社区与工会的领导人、神职人员、富裕农民、贫困农民、商人、专业人员、殖民地领袖和老寡头一起拼凑成区域联盟,以此作为向上争得国家权力的筹码。贯穿这一时代的种族沙文主义话语的主题,都在述说地方主义、区域主义和不平衡发展的经济现实和政治现实。站在地方和区域权力基础支架上的政治名流,致力于扩张已经取得的权力。他们正确地将接近后殖民国家视为这样做的一种手段。

对于国家层面新的领导人来说,所面临的挑战是,“在那些将影响力建立在种族、宗教或地区基础之上的相互竞争的权力掮客之间进行平衡,阻止他们彼此对抗以免失控”。^③ 去殖民化导致那些松散结合的、混杂的、通常多重的联盟之间以及他们内部展开争取控制国家机器的新斗争。这一过程的动力塑造了后续变迁进程,包括塑造了统治阶级形成的轨迹。正如朗斯代尔(Lonsdale)所指出的那样,将这些精英视为新兴的、

① 举个例子,Felix Houphouët-Boigny 是自1910年代主宰科特迪瓦政治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医学博士,而且是一个地主、一个富有的可可农民和法国殖民主义领袖家庭之一的后裔。关于一般性讨论,见 Lonsdale, “States and Social Processes in Africa”, p. 201, and Bayart, *L'Etat en Afrique*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89)。

② David Apter 引用了一个 Asanti 酋长的一句话:“我们是合法的统治者。” D. Apter, *Ghana in Transition* (New York: Atheneum, 1968), p. 18。

③ Bill Freund,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08。

虚弱的或国家的“资产阶级”，预设了一个从逻辑来说需要优先回答的问题的答案：这些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呢？

单单指向某一特定的资产、财产或公职是不够的。没有资产阶级可以在其小天地里自体繁殖……为了理解阶级是如何聚集的，人们必须透过冲突来观察联盟的形成。如果……建立联盟被认为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国家就能被认为是一个存在物，而且是一个行动的通道，或一种资源。（这种）……运思方式在非洲不仅适用于后殖民国家，而且适用于殖民地国家，甚至适用于前殖民时期的国家。前殖民时期的王国（可以被看作）……分立的权力持有者之间展开斗争的政治舞台，而不是超脱于这种竞争的独立第三方。^①

122 朗斯代尔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非洲的国家统治阶层在起源和利益上未必是同质的，反而是源自“精英的混合体。他们除了维护社会秩序外可能没有任何共同利益，但恰恰社会秩序……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它的答案十分依赖于混合的精英形成的方式以及他们现在行使权力的类型”。^② 从他们现在行使权力类型来说，也是在殖民主义之下的剩余分配和统治模式中被制度化的。

随着后殖民政权努力巩固权力并为统治建立某些基础，这些分配和统治模式被强化、拓展了。在后殖民时期刚开始时，格里尔就在一篇对加纳的简要研究中概述了这一过程。

当年主要被国家雇佣的小资产阶级，其地位得到巩固，其他许多下层社会成员则在国家部门中找到了非技能工作。总的来说，吸纳小资产阶级和吸收社会下层所需的物质基础来自对农民生产者

① Lonsdale, "States and Social Processes in Africa", p. 153.

② 同上, p. 153, 着重号为我所加。Nelson Kasfir 强调了国家作为资源的概念的重要性：“马克思和韦伯的重点都放在了国家作为在地方利益斗争中的一种至关重要的组织资源（是至关重要的）……两者都不会将国家看作仅仅是这些斗争发生的舞台。”见 N. Kasfir, "Class, Political Domination and the African State", in Zaki Ergas, ed., *The African State in Trans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pp. 46, 51.

盈余的挤占。然而，只有在农村社会和政治关系没有实现转型的状况下，这种挤占才有可能。关键是土地没有商品化，劳动关系仍然是依附性的，农民生产者多数自给自足，以及政治表达和社会重组的所有独立形式都被禁止。^①

在加纳和其他地方，国家贸易垄断公司接管了早期由欧洲商业公司保有的位置。这种状况拓展了国家的“商业功能”，并把对农业盈余的控制权集中到官僚、政客和新政权其他关联人士手中。^②

就像殖民地时期的欧洲商业资本一样，国家营销局能够从农民那里“买到便宜货”，这些农民不用付工资，靠家庭劳动耕作没有抵押的土地。小农经济的积累率低，殖民地时期就存在的农村贫困状况在独立后重新出现。其结果便是农村生产率水平低下，技术革新和资本形成率低下。像殖民政府一样，新独立的国家在农民种植经济的框架内，通过向农村地区分配投入，提高（或维持）生产力——通过国家控制的合作社发放国家资助的贷款——来加强生产。^③向合作社借债，其后果有助于保护农民不会失去土地，但同时也使农民受制于国家，其生产受制于国家控制的市场。^④通过营销局、农村合作社和强化农业发展计划（包括安置计划），后殖民国家继续进行着曾经是殖民计划的核心事业：力求“捕获农民”。^⑤

① Grier, “Contradiction, Crisis, and Class Conflict”, pp. 48–49.

② Gavin Kitching, “The State as Merchant Capital”, ch. 13 in *Class and Economic Change in Keny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还可见 Susanne D. Mueller, “Retarded Capitalism in Tanzania”, *Socialist Register* (1980): 208 *inter alia*.

③ 见 Hyden, *Beyond Ujamaa*, p. 82; Barker, *Rural Communities Under Stress*, pp. 110–120; Sheldon Gellar, “Circular 32 Revisited: Prospects for Revitalizing the Senegales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the 1980s”, in Mark Gersovitz and John Waterbury,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isk and Choice in Senegal* (London: Frank Cass, 1987), pp. 123–159; and Roger King, “Cooperative Policy and Village Development in Northern Nigeria”, in Heyer et al., eds., *Rural Development in Tropical Africa*, pp. 259–280.

④ King, “Cooperative Policy and Village Development in Northern Nigeria.” 还可见 Gavin Williams, “The World Bank and the Peasant Problem”, 特别是 pp. 33–36.

⑤ Hyden, *Beyond Ujamaa*.

123 非洲农村“贱买贵卖”的商业机制,连同本地化、个人化的政治控制模式,都在独立之后重现了。将农民纳入国家控制的商品市场中的努力过程,伴随着另一种努力,即旨在确保这个过程不会导致失地农民增加,不会导致对农村各阶级的放逐,以免带来城市破产无产阶级的膨胀。坦桑尼亚式的农村社会主义创造了一个农民阶级,其做法是把部分农村人口重新安置在政府建立的村庄之中,而政府组建这些村庄的目的是生产面向市场的作物。^①肯尼亚式农村资本主义(因)政府担心自耕农被驱离自家土地而有所节制,这些农民已经无力偿还殖民政府和后殖民政府当年卖力推销的抵押贷款和借款。^②塞内加尔政府采取的是维持现状的做法:“受‘非洲社会主义’原则的激励,1964年6月(土地)改革的目标是恢复土著地的公有部分,除了个人名下的土地之外,所有的土地都归国家所有,为地方市政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并监管土地的使用情况的革新提供了条件。”^③如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的回归土地计划,将失业的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地区,以便他们可以在国家开发的安置项目或他们的家乡开垦耕作。南非则以其特有的方式把这一逻辑发挥到了极致:通过把工人家庭迁徙到低于生存线的农业地区,接受“班图斯坦”^④和“黑人家园”^⑤间接统治,来规训国内那些难以驾驭的无产阶级,使他们“重新部落化”。

在后殖民时代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营销局、农村合作社的扩张以及针对耕作区农村发展计划的强化,扩大了国家在农村的存在,增加了政府在农村的开支。通过农村贸易实现私人积累的机会,不同程度上受到国家中介结构的节制,使得国家总体上在组织农村经济、尤其是农

① Hyden, *Beyond Ujamaa*.

② 见 Colin Leys, *Underdevelopment in Keny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o-Colonialism* (Los Angeles 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ch. 3, esp. p. 102.

③ R. Verdier, “Evolution et réformes foncières de l’Afrique noire francophone”, *Journal of African Law*, 15, no. 1 (1971): 85–101.

④ Bantustans, 前南非政府为黑人划分的有限自治区域, 1993 年废除。——译注

⑤ Homelands, 前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人家园。——译注

村商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① 组织后殖民农村经济的政治力量，致力于将农村权力掮客和食利阶级的精力与资本导向最有利可图的、风险最小的个人谋利渠道上：政治领域和国家调节的商业活动中的机会。

控制农村市场——出口商品、农业投入和信贷市场——的官僚化，为农村强人带来了新的更强有力的角色，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控制国家资源流向和分配的自由裁量权，来强化或再造农村的政治控制网络。正如贝茨(Bates)所言，这些对资源流动的控制形式，有助于解释“农业投入计划的强烈政治化”。

(比如)在赞比亚，绝大多数农村居民以其农业合作社社员的身份，最容易获得收入补贴机会。合作社是执政党的地方党部组建的，并且也是由他们主导的；获得补贴的机会因此也取决于政治忠诚的情况。地方层面的农村贷款项目……是由前政党“积极分子”运作的，他们要确保(贷款)发放给那些对执政党的事业有贡献的人。^② 124

随着农业家庭用益物权被“私有化”以及土地的人口压力增大，对市场准入、农业补贴和信贷的控制，盖过了对土地分配的控制，成为农村权

① 收集和出口农产品的国家垄断的强制实行，加速了一个更加一般的在农村商业上的控制的结构调整。曾经在早期主导进出口贸易的欧洲商业公司缩减了它们在农村地区的存在并将它们的活动集中在商业线路最有利可图的环节——批发进口上。这一过程扩大了在贸易和运输中的非洲私人积累的商机。国家在安排农村商业线路中的私人积累获得这些机会中的角色，随着政府发放许可证给私人贸易商和运输商，建立信贷计划以为非洲人拥有的商业企业提供资金，以及在像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的情况中创建政府拥有的连锁店以分配消费品而扩展。

② Robert Bates,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Africa*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127 - 128. 关于在塞内加尔的合作社的例子，见 Edward J. Schumacher, *Politics, Bureaucrac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Senegal*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ch. 7; and Donal Cruise O'Brien, *Saints and Politicians: Essays in the Organisation of a Senegalese Peasant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ch. 4.

威的关键。^①在农民商业生产的经济结构中,农村权威仍然站稳了脚跟。

更有甚者,一个地方的当政者发生轮替时,“农村强人”的作用不仅因此保持,时常还得到扩张,因为政权轮替给地方名流和国家中介带来更有利的时机。他们获得并控制了谋取私利的新资源和新机遇。农村的国家结构将农村贸易商、最有活力的农民和小城镇的专业人士吸收到公务员队伍、执政党机构中,或者将他们纳入国家调节的商业机会中。殖民地时代的“合作者”和“进步农民”通常被纳入新政权的庇护网络和统治结构中。在为因应民众不满诉求而废除酋长制的地方,殖民地时期的农村强人被那些现在与掌权者有着牢固联系的农村管理者、党员和当地名人所取代。在农村建立和强化政治机器,是现代化理论家称之为“国家整合”的过程的一部分。巴亚特(Bayart)称这一过程为 *la recherche hégémonique*——追求国家霸权。

围绕农民耕作组织起来的农业社会,构成控制国家机器的那些人的政治权力根基。在非洲私人控制下的主要生产性资产——土地——留在小规模的家庭生产者手中,他们在生产出口谷物的同时,还生产主要供家庭消费的谷物。农民对土地的控制反映并维持着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长期缺乏一个数量庞大的资产阶级或土地农民阶级的状况。欧洲殖民者定居的农业地区(像津巴布韦、赞比亚和肯尼亚的一部分)是验证这一规则中的例外。正是在这些地方,非洲农民被强行驱离土地以为政治上强大的商业性农业利益集团扫清道路(并提供劳动力)。^②后殖

① John Waterbury 提出,在塞内加尔,这一控制获取资源机会的系统在围绕着大家庭组织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层面上运转。族长,即在包括 2—5 个核心家庭的大家族中的权威人物,可能是合作社的唯一成员,并且因此“他可能控制种子和化肥的分配(给核心家庭的男性家长、单身汉、已婚妇女和提供季节性劳动同时耕作他们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居住区的临时成员)。在某些方面,这些投入的分配取代了族长作为家族土地分配者的传统角色”。John Waterbury, “The Senegalese Peasant: How Good Is Our Conventional Wisdom?” in John Waterbury and Mark Gersovitz,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isk and Choice in Senegal* (London: Frank Cass, 1987), p. 54.

② Michael Bratton 发现商业农民协会能够在这些地区促进其成员的利益,这具有重要的意义(见本书第九章)。

民时期非洲的大多数地区，农业社会的结构并没有为充满活力的、日益独立于国家的阶级的发展提供基础。国家对农业盈余的控制——以及地方资本的相对虚弱——为独立时代不同精英融合为新的“政治精英”提供了物质和政治基础。

对商业流通的控制，使国家处在经济的制高点，便于组织种植农民生产出口谷物。贸易仍然是资本积累的主要领域，也是决定投资规模和 125 投资形式所必需的资源集中最重要的机制。大多数政权迅速采取措施促进后殖民贸易的制度化，抢占先机，将非洲私人贸易商的自发行动苗头遏制在经过局部重构的殖民贸易形式所留下的商业领域之中。建立在殖民地国家监管机构基础之上的后殖民政府，为批发商和进口商颁发许可证，通过税收和关税制度控制进口，并规定农业商品、农业投入和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对贸易的控制，尤其是政府对出口谷物购销的垄断，使得大量的国家收入来源于内部。对贸易和贸易商的行政控制，还使得政府得以调控个人在城乡的商业机会。通过抑制商人之间的竞争，调控进口商品的供应，以及分配信贷补贴，国家干预市场所产生的租金，要么被国家占用，要么被划拨给那些享受优惠待遇的私人贸易商。^①

后殖民经济官僚化控制的做法，并不局限于商业部门。后殖民当局通常与外国资本合作，扩大半国营的金融部门并投资于工业。在 20 世纪 60 年代，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包括国家建设的住房）迅速扩张，保证了政府作为城市主要消费者和雇主的地位。在这些条件下，国家对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构成了塑造社会分层模式的主要内驱力。执政党的政治垄断和经济的持续国营化，压缩了国家庇护之外的社会力量——尤其是经济势力——集聚的通道，有效遏制了敌对政治势力的产生。^② 正

① 关于租金，见 Robert Bates,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② 看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Caglar Keyder 描述了“(土耳其)政府活动有殖民化社会的倾向”——以阻碍他所称的“敌对的政治阶层”的出现。Caglar Keyder, *State and Class in Turkey* (London: Verso, 1987), p. 98。

如内奥米·哈占在本书中写道,“中间社会组织软弱无力”。

这些结构性条件确保了国家庇护作为政治整合和控制机制的有效性。国家强制压缩政治领域,政府当局干的是“殖民”社会集团——当初殖民当局的“间接统治”无法控制和约束的社会群体:新兴资本家阶层、非洲贸易商、专业人士和公务员构成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城市技术工人阶级——的勾当。社团主义控制形式有助于驯服工会,并将妇女、青年、学生、教师和商人的协会都整合到垂直结构的恩庇—扈从网络之中,这种网络受集中化程度不高的执政党和国家所控制。发家致富、享有特权(就业、住房、高等教育和商业机会的通道)越来越依赖于官员对国家控制的资源的自由裁量式分配,因此更加离不开对那些已经掌权或更牢固掌权的人的政治效忠或政治认同。在这些条件下,拉拢——主要通过公务岗位和国家赞助的分配——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选项。“通道(成了)关键资源。”^①通过这一过程,有组织的政治势力被“吸纳和束缚在政党的怀抱中”。^②压制、拉拢和国家资助,修复并扩大了那个在殖民地时期用以分化和隔离社会力量的狭隘的政治控制系统。

政治机器内部横生出来的枝节将新的社会阶层引导到国家庇护和国家控制的轨道上。公务职位或对国家合同或许可证的依赖,把一些城市社会群体置于对国家资源的结构性依赖地位。然而,对城市其他专业团体、私营部门的产业工人和最贫穷的城市贫民来说,庇护政治只有在反复协商的情形下才能获得他们的政治认同。因此,庇护政治为政权巩固和治理提供的基础是脆弱的。为支撑城市区域的国家财政,政府当局有组织地抽取农民的生产盈余。像合作社、贸易局、投入分配计划和扎根于社区的政治庇护层级这些制度结构,都致力于组织和推动这一剥夺

① “‘通道’是……在政治非参与条件下的一种关键资源”(Rene Lemarchand, “The Dynamics of Fac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Africa”, in Zaki Ergas, ed., *The African State in Transition*, p. 159.)。

② Ruth First 将 Houphouët-Boigny 描绘为“在吸纳他的激进的反对派以将其束缚在他的政党的怀抱内的一个大师”。Ruth First, *Power in Africa* (New York: Pantheon, 1970), p. 118.

盈余的过程,但这些制度自身也越来越依赖于国家资源和资助向农村流动。政府当局调动所需资源的能力受到严重抑制。它们(对内)“压榨农民”,对外举债。

这些过程推动了“国家矩阵内精英的集聚”。^① 拉拢策略拓宽了接近国家并获取国家资源的渠道,在扩大执政联盟的同时,降低了融入联盟之中的政治掮客的自主性。把国有资源注入既有社会网络中,有助于把地方层面的政治和社会控制结构与中央联系在一起。佐尔伯格(Zolberg)所描述的1970年“科特迪瓦政治模式”,为这个过程提供了一个例证。

这一模式大约产生于1950年……[该战略包括]一个异质联盟的建立,在其中各成员保留其独特的身份。只有通过提高其领导人——乌弗埃博瓦尼——的合法性,通过把眼前利益分配给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和民族群体在内的联盟的关键成员,这一联盟才能维持……从这个角度看,不需要把现代性和传统主义对立起来。^②

农村的各界名流、宗教领袖、工会领导人、政治人物和商业巨头,跟以往一样依赖于国家分配的资源,或者变得更加依赖。与此同时,这些权力掮客通过薪水、津贴、政府合同、国家分配的商业机会、租金收入和国家资源的私有化来积累私人财富。新兴政治阶层的成员以惊人的速度积累个人财富,就像多纳尔·克鲁斯·奥布赖恩(Donal Cruise O'Brien)在研究塞内加尔时所提出的那样,其速度“大略与每一个人在官

① Bayart, *L'Etat en Afrique*, pp. 230–240.

② Aristide R. Zolberg,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Ivory Coast Since Independence”, in Philip Foster and Aristide Zolberg, eds., *Ghana and the Ivory Coast: Perspectives on Modern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p. 13–14. 关于在政权建设中的“民族算术”的一个最近概述,见 Donald Rothchild and Michael W. Foley, “African Stat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clusive Coalitions”, in Donald Rothchild and Naomi Chazan, eds., *The Precarious Balance: State and Society in Africa*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8), pp. 241–248.

僚层级结构中的地位相称”。^①

127 “政治化积累”促进了统治阶层的中产阶级化,并为执政联盟的凝聚力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不然的话就会缺乏共识。^②但是,要是将该过程看作是非结构化的、不受约束的或仅仅受唯利是图的个人和集团利益引导的,那么就会错过关键的事实。侍从主义和恩庇是政治化积累的必然结果,将该过程组织到政治控制系统之中。国家资源通过结构化的恩庇—扈从网络垂直流动,而该网络是由自利、政治忠诚的个人关系、依附以及易受上级制裁等诸多合力得以维持的。该网络在权力走廊内外构筑了“为避免同归于尽必须携手同行”的强大激励。^③对国家资源的特殊化、政治随机性分配,使执政联盟内部盘根错节,规模不断扩大。庇护政治为执政联盟内部提供了一个共识和控制的物质基础,为执政当局联合成为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的进程构建框架、加油润滑。

正如“精英融合”的说法所表明的那样,政权的巩固涉及执政联盟的性质及其所行使权力类型的质的转变。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政治化的积累,把统治精英转变成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本身”,这个过程意义非凡。政治精英集团的成员在可称之为盈余分配的社会关系中,享有共同立场。农村盈余系统性地“从农民流向了官僚”。^④不过,正如罗杰·默里所强调的那样,这一新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并没有在生产过程中占据公认的明确地位。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一致性以及他们作为次级社会阶层的地位,是由他们通过国家商业功能抽取农村盈余的能力所确定的。新的执政联盟在这个意义上很快地表现为社会阶层,并且通常也是被统治对象如此看待的。围绕这一财富的分配引发的

① D. Cruise O'Brien, *Saints and Politicians*, p. 194.

② 关于“政治化的积累”,见 Sara Berry, “Agrarian Crisis in Africa? A Review and an Interpretation”, 论文发表在 the 1983 annual meeting of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Boston, December 1983.

③ 这是改述 Nelson Kasfir 的话,见 Nelson Kasfir, “Class, Political Domination and the African State”, p. 55.

④ 同上, p. 46.

派系和联盟冲突，表现为阶级内部冲突的特征，而正是这一冲突，最后背离了基本的共同承诺——国家借以加强向代理人及雇员分配财富的手段。这些农业社会的农民基础、地方资本的持久虚弱以及统治精英的异质性，在这方面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执政联盟尽管有异质性，但在通过国家本身寻求扩张这一点上是同质的。^① 对新兴的统治阶层来说，庇护政治和政治化的积累为治理和剥削问题提供了一个综合解决方案。

然而，以庇护为基础接近国家，并不足以调和、更不用说均衡后殖民政权中容纳的不同利益集团各自所代表的更为根本的利益。资源分配本身无法组织起国家权力或统一的执政联盟，以支持一种广泛的、“变革性的”社会计划的有序推进。阶级形成、城市化、不平衡发展和土地压力，造就了具有不同的、甚至冲突的利益需求的社会阶层。这些差异在 128 政权内部产生了断层线，并产生了以领土、种族和宗教为基础的政治权力形式之间的内在张力。政治高层努力将各种可能有矛盾性政治需要的政治掮客融入执政联盟之中，以调和和抑制这些张力。国家权力的局限性表现在执政当局依赖于同盟的认可和政治生存，也表现在这些同盟者所保留下来的不容削减的自主性上。权力掮客们极少完全依赖国家资源，因为他们享有的权威形式、合法性和权力无法完全通过国家权力的行使来复制、调节或更替。城市大佬、敌对政客、修士(marabouts)、民族领袖和老寡头确保和维持获得国家资源——实际上是要求强占国家资源——的能力，是他们影响赞助者、追随者和社群能力的一个函数。虽然“精英融合”扩大了执政联盟及其社会支持(或默许)的基础，但是国家权力却要摇摆于各种碎片化的、地方化的势力之间，摇摆于各种潜在冲突的权威形式与社会控制模式之间。

① 见 Richard Joseph, *Democracy and Prebendal Politics in Nigeri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econd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Thomas Callaghy, *The State-Society Struggle: Zai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执政联盟复合特征的内在张力根本体现在土地问题上。土地仍然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因为对土地的控制方式,支撑着农村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也决定了农业盈余的提取渠道和机制。自上而下的土地改革仍然是一个现实的或潜在的选择,这种改革的压力来自那些立志要提高农村生产力的人,也来自有志于扫荡农村地区那些首先是“封建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力掮客的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塞内加尔土地所有制改革的民粹主义主张的提出,就是以此方式将小生产者从伊斯兰教修士的“贵族”控制下解放出来——清除地方层面那些依赖、控制和剥削网络的灌木丛。解放的进程将为提高生产力开辟新道路。在塞内加尔,局势发展的结果是,改革者而不是修士从政治博弈中出局。在坦桑尼亚,农村地区的乌贾马(*ujamaa*)巩固了农民阶级的身份,削弱了最富裕的商业农民和农村商人,而正是这两个群体,危及新兴“官僚资产阶级”霸权。然而,乌贾马的结构和过程,创造了一个农村政党——官僚精英阶层,他们隐匿在新农村中,隐匿在国家控制的生产和营销项目中。这一新阶层的地位被界定为维持现状,而不是推动高层所要的提高生产力“变革”计划。坦桑尼亚政府创造了一个新的农村权力掮客群体。要削弱他们可没那么容易,因为政府要冒着破坏自己在农村影响和控制网络的风险。^①

129 围绕土地改革的政治斗争的关键问题,远不止是中心与外围的竞争或新老精英之间的斗争。国家推动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体制变革,将政治成本和风险不仅强加在农村当局头上,而且强加在那些在高层领导执政联盟的人头上。国家主导的农村社会重组,一旦颠覆了农村强人与政权联系的权威,它的成本和风险就变得很高。改革有可能威胁到现有权力等级的团结:削弱了资源提取和分配的既有渠道,加剧了执政联盟内部的离心力,诱发了地方和区域一级权贵及其属民、追随者和选民一起变节。国家提议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体制变革,经常产生僵

^① 关于坦桑尼亚,见 Goran Hyden, *Beyond Ujamaa*, ch. 5。

局,因为那些在顶层的人的权力依赖于执政联盟的向心力,也依赖于产生地方政治秩序和政治认同的权力结构。^①

这样看来,在诸多方面,后殖民政权建立了类似于殖民地时期“间接统治”形式。小农场主所拥有的通过控制土地来保留自主权的能力,足以解释二者的相似性。后殖民政权仍然依赖于从农民手中所汲取的财富,也因此依赖于商业和庇护等级,正是这些等级将农耕社区与国家所控制的贸易网络及政治权力联系起来。国家作为构建财富提取和积累的主导力量的角色,反过来维持着地方资本的脆弱性。地方资本的持续脆弱,不仅缘于政府垄断了像出口作物采购这种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而且因为那些有能力利用其地位和权威来获得商业利益的个人,通常也被吸纳到当局的租金生成和租金汲取的庇护网络之中。然而,就像殖民地时期一样,“间接统治”和拉拢是个具有内在矛盾的过程,因为统治者依赖于也受制于那些他们试图控制的权力掮客。

正如白亚特(Bayart)所指出的那样,政治独立确实表现出与先前制度的决裂:非洲社会内部强势人物着手“重新夺回”国家机构。^②在所继承的国家机构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中,精英融合发现了自身的制度逻辑。新的行政结构和庞大的官僚机构,是政权巩固所采取的“融入”、拉拢和以庇护为基础的策略的具体体现。^③既有政治权力和渠道的等级向上延伸,深入到国家制度结构之中。恩庇—扈从网络与国家机构一道重新勾画了权力分配图景,行政特权沿着政党、官僚机构和政府机关内部形成的横向纵向的恩庇—扈从网络而断裂、划分和再划分。最高层的统治通过这些网络向下延伸,国家由此卷入自身无力直接控制的社会过程之中。正是这样的国家形成过程,使得大多数后殖民政权建立起松散的、

130

① 这种依赖性反映在政治顶层人物明显的矛盾心态中:“一旦要确保国家资源,按照中央明确规定的正式标准,通过庇护网络配置,便会有此心态。”

② “源于殖民占领的国家,已经成了多重重新占领过程的对象,这使其稳步地移离了其原始形式。” Bayart, *L'Etat en Afrique*, p. 258.

③ “权力斗争可能最重要的是财富的斗争……这部分解释了附着在新的行政机构的创建上的看似夸张的价值。这些机构本身是财富的渠道和来源(财富的积累和供应)。”同上, p. 122.

不稳定的领导形式。政治的失败源于相同的过程。在诸如加纳、尼日利亚和苏丹这些地方,执政党和行政机构“日益反映了国家的所有裂痕……(并且)政治体系在……十分激烈的权力争夺战……的压力之下崩溃了”。^①霸权和它的反面——分裂——所由以产生的社会过程,将后殖民国家和政权毫不费力地嵌入社会主流的权力结构之中。多纳尔·克鲁斯·奥布赖恩所描述的国家陷入基层社会泥潭的图景真是入木三分啊。^②

后殖民政权在巩固过程中扩大和强化了殖民统治和剥削模式,再度产生了当年曾导致殖民国家瘫痪的种种矛盾。垄断贸易线路允许后殖民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提取农民盈余,正如欧洲商业公司在早前所做的那样。像欧洲资本一样,大部分后殖民政权没有直接投资于生产;他们发现,加强农业生产更有利可图、风险更小、也更便利。曾经也试过创建国营农场以“绕开农民”,但结果令人沮丧。这个殖民时期欧洲资本家和殖民政府的财政专家已经尝过的苦头,现在后殖民政府也加倍领受了。^③没有小农土地的大规模转让,劳动力难以调动和控制。雇佣劳动通常会增加农场生产的成本,高于农民种植的平均水平;并且,来自小农的竞争,也会削弱大型生产商的竞争力。在土地控制的既有结构下,通过商业线路提取农民盈余,对后殖民国家仍然是“必要的”,就像曾经对殖民国家一样。

通过国家刻意的行动来摆脱农民生产方式限制,恐怕很快就会削弱主导性社会结构,而新老政治制度都是以此结构为根基的。运用国家权力加速推进以雇佣劳动和开放土地市场为基础的农村生产方式运动(例如,通过登记、造册和抵押土地的改革),将加剧农村社会阶级的形成和两极分化,将更多失地和贫穷人口驱赶到城市,激发独立的农村食利阶

① Ruth First, *Power in Africa*, pp. 120, 126.

② D. Cruise O'Brien, *Saints and Politicians*, p. 126.

③ 关于绕开农民,见 Bjorn Beckman, "Ghana, 1951-78: The Agrarian Basis of the Post Colonial State", in Heyer et al., eds., *Rural Development in Tropical Africa*, pp. 161-162.

级的崛起。像殖民政府一样,后殖民政权对这种过程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心怀恐惧。农村盈余的私人占有和再投资,将以危害国家直接控制这些资源的能力为代价。后殖民统治阶级的地位将变得越来越脆弱,因为,国家资源基础的萎缩,将侵蚀“精英融合”赖以形成和维持的共识、妥协和控制的物质基础。

在所推动的变革将有可能削弱其统治赖以建立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基础的情况下,执政联盟能够找到共同事业吗?一旦面对这一问题,人们就很难再指望后殖民政权会运用国家权力有计划地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和农村转型了。^① 这种利弊权衡有助于解释后殖民政权在面对下述建议时的矛盾立场:以牺牲种植农民为代价推进农村资本主义发展。更一般地说,既有政治统治形式的物质基础,解释了后殖民政权对“市场逻辑”的矛盾和谨慎态度。统治者和农民的生存策略,就这样阻止了土地和劳动力完全资本主义式控制局面的出现。

像殖民地国家一样,后殖民国家仍然在伯曼所称的“积累和政治控制矛盾需求”之间苦苦挣扎。这些矛盾一直是后殖民时期发展进程的主基调,造成了社会科学家所理解的非洲国家持续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结论

强调非洲国家“实力”和强调其“虚弱”的人们之间的争论,凸显了后殖民国家的矛盾。政权巩固的过程使权力的双面都尖锐化了,导致整个政治经济的某些最尖锐的紧张关系在后殖民国家核心结构和过程内部充分表现出来。“包容性”和同化性的政权,是通过壮大旧政权机构、强化军队、使大众政治参与和代表的法律结构中立法以及增强国家提取和分配资源能力得以建立起来的。国家结构这些变化对后殖民时期非洲

① 这并不意味着在政治阶级内部的成员不能、不会和不去投资于生产型企业。它只是表明,统治阶级不可能以国家权力的系统行使暗含的集体的和深思熟虑的方式承担一项旨在促进当地私人资本的扩张,并因此旨在重新定义积累权力和财富的过程的意义广泛深远的工程。

展开的政权巩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当研究者指出非洲国家的“实力”取决于它是一种威权统治制度。靠镇压和国家垄断的商业线路提取农村盈余时,他们并不离谱。

分散集权的政治控制模式和治理模式,在政体的各个层级以及整个政治经济体中运行,由此产生了国家庇护主义和侍从主义。这种模式,通过提供获得国家资源的机会换取政治承认,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各种异己的成分被整合到这种建立在豪赌基础上的执政联盟之中,政权的基本阵营庞大,政权建立或维持权力基础的资源也不少。鉴于不同的庇护网络在国家层面的扩展和聚合,官僚权力沿着相同的路线碎片化了。表现为“宫廷政治”形式或个人权力斗争形式的顶层派性,往往产生于国家政权之外的社会裂痕,这种裂痕可以延伸很远。国家资源的私人占用,132 将国家资源用于加强个人权力网络,并不是后殖民政治实践的畸变或副产品——它们恰恰处在后殖民政权巩固并寻求统治过程的核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同样的过程削弱了作为一个组织、行使和再造国家权力工具的国家。在政权巩固的过程中,国家权力碎片化和私有化了。国家权力变得日益依赖于权力掮客们,依赖于他们动用工具性物质性奖励与惩罚性措施来强化对现实政治认可的能力。这一体系一旦成型,后殖民国家——远比殖民地国家更“温和”、更少凝聚力和更多地“被地方社会势力所渗透”——就暴露出从前政权继承而来的特性:保守主义。^① 殖民地国家已经被证明是无法容纳从殖民主义自身启动的经济转型中出现的社会力量的。在面对两难选择时,如果说欧洲人选择的是不顾农村经济发展来统治的话,那么后殖民政权,虽然不事张扬但严格根据“统治者的规则”,同样也选择以社会经济转型为代价来进行政治控制。这一过程的张力和局限日积月累,相互强化。

① Jacques Marseille, *Empire colonial et capitalisme français: Histoire d'un divorce* (Paris: Albin Michel, 1984); Berman, “Structure and Process.”

这些张力和局限在眼下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昭然若揭。一方面，后殖民政权巩固的策略，驱动国家商业功能扩张。这为国家提供了物质资源，用以建立与政权联系的权力网络；提高了国家对私人积累过程（由此对社会中的权力分配）的控制水平；也使国家得以预先采取了旨在加速农村地区资本主义转型过程的审慎策略。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过程无法持续。正如殖民商业公司和殖民政府早已发现的那样，在农民耕种结构框架内，农村经济产生持续盈余的能力不可能无限扩大。像殖民地国家一样，后殖民国家被迫向国外借款以维持和扩大其资源基础。在后殖民时期，外债的规模和强度都增大了，主要是因为各方对国家资源的胃口很大，庇护者们满足胃口的紧迫性从未如此强烈。

争夺农村盈余的斗争，可能在以农民为基础的出口作物生产达到“结构性”上限之前很久，就已经削弱了后殖民国家。在种植业经济体中，垄断商业体系很容易受到生产者抗议、恶性竞争加剧和农村衰变过程的伤害。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生产者的抗议可能表现为从出口作物生产中逐渐撤出土地、撤出劳力，用于自给自足生产和本地化食物交易。竞争可以采取平行市场的形式。这两个过程都剥夺了国家的资源，¹³³使之难以维持（更不用说扩大）以现有国家为中心的庇护网络，难以保证多元分化的权力层级与中央的关联，也难以确保它们对中央的依赖。^①同时，对平行经济所催生的财富和权力资源，政府当局没法直接控制，这弱化了国家压制潜在的权力竞争对手的能力。^②农村衰败的政治威胁以城市贫民形式表现自身，这些贫民所产生并维持的经济社会网络（所谓的非正式部门），不受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控制。曾经共同导致危机的那些因素——外债、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和农村衰败——交织在一起，带

1. René Lemarchand, "The State, the Parallel Economy,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Patronage Systems", in Rothchild and Chazan, eds, *The Precarious Balance*, pp. 149–70.

(2) Janet MacGaffey, *Entrepreneurs and Parasites: The Struggles for Indigenous Capitalism in Za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还可见布拉顿在本书第九章的分析。

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骚乱”的爆发,城市贫民走上街头,抗议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进口)主要农产品的涨价。

那么,非洲统治阶级克服在 20 世纪 60 年代被强化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固有局限”的能力怎样呢?依附论学者把目光投向国际体系与国际资本,以查找影响非洲生产能力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限制。像比尔·沃伦(Bill Warren)这样的分析家,提出一种基于逻辑、貌似可信的抗辩观点,他认为,非洲资本主义关系的充分发展,最符合资本的利益。^①这正是下述观点得以建立的理由。这一观点认为,原始积累的过程(主要通过国家资源的私人占用)以及提高非洲经济的生产基础的压力,将逐渐把非洲的政治阶级转变为资产阶级。

对后殖民政权巩固的研究,有可能以多种重要方式证明这个观点,也有可能让人们看到,面对“资本的逻辑”时,为什么僵化的倾向会占上风。资本逻辑学派倾向于把后殖民统治阶级从历史和政治背景中提取出来,并因此假定一个完整的、不受国家过程之外产生的利益和社会关系约束的“国家阶级”或“政治阶级”的存在。这种模式貌似“考虑到几乎无限多样的”、仅仅由这一社会阶层成员共同的长期利益所引导的“政治实践”。^②然而,如果把政权巩固、执政联盟组建和这些过程的结构基础列为严肃分析的命题,就会呈现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

政权巩固不仅是个创造权力新结构、新关系的政治过程,而且是个把既有的建立在社会基础之上的权力结构与国家绑在一起的政治过程。治理和剥削模式是由既能够破坏也能够加强国家权威基础的社会力量塑造的,与此同时,也是由以社会为基础的、在政府机构内部或者通过政府机构获取好处的竞争塑造的。后续的变革路线,是由统治者寻求

① Bill Warren, "Imperialism and 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New Left Review*, 81 (September-October 1973): 3-44; Bjorn Beckman, "Whose State?"

② 正如 Lonsdale 所说,“大多数非洲资产阶级的可塑性……似乎允许几乎无限多样的政治实践……至少到一种政治实践增加了对物质再生产的一些更加苛刻的需要的分析为止” (“States and Social Processes in Africa”, p. 153)。

通过政治行动、通过使用“作为资源的国家”——管理和抑制这些冲突、管控并因此维持权力的具体方式所调节的。这一过程限定和约束了国家权力——以及任何形式的发展的可能性。 134

后殖民时代非洲的统治阶级,是通过将国家权力用于满足包含在统治联盟内部的异质群体的多样化、有时是冲突性的利益需求和政治需要而形成的。庇护政治为统治阶级的形成、为将政治冲突从争夺国家权力的目标转移到获取国家资源渠道的短期竞争上等广泛的议题,提供了一个工具性的、物质性的共识基础——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如果说有可能在这种意义上实现一种“精英融合”的话,那么这一融合将是局部的、空洞的和以政治工具主义为基础的联盟。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一个以共同奋斗目标和政治需要为基础的、致力于推进某种类型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精英“融合”。缺乏这种共同利益,政权的巩固便很可能以维持和扩大执政联盟为目标,而不是以其内部不同组成部分的转型为目的。执政联盟得以成立所采用的方式,以及为了勉强维持这些联盟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方式,在抑制了一个“统治阶级”本来应该有的作为空间。在行使政治权力确保国家权力再生产、确保国家的物质基础、确保其经由资本主义转型成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存在等方面,他们本该拥有共同的长远利益。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多数国家转向努力加强对农民财富的压榨,农村衰败、贫困以及经常由此导致的事实抵抗等形式,使得支撑后殖民政权的政治经济关系再生产变得越来越困难。统治阶级和国家的物质基础开始受到侵蚀。在这些环境中,非洲统治阶级再明显不过地表明自己是“自在阶级”而不是“自为阶级”。国家作为组织和行使权力工具的功能日益失调,“压榨农民”的反生产力举措以及统治阶层手中所掌握的非生产性财富的积累,导致这些后果的政治实践模式都是产生当前危机的病根。在很多情况下,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代理机构有能力躲过危机;同样重要的是,国家权力似乎也没有以这种事业所必需的标准或形式存在。

第三篇

社会势力：接触国家权力

第六章

劳工分化：现代中国国家形成的起源

143

裴宜理

由于 20 世纪工人阶级辜负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他们的崇高期待，近几代研究劳工的历史学家对此感到失望之余，转而将他们的研究精力集中在无产阶级政治的局限性上。这一学术新风的核心是关注劳工分化特征。被性别、年龄、种族和技能所分化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家们所预料的那种步调一致的行动，也看不出有什么阶级意识。最近的研究多有一种悲观的论调，因为研究劳工的学者不愿面对他们研究对象的缺点。同时还存在一种讽刺的论调，因为学者们发现，激进劳工运动所得到的一丁点本地支持往往集中于工人阶级中享有最高特权的那些部分，与此前所寄望的英雄无产阶级相差甚远。^①

^① 这一重要文献的一个选录，见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eds.,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Princeton, N. J., 1986); Richard Jule Oestreicher, *Solidarity and Fragmentation* (Chicago, 1986); Sean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1984); Victoria Bonnell, *Roots of Rebellion: 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1900-1914* (Berkeley, Calif., 1983); Charles F. Sabel, *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 (New York, 1982); Ronald Aminzade, *Class, Politics and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New York, 1981); Dick Geary, *European Labour Protest, 1848-1939* (London, 1981); Diane Koenker, *Moscow Workers and the 1917 Revolution* (转下页)

劳工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未竟的预言纠缠不清,所以就一直沉溺于这些“为什么不”的问题:为什么工人没有形成阶级认同?为什么劳工、尤其是其中最受压迫的人们,没有团结在激进政党周围?为什么工人阶级政党、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政党,没有发动马克思主义革命?用这种腔调发问,这些问题就会激发人们去探讨工人阶级弱点的根源问题。这种探讨已经引导人们开展对劳工势力内部分化的深入研究。大量细致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显示,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儿童、黑人与白人以及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矛盾,使得工人阶级无法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表现出党派忠诚的阶级意识或革命行动。

这一研究路数所蕴含的对劳工的分解剖析,确实是一个有益的取向。我们现在对现代工人阶级内部所产生的强大离心力有一个更加现实的评估。但是,难道这种阶级内部的分化,都只能以消极眼光来看待吗?都只能被视为实现无产阶级“真正”使命的障碍吗?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恰恰是劳工分化本身,为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工人阶级的行动提供了基础,它不仅体现在支持这个或那个政党上,甚至体现在新国家的诞生上。将阶级分化与国家建构联系起来的思路,尤其适用于第三世界研究。大家公认,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高度分化。然而,承认社会的内在分化,并不意味着也承认它的政治无能。不同的社会部分——甚至是社会中一个阶级的不同阶层——与国家的结盟,甚至可能对双方的命运发挥决定性影响。这并不是说各种社会集团能够自行其是;通常情况下,在这些往往不稳定的关系中,没有一方可以得到如其所需或者如其

(接上页)(Princeton, N. J., 1981); William P. Sewell,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New York, 1980); Michael P. Hanagan, *The Logic of Solidarity* (Urbana, Ill., 1980); I. Prothero, *Artisans and Politic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London, 1979); Barrington Moore, Jr., *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 (Armonk, N. Y., 1978); Herbert G.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1977); Bernard H. Moss,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Labor Movement* (Berkeley, Calif., 1976); Joan W. Scott, *The Glassworkers of Carmaux: French Craftsme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a Nineteenth Century City* (Cambridge, Mass., 1974); Stanley Aronowitz, *False Promises* (New York, 1973)。

所愿的东西。尽管如此，通过从头开始我们的研究——认真对待这些次阶级势力的政治潜能，尽管它们可能是分化的——我们就掌握了一种探究国家—社会互动模式的具体方法。

概述

本章探讨两个非常不同的“现代”中国国家政权——1927—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和1949—1989年的共产党政权——与上海劳工界的关系。它们各自从上海工人阶级的不同部分挑选其支持者。国民党（在黑社会的帮助下）主要依靠来自中国北方的半熟练体力劳动者，而共产党则从南方吸引熟练的技工。这种劳工基础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两个政权的根本区别。国民党反映出了一种匪徒心态，从上海资本家手中敲诈钱财，同时如果有足够的好处的话，也与资产阶级合作。相比之下，共产党运行的规则更符合熟练技工的价值观——严格地限制资本家特权，建立一种劳资关系新体系，其中国家为职工福利承担起主要责任。

在一个时至今日农村仍然占绝大部分的国度，尽管中国工人阶级（集中在工业大都市上海）数量相对较少，但仍然显示了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部分是由于普遍的经济原因，那就是使用昂贵工业设备的工人有能力造成巨大伤害（在财产和生产两个方面）。但对中国劳工的力量，还有一种意识形态的解释。无论是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0世纪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像在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都着眼于新社会并把工人阶级摆在突出位置。鉴于145
现代化实际上被视为工业化的同义词，工人就被奉为进步的代言人。一个宣称代表进步势力的政党因而需要工人阶级的支持。出于这种意识形态考量，规模甚小的中国工人被赋予其他国家所无法企及的政治发言权。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积极努力地将劳工运动引导到对自身政治议程有利的方向上。在此过程中，政党和国家——连同劳工本身——都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

诚然,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宣示截然不同。共产党的劳工组织者强调由斗志激昂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而国民党则强调阶级调和的必要性,即为国家经济发展展开劳资合作。相反的方针有助于解释他们的倡议在工人中引起的不同反应。自诩拥有悠久斗争历史以维持高工资和工作自主的熟练工人,对接受共产党的激进信号毫无障碍。半熟练工人(通常是工厂训练的,缺乏像有行会基础的技工那样的独立性)更倾向于支持由国民党的组织者创建的保守的“黄色工会”。

意识形态并不是这两部分工人力量之间分化的唯一基础。组织方面的差异对塑造他们与政党—政府的关系同样重要。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熟练工人号称有深厚的社团组织传统。行会、同乡会以及诸如此类的协会,为其成员灌输一种公共精神,激发他们为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相形之下,缺乏职业训练和熟练技工的那种安全感的半熟练工人,依赖地下帮会来确保自己在激烈的城市生存竞争中能够谋生。作为工业城市冷漠世界的新人,这些半熟练工人成为强大的青帮和洪帮招募的对象,这两个帮派主导着20世纪早期上海的经济走势。

靠着与黑帮老大(其中许多同时是工厂的工头)关系密切的国民党干部,在劳工关系中建立起一种恩庇—扈从网络。作为对提供劳工支持的回报,这些黑帮分子在政府中被委以关键职位。庇护系统的出现(其中帮会头目成为半熟练工人和高层政治家的中介),限制了国民党政权实现其经济或政治改革的能力。与之相反,共产党干部以熟练工人的行会传统为基础,成立了鼓吹阶级斗争和工人福利的激进工会。共产党执
146 政以后行会传统仍遗留在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单位结构之中。单位系统现在被很多人视为深化产业改革的一个障碍。

争夺上海劳工的斗争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业之都上海成立一事非常自然。然而在当时,这个地方藏污纳垢,使青年马克思主义组织者——

他们习惯于政治首都北京更加“有教养的”氛围——的信心备受打击。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1921年夏天中共一大召开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表了几篇关于上海的随感录，其中轻蔑地写道：

上海社会，分析起来，一大部分是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在外国资本势力底下讨生活的奸商；一部分是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发财票的诈欺取财者；一部分是卖淫业妇人；一部分是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一部分是做红男绿女小说做种种宝鉴秘决做冒牌新杂志骗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一部分是流氓政客；青年有志的学生只居一小部分，处在这种环境里，仅仅有自保的力量，还没有征服环境的量力。……我因此联想到国民大会如果开得成，总以不在上海开会为宜。……

上海社会是那一种人最有势力？从表面上看来，政治的经济的太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会的底里面却不尽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大部分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他们老头子的命令之效力强过工部局。……消灭他们只根本办法，惟有使各业工会在法律上都公然成立……^①

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在少部分与即将成立的共产党的组织者在思想观念上接近的工人中间建立工会，最容易实现。在共产主义者支持下成立的第一批工会，出现在金属加工和印刷行业。这些技术职业由来自同样繁华的中国南方地区的技工占主流，许多年轻的中共干部也来自这些地区。不足为奇的是，新工会反映的是熟练技工的长期诉求。上海技术工会——其70个左右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如钢铁业和棉纺业），在其成

① 陈独秀：《上海社会》，载《新青年》（New youth），第8卷第1、4号（1980）：67-71（Emphasis added）。

立宣言中承诺,要维护学徒制和传统的互助习俗。^①

对共产主义者来说,走出熟练技工的场域,投入到低技能的上海无产阶级普通工人(他们许多是来自中国北方农村贫困地区的帮派成员)147 中去,团结他们,联合行动,是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事业。一位早期的活动家回忆道:

“我们的工作遇到许多困难……青帮和洪帮是最难对付的。我们最后决定,应该派几个同志混进他们的队伍。但是,那时我们的同志全是学生。如果我们让他们上台发表演讲或坐下来写一篇文章,总会有人自愿来做。但潜入青帮或洪帮,需要卑躬屈膝,学习帮规,然后还要通过层层伪装才能开展工作。谁有能耐干这活?”^②

事实证明,保守的国民党党员更擅长拉拢工头,并获得帮派分子的支持。得益于帮派的支持,到1920年,上海成立了十几个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工会。^③

共产党和国民党努力动员上海劳工的不同结果,很快因为出现了不同的工人阶级支持者而变得明显了。总的趋势可以通过密切关注上海的英美烟草公司(BAT)来说明,这是一家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具罢工倾向的工厂。作为中国劳工研究者深入调查的对象,英美烟草公司通常被描绘成向共产党提供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支持的堡垒。^④然而,实际

① “Shanghai jiqi gonghui kai faqihui jilue” (Annals of the inaugural meeting of the Shanghai Mechanics' Union), *Zhongguo gongren yundongshi cankao ziliao* (Reference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vol. 1 (1980), pp. 43–47.

② *Bao Huiseng huiyilu* (The memoirs of Bao Huiseng) (Beijing, 1983), p. 67. 对共产党劳工运动来说幸运的是,原来,他们的一些年轻干部有足够的耐心同帮派流氓一起工作。关于早期共产党劳工组织者打入帮派内部的努力,见 Zhu Xuefan, “Shanghai gongren yundong yu banghui ersanshi” (Two or three things about the Shanghai labor movement and the gangs), in *Jiu Shanghai de banghui* (The gangs of old Shanghai) (Shanghai, 1986), pp. 1–20.

③ Jiang Peiman and Chen Weimin, “Shanghai zhaopai gonghui de xingwang” (The rise and fall of Shanghai's signboard unions), *Jindaishi yanjiu* (Studies in modern history), no. 6 (1986): 46–47.

④ *Zhandou de wushiwunian* (Fifty years of battle), (Shanghai, 1960). 是这些研究中最详细的。

情况要复杂得多。

英美烟草公司，像大部分其他烟草公司一样，分为三个重要生产部门：采叶部（用手工把烟叶从茎上摘下来），卷烟部（用机器将干燥的烟丝卷成香烟），以及打包部（将香烟装进纸盒里）。另外还有一个机械车间，那里熟练的机械工人（一般称为“铁匠”）制造和维修工厂的设备。^① 在外部政党对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感兴趣之前，工厂就因劳资纠纷而名声在外。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早期的抗议活动（包括共产党干部来之前的15年内的12次罢工）都是由采叶部和打包部的非熟练女工发动的。^② 烟草女工表现出来的这种突出的战斗性，与研究者对差异巨大社会的调查结果颇能呼应。^③ 然而，一旦外部政党卷入英美烟草公司内部工人的斗争，情况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来自修理车间的熟练男性机械工人（几乎其中所有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在共产党人发起的抗议中变得活跃，而半熟练的卷烟机器操作工（虽同样是男性，但主要来自北方）则站在了国民党一边。

1921年夏天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几个星期，英美烟草公司里的劳工政治模式便发生变化。当时，工厂里的机械工聚到一块儿，抱怨分到该部的那位英国新经理。技工们想必是受到前不久刚成立的上海技工 148 工会的鼓舞，被新监工企图剥夺他们传统特权的行为所激怒。于是他们宣布罢工。两天之内，一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劳工组织者就被派到了罢工工人聚集的场合。在他的指导下，筹集了一笔罢工基金，草拟了一系

① *Shanghai juanyan gongye gaikuang* (Conditions industry) (Shanghai, 1950), pp. 35–42.

② *Shi bao*, 1906/6/13, 1915/2/5, 1916/3/10, 1918/8/5, *Minguo ribao*, 1917/7/21, 1917/7/24, 1917/7/25, in the Shanghai rolled tobacco, 1918/8/6 1917/8/2, 1918/8/9, 1917/8/10 1919/10/8 1918/5/2 1918/8/4, 1919/11/10, 1919/11/14, 1920/6/23, 1921/3/7, 1921/3/18, 1921/6/25, 1921/6/28, 1921/6/29.

③ Rose Glickman, *Russian Factory Women* (Berkeley, Calif., 1984), p. 162; Louise A. Tilly, "Paths of Proletarianization", in Eleanor Leacock and Helen I. Safa, eds., *Women's Work* (South Hadley, Mass., 1986), p. 37; Patricia A. Cooper, *Once a Cigar Maker: Men, Women and Work Culture in American Cigar Factories, 1900–1919* (Urbana and Chicago, 1987).

列具体要求。部分由于这一援手,这次罢工在持续 20 多天后,以管理者同意所有的诉求而取得完全胜利。为巩固成果,一个共产党指导的英美烟草公司工会,在当地城隍庙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成立了。^①

然而,一年后当另一次罢工在英美烟草公司爆发时,管理者求助于当地的青帮暴徒,以阻止又一次长时间罢工。在许诺其追随者可以获得比共产党支持的工会可能通过谈判获得更好待遇的情况下,青帮流氓召集了几百个卷烟机操作工,准备越过纠察线并复工。虽然罢工在没有实现任何最初要求的情况下很快结束了,但资方确实对提早复工的三百多名卷烟机操作工给予回报。^②

1927 年春天国民党掌权之后,流氓卷入英美烟草公司劳工运动的力度加大了。国民党见证了共产党支持的工会的威力,急切地想插手劳工运动。英美烟草公司工会被改组了,“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发展烟草行业以及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推进国民革命”。^③一位与青帮熟络的共产党员仍然是工会负责人,但是工厂里的两个青帮头目加入了工会常务委员会。凭着新生国民政府雄厚的财力支持,英美烟草公司工会迅速削弱了共产党的影响力(共产党员身份的负责人很快被逮捕了),并且拥护政府的政策。当习惯于以往军阀政权时代优惠减税政策的英美烟草公司拒绝支付国民政府征收的一项新烟草税时,国民党支持的工会便宣布罢工。

由于罢工资金来自财政部的秘密补贴,这一罢工持续了将近 1 个月,使其成为国民政府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劳资纠纷。^④但是,由政府资助的罢工,同样也要受制于政府的法令。1928 年初,国民政府通过蒋介石的内兄、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谈判——与英美烟草公司达成和

① *Zhandou de wushi nian*, pp. 19–31.

② *Ibid.*, pp. 32–38.

③ Luo Chuanhua, *Jinri Zhongguo laogong wenti* (Labor issues in today's China) (Shanghai, 1933), pp. 97–102.

④ 见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1:2–746, 来自国民党劳动局局长发给财政部长的机密备忘录,慷慨地为英美烟草公司工会划拨秘密补贴。

解。随后达成的协议，是在宋子文的上海豪宅里举办的一次宴会上签署的。烟草公司在交付 300 万大洋税款之后，政府当局承诺对该跨国烟草巨头减免税收（尽管减免率大减）并承认工会的谈判权。^① 由于有了这一协定，英美烟草公司所交的税收成为政府和工会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据英美烟草公司总经理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上海国民党每月从烟草税中获得大约 1750 块大洋，其中 550 块大洋留下自用，其余的钱分给英美烟草公司工会中的三个青帮派别。这种当地政客与工会领袖之间的共生关系，使总理想起了坦慕尼协会的种种。^② 149

直到日本入侵、国民党军队撤退到中国内地时，这种国家资助的黄色工会才被削弱。到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共产党在英美烟草公司的机房里重新恢复了立足点。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日本人控制了英美烟草公司。共产党在该厂设立了支部（由三个金属制造工领导），鼓动许多人怠工，干扰生产，要求提高工人福利。随着日本人在 1945 年夏天投降，中共党员决定在英美烟草公司重建一个左翼工会。他们的第一次筹备会是在一个金属制造工的家里举行的，这表明共产党的支持力量主要限于机械车间。相比之下，卷烟部由青帮头目兼国民党党员洪美全控制。他在十多年前的黄色工会时期就一直很活跃。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卷烟机操作工，洪在卷烟部领导着一个由北方来的工人组成的结义兄弟会。1946 年春，洪美全被任命为由政府批准建立的英美烟草公司工会的新负责人。^③

中共面临的紧迫问题，是他们局限于有限的工人势力之内。正如一份关于英美烟草公司情况的党内报告所坦言的那样，“我们所有的基础都建立在铜匠房里（即机械车间）…… 尽管我们的一些人在其他部门工

①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928/1/18.

② BAT Pudong archives; August 1933 report of I. G. Riddick.

③ Yao Haigen, 1958.10.28; and Hong Benkuan, 1958.10.24; interview transcripts in the Labor Movement Archive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ASS).

作,但我们无法在那里发展大量追随者”。^①诚然,机械制造工是一个有活力的群体。但正是他们的好斗性,引来了更严密的监控。如果英美烟草公司内激进的劳工运动还想继续,那就应该将活动基地转移到一个较少受到监视的车间。1947年夏天,当英美烟草公司内卷起员工要求星期日工资的浪潮之时,共产党组织者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斗争的领导权让给卷烟部的一些可信赖的盟友。一位罢工领导人回忆,

当时,反动工会正严密监视着铜匠们。由于他们先前就已经很“红”了,我们卷烟部的工人领导了这次斗争。我是黄色工会的首领洪美全的拜把兄弟,卷烟部的头儿也是洪的拜把兄弟。所以他对我们车间没有丝毫怀疑,也没有把我们部的任何工人列入黑名单。^②

这次罢工的成功削弱了黑帮势力。但是,直到1949年春国民党逃离上海,共产党人才完全实现对英美烟草公司劳工运动的控制。一个被国民党囚禁的机械制造工,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后,担任该工厂新的工会主席。他的克星洪美全,虽然被公安局里的朋友庇护了一段时间,但最后150 在1951年春,还是被当作镇反运动的对象逮捕了。

这家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们书写了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劳工抗议的历史,跨越了近半个世纪。这样,研究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学家们,倾注很大精力研究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并称赞他们是模范的无产阶级战士,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英美烟草公司的案例尽管很重要,却并不主要是一个爱国革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争取权力的故事。相反,它是一个被外部对手(黑帮、国家当局以及青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竞争性议程以各种重要方式塑造的故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揭示工人本身复杂性的故事。尽管有时也能联合行动,但英美烟草公

① Archives of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Taipei, #556, 282-810. 1946年底,英美烟草公司里有25个共产党党员,包括12个金属制造工,5个采叶部门工人,4个卷烟部门工人,1个办公室职员,1个印刷工和2个教师。其中没有妇女。

② Huang Zhibao, 1958.9.2, interview transcript in the Labor Movement Archive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SASS.

公司的工人因技术、工资、性别以及出生地的差异而分化。这种分化带来劳工运动的复杂性，其中一些参与者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热情鼓吹者，一些人将支持给予国民党及其青帮打手，还有一些人则置身事外，不受这些组织者的影响。

况且，英美烟草公司工人阶级的分化，绝不是一个特例。其他企业和行业的工人力量，也显示了类似的分化。在棉织厂和缫丝厂，来自中国北方的非熟练女工构成了职工的绝大部分，而来自南方的小部分熟练男性机械工人则成为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骨干。在丝织厂里，有技术有文化的男女工人（来自中国南方）从事着高工资的工种，他们当中相当比例的男女工人参加了革命。在电车轨道行业，熟练的南方机械工人构成了支持共产党的堡垒，而在半熟练的司机和售票员中间（来自北方），青帮和国民党的影响却占主流。^①

从比较视角观察，上海劳工的政治分化不足为奇。正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在一战期间，机械工人“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激进劳工运动的独特领导者”。^② 迈克尔·汉根对此作了补充说明：“能够留在工厂里的手工艺人再没有比金属加工工人更多的了。虽然偏安工厂一隅，金属制造工一直以来都表现得好像在自己的小作坊里劳动。”^③一位俄罗斯记者，试图解释革命时期彼得格勒熟练的金属制造工的战斗力，他总结说：

“每一次运动从事机器生产的工人总是冲在前线……车床工、翻砂工、锻工、机修工和机械师——所有这些形成良好个人意 151
识并有相当高工资的进步人士……这一类工人，因为工艺的缘故，必须多动脑筋……他们的谈吐，几乎跟我们的知识分子没有区别。在我看来，他们更有趣，因为他们的判断更加新鲜，并且，他们的信

①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Calif., 1993), chs. 8 and 9.

② Eric Hobsbawm, *Labouring Men* (New York, 1963), p. 424.

③ Hanagan, *The Logic of Solidarity*, pp. 10–11.

念一旦形成,就更加坚定。”^①

事实上,欧洲金属制造工的激进主义在一战之前的半个世纪间就一直持续着。1851年,图卢兹警察在试图解释为什么工厂金属制造工“几乎都是社会主义者”时指出,因为他们都集中在大作坊中,便于扩大宣传。^②

工作中密切互动的结果——为学徒制所激励——是熟练工人为工作而自豪。他们一向工作稳定,待遇公平,对雇主的要求很高。作为劳工阶级中享有特权的部分,技工们很自然地将自己视为劳工整体利益的代言人。在他们的脑海里,在我们可以称为“工匠意识”(对特殊技能群体集体利益的意识)和“阶级意识”(对包括其他群体的工人阶级共同利益的意识)之间,不存在必然的矛盾。^③

不同于那些通常短暂而缺乏安全感地依附于城市的非熟练工人,大部分熟练工人都融入了城市生活。作为城市社会的永久居民,他们对超越工作场所界限的公共事务感兴趣。大多数技工职业所需要的高文化素质特点,进一步助推着这些工人的政治化过程。^④

技术工人的这些特征——识字、城市化以及对产品的自豪感——是最突出的,同时这一行当也产生了与其人数不相称的工人阶级激进分子。娜塔莉·戴维斯以印刷业为例,^⑤罗伯特·伯祖查聚焦于丝织业,^⑥艾瑞

① 引自 David M. Mandel, *The Petrograd Workers and the Fall of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1983), p. 13.

② Aminzade, *Class, Politics and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p. 76.

③ 关于这一点,见 Hanagan, *Logic*, p. 210. 还可见 Bonnell, *Roots of Rebellion*, p. 141.

④ 一项 1908 年的莫斯科调查表明,熟练工人,最值得注意的是金属制造工,识字率约 90%,与纺织工人相比,他们相当多地居住于城市(以出生在城市作为衡量比例)。Koenker, *Moscow Workers and the 1905 Revolution*, p. 29. 这种工人——熟练,报酬优厚,识字,城市化——领导了 20 世纪早期的罢工浪潮。Koenker, *ibid.*, pp. 76-78.

⑤ Natalie Zemon Davis, "A Trade Union in Sixteenth Century Franc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o. 19 (1966): 48-69; Natalie Zemon Davi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Stanford, Calif., 1975) pp. 4-10.

⑥ Robert J. Bezucha, *The Lyon Uprising of 1834* (Cambridge, Mass., 1974).

克·霍布斯鲍姆和琼·斯科特则以制鞋业为例，都验证了这一点。^① 我们有必要考察上海那些最活跃的共产党工会领袖的背景。陈云——后来成为社会主义中国工业系统的设计师——曾在该市最大的印刷厂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在“大跃进”期间，当陈云的经济政策不受待见时，他埋头写评弹文章，这是一种出自其中国南方家乡的戏剧传统。）^② 张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丝织企业梅雅的一名熟练技工。还有刘长胜——后来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曾是一个鞋匠。

尽管欧洲劳工运动通常被拿来作为国际比较的标杆，但拿上海的例子与美国劳工相比较，至少具有启发意义。这种相似性背后是一个相似的招聘流程，就是说，这两个国家都依工人特定来源地和背景划分工作队伍。正如约翰·坎布勒(John Cumbler)所描述的美国模式：

“选择性招聘将不同技能和经验的流动人员划到特定行当之中。出来工作之前与亲友的接触，将新来者引入已有的以特定区域或出身划分的职业和街区……社会和种族的分化，将工人导向各种以传统、习俗和技能为界限的领域，这些界限来自他们的过去，并被他们当前以族群划分的生活和工作经验所强化。”^③

技能和出生地的差异，在美国一如在中国，反映到政治倾向上。斯坦利·阿诺罗维茨在一项对美国劳工运动的研究中指出，社会主义者最初在熟练工人中获得关键支持，这些工人要么是土生土长的，要么是来自北欧的。相比之下，非熟练工人——其中大部分来自东欧和南欧——

① Eric J. Hobsbawm and Joan W. Scott (1980), "Political Shoemakers", in Eric Hobsbawm, ed., *Workers: Worlds of Labor* (New York, 1984), pp. 103–130.

② David M. Bachman, *Chen Yu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Berkeley, Calif., 1985), pp. 72–73.

③ John Cumbler, "Migration, Class Formation,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Michael Hanagan and Charles Stephenson, eds., *Confrontation,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Labor Process* (New York, 1986), p. 42.

大多置身于激进劳工运动之外。^①

不过,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上海,还存在一个同样在劳工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半熟练工人的中间群体。由于缺乏像熟练工人那样的工作保障或社会地位,这些人往往被迫投向帮会人脉以寻求保护。帮会帮助农村移民艰难转型以适应城市生活。他们同时还充当工人与政客之间的中间人。坦慕尼协会这个臭名昭著的曼哈顿民主组织清晰地表明了这一关联。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与中国一样,经历了帮派活动向更加成熟的政治活动转型的过程。有组织犯罪集团卷入马车夫协会是这种演变的象征。从它第一次建立以代表四轮马车车夫开始,就开启了腐败之门。正如一位研究暴力的学者在解释该协会要挟美国运输工人时所说的:“每个工人都是孤立无援的小人物,因此易受威胁。”^②欺诈性保守政治是该工会的标志。^③

对于普通工人来说,与帮会建立起各种庇护关系是谋生的重要凭借,不然他们便要面对险恶的环境。正如马车夫协会领袖吉米·霍法承认的那样:

“人际关系是提供服务的关键,并且,给成员提供服务是我们在这项业务中存在的唯一理由。至于那些政治和社会的劳什子它们并不重要。我并不认为车夫们希望我为他们筹划集会,或者去电台做节目并告诉他们究竟德国或意大利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干的是出卖劳力的营生。我们要获得最好的回报。”^④

帮会在动员半熟练工人方面取得的成功,多半要归功于它们的工会

① Aronowitz, *False Promises*, ch. 3.

② Jonathan Kwitny, *Vicious Circles: The Mafia in the Marketplace* (New York, 1979), p. 143.

③ 到了上世纪50年代早期,工人一旦被怀疑支持共产党,就有理由被开除。见 Kwitny, *ibid.*, p. 144.

④ Jim Clay, *Hoffa!* (Beaverdam, Va., 1965), p. 163.

在与执政当局建立密切联系的同时公开否认有政治企图。就如安东·勃洛克对黑手党所做的分析那样，黑手党与一般土匪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同那些场面上掌权的人有着共生关系。黑手党在联系政客与普通公民的人脉关系网中，充当政治掮客或权力经纪人的角色。^① 半熟练工人所处的不安全地位——他们的未来系于城市，但在为自身争取稳定职业而进行的斗争中没有获得多少好处——使他们特别容易接受此类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保护。由于雇主培训的工人缺乏熟练工人所拥有的那种自主的行会传统，他们因此很容易被鼓吹经济收益而非政治抵抗的“黄色工会”所吸纳。

如果说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政治分化是世界各地劳工运动普遍特点的话，那么中国的例子便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么说是根据这样的事实，即工人群体每一种“自然的”政治倾向，都分别与国家——中华民国（1927—194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至今）——联系在一起。通过考察这些对立的政治势力与中国劳工之间天然的关系，我们就有机会来分析社会运动对国家形成的影响。我们先来检视国民党人在大陆命运多舛的执政时期的情况，接着再转而考察当代共产党人。

上海劳工与国民党政权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的政变，粉碎了共产党的劳工运动，将激进分子赶出城市并使其陷入了长达20年的农村流放。理所当然，这一政变是由上海黑帮执行的。3月底，蒋介石的三个心腹——他们都有黑社会背景——被派往上海联络黑帮头目。在那里，他们同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秘密会面，一起制定了随后实施的反共镇压方案。

国民党对帮会的依赖，是对帮会在20世纪早期在上海地方上的强大影响力的认可。上海青帮“教父”黄金荣，早在1900年就来到上海。

^① Anton Blok, *The Mafia of a Sicilian Village* (New York, 1974), pp. 6–7, 177.

过了几年小瘪三生活以后，他被法租界巡捕房招募为便衣刑事侦探。在上海法租界的警察工作，自然不需要他断绝与黑帮的联系，因此黄金荣与各帮派都有联系。几年后，他的重大转机来了。他成功地解救了在前往中国北方的路上被绑架的法国神父。该神父是上海法国领事馆领事和法国巡捕房总长共同的亲密朋友，所以黄金荣获得了丰厚的奖赏。他被任命为法巡捕房华探督察长这一新设立的职位。提升到这个权势职位，大大提高了黄金荣作为上海黑社会帮派头子的地位；多达两万的上海居民宣誓效忠，成了他的门徒。^①

- 154 杜月笙就是拜黄金荣为师的门徒之一。杜月笙出生在一个贫苦人家，自幼父母双亡。在旧中国城市上海码头边，他在叔叔的水果摊干了几年。年轻的杜月笙有个嗜好：向黄包车上衣冠考究的乘客投掷烂苹果。他叔叔因此不待见他。终于有一天，他偷钱去赌博被叔叔发现了。他被赶出水果摊。无业晃荡的杜月笙，正是这个时候攀附上有权有势的黄金荣。黄金荣的情妇以前是妓院的鴿母，很快喜欢上了这个当时人们口中的“水果月生”，并亲自过问，安排杜月笙在黄金荣的黑帮帝国中工作。就像他之前几代秘密帮会头目一样，杜月笙很快因为上海滩利润丰厚的鸦片交易富得流油，声名鹊起。一开始，他被指派到广东人在虹口的鸦片馆里当伙计，很快又被提拔去管理黄金荣在法租界里的一个大烟馆。他比师傅更有生意头脑，很快找到将黄金荣与法国巡捕房关系发挥到极致的门道。经师傅批准，杜月笙建立了“黑色材料公司”，按月从法租界的每个鸦片馆收取保护费，回报就是可以公开自由地出售鸦片，没有警察干预。这个生意得以维系，代价是每个月向法国当局进贡大笔的

^① Xue Gengshen, “Jindai Shanghai de liumang” (The gangsters of modern Shanghai), *Wenshi ziliao xuanji*, no. 3 (1980): 162–163; Cheng Xiwen, “Wo dang Huang Jinrong guanxia de jianwen” (What I saw and heard as Huang Jinrong’s butler), *Jiu Shanghai de banghui* (1986): 144–148.

贿赂。^①

很快，杜月笙的野心超出了法租界。为扩大鸦片经营规模，他与上海另一个从事鸦片交易的帮派大亨取得了联系。该大亨即是张啸林。张啸林与上海警备总司令部的密切关系，使得他控制了扬子江与黄浦江交汇口上的鸦片交易。1920年，张啸林同意与杜月笙、黄金荣正式合作。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之间的亲密关系——通过兄弟结拜仪式确定——在黄金荣于1924年划了一块自己在法租界的地皮给两位得力兄弟建造毗邻的别墅时，进一步巩固了。^②

蒋介石的北伐，要挑战长江流域的政治现状，也威胁到了鸦片生意。因此，驱使上海鸦片三巨头在1927年积极为蒋委员长效劳的，远不止是革命精神或个人商誉。他们最优先考虑的是维持其有利可图的鸦片交易。蒋介石也愿意制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以换取这些帮派头面人物的支持。

1927年4月11日晚，在发动偷袭的几个小时之前，鸦片三大亨和蒋介石的心腹会面，三杯两盏之后，双方就互表忠心。^③4月12日清晨两点，进攻开始了。佩戴“工”字样袖章的数百名暴徒，从租界蜂拥而出，进入到毗邻的中国地界，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手里，夺取了控制权。战斗是短暂的，因为军队很快接管了纠察队驻地和工会机关。几百名工人和劳工组织者在随后的屠杀中丧生。^④

①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microfilm reel 256, D-9319; *Da liumang Du Yuesheng* (Big gangster Du Yuesheng), (Shanghai, 1965), pp. 1-7; Huang Guodong, "Dumen huajiu" (Old tales of the Du residence), *Jiu Shanghai de banghui* (1986): 248.

② Zhu Jianliang and Xu Weizhi, "Zhang Xiaolin de yisheng" (The life of Zhang Xiaolin), *Jiu Shanghai de banghui* (1986): 343-344.

③ Xiang Bo, "Huang Jinrong shilue" (An account of Huang Jinrong), *Jiu Shanghai de banghui* (1986): 134.

④ "Siye shibian de qianqian houhou" (Before and after the April 12 incident), *Shanghai gongren yundong lishi ziliao*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Shanghai labor movement), vol. 4 (1953), pp. 12-35; Wang Jianchu and Sun Maosheng, *Zhongguo gongren yundongshi*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Shenyang, 1987), p. 138.

镇压了共产党的劳工运动之后,蒋介石的人马立即着手将自己的组织架构强加到上海工人头上。用经典的社团主义解释,其目标是创建一个在政府指导下的驯服的工会网络。^①

4月13日,蒋介石发动骇人政变之后仅仅一天,他的手下主持了上海工会联合会的成立大会——该组织由黑帮操纵,很快因极端残酷而臭名远扬。共产党员和其他涉嫌庇护左翼分子的同情者,被立刻逮捕并处死。联合会的残酷举措甚至连一些国民党人都难以忍受,这些人不久成立了自己的伞状协会,争取上海市各工会的支持。

国民党敌对派系之间的互相残杀,直到1928年秋成立的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被责成管理上海市的劳工运动时才告结束。尽管该局不少职工愿望良好,但该局改变工业系统的努力遭遇挫折。1930年,该局负责人潘公展报告说,全市只有157个工会在该局注册登记。^②这与在国民党接管之前活跃在上海的500多个工会相去甚远,即便该局确实表现出政府在劳工组织事务上的兴趣。潘公展抱怨说,社会事务管理局在履行劳工管理职责时,遇到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是外国租界的继续存在,在那里外国居民受自己的议会、法院和警察的管辖。上海的大多数工厂都坐落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中国官员要求外国当局合作,在工会注册和纠纷调解方面负起责任。这种合作几乎没有开展过。潘公展认定的阻碍社会事务管理局正常运行的第二个问题是“那些为了私利煽动工人的家伙”。毫无疑问,潘公展的指责部分指向残余的共产党组织者,他们试图唤醒劳工运动。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也暗指国民党同盟

① 关于社团主义,例如,见 Phillippe C. Schmitter, *Corporatism and Public Policy in Authoritarian Portugal*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 1975); 及 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N. J., 1978)。国民党作为一个社团主义政权的描述可见 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Honolulu, 1985)。

② Pan Gongzhan, “Shanghai tebieshi shehuiju zhi zuzhi ji gongzuo” (The organization and work of the Shanghai Bureau of Social Affairs), *Qingnian jinbu* (Youth progress), no. 133 (1930): 34-41.

内的某些人。党内纷争最让人恼火的源头恰恰来自蒋介石在四月政变中求助的那群人：青帮。虽然专横的联合会的解散导致国民党首次实施的由黑帮主导的控制劳工企图的可耻失败，但他们很快就尝到了第二次失败的滋味，这次的形式是黑帮干预——更加隐蔽，也更加奏效。

看到国民党政府对控制劳工无能为力，青帮头子杜月笙决定亲自尝试组织劳工运动。杜月笙的第一步行动是把手伸向上海邮电局里的改革派工会领导人。邮电局是由外国人控制的中国政府机构，杜月笙认定它是一个有充足社会和政治影响力的机构，是自己介入工会的理想入场券。在邮政工会成员中，他首先与陆京士等人联络。

在流氓大亨的庇护下，陆京士很快上升为上海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出任上海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长。

同为邮政工会成员的朱学范，很快担任新成立的上海市总工会主席，而该工会宗旨就是全面指导全市的劳工运动。^①

不过，冉冉升起的最耀眼的那颗星当然是杜月笙了。1933年中国的“名人录”英文版，将这位鸦片巨头描述为“中国的金融家、银行家和工业家领袖之一”，有“一份长长的在公共和公民服务方面取得重要功绩的可敬记录，多次为祖国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在杜月笙诸多的官方头衔中，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上海特别市参议会议员、上海商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中国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一家政府控股公司）”。^②正如当时一位外国人所评论的那样，杜“是阿尔·卡彭和洛克菲勒的合体”。^③

黑帮头子杜月笙和邮局追随者之间互利的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劳工控制的基础之上的。通过陆京士等人的穿针引线，他们的庇护人杜月笙

① Zhu Xuefan, “Shanghai gongren”, pp. 6–9.

② George F. Nellist, ed., *Men of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 (Shanghai, 1933), p. 110.

③ Ilona Ralf Sues, *Shark's Fins and Miller* (Boston, 1944), p. 78. (阿尔·卡彭，黑帮教父，1925–1931年掌权。卡彭时代的黑手党徒，风衣下藏着冲锋枪，火拼时用手榴弹开路，强硬残忍的作风令其他黑帮胆寒。——译注)

应邀介入上海市爆发的几乎每一次大罢工。杜月笙作为出类拔萃的劳工谈判家的才能得以施展——往往以十分有利于劳工的方式出现——在包括棉花、印刷、丝织、珠宝、新闻以及人力车运输等多个行业中。杜月笙不止一次先用他的个人银行账户资助罢工委员会，然后增加管理者为达成和解愿意支付的价码。这种善举使他赢得了工人、雇主和舆论的好感（与此同时，也让他赚得了大量的公司股份）。^①

朱学范在最近的回忆录中记述了杜月笙对罢工的干预是如何使他褪掉坏名声并跃升为上海名流的。杜月笙每促成一次和解，上海的四大中文报纸（这些报纸的董事局主席就是杜月笙）都对它大肆渲染。劳工新闻社推动了这些事件的报道。该机构旨在专门宣传其资助人的功绩。^②如来自台湾的杜月笙传记作家所强调的，这些活动直接为这位鸦片大亨带来迅速增长的名声：

“不管是杜月笙还是陆京士促成解决了劳动争议，他们的行动都堪称天衣无缝。几年后，杜月笙和上海市党部合力领导劳工运动。在中国地区和外国租界里的上海实业家和劳工领袖，不管来自何种行业或职业，都奔入杜月笙的家门。这些力量的汇合给了杜月笙极大的能量。他随后能够轻松地开展大事业，可以追溯到在这一时期所奠定的坚实基础。”^③

尽管杜月笙的平步青云确实可以归因于政府和大企业的支持，但是

① 这就是杜月笙在1928年和1930年的法国电车公司罢工、1932年的南投电车公司罢工、1933年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罢工、1933年的上海电力公司罢工及1937年的上海电力建设公司罢工期间的操作模式。见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reels #16-17, D-5319。英国警方指出，“老的法租界鸦片帮派似乎通过在中国工业企业内敲诈勒索来补充其收入。”见 reel #14, D-1611。尽管对杜月笙的服务的财政奖励是充足的，但是英国警方提供了另一个关于帮派流氓热心调解劳动纠纷的同样重要的解释：“他之所以渴望解决劳资纠纷，目的是赢得公众及特别是政府机关的信任。”见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reel #56, D-9319。

② Zhu Xuefan, “Shanghai gongren”, pp. 6-7.

③ Zhang Jungu, *Du Yuesheng zhuan* (Biography of Du Yuesheng) (Taipei, 1968), vol. 2, p. 155.

这位帮派头目及其追随者的义气是他们自身成功的基础，舍此之外，别无他物。结果是，当这种策略有望获得更大的回报时，黑帮分子很乐意捍卫劳工事业，甚至还助长劳资冲突。朱学范向一位外国参访者夸耀劳工新闻社时说，“我们是唯一保护上海工人免于剥削的人”，^①朱学范这么说确实有一定道理。他们甚至建立一间小印刷室，秘密印刷罢工传单，而这些是受到政府严格审查的定期刊物所不敢做的。^②

帮派领导的罢工目的多种多样。我们已经看到，英美烟草公司中的青帮工会领导为提高劳工工资所发动的罢工是怎样快速地与国民党图谋对该跨国巨头增税联系起来的。但是，政府和企业都可能成为杜月笙劳工战略谋划的俘获品。1932年，青帮在法国电车公司煽动了一次罢工，抗议一个新的法国领事和警察总长威胁在法租界内限制鸦片和赌博的不友好政策。^③同年，杜月笙在上海邮政局的追随者发起了一场有政治动机的罢工，这一罢工迅速蔓延到北平、天津和南京的邮政工人那里。尽管罢工者抱怨最近的邮资增长没有带来相称的工资上涨，但是抗议的真正对象是交通部的领导。交通部当时是由汪精卫的“改革派”控制的——该派是“CC系”的对手，而杜月笙和“CC系”关系更密切。^④

这些例子表明了促使杜月笙对劳资纠纷推波助澜的一系列动机。有时，如1927年英美烟草公司中的罢工，杜月笙的目的与国民党政府不谋而合。然而，其他时候，如1932年的邮政罢工，抗议可能针对政府机关本身。通过授权青帮，让青帮成为主要的劳工组织者，国家给自身的

158

① Sues, 1944, p. 75.

② Zhu Xuefan, “Shanghai gongren”, p. 7.

③ *Shanghai chanye yu Shanghai zhigong* (Shanghai industries and Shanghai workers), (Shanghai, 1939), p. 359; Xue Gengshen, “Wo yu jiu Shanghai fazujie” (The old French Concession of Shanghai and I), *Wenshi ziliao xuanji* (June 1976): 157–158.

④ “Kangri zhanzheng yiqian Shanghai youzheng zhigong de douzheng qingkuang” (Struggle conditions among Shanghai postal workers before the Sino Japanese war), *Shanghai gongren yundong lishi ziliao* (1954), pp. 1–30; Shen Tiansheng, “Huiyi 1927–1932 nian Shanghai youwu gonghui qingkuang” (Remembering the situation in Shanghai’s postal workers’ union, 1927–1932), *Shanghai gongyunshi yanjiu ziliao* (1981), p. 29.

权威制造了一个强大的挑战者。其结果与第三世界出现的许多情况一样,当局不得不同当地强人达成妥协。乔尔·S. 米格代尔写到:“这个悖论……是:如果说强人始终得依赖国家资源的支撑来控制社会,那么国家领导人也得始终依赖强人,他们以违反国家规则和法律的方式使用这些资源。”^①

帮派强人在民国时期的权势强大到能够挫败推进劳工政策改革的地步。码头工人的案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不满于黑帮背景的包工头从工人工资中抽取太多,也希望赢得普通码头工人的感激,1928 年南京政府推出了“2-8 规则”,借此承包人抽取的工资比例被削减到 20% 以内,留下的 80% 给工人。这样一个规定,立刻激怒了早已习惯于抽取工人工资更大份额的包工头们。包工头们动用其黑帮的关系网,整个 30 年代都在游说其在政府中的帮派成员,阻止该规定的实施。结果不仅没有如南京的立法者所愿造就一个统一而忠诚的码头工人工会,“2-8 规定”反而为大量敌对工会的成立打开方便之门。^②

国家、黑帮、资本家、工人和外国人之间令人眼花缭乱的互动——他们还同时遭受内部分裂之苦——界定了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上海政治。当国民党上海党部最初授权成立由朱学范领导的总工会时,社会局——是政府而不是政党的一个机构——拒绝承认其权威。直到三年后南京政府出面调停,该局才同意承认这个新的伞形工会。而到那时,劳工组织者所占的总工会 5 位常务委员名额全都是青帮分子。最终,该局自身也被迫向黑帮分子打开大门。到 1936 年,该局四个部门中的三个已由杜月笙的门徒领导。不用说,劳动争议调解处及其下属的调解办公室落入杜月笙掌握之中。^③

杜月笙不满足于通过控制劳工所获得的经济报酬,他还想要获得社

①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Princeton, N. J., 1988), p. 141.

② Number Two History Archives, #720-733, #722:4-233, #722:4-502, #722:4-504.

③ *Da liumang Da Yuesheng* (Big gangster Du Yuesheng) (Shanghai, 1965), pp. 50-51; Zhu Xuefan, “Shanghai gongren”, p. 8.

会荣誉。1931年6月,全上海停顿了好几天以庆祝杜月笙公馆的落成。为了纪念这一特殊的场合,陆京士等人甚至安排当地邮局发行纪念邮票。^①这一盛大庆典(包括彩旗招展的游行、三天的戏剧表演、由上海市市长主持的礼拜仪式以及每餐五万客人的宴会)反映了杜月笙将其雄厚的经济和政治资本转化为相称的文化和社会地位的愿望。^②为达成完美的形象,杜月笙开始身着长袍马褂,并以一种精心设计的书法风格签名,以此掩饰他缺乏正规教育的事实。^③杜月笙获得名望的一个体制性表达方式是1932年恒社的成立,大约1500名杜月笙的有名望的追随者忝列其中。^④ 159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杜月笙成了上海上流社会一个最重要的成员。他的典型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在他豪华的法租界住处的某个地方,款待一两百号宾客,其中多数人非富即贵。^⑤立法院院长孙科大概是登门求助于“杜月笙先生”——这是他被冠以的尊称——的人中名望最高的那位,而孙科造访的目的只是为自己棘手的风流韵事找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法。^⑥

杜月笙地位的迅速上升,是帮派背景对一个人向上海上流社会流动之重要性的一个鲜活例证。杜月笙痴迷于获得社会认可,凸显了这个暴发户从一个卖水果的孤儿到一个政治掮客所走过的历程。20世纪30年代,成千上万围着杜月笙转的追随者,也同样抱着对地位上升和获得名

① Zhu Xuefan, “Shanghai gongren”, p. 5.

② Fan Shaozeng, “Guanyu Du Yuesheng” (Concerning Du Yuesheng), *Jiu Shanghai de banghui* (1986): 221–229.

③ Guo Lanxin, “Du Yuesheng yu Hengshe” (Du Yuesheng and the Constant Club), *Jiu Shanghai de banghui* (1986): 304; Fan Shaozeng, “Guanyu Du Yuesheng”, p. 206.

④ Guo Lanxin, “Du Yuesheng”, pp. 300–320; Zhu Xuefan, “Shanghai gongren”, p. 6; “Hengshe sheyuanlu” (Record of the Constant Club membership), *Jiu Shanghai de banghui* (1986): 369–382; *Hengshe qiuji lianhuan dahui tekan* (Special issue on the spring get-together of the Constant Club), Shanghai, 1934.

⑤ Huang Guodong, “Dumen huajiu”, p. 253.

⑥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reel #56, D-9319.

望的渴望。上海滩这些出身背景不好的人，身份卑微，却雄心勃勃；他们被吸纳到杜月笙的黑帮网络中，希望这是一条通往名利场的捷径。杜月笙的一位前追随者回忆说，和他一样，杜月笙的大部分门徒都是“有一定能力和潜力却在实现愿望过程中遇到巨大障碍的人”。在一个恶劣的社会环境中，追随杜月笙是出人头地的一个合适策略。^①

在工人阶级内部，这些新成员中——虽然事实上每一行业都有——半熟练工人的数量尤占大头。由于在工资薪酬和工作岗位保障上不如技工师傅，同时又比那些缺乏技能的流动工人更渴望城市生活，这些半熟练工人更容易被这些工贼的花言巧语说服。在黑帮和政府的联手推动下，上海劳工的中间势力拥有前所未有的政治价值。在那种大量增加半熟练工人招募人数的生产结构中，这种政治趋势得到了强化。在“南京十年”（1927—1937年）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席卷欧美工业领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上海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人们发现，由雇主培训的非熟练男工人的数量，在中、外资企业中都日渐见长。

160 1937年日本侵华结束了国民党的“南京十年”这一全盛时期。日本人先是控制了上海的中国辖区，并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进而控制了上海的租界区。之后，他们便将自己的秩序强加到中国最大城市的工人头上。直到1945年夏天日本战败之后，国民党才有机会重新夺回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蒋介石四月政变之后推动黄色工会体系的那拨人，在战后都被分配到有影响力的职位上。回归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陆京士，这位前邮政局工人曾以青帮头子杜月笙弟子的身份，赢得了国民党政权中许多引人注目的职位。在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陆京士跟随国民党政府西撤到战时陪都重庆。在那里，他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结下了亲密友谊。1945年，当陆京士奉命回到上海，从他们的敌人共产党手中夺回工人运动控制权时，他与秘密警察的关系被证明是非常有益的。多亏了戴笠为他慷慨提供武器，陆京士才得以在工人中武装一批忠实的追随者。

① Guo Lanxin, “Du Yuesheng”, pp. 306–307.

尽管陆京士在战后劳工圈子中很有影响力，但是他的权力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反对者并非只来自共产党地下组织。表面上，陆京士把共产党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但他实际要面对的是国民党内更阴险的对手。以前与陆京士合作过的许多著名的工会领导人，现在都建立了自己的拥护群体。这些足以削弱他的控制力。^①

战后派系冲突衰弱的一个结果是，许多南京政府十年时期的骨干人物，现在发现自己与国民党政权日益疏远。陆京士的保护人杜月笙在战后返回上海。他希望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事与愿违，或许是为了掩人耳目以撇清自己跟黑帮的关系，蒋介石任命一个杜月笙的对手来领导上海市政府。几个月后，上海市议会成立，杜月笙又燃起了希望，垂涎着议长的职位。他再一次失望了。不过，杜月笙自尊受到最大的一次伤害是在1948年秋天。当时，他的儿子被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逮捕，理由是涉嫌上海证券交易所非法交易。在《中央日报》头版看到自己的儿子戴着手铐的图片，对杜月笙来说简直是忍无可忍。超过一个月时间，这个忧心如焚的父亲既不外出，也不见客。很可能就是这个事件，而不是其他任何事件，使杜月笙在共产党行将接管上海时，决定去香港而不是去台湾。^②

不少上海名流选择留下，将自己的命运赌注押在新生社会主义政权上。上海黄包车行老大顾竹轩与自己的侄儿合作。他的侄子是负责联络上海帮派的共产党干部。顾竹轩成为解放后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代表。^③ 不过，倒向共产党一边的最著名的上海劳工领袖 161

① Mao Qihua, "Luotian jiefang zhanzheng shiqi Shanghai gongren yundong de yixie qingkuang" (A summary discussion of conditions in the Shanghai labor movement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Shanghai gongyunshi yanjiu ziliao*, no. 2 (1982): 1.

② Fan Shaozeng, "Guanyu Du Yuesheng", pp. 239 - 242. 另见 Huang Guodong, "Dumen huajiu", pp. 265 - 267.

③ Gu Shuping, "Wo liyong Gu Zhuxuan de yanhu jinxing geming huodong" (I used the cover of Gu Zhuxuan to carry out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Jiu Shanghai de banghui* (1986): 363 - 366.

是朱学范。早在 1936 年,他就与共产党的地下党接触,抗日战争期间,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战后,尤其是朱学范被敌对的国民党特务行刺受伤之后,他的效忠不可逆转地倒向共产党。^① 随着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成为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第一任邮电部部长。

建立在帮派支持基础之上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高度人格化因此也十分脆弱的政权。帮派关系网方便政府接触工人(尤其是被帮派工头严格控制的非熟练工人),但一旦帮派领袖找到一个更有前途的盟友,同样的关系网可能随时撤回支持。如果说 1927 年的国民党看上去值得下注的话,那么 20 年后的共产党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上海劳工和共产主义国家

尽管倒戈的帮派分子对推动共产党接管上海是重要的,但是共产党在该市的核心支持者仍然是熟练工人。从共产党最初开始动员工人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工厂技工一直是这项事业最热情忠诚的拥趸。因此,对共产党人来说,与其前任国民党相反,是行业协会而不是帮派成为国家发起的劳工组织的原型。

技工支持的重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上海,就像在其他同样被占领的中国领土一样,日本人的投降造成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日伪区控制权的争夺。起初共产党满怀希望:在无产阶级支持之下,他们或许可以掌握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一年,预见到可能爆发内战,中共中央下令组建一支上海工人的秘密军队(上海工人地下军)。担负着招募这支军队艰巨任务的上海劳工干部,首先求助于帮派分子。一些混混一度确实帮衬着招募工人军队最初的人手。不过,他们很快就明白,要维持帮派分子的效忠,需要付出大量的报酬。由于资金短缺,共产党又回到了征募新成员更可靠的来源

^① Lu Xiangxian, *Zhongguo laodong xiehui jianshi*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a Labor Association) (Shanghai, 1987).

上：来自中国南方的金属锻造工。^① 1945年8月23日，超过七千名忠诚战士——其中许多是党员——聚集在一座机械厂，打算举行武装起义，¹⁶² 目标瞄准附近警察局的武器，然后进军市中心，协助新四军解放上海。然而，当天下午，这一起义被党中央命令取消。早在开始批准这一起义的三天前，党中央就收到苏联电报，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和平共处，以维护苏联与中华民国签订的一个新的友好条约。工人军几天之后被解散，那些身份暴露的成员被转移到北方加入了新四军。^②

尽管工人军时运不济，但它的发展说明了上海地下党组织者在窘迫中对上海工人阶级中最忠实盟友的依赖程度。虽然帮派分子可以作为开展武装活动的工具，但熟练工人最终被证明才是愿意为了更高的目标牺牲的人。对中共来说幸运的是，工人阶级中这一部分人的规模在战后大幅增加。成千上万的熟练工人——铜钳工、铁匠及专业技工——在日本投降后从内地回到上海。^③ 除此之外，三万余名中国工人——大部分是来自南方的受过训练的熟练工人——从日本回国。^④

在内战期间，中共上海劳工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分工反映了对工厂技工的高度关注。张启是劳工委员会秘书，也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熟练丝绸编织工人。他被指派负责铁路、航运和棉花（特别注重技工）行业。上海电力公司的一名工人负责水电厂及机械行业。一名印刷工被分配到了

① 我们统计的工人军的69个成员中，只有8人来自中国北方，其他61人来自南方地区。“Shanghai gongrendui duiyuan mingdan” (Name list of members of the Shanghai workers' brigade), 1988, *Shanghai gongyun shiliao*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Shanghai labor movement), nos. 2-3 (1988): 52-54.

② “Zongshu Shanghai gongren dixiajun” (Overview of the Shanghai workers' underground army), *Shanghai gongyun shiliao*, nos. 2-3 (1988): 1-7; Zhang Chengzong, “Zuzhi dixiajun, zhunbei wuzhuang qiye” (Organizing the underground army, preparing for armed rebellion), *ibid.*, pp. 8-12; Zhang Qi, “Huiyi Shanghai gongren dixiajun” (Remembering the Shanghai workers' underground army), *ibid.*, pp. 13-18. *Jiefang ribao*, 1945/8/23, 及 *Xinhua ribao*, 1945/8/28, 报道了这一新闻。

③ 见 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12-1-52, 一份关于这些返回者的名单。

④ 包括许多出自八路军的俘虏，这些人中大部分在被送回之前已经在北海道工作了数年。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11-1, 11-9.

出版行业——负责为工人运动印刷宣传品并在印刷工同行中开展组织活动。他也负责一部分医院、电影院以及其他服务业企业。^①

在中共组织的劳工运动中一直活跃的一位熟练技工，成为1949年之后中国工业体系的设计师。陈云^②早在20年代中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还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一名工人。该书馆中的激进工会（陈云是其中一个积极会员），是印刷行业协会的一个副产物，该协会多年来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③那么，由像陈云这样的人缔造的体系，将大量费用放在福利和安全上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是他们出身其间的行业环境的核心问题。

这种行会传统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最明显，国有企业可是最能代表“新”社会主义体制的产业经济部门。正是这些组织为其员工提供了终
163 身就业、高工资及大量的福利措施。安德鲁·瓦尔德指出，

在国营工业企业中的两千七百万固定工，是产业劳工中充分享受这一福利国家的仅有部分……1981年，他们的平均工资比城镇集体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高出大约40%，是劳动力中其他群体平均工资的两倍多。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许多额外福利、工资补贴、政府补助、本地服务以及国家规定的福利和保险条款……这些工人事实上终身在职。大中型企业通常能够为他们提供伙食津贴、住房、医疗服务以及其他许多服务和福利，这些福利其他地方不可能提供。^④

得益于它带来的额外收入，在国有工厂里有一份工作，就端上了“铁

① Mao Qihua, “Luetan jiefang”, p. 1.

② Nicholas R. Lardy and Kenneth Lieberthal, eds., *Chen Yun's Strategy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rmonk, N. Y., 1983); David M. Bachman, *Chen Yu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Berkeley, Calif., 1985).

③ *Shangwu yinshuguan gonghui shi* (A history of unions at the Commercial Press) (Shanghai, n. d.), pp. 1-2.

④ Andrew G. Walden,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Berkeley, Calif., 1986), pp. 40-42.

饭碗”，相对于不那么可靠也不那么吸引人的是集体企业的“泥饭碗”。^①

在每个省市，国有工厂里工人的特权，由地方工会联合会监督，后者是负责工人福利的国家部门。^② 以上海为例，该市工会联合会是由解放前共产主义劳工运动的活动家主导的，其中大部分出自中国南方技工队伍。

如果说共产主义新秩序对熟练技工来说是梦想成真的话，那么对劳动力群体的其他人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在1956—1957年“百花齐放”运动的激励下，数百个工厂出现了罢工。如弗朗索瓦·吉普鲁(François Gipouloux)发现的那样，这些劳工抗议多半是由“边缘”工人发起的，这些工人是临时工和合同工、在服务部门工作的工人、学徒以及其他在国有企业里没有享受老员工所具有的特权的工人。^③ 尽管这一时期出现了强烈的抗议，但在未来的岁月里，固定工和临时工或合同工之间的差距甚至变得更大了。^④

1966—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严重的斗争在全国各地的工厂里再一次爆发。这种冲突在老工厂里最为严重，因为那里的代际怨恨特别突出。当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时，许多上海的老工人加入了“保守的”红卫兵队伍，鼓动改善工资和工作条件。在上海市委默许下，他们发起了总罢工，连续几天使上海陷入瘫痪。较年轻的工人，包括相当数量的被排除在国家特权体系之外的合同工和临时工，加入了革

① Martin King Whyte and William L.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1984), p. 33.

②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同时也是该市的党委副书记。见 Paul F. Harper, “Trade Union Cultivation of Workers for Leadership”, in John Wilson Lewis, ed.,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Calif., 1971), p. 125.

③ François Gipouloux, *Les cent fleurs à l'usine*, (Paris, 1986), pp. 198–205; 还可见 Lynn White III, “Workers’ Politics in Shanghai”,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6, no. 1 (1976): 105–107.

④ White, “Workers’ Politics”, pp. 107–115.

命造反派队伍。革命造反派指责红卫兵搞“经济主义”，有“行会思想”。^①正如林恩·怀特对没有享受特权的工人支持激进目标现象时所做的解释，

失业工人和合同工起初不可能对历史学家的错误、小说家的意识形态或者音乐家的人生哲学表现出深切的愤怒……然而，失业工人似乎对他们不喜欢的政治领导人有一些看法。当像市长这样赞同“工农体系”的人因其文化政策遭受批评时，在底层无产者内部激起了一些愤慨。广为人知的对“经济主义”的批评，只有考虑到额外的好处通常只提供给正式工人而不是临时工人的事实时，才是可以理解的。^②

听惯了前辈讲述往昔的革命功绩，这些年轻工人，渴望有一个公平机会。“文革”给了他们这一机会。

虽然“文化大革命”的共产主义修辞从长远看可能与技术工人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但是这一运动所要求的物质牺牲绝不是熟练技工所想要的，他们的特权地位早已表现在较高的工资上。

劳工抗议显示群众对现存工业模式的不满，但国家发现，要对一个由各种既得利益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的体制进行有效改革，是极端困难的。在许多方面，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反映了对以前状况的回归。

陈云复出以后重新做的基本安排，为中央计划者提供了一定的优势。虽然陈云不同于毛泽东，为市场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安排了一个重要角色，但它只不过是一个辅助角色。正如尼古拉斯·拉迪和肯尼思·利伯索尔所指出的那样，对于陈云来说，市场“仅仅是集中计划

^① 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Calif., 1978), p. 137; Lynn T. White, III, "Shanghai's Polity i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Lewis, ed., *The City in Community China*, pp. 325 - 370; Parris Chang, 1981, "Shanghai and Chinese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ristopher Howe, ed., *Shanghai* (Cambridge, U. K., 1981), pp. 66 - 90.

^② White, "Workers' Politics", pp. 114 - 115.

的一个补充”。官僚式配置，尤其是对熟练工人方面，仍然是陈云方案的基石。^① 这种安排成为人民共和国头十年经济运行最基本的要件。在此背景下要推进以更多市场为导向的多元改革，是难以实施的。中央政府所需要的稳定的财源，是以国有企业中经验丰富的工人可靠的产出为基础的。此外，通过这种体制拥有特权的工人们，是这种体制长久延续的一个重要源头。

结论

166

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都表明政府对劳工界日益深化的一种介入模式的发展。两者都努力将劳工运动引导到政府控制的机构之下：国民党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工会。两者都在国家政权稳固之后对存在的劳动冲突表现出矛盾心理。并且，两者都成功地设法争取让劳工领袖担任国家官员。

诚然，国民党的帮派基础和共产党的行会基础，显示出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这两个对立党派相互抵触的意识形态，引起了不同的大众反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熟练技工被吸引到共产主义使命之中，而半熟练工人则被国民党的中庸之道吸引。这并不是巧合。

尽管意识形态大相径庭，但这两个政权所面临的共同局限，都指向许多其他新兴政权共有的一个问题，不管这些政权所信奉的政治价值是什么。要把统治加诸高度分散的社会之上，新政权势必与愿意接受它的社会群体达成默契。然而，这种安排可能使国家受制于各种倾向性的关系之中，最终阻碍了更广泛的支持基础。

在提出社会制约的观点时，我背离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他们强

① Lardy and Lieberthal, *Chen Yun's Strategy*, p. xiii.

② 毛泽东在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呼吁用更好的教育和改进领导方式作为前一年爆发的罢工的一个解决方法。在1957年春天，刘少奇提出了更大胆的看法，认为工会和党的官员自身也应参与罢工，以恢复工人的信任。见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 #41889, p. 58.

调的是所谓现代国家不受社会势力影响的观点。在中国研究领域——多亏了中国古代官僚传统和它的当代共产主义经验——人们对国家自主权的强调显得特别突出。这种强调甚至表现在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研究。劳埃德·伊斯曼也许是研究国民党政权最高产的学者，他提出了一个“自主命题”，认为国民党政权“对外在于其政权的政治团体或机构，从来都是不负责任的”。^① 在他的论文中，伊斯曼回顾了理论界关于国家性质的辩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将现代国家视为“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而韦伯传统则将国家描绘为一个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运行的“理性”实体。^②

面对这些不同看法，如查尔斯·布莱特和苏珊·哈丁所总结的，挑战的目标是达成“一个关于国家既不会与社会力量高度一致，也不会与社会力量背道而驰，国家独立于其他社会力量的认知”。^③ 但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相关”社会力量是什么？也许可以说，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内资产阶级确实是国家建设过程中政权必须与之互动的关键“社会力量”。然而，同样的观点适用于像中华民国这样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家吗？对资产阶级总体上早已被剥夺了财产的共产主义中国来说又怎么样？

领导人被迫应对的阶级不仅包括地主和资本家的新旧精英，而且还

① Lloyd Eastman, “New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of the Nationalist Regime”, *Republican China*, 9, no. 2 (1984): 11. 还可见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74)。

② 然而最近，这些“联盟”和“自主”观点被加进了第三种关于允许国家的“相对自主”的观点。Nicos Poulantzas, 1978, *State, Power, and Socialism*, London, 认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意味着国家不可能仅仅反映精英的利益，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相对自主性”的新马克思主义争论。随后，Theda Skocpol 与 Kenneth Finegold 阐述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了相对于工业的“相对自主性”。见他们的“State, Party, and Industry”, in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ed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Ann Arbor, Mich., 1984), p. 184。

③ Bright and Harding, *Statemaking*, p. 1. 关于强国家、弱国家和中等国家的发展类型的有用结果，尤其见 Peter J. Katzenstein,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1 (1977); 及 Stephen D. Kraz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Princeton, 1978)。

包括工人阶级（及其领导人）。历史记录显示，在被外来政党组织者按照合意方式塑造的过程中，中国劳工显示出很高水平的主动性。尽管国民党支持的黄色工会某种程度上能够以服从国家官员的方式确定劳资关系，但工人及其代言人在既定的企业里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如果说相对于共产党的“集中统治”，国民党只是进行“分散统治”的话，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劳工都展示出了强大的抵抗能力。它所见证的工人政治角色的影响力，比新近一代研究劳工历史的学者所能引发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168

第七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埃及的商业冲突、合作与特权^①

罗伯特·维塔利斯

174 在本书“劳工分化：现代中国国家形成的起源”一章中，裴宜理一开始就对工人阶级历史编纂学新近的趋势作了深刻总结。她认为，针对“马克思主义未竟的承诺”，最近几代劳工研究“一直沉溺于这些‘为什么不’的问题：为什么工人们没有形成阶级认同？为什么劳工……没有团结在激进政党周围？为什么工人阶级政党……没有发动马克思主义革命？”裴宜理对这一“研究工人阶级虚弱根源（的学术取向）”感到困惑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研究深化了对任何无产阶级所包含的多元且常常冲突的势力的理解。然而，她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这种“内部分裂”仅仅被理解和分析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行动的“障碍”呢？克服这些障碍不正是劳动者的特殊道路或特殊阶级计划（“真正的‘无产阶级使命’”）信念的一个内在逻辑吗？^②

① 我要感谢所有对这本论文集做出贡献者，并且尤其感谢它的编辑们阿图尔·柯里，乔尔·S. 米格代尔和维维恩·苏，感谢他们对早期草稿的密切和周到的阅读。另外，我要感谢 Joel Beinin, Eva Bellin, Nathan Brown, David Gibbs, Ellis Goldberg, Zachary Lockman, Afaf Marsot, Roger Owen, 和 Robert Tignor, 感谢他们对这篇文章的慷慨和重要的贡献。

② 关于这一评论理论基础，见 Jean L. Cohen,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 Theor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2), and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5)。

类似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分析家也一直纠缠于自由主义没有兑现的承诺。各派殖民和依附领域的理论家提出了一个特殊的“为什么不”问题:为什么本土中产阶级不策划资产阶级革命?比如,M.罗伊和第三国际的其他代表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将帝国主义理论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形成公式化思考框架,持续指导着人们对此问题的思考。自那以后,许多人就强调说,新兴资产阶级中倾向民族主义部分与反对民族主义(买办)部分之间的根本分化,削弱了整个资产阶级在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秩序时扮演“历史角色”的能力。^①

买办主题实质上是人们在资产阶级中寻找其弱点根源时普遍使用的一个变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因为他们的内部是分化的。^② 由于 20 175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证明像无产阶级革命一样难以捉摸,研究者们曾经不得不去解释为什么资本家无法推进他们阶级的历史事业。任何工商业界都存在的、直观表现在竞争性企业和生产部门之间的观点、态度等方面阶级内部分化,与其在劳动史学“新潮流”中发挥着同样的解释功能。换言之,工商业界内部的分化,也主要被理解为集体性和社会性变革的阶级行动的障碍。同样,对阶级内部分化的强调以及阶级内部分化

① 这一论点是 1920 年代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理论支柱。有关开创性批判,见 Alec Gordon, "The Theory of the 'Progressive' National Bourgeoisi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October 1973): 192 - 203; 关于其在革命思想中的持续影响的案例分析,见 the Popular Liberation Forces-Farabundo Martí (FPL-FM) in Tricontinental Society, *El Salvad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Struggle* (London, 1980), 同时引自 James Dunkerley, *The Long War: Dictatorship and Revolution in El Salvador* (London: Verso, 1982), pp. 92, 221。这一学说的民族主义起源体现于其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圈子之外的广泛传播。关于埃及的情况,见 Peter Gran, "Modern Trends in Egyptian Historiography: A Review Artic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9 (1978): 367 - 371, and Robert Vitali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pradors: The Role of Abbud Pasha in the Egyptian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2 (1990): 291 - 315。

② 这一关于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歧的同一观点被用于为研究美国情况的多元方法辩护,并反对在这里关于工商业界权力过大的主张。例如,见 Robert Hessen, ed., *Does Big Business Rule America?* (Washington, D. C: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1987)。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埃及,在工商业界中的“民族的”和“种族的”分歧通常是被突出强调的,其原因显而易见。

后果的推断,也来自对“创造历史”的资产阶级的特殊道路或特殊计划的信念。

此类命题强化了研究埃及的诸多当代文献中的共识:这些文献将埃及工商业界描述得特别软弱,易于分化。^① 按比安奇(Bianchi)所言,埃及的投资者构成“一个高度涣散的资产阶级,阶级分化不仅沿着诸如行业、区域、规模和国际竞争力这些传统的裂隙,而且沿着年龄、教育、道德水准、家庭背景以及——理所当然地——政治忠诚这些同样重要的差异”。^② 然而,任何资产阶级,无论肤色如何,或强或弱,都能符合这一描述。将埃及资产阶级的相对软弱归因于他们的内部冲突和分化分歧的做法,在现实中漏洞百出。这种做法隐含的意思是,越强大的阶级越少因行业利益冲突和其他分歧而分化。与发达工业经济体相比,当前埃及工商业界仍然相对规模小,结构未分化。我的观点是,埃及和第三世界其他地方资产阶级所谓的软弱性,不能简单以阶级内部分化来解释,因为到目前为止,分化是所有资产阶级的典型特征。如果不说明为什么这种分化在埃及显得特别重要,那么这种论点至多是一个分析命题,而不是一种信念行动。

本章以拓展对工商业与政治的研究入手。所用方法是检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及政治经济中本国投资者之间的竞争性冲突以及他们与政权更迭的关系。我们将集中研究1930—1935年间的威权统治。该政权的图谱是由伊斯迈尔·希德基绘制的。他在1930年6月掌权,此后3年,他践踏宪法,实行铁腕统治。1933年9月,埃及国王迫使希德基辞职,与此同时继续支持该政权。接着,英国介入干预,反对宫廷,为“民主转型”(1935年12月—1936年5月)铺平道路。因此,这一时期的政治,

① 关于偏离这一共识的一个综述和评论,见 Alan Richards, “Ten Years of Infitah: Class, Rent, and Policy Stasis in Egyp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 (July 1984): 323—338.

② Robert Bianchi, “Businessmen’s Associations in Egypt and Turkey”, *Annals*, 182 (1985): 147—154; 153. 引自 Robert Springborg, *Mubarak’s Egypt: Fragmentation of the Political Ord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p. 69.

经常被说成是三方——即埃及唯一的大众政党华夫脱党、国王和前殖民统治者英国——之间的权力斗争。^①

正如我最近研究所发现的,激烈的利益竞争和冲突,与这个早熟的威权主义实验期间发生的几乎每一个重大冲突都交叠在一起。这方面特别突出的,是敌对的投资者联盟或“商业团体”联盟为争夺大战之间埃及国家投资资源而展开的竞争。尽管希德基和他的继任者努力利用这些资源来建立和维护商业赞助,但是经济状况限制了政府调节利益冲突的能力。商业对手之间为赢得合同而进行的激烈斗争,是破坏希德基政治联盟、扼杀其政府的生机以及塑造后希德基秩序的关键。 176

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的情况显示,资本主义企业的活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公共资源的获取和占用。埃及的情况完全证实了这一模式。在1882年占领埃及之后,英国监管着埃及第一次资本主义“私有化”实验,并且,自19世纪晚期以来,几乎每一家埃及大型商业和工业企业都依赖于国家直接间接的资助,包括国家资源的转移。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像阿博德集团和埃及银行集团这样的投资商,都成为强大的本国私人资本集聚单位。这些商业对手通过竞争信贷、补贴、执照、合资协议、咨询服务和由国家机构分配的合同来争夺对市场、产业和整个行业的控制权。

在埃及投资者和国家派系之间刻意打造的合作框架中,合作与冲突处于不稳定的平衡之中。这种关系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体系中,反映了工商业的“特权”地位。简单地说,工商业特权根植于市场导向的经济体的动态发展之中。市场将公共权力委托给私有部门。在所有的市场体系中,政府官员经常被迫承认并在某种程度上要主动适应资本家的社会权力。埃及工商业团体和国家派系之间的冲突,反映了资本家的特权地

^① 关于两次大战之间埃及政治的这一传统表征的一个最近的例子,见 Gabriel Warburg, “‘The Three-Legged Stool’: Lampson, Faruq and Nahhas 1936 - 1944”, in G. Warburg, *Egypt and the Sudan: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olitics* (London: Frank Cass, 1985), pp. 116 - 157.

位,并且,冲突的发生是“由于……资本家们在政治经济秩序中享有重要的领导角色”。^① 本章将考察投资联盟,考察这些联盟为稳获国家提供的市场份额而采取的策略,从而为分解和分析国家与社会在一个关键的政策领域中的互动提供一个具体的路径。

吊诡的是,分解性研究使我们能够深入理解以阶级为基础的权力形式。与其他社会势力类似,资本家在采取大范围的集体行动方面面临障碍,其中包括市场带来的冲突和合作的强大交叉压力。当然,市场也赋予一些独特的优势。公司、合资企业、集团和卡特尔都是集体的投资商,它们在大战之间的埃及国家里,有机会定期地、直接地并有效地接触政治当局。投资者一般不必为了自己的诉求能够被倾听而被强迫合并更大的集团之中。毋宁说,埃及资本家善于在诸多小领域中采取形式多样的集体行动。历史地看,正是在这些领域中,这种集体行动使得开启像再分配这样的议题显得顺理成章。^② 一旦我们对这样的命题——埃及资本家或企业家尝试过但“未能”实现许多理论家所想象的“阶级任务”——释怀,我们便能对这一新兴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对阶级内部分化的性质和意义以及对商人寻求提升其利益所经由的渠道有更清晰的理解。

埃及工商业集团和补贴性进口替代部门的扩张

对埃及工业化进程有一种普遍的想法是把它看作一场拔河比赛。一种力量特别卖力地拉动经济向前发展,而其他力量则努力将其拖回来。这幅图景在对大战之间埃及经济的最新研究中很常见。罗格斯大学的政治学家埃里克·戴维斯对埃及银行集团背后的“本土埃及人”组

① Charles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 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 179.

② 见 Theodore Lowi, “American Business, Public Policy, Case Studies and Political Theory”, *World Politics*, 16 (July 1964): 677–715.

成的联盟十分推崇,说该联盟有意“成为缔造埃及经济中现代工业部类的原动力”。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罗伯特·提格诺(Robert Tignor)打破了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俗见,辨别出一个“充满活力且远见卓识的”非埃及籍居民商人群体,声称这些人是“结构性经济变革的真正动力”。两位作者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实业家”最终还是输掉了拔河比赛。就像埃及银行集团未能“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有活力的机构……并创建一个自我维持的工业部门”一样,“埃及工业资产阶级在埃及的政治经济中从未占据上风”。其他社会力量,像“外国资本”和本国的“地产巨头”,想方设法打败他们。^①

这种解释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埃及三角洲的城镇和村庄——两次大战之间,埃及投资者在这里经营地产、交易棉花以及开纺织厂——发生过此类巨大的冲突。两次大战之间,该国最著名的产业领袖——阿巴德·帕夏(Abbud Pasha),在南部沿着尼罗河种植糖料作物,同时企图筹建水电站。即便是埃及银行集团,表面上投资工业“以减轻埃及对长绒棉生产的经济依赖”,似乎在其开拓产业之路上也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在其成立的10年之内,随着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纺织制造企业的成立,埃及银行集团也发展成为该国最大的棉花出口商。^②

历史学家普遍发现,他们很难将对埃及工业发展的解释,从一战之后民族主义政治——尤其是1919年3月全国性的反英国殖民主义运动——进程中超脱出来。1920年埃及银行集团的成立,“正是民族独立

① Eric Davis, *Challenging Colonialism: Bank Misr and Egyptian Industrialization, 1920 - 194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引自 pp. 3 and 9; Robert L. Tignor, *State, Private Enterpris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gypt, 1918 - 195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52, 246.

② 引自 Davis, *Challenging Colonialism*, p. 5. 关于棉花出口商的排名,见 George Pilavachi, ed., *Egyptian Cotton Year Book for 1931 - 1932* (Alexandria: Societe de Publications Egyptiennes, 1932), p. 199. 关于背景,见 Robert L. Tignor, “Bank Misr and Foreign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8 (1977): 161 - 181. 对埃及1919年后经济的传统历史学著作把这一在银行集团投资策略中的明显矛盾看作一个需要解释的根本政治问题。我挑战这个假设,并不完全采信对其进行“理论化”的熟悉形式。

斗争如火如荼之时,某种意义上也是民族独立斗争的组成部分”,留给我们的英雄主义的叙事以及诸多分析性问题,分析这些问题还必须搞清楚其政治经济含义。^①比如,历史解释有一个奇特的对称性。鉴于民族主义运动领袖未能实现他们“完全独立”的目标——尽管英国人于1922年进行了名义上的权力移交,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无从实现其所谓的“经济独立”目标。^②

这种论证路径,为1954—1961年间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政权对控制经济的工商业利益集团的攻击提供了理论辩护。^③尽管把埃及工业痛苦诞生的故事说成民族史诗中的一章是轻而易举的,并且,在1952年后埃及的政治背景下,无疑也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说法对解释1922年—1952年几十年时间里埃及资本家的构成和活动而言,是一个不可靠的指引。认定一个有抱负的“埃及工业资产阶级”本身就很成问题,因为一战以前就开始建立的相对大规模的国内产业,本质上仍然是经营它们的本地投资者的一个附属投资部门。换句话说,埃及最著名的实业家,同时也是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地主、棉花出口商、抵押贷款银行家、投机者和买办。他们成功地整合了不同的商业活动,因此缩小了竞争性行业中优先事项的潜在冲突范围。埃及产业的有限扩张补充了、而不是破坏了农业出口经济。^④1920年之后,埃及工商业界内部最基本最

① Joel Beinin and Zachary Lockman, *Workers on the Nile: Nationalism, Communism, Islam, and the Egyptian Working Class, 1882 - 195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0.

② 见 Marius Deeb, “Bank Misr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Local Bourgeoisie in Egyp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2 (October 1976): 69 - 86; 82. Tignor, *State, Private Enterprise* 是他对在独立后十年里的经济的解释加的标题“High Hopes Dashed, 1921 - 1929”。

③ 在对这一点的思考中,我受到了有关编史评论的影响,见 Asim al Disuqi, *Nahw fahm tarikh misr al iqtisadi al ijtimai* (Cairo, Dar al kitab al ami'i, 1981)。关于使得在许多国家的左派接受“国家改良主义”并“使他们与国家权力的显然无限增长相调和”的意识形态因素的讨论,见 Nigel Harris, *The End of the Third World: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and the Decline of an Ideolog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引自 p. 122。

④ 关于被详尽发掘出的一个类似的情况,见 Maurice Zeitlin and Richard Earl Ratcliff, *Landlords and Capitalists: The Dominant Class of Chi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持久的冲突形式,是相互竞争的资本家们为支配这些新的尽管是有限的积累利润机会而开展的斗争。

工商业集团冲突

两次大战之间埃及工业投资者的有限目标一旦澄清,传统的阶级解释法的问题就很容易看到了。尤其像这样的想法——例如,“土生土长”资本家与“外籍定居”资本家之间的分化妨碍了集体行动的能力,进而导致该阶级的软弱以及“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胆怯”——完全是同义反复。资产阶级软弱的主要证据是他们“未能”在产业转型或者支配其他势力中组织起来,并采取行动促进他们可以盘算的集体利益。^①

诚然,埃及工商业界是分化的,并且,工商业者的政治也反映了这些分化,但这只是对现有资本主义体系基本特征的简单认识:绝大多数领域的投资者都是分化的。^② 两次大战之间埃及投资者常规性政治活动,按多样化的企业、部门或阶级阶层这类竞争者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和谐来理解,可能会更好。同时,工商业者相对其他社会群体所拥有的特权地位——在财政资源、接近决策者机会和信息意义上——使得投资者更容易通过多种多样的集体行动形式来降低成本。^③ 我把工商业集团界定为 179
投资者联盟合力操纵不同经济部类的公司,以此作为大战之间利益整合

① Tignor, *State, Private Enterprise*, pp. 246–247; Deeb, “Bank Misr”, pp. 80–82, “新的地方资产阶级遭受着社会和政治怯懦的痛苦”并且“未能实现其经济独立的目标”。

② 然而,在埃及资本家之间的诸多分化,是广义的资本主义集体行动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包含制糖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其他公用事业在内的该国最大雇主的跨行业协会——产业联合会(the Association of Industries)在1922年成立之后,紧接着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工人阶级政治运动。见 Beinun and Lockman, *Workers on the Nile*, pp. 83–158; Deeb, “Bank Misr”, p. 74; and Robert Bianchi *Unruly Corporatism: Associational Life in Twentieth Century Egyp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68–69。

③ 见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and Thomas Ferguson, “Party Realignment and American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Investment The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Paul Zarembka, ed.,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 6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1983), pp. 1–82。

与集体行动的基本单位,而不是坚持那种虚幻的观念,把“企业”等同于“个人”或者把在政治经济中活动的大多数投资者简单看作像其他想象中的个人那样只代表他们自己。埃及最著名的投资者联盟是埃及集团,一个由商业民族主义者和政论家塔拉特·哈尔伯(Tal'at Harb)领导的紧密联系的投资者集合体。这些投资者在1920年成立了第一个完全由埃及人控制的金融机构——埃及银行。^①他们获得接触1922年后埃及国家的特权,并利用政治影响力将该集团打造成一个融商业信贷、融资抵押、棉花出口、建筑、航运、建材、旅游、纺织制造、化学药品、保险和房地产等诸多业务于一体的巨无霸。

然而,其他埃及投资者也想在这些市场中分得一杯羹,这引发了埃及集团和以后的历史学家没完没了的争论。最成功的竞争对手是格拉斯哥的一个训练有素的工程师——艾哈迈德·阿卜杜(Ahmad Abbud)。他在1924年开始了作为商品和服务承包商的职业生涯。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阿卜杜和合伙人建立了一个在每一个经济部门都有股份的商业帝国,包括建筑、航运、贸易、服务业和制造业。艾哈迈德集团包含了一些当时埃及最大和最知名的企业,包括埃及开罗邮件行、埃及食糖和炼油公司(一个国家支持的垄断公司)、埃及综合公司、埃及不动产公司,以及埃及肥料和化学工业公司。

这些投资者联盟的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有常规化可预约的渠道接近政治决策者,这一点与埃及绝大多数人有云泥之别。这一点丝毫没有“不正规”“守旧”或者“埃及特色”:事实上,它是资本家联合起来进行利益表达的最常见形式之一。^②埃及那些头牌的工商业集团,将亚历山大

① 关于银行集团唯一最好的记述可见 Davis, *Challenging Colonialism*。

② 其他形式包括公司、卡特尔、信托、行业协会(例如银行协会)、全行业协会(商会,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和跨行业协会(一个雇主联合会, the Business Roundtable, 等等)。关于它的详尽阐述,见 Claus Offe and Helmut Wiesenthal, “Two Log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oretical Notes on Social Clas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in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vol. 1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1980), pp. 67–115; and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市和开罗市里的少数族裔(希腊人和犹太人)中的望族团结起来,在世纪之交作为地方工商业界内部最重要的利益整合单位横空出世。^①

他们的影响力来自于对资源的控制,包括对通常由国家权力和由投资者与官僚政客共同打造的政治联盟支撑的市场的控制。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他们与埃及地主一道,操纵着一个几乎不受监管的工商业和农业出口经济。在埃及最大规模的工商业企业中,工商业集团是地方性的合作伙伴。故而,毫不奇怪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埃及统治当局的高官们也与这些商业集团联手,制定一项经济多元化的战略,其中包括附属于出口部门的国内制造业发展战略。1918年,该规划方案获得了国家认可。那一年,政府当局发布了商业和工业委员会和谐法,而该委员会是一个经内阁任命、由伊斯迈尔·希德基主持的小组。^② 180 伊斯迈尔·希德基当时是公务员队伍中的耀眼之星。^③

阿卜杜·埃及集团和其他埃及新生代投资者,采用的是早期资本家的那种多元化投资策略,在商界内部迅速占据控制地位的同时,也迅速扩大了产业,迅速使既有的产业部类埃及化。希德基委员会的报告,制定了制造业投资顺应有限的进口替代工业化(ISI)计划。该报告认识到,在基础设施建设、引进机床和技术以及保障最有雄心的企业融资等方面,需要与外国资本合作。

19世纪80、90年代,英国控制下的埃及政府通过私有化和相关公共资源转移,承载着缔造一个地方性的主要是非埃及人的资产阶级任务

① 这一讨论所依据的记述可见 Robert Vitalis, *When Capitalists Collide: Business Conflict and the End of Empire in Egypt*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即将出版)。

② 有5个商人任职于九人委员会。包括 Talaat Harb 在内的其中三个是强大的少数派 Suares 集团的合作人。第四个人代表着在开罗拥有燃气特许权的法国公用事业托拉斯。第五个人是一个主要的埃及棉花出口商。见 Commission du commerce et de l'industrie, *Rapport* (Cairo: Imprimerie Nationale, 1918)。关于概要,见 Charles Issawi, e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1800 - 1914: A Book of Read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Midway rpt. ed., 1975), pp. 453 - 460; and Tignor, *State, Private Enterprise*, pp. 55 - 58。熟悉传统解释的读者将马上辨认出我的总结中的修正主义推力。

(更不用说伦敦的银行家、曼彻斯特纺织业主和布鲁塞尔金融信托机构的利润率了)。那个时代的工程奇迹,像阿斯旺大坝的建设,在埃及受到颂扬,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作为租金和刺激积累的一个巨大来源,也因为在此过程中不断地改变着城市和农村的面貌。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包括有抱负的埃及投资家在内的工商业界,以“竞争性独立力量”面目并按可预见的方式组织到埃及国家之中,提出雄心勃勃的新公共工程计划,包括城市发电厂、埃及三角洲电气化、阿斯旺大坝的加高和利用尼罗河水经营新产业。

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埃及商人没有参与到两次大战之间的主要政治事件,以下的类似解释(① 埃及希德基威权政权的兴衰;② 阿卜杜集团开发国内电力和硝酸行业的努力),都已提供了相对紧凑的细节。寻求这种叙事策略是为了继续证明我对埃及的相关主张,并拓展这样的观点,即在由寡头有组织地把控的市场经济中,围绕稀缺资源的冲突何地、何时、如何发生。

以下概述,对那些不熟悉后殖民时期埃及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人,或许有所助益。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阿卜杜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埃及承包商。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对华夫脱党的第一笔投资。华夫脱党是一个民族主义派别联盟,在 1919 年迫切追求埃及独立。然而,阿卜杜的财富暴涨,却是他把投资转移到支持一个独裁者而不是华夫脱党之后的事情了。他的主要目标是获得政府对阿斯旺大坝发电工程并用此电力在埃及生产硝态氮肥项目的支持。

伊斯迈尔·希德基是一个准独裁总理,1930 年在阿卜杜的支持下巩固了权力,但最终在一些关键行业的冲突中,他站在阿卜杜的竞争对
181 手一边。未能获得阿斯旺项目的阿卜杜,转而支持其他派系。特别是他加入宫廷势力一方后,成功地削弱并最终在 1933 年推翻了希德基政府。不过,他在国内、重要的是在国外——英国的议会舞台上四处插手阻扰政策,树立了一个牢固的有着巨大的敌对利益的反对联盟。

为扭转经济地位下降的局面,阿卜杜支持重建希德基—宫廷联盟。他没有成功。相反,宫廷同意回归1923年宪法,同意全国大选,也乐见华夫脱党重新掌权。政权更迭让阿卜杜的竞争对手巩固了在竞争阿斯旺项目和其他国家资源中的地位。

阿卜杜本来已经组建了一个强大的联盟来推动阿斯旺项目。该联盟包括他的当地投资伙伴;战略部门和宫廷盟友,其中可能还包括国王本人;诸多强大的外国制造业、金融业和工程界公司。然而,该集团在1930—1933年的一轮谈判中还是没能获得合同,并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地位被一个围绕着英国电气公司、华夫脱党的核心成员、财政部长和当地资本家而建立起来的巨型的竞争对手集团所霸占。像阿卜杜集团一样,这个集团的力量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与统治埃及三大政治巨头中的两个巨头之间的战略关系——这里指的是英国驻节专员公署和华夫脱党。

建立威权统治:商界与希德基政权

三个基本因素导致野心勃勃且冷酷无情的伊斯迈尔·希德基于1930年6月被任命为埃及总理。第一,直接把希德基推上总理宝座的埃及国王,想推翻1923年宪法,以强化宫廷在新的“自由”秩序方面的权力。尽管埃及形式上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其整体政治制度对宪法和议会仍抱持一种矛盾姿态。福阿德国王把宪法和议会看作是对自己家族的世袭权力和特权的威胁。该国的主要政党——华夫脱党捍卫自由主义政治,以此为武器对抗英国的外来侵犯和宫廷对行政事务的不断干扰。掌权时,华夫脱党和另一个由商人、专业人士和地主组成的较小派系,灵活地解释宪法。他们这样做只是效仿英国而已,但英国却进行干预,将1924年上台的埃及有史以来第一届民选政府,在一年内赶下台。

这种独有的帝国主义特权——干预——是希德基上台的第二个因素。继1930年初与华夫脱党政府的一轮条约谈判失败之后,英国也在182寻找一个替代政治领导,只要他愿意保护英国在埃及的持久利益,并能

批准通过与前殖民当局签订的同盟条约。第三个因素——英国和宫廷在这方面的投资并不比埃及地主和商界少——是折磨埃及的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威权统治是1929年经济萧条的一种反应。^①

如果对希德基政权上台原因的解釋是简单明了的话,那么希德基主政时期的许多事情却是争议不断的,尤其是该政权的支持基础、导致支持被削弱的因素以及1933年9月该政权垮台背后的原因。^②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家阿发佛·马索特(Afaf Marsot)就断言,希德基“没有获得人民的支持,事实上,正是没有任何支持才使得国王允许他主政”。然而,只有当人们漠视英国驻节专员公署、官僚机构的战略部门、寻求缓解棉花价格下跌和利率上升的耕种者、银行家以及其他陷入困境的行业时,这种说法才可信。^③

最迟从1928年春天开始,部分国内商界和外国资本就积极活动,拥护建立一个以宫廷为中心的权威联盟。该联盟起初以穆罕默德·马哈茂德为核心。他解散议会,中止宪法,在接近16个月(1928年6月—1929年10月)的时间里发号施令。毫不奇怪,商人们对马哈茂德的经济计划大为赞赏。正像伦敦的《泰晤士报》很直白的提示那样,马哈茂德选择了“将国家的能量从政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④

① Afaf Marsot, *Egypt's Liberal Experiment: 1922 - 193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p. 132 - 137.

② 这一讨论引自 Mona Abul Fadl, "The Sidqi Regime in Egypt (1930 - 1935): New Perspective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5; Marius Deeb, *Party Politics in Egypt: The Wafd and Its Rivals, 1919 - 1939* (London: Ithaca Press, 1979); Tignor, *State, Private Enterprise*; Jacques Berque, *Egypt: 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Praeger, 1972); Abd al Azim Ramadan, *Tatawweur al haraka al-wataniya fi Misr min sana 1918 ila sana 1936*, 2nd ed. (Cairo: Maktaba Madbuli, 1983); Marsot, *Egypt's Liberal Experiment*; and Panayotis Vatikiotis, *A Modern History of Egypt*, 2nd 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③ Marsot, *Egypt's Liberal Experiment*, p. 138. 关于希德基在“金融界”和“开明的埃及人和外国人”中间的支持,见 *New York Times*, 14 September and 2 November 1930, 12 April 1931; and Berque, *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 p. 441.

④ *Times*, 29 October 1928. 关于投资者的看法,见在 Mahmud, Yahya 集团和其他亚历山大港投资者中间召开会议的解释, *Times*, 6 November 1928.

马哈茂德当局将国家电力资源的扩张置于“改革”议程的核心，而希德基政府在1930年这样做过。从1920年代早期开始，当地投资者就与部分国际电力工业的竞争对手合作，致力于推进多项电气化工程项目。主要的项目有三个，其中每一个都关联着一个不同的外国—本地资本联盟。第一是阿斯旺电力计划，集中于埃及南部(上游)阿斯旺大坝的电气化。大坝发的电用于附近省份灌溉工程并生产化肥。另一个方案倡议埃及三角洲——从开罗到地中海向北延伸的扇形区域——的电气化。三角洲方案的主要电源是在亚历山大附近建造一座蒸汽驱动厂。第三个计划以在开罗北部的舒卜拉建设一座新的“超级”发电站为基础。舒卜拉方案是由外国资本家设计的，他们控制着埃及的能源部门，试图阻止其他外国公司来挑战其垄断地位。

表1 1928年埃及电气化方案

计划	本地投资者	外国合伙人
三角洲方案	埃及集团	英国电气公司 冈茨丹乌比斯公司 西门子公司
舒卜拉方案	埃及集团	昂潘(Empain)集团 ^a
阿斯旺方案	阿卜杜	达德利·多克尔(Dudley Docker) ^b

a 在开罗被称为昂潘(Empain)集团的电力投资者，是一个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金融信托公司(the Schneider-Jeumont-Charleroi 集团)。

b 多克尔(Docker)是一个英国金融家，领导一个国际财团，包括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其子公司联合电器工业公司(英国)，以及与之密切联系、活跃在布鲁塞尔的被称为索菲娜的工程装备公司。

表1涵盖了当地资本家、国际公司间的关系，以及在希德基上台之前与上述投资者有重要关联的工程项目。国际竞争者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占领更多的埃及市场份额，而这些不同项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英国电器公司和其他公司最终在支持各种不同项目时采取的是灵活机动的政策。本土的埃及集团一直很有策略地把自己定位在那些国际竞争对手的位置上。1928年，埃及投资者开始低调接触昂潘集

团,后者是一家总部在比利时的金融信托公司,主导着埃及的电力和运输市场。两年后,他们与昂潘合资组建了一家建筑公司并合伙建立舒卜拉电站。同时,埃及集团核心人物也与国际竞争对手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匈牙利制造商甘兹(Ganz)、德国电气巨头西门子以及财政困难的英国生产商英国电气公司。^① 电气行业竞争如火如荼之际,埃及银行在1929年5月发布了预测性的研究报告《国内产业的建立》,篇幅有200页之多。在以国家利益为名表达了要求国家支持其规划好的新的合资企业以及其他计划之外,该银行侧重表达了发展水力发电、化肥生产、新的运输企业和铁路电气化项目的决心。随着马哈茂德政府的垮台,埃及银行集团深化与重新掌权的华夫脱党的行政部门的联系。^②

在这些基建项目中,埃及集团的主要本土竞争对手是艾哈迈德·阿卜杜,这个承包商在其早期职业生涯中,就在精心培育与华夫脱党和英国工程师及设备制造商的关系。不幸的是,阿卜杜在1927年失去了华夫脱党的政治支持,当时,他选择的候选人在寻求接管该党时失败了。从那一刻起,他把大量筹码压在独裁者身上,把自己的精力一半花在扶持伊斯迈尔·希德基竞争总理职位上,一半花在阿斯旺大坝电气化计划上。我集中讨论阿卜杜在英国和埃及政治舞台上的各种干预行为,意在为两次大战之间经济利益、利益表达的策略以及相互竞争的埃及投资者的政治能力提供更多的理解渠道。

① Vitalis, "Theory and Practice", pp. 301 - 302; Clement Levy, *The Stock Exchange Year Book of Egypt*, 1943 ed., p. 695; F0371/12358, J1939/758/16, Memorandum of the 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 13 July 1927; J2449/758/16, Henderson to FO, 26 August 1927; *al-Waq'a'i al-Misriya*, 12 and 19 January 1928; *Pesti Tozsde*, 20 September 1928, translated in F0371/13138, J3032/130/16, 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 22 October 1928; F0371/13877, J1391/1056/16, Lloyd to FO, 5 May 1929; J1476/1056/16, Lloyd to FO, 15 May 1929; F0371/13870/J2382/297/16, 封卷的备忘录来自 Larkins, 8 August 1929.

② Tignor, "Bank Misr", p. 170; F0371/13870, J1664/297/16, enclosing dispatch from Turner to 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 22 May 1929; F0371/14636, J1433/130/16, enclosing dispatch from Turner to DOTT, 8 April 1930, "关于马哈茂德家族成员占据埃及政府职位的备忘录".

政治投资和经济回报

在希德基正面攻击宪法及其拥护者的初期,政治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他于1930年6月20日宣布内阁成立。第二天,他宣布中止议会。在6月28日,艾哈迈德·阿卜杜访问了在开罗的英国驻节专员公署(1936年称为大使馆)的官员,报告了他即将作为新政权非官方的代表动身前往英国访问。他想代表希德基本人会见英国国务大臣。到达英格兰之后,他整个7月份始终都在坚持自己的宣传使命,而那时,亚历山大发生了血腥的反政府骚乱,造成21人死亡,步兵占领了城市中心,英国军舰驶近港口。阿卜杜在秋季再一次前往伦敦,携带着希德基“形式和实质都反动”的新宪法,提前通报英国。^①

阿卜杜替希德基所做的这些积极努力,很快就获得了回报,其中包括任命阿卜杜集团的一名成员为希德基新“政党”——一个成立的目的是为希德基提供无限制支持的组织——的秘书长。更有意义的是,希德基在7月改组内阁时,任命了阿卜杜的一个前员工和亲密的盟友易卜拉欣·法赫米·海亚姆为公共工程部长。阿卜杜以此确保了自己作为经济中一支强大的新生力量的声誉,当时海亚姆正全力以赴变更阿斯旺大坝工程的合同。原来的建设者被阿卜杜和他的合作伙伴取代了。^②

在近十年时间,作为承包商、海外制造业利益的委托代理商以及宗主

① FO371/14616, J2235/4/16, Cairo Chancery to Egyptian Department, 29 June 1930; J2360/4/16, Abbud to Selby, 10 July 1930 and FO Minute (Selby), 15 July 1930; FO371/14620, J3167/4/16, Telegram from Hoare, 22 September 1930. 阿卜杜寻求英国不会干涉希德基“改革”的保证。伦敦的官员告诉议会他们不会成为任何“选举法修改”的部分。New York Times, 17 July 1930. 如果这一信息真的意在阻止希德基,那么它也许应该被表达得更加强烈。关于1930年10月宪法的细节,见 Deeb, *Party Politics*, pp. 241–242。描述出自 Berque, *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 p. 442。

② Deeb, *Party Politics*, pp. 278–281; Robert Keith Middlemas, *The Master Builders* (London: Hutchinson, 1963), pp. 305–306; FO 371/14633, J3291/93/16. Hoare, 4 October 1930; J3459/93/16, Hoare, 11 October 1930; J3558/93/16, FO Minute (Mack) 29 October 1930.

国金融家的本土合伙人之后,阿卜杜在希德基主政期间一跃成为显要人物。1931年2月,他因“公共服务”获得了帕夏称号。^①并且,尽管在运河疏浚和委托代理商业中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他还是把业务扩展到公司推广、基建投资、航运、城市交通以及短暂的石油经营等领域。此外,在与英国工程公司、制造商和他的朋友达德利·多克尔——“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家之一”——合作中,他开始将他的业务扩展到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土耳其。^②

毫无疑问,阿卜杜还想得到更多。他寻求政府批准数百万英镑的电气化合资企业项目,包括建在阿斯旺的发电厂和化肥厂。这个项目以及阿卜杜的其他企业面临着严峻的竞争,一批同样很有能耐并且在政治上
185 得势的商业竞争对手,对国家有限的资源虎视眈眈。例如,在考虑建立一家纺织企业时,他所面对的市场是由埃及集团和萨尔瓦格斯集团正式组建的企业联盟的垄断。他在1933年组建的航运合资企业,面临着早前由亚海姆集团与埃及集团成立的合资企业的对抗,后两个集团在政府中各自都争得了美差。亚海姆是希德基内阁的组成人员。希德基的交通部长曾不遗余力地为埃及银行的航运子公司效力。随着阿卜杜进入开罗拥挤的运输市场,总部在比利时的昂潘集团就曾试图将他挤出去。^③还有,几乎每位投资家都对电气化业务青睐有加,包括希德基本人。

电力行业的冲突

各方对电气化业务的浓厚兴趣并不难理解,其原因有:一个方面,对国际制造商和服务企业而言,全球范围内的市场逐渐萎缩;另一方面,它

① Pasha, 帕夏,旧时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武官的称号,置于姓名后。——译注

② *al-Ahram*, 6 February 1970; R. P. T. Davenport-Hines, *Dudley Dock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Trade Warri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③ 关于控制纺织业的卡特尔,国家的支持和阿卜杜对它的早期兴趣的证据,见 Robert L. Tignor, *Egyptian Textiles and British Capital, 1930-1956*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of Cairo Press, 1989), pp. 26, 35; 关于航运业务合资企业,有关一系列文件见 F0371/13878, 1929; and F0371/15417, J699/162/16, Baker (Board of Trade), 6 March 1931; 关于 Duss, 见 Davis, *Challeugrug Colonialism*, p. 141; 关于交通运输业,见 Vitalis, "Theory and Practice", pp. 298-300.

有丰厚的垄断租金。拟议中的阿斯旺项目风险巨大。阿卜杜的国际合作伙伴拟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该项目将耗资 3000 万英镑，包括一个以阿斯旺为中心的精巧的生产—传输—分配网络。对如此巨大的一笔风险投资而言，取得稳定的政治支持是关键。尽管多克尔完全有理由能够确保伦敦的支持，但开罗的局面不容易掌控。

多克尔和阿卜杜向希德基政府递交了一份“临时”计划，以便让埃及政府有时间去研究阿斯旺方案。他们提议，工程起步阶段，在亚历山大和开罗建造两座蒸汽驱动发电站，并在三角洲和开罗南部地区建立一个传输网络。这个策略对希德基是透明的，就像后来他向英国高级专员所说的那样。如果阿卜杜和他的盟友执行了三角洲方案，这将充当阻挡潜在竞争对手的一个有效屏障，造成事实上的垄断。^①这也正是其竞争对手昂潘集团的目标，后者从 1929 年就开始资助希德基，希德基也是该集团公司电车企业的董事会成员。

阿卜杜有机会接触一份内部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简单介绍了比利时人为扩大其对埃及电力行业的控制而制定的计划。这些文件也凸显了希德基的“宝贵支持”。希德基的价值在他于 1930 年 6 月上台后几周就被证明了，他当时精心策划了一份有关新工厂的保密的但具决定性的最终协议。英国高级专员觉察到围绕此事的秘密，他大胆断定，这份协议对英国在电力行业中的竞争的利益是一个打击，并且有些天真地建议多克尔，设法凭借自己的比利时人脉关系接管昂潘集团。^②

① Davenport-Hines, *Dudley Docker*, p. 211; F0371/15420, J357/357/16, FO Minute, 4 February 1931; and J1606/357/16, Lorraine to FO, 7 May 1931.

② 见 F0371/11646，来自 Abbud 给 Turner, 27 May 1930 的信，和标题为“Notes from Egypt” and Societe Egyptienne d' Electricite, 25 March 1930 的附带文件；J 1978/752/16, 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 17 June 1930; J2595/752/16, P. Lorraine, Cairo, 31 July 1930; and J2797/752/16, P. Lorraine, Cairo, 6 August 1930。伦敦方面怀疑多克尔与在布鲁塞尔注册的公用事业公司索非娜的美国出生的工程师 Dannie Heineman 的关系，但他们仍认为合资企业“是英国的”，最终是因为多克尔的假定的英国电器制造商的物主身份。根据多克尔的传记作家所言，“美国对 Metrovick 的控制仅被一个有限的圈子所知”。见 Davenport-Hines, *Dudley Docker*, p. 180。

在阿卜杜企图进入开罗运输市场时——那是昂潘集团电车线路的专属区，比利时资本家对他实施了第二次也是更有杀伤力的打击。阿卜杜和埃及同盟投资家联合英国制造商一道，在开罗开辟公共汽车服务业务。比利时人试图从阿卜杜集团手中夺取该公司的控制权，或者迫使其破产，他们动用了自己内阁中的盟友，把阿卜杜带到谈判桌上。在向比利时人屈服之前，阿卜杜在1931年一整年的时间里都在苦苦努力，抵挡对方的收购图谋。结果，昂潘集团还是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并迫使阿卜杜将公司的利润用来共同经营电车，其中80%的收入归他们。昂潘集团一获得这次胜利，希德基内阁突然就变成了和事佬，批准了该公司的特许权，并且引导参议院在1932年夏天通过了该特许权。^①

尽管在幕后为交通和电力市场的地位争得你死我活，阿卜杜在1931年还是继续支持希德基。表明他继续保持忠诚的最重要的证据是他在1931年春末所承担的外交使命。在一场伴随着暴力和流血的舞弊大选（1931年5月）之后，阿卜杜再度回到伦敦，安抚希德基政府的商界支持者。^②

尽管如此，档案记录还是揭示了阿卜杜与不同政治官僚派系联盟背后所潜藏的紧张关系。很明显，希德基需要阿卜杜的支持，因为他看重阿卜杜在伦敦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被认为是阿卜杜通过经营层层叠叠的业务联系取得的。然而，阿卜杜的支持是基于国家对他的阿斯旺投资事业的支持。出于同样明显的原因，英国外交部重视阿卜杜与英国制造商和工程公司的联系，然而官员们开始反对他的用来支持这些商业利益的政治动议。说白了，决策者被这个埃及商人激怒了，因为他的行动

① FO371/16123, J1127/429/16, Turner to 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 19 April 1932, 有关封卷的备忘录，见 Larkins, "Recapitu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Cairo Motor Omnibus Concession"; *Egyptian Gazette*, 7 July 1932; *al-Jarida al-Ra'smiya*, 14 July 1932; Vitalis, "Theory and Practice", pp. 298–300.

② FO141/1766, 80112/31, Turner to Murray (FO), 21 May 1931. 关于围绕着选举的气氛的描述，见 Berque, *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 p. 143; Vatikiotis, *History of Egypt*, p. 288, and Deeb, *Party Politics*, pp. 243–244.

越出了外交部传统上分配给他或任何其他埃及人的限定范围。在他1931年5月伦敦之行以后,外交部便设法破坏阿卜杜与埃及总理的统一战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当局的“腐败”案牵涉到阿卜杜以及有关他坚定不移地优先“服务”英国的传言在埃及反对派媒体和其他渠道中广为传播的时候,阿卜杜开始发现,自己的商业投资项目已无法顺利地获得伦敦方面的外交支持了,这反映出几年来埃及外交部对他的敌意持续增加。^①与此同时,希德基本人也正着手设置一系列更强大的障碍,阻止阿卜杜获得阿斯旺合同。随着竞争压力的加剧,希德基的分赃联盟开始瓦解,这位总理被迫在国家稀缺资源的分配方面做出代价高昂的选择。

阿卜杜在交通和电力行业中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地位日益弱化,促使他在1932年重新评估自己的政治投资策略。我们将会看到,阿卜杜放弃了希德基而转向宫廷,支持福阿德国王削弱希德基政府的努力,并最终推翻了希德基——这个话题越来越多地牵涉到英国,当然也牵涉到 187 总理。对希德基所打造的前政权联盟内部成员之所以背叛的种种原因,上述分析提供了新的见解。

商业冲突与希德基政府的垮台

希德基和阿卜杜之间的关系到1932年夏季和秋季变得越来越紧张。在阿卜杜伙伴办公室的一份有关阿斯旺大坝加高工程的备忘录中,希德基开始故意破坏阿卜杜商业交易的形象。它记录了与阿斯旺一位分包商的一次面谈内容,该分包商是希德基的一位密友,此人曾前往伦敦,有报道说带着希德基的明确指示。该分包商前往伦敦的目的是说服

① 见 United States Record Group 59, 1930-1939, 883.6113.60, Jardine to State, 10 February 1932; and *al-Jihad*, 24 February 1932。

英国工程师中止阿卜杜与埃及政府任何新的交易。^① 希德基后来为自己的举动辩护,声称阿卜杜是8月和9月《伦敦每日电讯报》一系列批评文章的背后黑手。就在伦敦成为阿卜杜和公共工程部之间就阿斯旺项目问题而展开的各种密会和密谋中心之后,这场所谓的新闻战于8月份开打。^②

希德基之所以致力于破坏阿卜杜与英国资本家的关系,源于他怀疑阿卜杜正试图损坏他的政权在伦敦的名声。英国的报道称,事实上,阿卜杜从1932年夏天开始就着力提高“对宫廷圈子的影响力”,这正是各方都认定的一场新的由宫廷领导的反对总理的进攻开始之前的时间节点。国王顾问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萨基·艾尔-伊布拉西,与阿卜杜关系密切,在此前几个月鼎力帮助这位商人。如果说阿卜杜还在试图利用他的影响力支持宫廷反对总理的话,那么其原因只可能是希德基早已放弃了阿卜杜,不再支持他在交通运输和电力行业中的投资。

那年夏天,正当希德基想方设法让英国人对他的政府的支持度和稳定性有信心时,一个在伦敦发出的有影响力的反希德基的声音,将势必

① FO141/759, (The Residency's File on Abbud for 1933), 254/2/33, Memorandum of interview with Commandante Dentamaro, signed E. D. J., 6 September 1932. 敌对的投资者 Emmanuel Dentamaro 是来自意大利巴里的一个拥有一家建筑公司、经营砖瓦厂和采石场、进行着填筑工程并从事投机土地开发的地主的儿子。见 Arnold Wright and H. Cartwright, eds.,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Egypt: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London: Lloyds, 1909), pp. 351-352。希德基最终承认了这些指控的内容。例如,见 *La Reforme*, 15 March 1934. Dentamaro 也是曾牵连希德基的 Corniche 丑闻中的一个主要人物。

② 在伦敦的埃及外交官声称,对希德基政权攻击的作者受雇于阿卜杜。为回应朝向一个无情的独裁者希德基所显露出来的持续的“敌意”,外交部计划限制记者采访白厅。FO141/759 254/1/33, Minutes of First Meeting Held at the Residency, 6:30 p. m., 10 January 1933; FO371/17019, J127/127/16, 来自 Peterson 寄给 Loraine 的信, 17 January 1933, and FO Minute on Professor Gerothwohl, 16 January 1933; J303/127/16, Loraine to Peterson, 28 January 1933。关于阿卜杜和 Korayim 之间的密谋策划,见 *La Bourse Egyptienne*, 25 August 1932; *La Reforme*, 7 and 15 March 1934; *al-Ahram*, 13 March 1934; 在由阿卜杜提起的对 al-Siyasa 的诉讼中的 Cairo Assize 法院的诉讼记录, 15 December 1934, 报告在 FO371/18014, J3219/660/16, Peterson to FO, 22 December 1934; J2831/660/16, Peterson to FO, 22 November 1934, enclosing C. D. R. Lumby to L. Smith。

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他当时想与英国谈判达成一份条约,以解决英国单方面宣布埃及独立以来双边存在的突出问题。事实上,从1922年到1936年,这个目标一直困扰着几乎每一届埃及政府。^①英国外交部也有这个想法。随着阿卜杜选择了支持宫廷而反对希德基,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英国外交部对阿卜杜及其政治活动的敌意也就增加了。从此以后,想把由阿斯旺水电站项目所导致的商业竞争与导致希德基在1933年9月辞职的埃及的政治权力斗争分开,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188

希德基的倒台

阿卜杜在两次试图推翻希德基的行动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第一次是在1932年12月,而最终成功的政变是在1933年9月。希德基怀疑阿卜杜与宫廷力量勾结,实际上把围绕阿斯旺项目的竞争转化成对国家权力的争夺,这场争夺开始于他介入到公共工程部的招投标计划之中。^②

据英国高级专员珀西·洛兰(Percy Loraine)所言,到12月初就有迹象表明,内阁在合同问题上产生分歧。据报道,希德基的外交部长和阿卜杜在公共工程上的盟友克拉依姆都将辞职。而时常被描述成埃及驻英国“非官方”大使的阿卜杜,也已把辞职的消息传达给英国商界。同时,在伦敦的埃及“官方”代表把分裂的责任推给了阿卜杜,说他控制了克拉依姆并利用他作为自己反对希德基的一种武器。^③

① 见 Marsot, *Egypt's Liberal Experiment*, pp. 160–161, 关于希德基对条约谈判的渴望,以及在1932年夏天政治气候的概括性总结。关于阿卜杜和宫廷精英,见 F0371/20916, J1989/815/16, Lampson to FO, 16 April 1937, *Egyptian Personalities Report*, entry on Abbud.

② *Egyptian Gazette*, 15 and 16 November 1932; F0371/16116, J3398/128/16, 附带一封信来自 Larkins (no. 1108), 17 November 1932; Council of Deputies, Committee on Financial Affairs, *Taqrir al-lajna “an mashru” kahraba khazan Aswan*, Report No. 111 (Cairo: Royal Printing Office, 1948); and “Abd al “Aziz Ahmad, *Kahraba Misr* (Cairo: Ministry of Public Works, 1955)。

③ 见 F0371/16110, J3362/14/16, Loraine to FO, 10 December 1932, and note by Peterson, dated 22 December 1932。

1933年1月,希德基发起了反击,撤换了三任部长,并把克拉依姆调离公共工程部。阿卜杜的竞争对手们判断,政治动荡的洪流正迅速涌向他,其中有人预测阿卜杜的垮掉“不会拖延太久”。外交部看来也急于加速这个进程,这一点从当时该部与英国驻节专员公署交流的记录中就可以看出。^①阿卜杜与外交部、埃及其他关键部门以及总理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使自己在一个围绕阿斯旺工程而挤满商业竞争对手、冲突日益加剧的舞台上处于不利地位。

驻开罗的英国官员,对于在许多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该支持谁,正在寻求指示。另一方面,来自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投资者、英美主导的智利出口联合集团(COSACH)以及在利润丰厚的化肥贸易中有大量股份的英国托运商,却在寻求他们的帮助。所有这些投资者都反对埃及建立一个替代进口的化肥工厂计划。另一方面,有可能供应部分发电设备和化工厂设备的英国重型机械制造商们,却常常获得订单。反对阿斯旺项目的声音也出现在埃及官僚体系内部。政府的金融顾问(一个英国公民)整理了一组数据,旨在证明该项目是一个糟糕的商业计划,一旦上马将耗尽埃及本已稀缺的金融资产。这些数据是由德国化工巨头法本公司提供的,而该公司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向埃及出口化学肥料的出口商。^②

① F0371/17019, J124/127/16 来自 Bagg 寄给 Loraine 的信, 19 January 1933, Loraine to Bagg, 20 January 1933, and Crowe to Loraine, 16 February 1933; and F0371/17020, J246/246/16, Farrer 的备忘录, DXT, 24 January 1933, for the quote.

② 见 *Times*, 8 August 1932; 以及 Joseph Levy, "Egypt Surged by Cabinet Dismissals over Demand for Justice, Reforms", *New York Times*, 8 January 1933; F0371/16116, J3398/128/16, Larkins 到 DXT, 7 December 1932. "State Finance in Egypt"; F0371/17003, JIS/15/16, DXT Memorandum, 31 December 1932; J507/15/16, 附着来自阿卜杜给 Larkins 的信, 22 January 1933, Farrer to Cairo, 23 February 1933, 以及来自 Selous 给海外贸易公司的信, 11 February 1933; and J2344/15/16, DXT, 27 September 1933, 附着 Larkins 的备忘录, "Hydroelectric Scheme for Generation of Power by Means of the Aswan Dam". 隶属于埃及商务部(财政部)的英国化学工业专家 Dr. Fyleman, 后来承认在提交给该部的一份他自己的报告中, 所有他的计算都是基于 IG Farben 的报告。毫不奇怪的是, Fyleman 的报告得出结论, 化肥的当地生产将是不经济的。

阿卜杜与宫廷携手并肩,于1933年春天对希德基政府发动了新一轮攻击。他的主要同谋者是国王的一位亲密助手萨基·阿尔-伊布拉西。随着宫廷公开地干预国家行政工作,他正上升为该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对英国人来说是最受鄙视的)之一。希德基在1933年9月辞职的直接原因,通常被说成是在任命新的财政部长问题上与宫廷所发生的冲突。不过,英国外交人员认为,这场危机背后的商业利益竞争,牵涉到一 189 场被新任高级专员兰普森(Lampson)称为“争夺埃及政府合同的腐败斗争”。而他的商业顾问则将此贴上“内阁解体的关键”的标签。^①

很明显,由外交部所做的对阿卜杜勒·法塔赫·叶海亚新政府的第一次评估,聚焦于阿卜杜的商业利益影响上。塞西尔·坎贝尔在做出一个反对后者的任命中不得不掂量其中困难时,阿卜杜-伊布拉西-克拉依姆组合引起了特殊关注。^② 内阁改组对将来的一个合同有着特殊影响。随着希德基内阁垮台,英国海外贸易部就着手评估阿斯旺水电项目的状况。当月早些时候,驻节专员公署工作人员提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指出希德基政府原来的公共工程部长的敌意;然而,作者预测说,这“不可能约束他的继任者”。^③

① 关于第一个解释,见 Deeb, *Party Politics*, p. 249, Marsot, *Egypt's Liberal Experiment*, p. 162, 以及 Ramadan, *Tatawejour*, p. 763, 后者引用了——并校正了——希德基的回忆录。关于兰普森的描述,见 FO141/198, 218/5/34, 来自兰普森给 Simon 草拟的电报, 18 March 1934; Selous 的描述在同一文件中可以找到, 218/4/31, Minute Sheet, Commercial Secretary for His Excellency [i.e., Lampson], “Abbud and Company versus Dentamaro And Company”, Selous, 13 March 1934。我无意对由其他人强调的因素提出争议,例如, Lorraine 的召回, 希德基启动谈判的失败等等;但是这些并不能解释瓦解当其发生时的原因,也不能解释内阁变化的逻辑。在影响事件中的阿卜杜-希德基冲突的权重将由阿卜杜及宫廷在希德基辞职以后通过对被称为 Corniche Road 丑闻的调查继续追击希德基所具有的猛烈强度而得到间接证实。

② FO371/17009, J2329/25/16, Campbell to FO, 25 September 1933.

③ FO371/17003, J2311/15/16, 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 27 September 1933, 附带由 Larkins 给海外贸易公司的信, 6 September 1933。

“承包商—政客”的统治

正像英国人和其他人所担心的那样，希德基的继任者被证明对阿卜杜及其宫廷庇护人和潜在的商业合作伙伴萨基·阿尔-伊布拉西言听计从。英国人与叶海亚—宫廷新政府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了，导致该政府在一年内垮台。对于英国决定在1934年重新采取干涉埃及内阁政策，通常的解释集中在伊布拉西对国家事务不受欢迎的干预、“宫廷统治出格”以及叶海亚政府表现出来的“不妥协的民族主义态度”上。^① 此处与我们所探讨的有关问题是：“过度”“干预”和“不妥协”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

竞争性冲突在后希德基高层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阿卜杜在希德基政府垮台之际，与伊布拉西密切联系，抓住机会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当时，国王生病，伊布拉西以福阿德的名义行使权力，代表国王冲在商业交易的前线。争夺国家稀缺资源的斗争以及阿卜杜恢复支持威权秩序的政治活动，使英国政府铁下心支持1934年11月撤换内阁行动并结束承包商政客们的统治。与此同时，阿卜杜及其盟友面对着由埃及政客、商业竞争对手和英国国家代理人组成的强大的反对阵线，后者阻止他参与阿斯旺项目。就这样，这些商业冲突与1923年宪法的最终恢复以及民选的华夫脱党重新掌权交织在一起。

阿卜杜集团的扩张

宫廷的支持、一个顺从的总理和一个在交通部的可靠盟友，都激励着阿卜杜着手从事新的风险投资项目。例如，他和盟友决定推进一项新的当然是有争议的项目，来对亚历山大港进行现代化扩建，而这是一个由克拉依姆监管的项目。出于同样的原因，阿卜杜通过购买埃及开罗邮

^① Marsot, *Egypt's Liberal Experiment*, p. 171; Deeb, *Party Politics*, p. 252, 引自一份来自Lampson给Simon的急件, 3 May 1934 (F0407/217, Part CXV, No. 38)。

件行的所有的普通股,而将他的投资活动扩展到一个新领域。该行是一家埃及航运公司,由英之杰集团控制。英之杰集团也是跨国公司半岛东方航运公司的所有者。这些风险项目使他冲撞了一大批竞争对手,包括跨国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的当地子公司、智利硝酸盐销售公司、争夺港口工程的各路竞争对手,以及希德基政府曾帮助其从埃及开罗邮件行手中夺取一项有利可图的运输特许权的本土投资商——埃及集团。^①

阿卜杜与合作伙伴们在争取国家业务时,有国家的一个派系——宫廷——做靠山。然而,他在收回运输特许权的斗争中向英国驻节专员公署的求助,遭到了拒绝,尽管他 1935 年整年都在徒劳无功地敦促英国的干预。当然,英国的支持对他以往的事业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任何集团要获得阿斯旺项目合同,英国的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作为希德基深陷其中的“滨海路丑闻”的一个副产品,他与克拉依姆以及埃及其他官员的关系由于受到媒体的密切监督而开始变得不自在。阿卜杜和他的由前总理希德基以及阿菲菲领导的诋毁者,在报纸、法庭和其他场合交替进行着指控与反指控。^②

这些令人讨厌的丑闻,导致许多原来支持威权政权的支持者对叶海亚政府日益表现出不满情绪。当然,华夫脱党从一开始就反对该政权。政党活动,连同一系列由学生团体和议会外团体发动的反政府行动,一茬接一茬。另外,希德基联盟的关键部分正放弃该政权(或者,就希德基来说,已被其所抛弃)。叶海亚政府逐渐失去商业精英、战略性国家机构

① 关于阿卜杜对 Inchcape's Egyptian 集团的接管的参考资料,见 F0371/19094, J9718/1366 16, Lampson to FO, 14 December 1935。关于该买卖背后的情形,见 Stephanie Jones, *Trade and Shipping: Lord Inchcape 1852 - 1932*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9)。关于阿卜杜的商业对手,见 F0371/17020, J246/246/16, DOTT Dispatch, 27 January 1933; F0371/18014, 2265/636/16, Peterson to FO, 22 September 1934; F0371/17022, J2863/261/16, Selous to DOTT, 21 November 1933;以及 F0371/17969 中从 J73/75/16 开始的一系列文件。

② 故事开始出现在 1934 年 3 月,政治反对派把持续不断的战争作为要求政府辞职的一个借口。关于由委员会发布的调查 Corniche 丑闻的一份报告,见 F0371/17996, J1057/71/16, Lampson to FO, 30 April 1934。

(毫无疑问受到了宫廷对神圣的官僚地盘的不断侵犯的刺激)以及英国驻节专员公署的信任,后一点最为重要。

叶海亚政府的垮台

1931年春天,新任英国高级专员迈尔斯·兰普森的访客络绎不绝,几乎包括了埃及商界的全部精英。阿卜杜的名字已被故意遗漏了。^①像埃及集团及其支持者——比如,新任财政部副部长艾哈迈德·阿卜杜勒·瓦哈卜——这样的商界利益集团——一直抨击腐败的宫廷利益网络。管理苏亚雷斯集团糖料加工垄断业务的比利时实业家亨利·劳斯(Henri Naus),也来凑热闹,指控伊布拉西在政府里独断专行,使他的“亲爱的朋友和商业伙伴”——国王——名声扫地。同时,希德基抓住一切机会谴责他在位时的顶梁柱——阿卜杜和福阿德。^②

这些批评者对阿卜杜及其宫廷盟友的产业表示愤怒。例如,在亚历山大港扩建项目中,他们把支持者塞进政府的相关委员会里。同样,如果希德基的话可以相信的话,阿卜杜的“阴谋”迫使埃及驻伦敦大使哈菲兹·阿菲菲辞职。假如真是如此,这一行径很可能就是外交部内部日益增长的反阿卜杜情绪的原因。阿菲菲在外交部广受欢迎和尊敬。阿卜杜的竞争对手埃及集团,很快就在集团的综合业务公司中为这位前外交官腾出了一个显要的位置。^③不用说,外交部对阿卜杜一直以来干预本

① 见 Sir Miles Lampson, Lord Killearn,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之后, *Killearn Diaries*) 的日记, 5 March and 4 April 1934。

② *Killearn Diaries*, 13 April 1934; FO371/17996, J667/71/16, Lampson to FO, 9 March 1931, 报道在希德基与东方部长之间的对话; FO371/17977, J1095/9/16, Lampson to FO, 28 April 1934, 报告在他与希德基之间的一次对话。该前总理声称,他严重负债于银行集团和埃及国家银行,而国王却关闭了通向他的“所有商业渠道”。

③ 关于港口方案见 FO371/18014, J1462/636/16, 附带来自埃及政府的财政顾问 Frank Watson 的备忘录,日期为 1934 年 1 月 3 日;关于希德基的控诉见 FO371/17978, J1228/9/16, 附带 Heathcote-Smith (Alexandria) 到开罗的急件,报告与希德基的一次谈话, 7 May 1931。兰普森也证实了它。他的关于阿菲菲的短评,见 FO371/20916, J1989/815/16, *Egyptian Personality Report*, 16 April 1937。

国的英国政治事务极其愤慨。

随着1934年初国王的病倒,对叶海亚“宫廷政府”“稳定性”的担忧变得日益明显,促使阿卜杜在6月间不止一次回到伦敦。他的造访,指向叶海亚政府与英国人之间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英国人的耐心——连同正在推进中的“中立”政策——明显开始减弱。阿卜杜寻求缓解紧张局面,以打消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对叶海亚意图的疑虑,并使宫廷主导的政权获得回旋余地。他在下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说时,当着议员的面谴责华夫脱党,并指出,国王福阿德是埃及唯一能够保证国内稳定以及“与英国永久和解的力量”。^①他在强大的英国工业联合会面前反复强调了这一点。这位埃及商人整个夏天都留在伦敦,在他的高薪“顾问”——《每日电讯报》的前记者的帮助下,为国王进行游说。

这些活动激怒了外交部。其他的姑且不论,外交部拦截了阿卜杜与伊布拉西之间的通信。^②外交部再度下决心“毫不迟疑地打击阿卜杜”,极力并成功地在他与伊布拉西之间“打开一个缺口”。伦敦下令在开罗的驻节专员公署会见国王并“抹黑”阿卜杜。寻求亚历山大港合同的竞争策略被指责为“宫廷所到,无不腐化”并且“应尽快采取措施切断宫廷与阿卜杜·帕夏关系”的论据。一位官员将这一情形比作赫迪夫·伊斯梅尔的越轨行为。另一位甚至更强烈地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我们应该并立刻看到伊布拉西和阿卜杜消失。”^③

① 见 FO371/17978, J1670/16, J. Loder (MP) to Lord Cranbourn, 12 July 1934 中的解释。

② 我已经做出了基于 FO371/18949, J1772/1772/16, Green File, 标签为 Ahmad Abbud Pasha 的关于外交部的阴谋的判断。这一在 J1772/1772/16 中的通讯,附带着来自 Oliphant 给兰普森的信的草稿, 26 July 1934。包括一份兰普森奉命销毁的被拦截的信件。还可见 Oliphant 给兰普森的第二封信, 3 August 1934。再一次,英国外交官们想向埃及当局提出抗议。不过,阿卜杜的游说活动仍在持续,多得让外交政策官员们惊慌失措。

③ 对该商人的监控持续着并且外交部采取措施阻止阿卜杜会见英国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 Sir Frederick Leith Ross, FO371/18019, J1772/1772/16, 附带着给 Peterson 急件的草稿, 12 September 1934; 来自 Kelly 给 Peterson 的信, 12 September 1934; 以及来自 Leith Ross 的秘书的笔记, 11 September 1934。引用来自附加到 J2265-636/16, Peterson to FO, 22 September 1934, 亚历山大港扩建项目的备忘录。

192 英国人与埃及政府之间不断扩大的危机在 1934 年 10 月漫长的一个月进程中达到顶峰,当时国王健康状况的迅速恶化加剧了危机感。外交部下达了严密监视阿卜杜的命令,而他正试图阻止内阁更迭。^① 英国人被他重返伦敦的举动所激怒,将其作为宫廷不妥协的证据,并且加大了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和更加合作的政府的压力。一位官员把阿卜杜寻求英国干预(也就是一场政治危机)的行径贴上“故伎重演”的标签,因为这意味着“这次访问一定会被国王轻轻放过,把它当作一次寻常的交流,而不是皮得森先生希望强加在他身上的那种激进改革”。^②

阿卜杜显然向王宫建议,可以忽略英国的压力,一旦皮得森按计划于 11 月下旬离开开罗,危机将会消退。当《纽约时报》1934 年 10 月 23 日的新闻报道逐字逐句刊登了阿卜杜的消息时,驻节专员公署和外交部的官员行动起来,纠正了对党的路线的偏离。^③ 叶海亚总理确实在敷衍了事,他在 10 月下旬将一位不起眼的人物任命为皇家内阁的负责人,此举显然旨在安抚英国,同时允许伊布拉西(皇家教基金或慈善基金会的正式主管)留任。五天后的,叶海亚向国王提交了他的内阁两名部长的辞呈。1934 年 11 月 6 日,他递交了自己的辞呈。^④

① 其中一个例子,见来自 Thompson 附加到 F0371/18014, J3219/660/16 的备忘录。对他称之为“天生的骗子”的阿卜杜,曾有来自一个主要的英国工程公司 J. Stone and Company 的一个公司董事,其访问了外交部并对阿卜杜代表国内商业利益的义举赞不绝口。该官员警告了假设叶海亚政府倒台和阿卜杜的影响受到削弱的危险。然而,见 Marsot, *Egypt's Liberal Experiment*, p. 172,他认为,国王确信需要改变政府。

② F0371/17980, J2521/9/16,附加到文件上的备忘录。J2521/9/16,附带着来自 Peterson 给 Wellesley 的个人的和秘密的电报(我的注释没有注明日期)。

③ F0371/17980, J2521/9/16. 根据 Somers Cocks 的一份备忘录,阿卜杜的建议已经找到直接进入《纽约时报》的方式。这是非常恶作剧式的。它表明,Mr. Peterson 的建议没有被接纳并且该无视是由绝望导致还是由乐观导致仍有待观察。外交部第二天构建了它自己的故事。

④ 该年表立足于《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29 October, 2, 5, 6, and 7 November 1934。叶海亚辞职中的延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权力掮客之间就同意下届总理上的冲突。见 Ramadan, *Tataurwur*, pp. 767-768。

商业重组：在阿斯旺项目中削弱阿卜杜集团

外交部再一次评估内阁变化对阿卜杜可能产生的影响，认为他注定对新政府没有更多影响。举例来说，新任总理被证明比他的前任更迁就英国人的想法。^①同时，财政部掌握在艾哈迈德·阿卜杜勒·瓦哈卜的手中，他是埃及集团的一个亲密盟友及阿卜杜的一个无情批评者。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伊布拉西和阿卜杜仍然活跃。这促使英国人加倍努力，想要压倒他们。事实上，英国人在埃及国内舞台上的不断干预，到1935年底逐渐掏空了马哈尔傀儡政府的基础。^②不管怎样，外交部仍然矢志不渝地破坏阿卜杜与英国企业的商业联系。

最露骨的例子出现在1935年2月。当时，英国外交官收到报告说，“经过短暂间隔的遮遮掩掩之后”，伊布拉西和阿卜杜已合谋，成功阻止一项新的公交线路特许权转让给一个联盟，该联盟包括阿菲菲和埃及集团。英国驻节专员公署不惜以牺牲英国厂商（他们是阿卜杜公交企业里的合作伙伴）的利益，出手支持阿卜杜的竞争对手。虽然在1934年阿卜杜在开罗代理的企业总共收到了85.45万埃镑的订单，但是，海外贸易公司将他打上了英国商务威胁的烙印，并在暗中破坏他的商业联系。这么深的敌意，有助于解释英国商业和外交官员方面强化英国投资者与埃

193

① Lampson 关于新总理 Muhammad Tawfiq Nasim 的评价是“如此顺从和愿意合作”。参考文献出现于 Marsot, *Egypt's Liberal Experiment*, p. 173。还可见由 Thompson 添加到 FO371/17995, J2736/63/16, DXT, 14 November 1934 上的一个注解中关于阿卜杜的探讨。

② 关于 Nasim 政府面临的处境，非常有用的讨论见于 Deeb, *Party Politics*, pp. 253–258；关于英国对该政权不满的早期迹象，见 FO371/19069, J626/110/16, Lampson to FO, 8 February 1935，及附件；关于埃及人对 Nasim 政府及其表现出的对驻节专员的太露骨的奉承的广泛敌意，见《纽约时报》，10–12 and 14 December 1935。因为于1935年10月23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所以甚至连英国忠实的朋友阿卜杜也发现有必要谴责对埃及“完整国家性”的持续拒绝。

及银行集团之间联系的决心。^①

它也有助于解释在争夺阿斯旺项目中越来越偏袒一伙由英国电气公司领导所认同的英国企业。外交部意图阻止阿卜杜参与阿斯旺项目。兰普森甚至从英国电气公司(EEC)的董事会主席那里获得了一份保证,即他的公司与阿卜杜没有任何联系。外交部的文件反复强调,已经以最快速度掌控谈判的财政部长,同样坚决地排斥阿卜杜。^②

对阿卜杜的敌意使埃及许多官员夸大了这个商人对跨国竞争对手的影响力。这不,当英国电气公司一家参与该项目竞争的伙伴在其承诺中表现得犹犹豫豫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由阿卜杜造成的。这种对阿卜杜的过度关注,导致埃及政府与那些对该项目的态度充其量是模棱两可的公司进行谈判。例如,兰普森回电伦敦称,另一个竞争对手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CI),“一直很巧妙地刻意在埃及政府的心里营造一种对整个计划犹豫不决的印象”。^③

艾哈迈德·阿卜杜勒·瓦哈卜邀请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表面上的竞争对手——德国法本公司也提交一个方案。这可能是一种谈判策略;它也可能反映了埃及集团的影响,后者与以法本公司为首的德国硝酸盐辛迪加从事棉花—化肥易货贸易。^④无论如何,比起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法本公司对在埃及建立一个化肥工厂没有更大兴趣。这两个企业巨头早已秘密商定了对埃及和其他出口市场的划分。然而,埃及内阁在1935年6月下令,与英国电气公司—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财团就阿斯旺项目的

① 该冲突的详细说明见 Vitalis, “Theory and Practice”, pp. 299–300。关于向埃及出口数据的分析,见 FO371/19088, J372/372/16, DOTT, 28 January 1935。外交部—海外贸易公司立场的最清晰的陈述见 FO111/680, 380/8–35, Oliphant to Lampson, 9 May 1935。关于该银行在1930年代多次提到的与英国工业的加深的联系,见 Davis, *Challenging Colonialism*, pp. 141–143, 153; 以及 Tignor, *State, Private Enterprise*, pp. 134–135。

② 例如,见 FO371/19086, J602/348/16。

③ 见 FO371/19086, J1181/348/16, Lampson to FO, 5 April 1935, 报道了在 Selous [开罗驻节专员]与 Horsfall [EEC 总经理]之间的会谈, 3 April 1935。

④ 对自1920年代后期与银行集团就有联系的制造企业西门子持有重大兴趣的 Dresdner 银行,是在易货贸易中的另一个合作伙伴。详情请见 FO371/19057, J156/J670/J2375/J7334/31/16。

建设举行一轮独家谈判。^① 矛盾之处在于,唯一对在发电厂周边建设硝酸盐厂表现真诚兴趣的利益集团——阿卜杜和他的外国伙伴,被挡在了交易门外。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1935年3月和4月当阿斯旺项目谈判正在进行时,阿卜杜与宫廷联手发动的对英国及英国支持的埃及当局的政治攻势不断升级。到4月中旬,英国人迫使伊布拉西辞职并把他流放到布鲁塞尔。随着自1930年以来埃及一直运行的专制秩序在1935年底开始崩溃,阿卜杜平生最后一次把赌注压在威权主义之上。

1935年12月的群众示威游行,铺平了恢复1923年宪法的道路。尽管政党之间形成了统一战线,但是在继任政权组成和议会选举时间的选择问题上,派系冲突仍然接踵而来。1935年12月至1936年1月之间达194成的妥协方案,导致一个“中性”内阁的形成,同时将选举推迟到1936年底。^②

在此间所取得的诸多显著成就中,伊斯迈尔·希德基导演了一出在政治舞台上东山再起的好戏,在派系纷争的统一战线背后充当指挥者角色。希德基向英国代表公开吹嘘他的领导作用,并说他在1月初就煽动学生骚乱。^③ 在他新近组成的联盟中,他的表现要更谨慎些。希德基与阿卜杜修好的消息,很可能让外交官们困惑不已。这位曾在其执政的最后一年如此不遗余力反对阿卜杜的商业利益的政客,到1936年1月接

① 见 FO371/19086, J2290/348-16,附带来自 Abd al Wahab 给 EEC 的信,5 June 1935。当时并未对该项目公开招标,而是由政府决定对投标进行排序并与负责人一个个谈判,直到达成协议为止。阿卜杜的投标排在最后一位。1935年6月5日公告事件的进一步的细节,见 Vitalis “Theory and Practice”。

② The Times, 10-12 and 14 December 1935; Marsot, *Egypt's Liberal Experiment*, pp. 171-176; Deeb, *Party Politics*, pp. 257-258; and Ellis Goldberg, “The Wafd 1935 National Congress: Popular Front or Populist Front?”, 1987 年未发表的论文。新任总理是前银行集团董事会成员和皇家内阁的主管 Ali Mahir。

③ 该商人和本质上的独裁者一次在亚历山大与英国法律总顾问 Heathcote Smith 的引人注目的谈话中鼓吹自己的观点。见 FO371/20097, J921/2/16,附带于 Lampson to FO, 21 January 1936。

受了阿卜杜航运合资企业——埃及开罗邮件行董事会的一个职位,并在阿斯旺协议中与阿卜杜通力合作。

该联盟对阿卜杜有意义。他的经济利益正在英国政府手上白白流失,并且,在华夫脱党重掌权力的时候,想要从政府那儿获得好处几乎不可能。相反,这位商人正推动另一种政治解决方案,即回到1930年的宫廷——希德基威权统治,尽管他极力否认在反对派阵线中的政治角色。^①

然而,相互竞争的工商业利益集团发起了新一轮攻势,反对政府与英国电气公司合作的计划。英国电气公司的官员得知阿卜杜和希德基已显然得到总理配合、推迟向内阁提交这个计划以备批准时,显得惊慌失措。英国跨国公司寻求外交支持,致使伦敦虚构了一个理由,放弃其在英国企业竞争对手之间的中立政策,迫使埃及当局签署其与英国电气公司及其盟友达成的最终协议。^②

时间所剩无几。选举被定在5月初。英国电气公司利益集团及其在英国政府中的盟友显得日渐焦虑,担心政权转移到民选的华夫脱党政府之前协议不会被通过。在英国高级专员还来不及进行干预之前,一场新的政治危机因国王福阿德在1936年4月末的突然去世而爆发了。尽管英国政府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但是直到5月的第一周埃及大选举行

① 阿卜杜在向一位英国外交官做一番评论时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政治倾向。见 F0371/20097, J921/2/16, Heathcote Smith to Lampson, 16 January。关于他的政治活动的问题(“他说他放弃了政治”),见 F0371/20119, J7708/2/16, FO Minute (Mr. Pink), 17 September 1936; 关于埃及新闻对同样问题的解释,见 F0371/20120, J8211/2/16 Kelly to Houston Boswall, 13 October 1936; 关于希德基为了阿斯旺项目的利益的游说,见 F0371/20139, J445/445/16, 由 Selous 做的附属备忘录, 8 January 1936。

② 关于该公司收集的有关阿卜杜、希德基和内阁内部的倾轧的情报,见 F0371/20139, J3628/445/16, 附着着来自 Grey EEC 在开罗的代表给 Nelson EEC, London 的信, 17 April 1936。由外交部表现出来的欺骗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们认为,伦敦对 EEC 的支持是正当的,因为埃及政府的(英国)财务顾问最后批准了该计划,“基本上因为它证明能降低化肥成本”。事实上,正如 Lampson 一个月后指出的那样,该财务顾问不相信,该项目会被证明是一项可靠的投资。见 F0371/20139, J3559/445/16, Lampson to FO, 22 April 1936。当然,正如在 Lampson 未出版的日记里记录的那样, Watson 明白他为谁服务,认为埃及的“最佳利益”不是在这件事上的“正确的标准”。Killearn Diaries, 23 April 1936。关于支持 EEC 的充分的理由,见 F0371/20139, J2560/445/16, DOT 备忘录, 24 March 1936。

时,国家各派系在阿斯旺项目上仍然僵持不下。^①

兰普森接到立即约见新政府并迫使其在阿斯旺项目上做决定的指示。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新政权之下这项决策不再简单。英国官员得知,华夫脱党的公共工程部长秘密地受雇于英国电气公司。^②

195

总结评论

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形成联盟,或发生冲突,视利害得失情形而定。^③

本文对埃及商业利益冲突的研究,把传统上对两次大战之间政权更迭的解释中被忽略的一面呈现出来。直到现在,对1930年代埃及政治和社会的史学研究方法,都还集中在意识形态变迁和埃及民族主义变迁兴衰上,要么就叙述为人熟知的华夫脱党、宫廷和英国驻节专员公署之间的“三方权力斗争”。但是这些研究方法从来没有试图准确解释:在1922年后争夺埃及国家控制权的斗争的各个节点上,什么才是利害攸关的?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回答,一再地出现在伊布拉西对“行政事务”的“不断干预”上,出现在希德基抵御宫廷的策略上,以及1935年全年英国对纳西姆“顺从”政府的不间断的压力上。

在埃及早熟的威权主义试验期间,商业竞争或物质利益冲突十分明显地与每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正如我试图证明的那样,商人一直都在投资于埃及的新秩序。伊斯迈尔·希德基竭力迎合他们,因

① FO371/20139, J3619/445/16, Lampson to FO, 28 April 1936. 关于就各部门内部的分界线和 Lampson 因为它们而推迟行动的决定的详情,参见 Robert Vitalis, “Building Capitalism in Egypt: The Abbud Pasha Group and the Politics of Construction”, 博士学位论文,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8, pp. 405–407.

② FO371/20144, J1104/1553/16, Lampson to FO, 8 May 1936; FO371/20139, J4261/445/16, Farrer to Pink, 12 May 1936. 附属于该文件的由 Campbell 作的注解,以及给 Lampson 的电报草稿。还有 J4845/445/16, 内附 Selous 至海外贸易公司函, 12 May 1936.

③ Berque, *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 p. 448.

正如贝尔克(Berque)正确指出的那样,该政府需要“同谋”。^① 政治科学家可能会按照国家“自主性”和“恩庇—扈从主义”之下社会利益的“附庸性”的范畴,来理解希德基政权与工商业界的关系,但希德基理解的是政治经济学。希德基对工商业界的需要程度,至少与投资者对一个能够带领埃及度过大萧条难关的强人的需要程度一样。为了稳定经济,希德基与地主和资本家讨价还价。商人需要刺激以行动。希德基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吸引其他的社会群体。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希德基不像墨西哥的拉萨罗·卡德纳斯、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或土耳其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等威权主义领导人那样,大规模扩张公共部门。这个国家相对有限的资源,是希德基可以提供给相互竞争的投资者仅有的激励之一。

在商业集团及其盟友与对手之间的这场斗争中,一直缺乏有效的机制或机构来调节那些年最大的工业项目——拟议中的阿斯旺电力和制造业发展计划,也缺乏执行替代方案或调解所涉及的诸多冲突的机制或机构。英国的机构——驻节专员公署在1882—1919年履行了这一功能,但在后独立时代,丧失了经济决策的绝对权威。在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期,政策制定所在的环境,打上了对国家资源日益碎片化控制的印记,各种“特殊的”投资联盟及其盟友一直为争夺国家资源而争斗。阿卜杜集团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该集团与各种外国的、本土的商业合作伙伴(如艾哈迈德·拉什迪)、像克拉依姆这样的“公共”官员以及像伊布拉西196 这样的宫廷坚定拥护者都有联系。合作——要么是通过各竞争联盟自愿谈判达成的,要么是由国家发起的——的持续缺位,被证明对各方都代价高昂。

上面给出的解释,与传统上对埃及投资者的描述判然有别。比如,把阿卜杜刻画成外国商业利益集团的马前卒,两次大战之间埃及政治的“边缘人物”,英国外交官和埃及内阁部长们的“受庇护者”。这些熟悉的

^① Berque, *Imperialism and Revolution*, p. 449.

直白的描述,反映并有助于重复论证一套很成问题的所谓埃及资产阶级(及其组成部分)软弱性命题,这套命题是从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它被认为如何发展的特殊叙述中推导出来的。

传统的理论依靠并糅合国家资本和产业资产阶级这种熟悉的叙事手法,往往错失了两次大战之间商业利益冲突的焦点。比如,根据不存在的不同行业资本家群体之间的冲突(例如,工业联合会对抗商会)来叙述,或者根据不存在的资本“派别”之间的冲突(例如,“买办”“商业利益集团”)来叙述。他们经常误判了埃及商人的政治能量。而且在本质上,他们误读了20世纪20、30年代的政治经济史。

这样,对20世纪30年代埃及商人的故事,习惯性的讲法是描述这些资本家为什么在领导埃及进行(本应该有的)影响深远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资产阶级或民族资本家的事业)方面“失败了”——或者至少止步不前。例如,在大多数解释中,阿卜杜代表着据说阻碍本土工业逐步发展的那种投资者类型或资产阶级部分。更为普遍的是,阶级分化主要被描述和分析成那种资本家集体行动——通常未被详细说明——问题,这种行动表面上本来可以使资产阶级或国家资本或中产阶级获得更多权力,并且照理说会导致更快速更广泛的工业化。

我在这里讲的是有关埃及资本家和政治之间关系的不同版本的故事,这个故事并不依赖于这样的假设,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家通常会(或应该会)通过越来越复杂的组织形式在政治领域里界定并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及这些更接近于阶级形式的集体行动通常会(或应该会)取代各种个人主义的或者特殊主义的追求。一些在政治方面非常简单化的观念通常是这个故事的组成部分——尤其是这样的观念,即资本家集体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去争夺国家权力(去“捕获国家”)。按照后面这种假设,那么资本家之间的分化,既充当了一个特定阶级相对(缺乏)权力的根本原因,又充当了这个阶级相对(缺乏)权力的便利指标。

即便是非常细心的分析家也可能陷入这种发展工具主义的逻辑困境之中。例如,在最近一项总体上非常有见地的分析印度尼西亚资本家 197

的研究中,理查德·罗宾逊(Richard Robison)探讨了垄断、许可证和信贷对各种印尼商业派别的重要性,但他谨慎地强调,这些资源的分配“不是由一个政治上有凝聚力的和强大的资产阶级强加于国家的”。这个观点没有什么意义。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根本就不是一个阶级(不论团结与否)有可能围绕着它们而组织起来的政策领域。它们反而是相互竞争的投资者发生冲突的典型领域。^①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埃及,像阿卜杜集团这样一个投资者联盟,代表着资本主义集体行动的一种基本制度形式,并且,这些相互竞争的、跨行业的联盟,比如,在竞争合同和特许权中,频繁而有效地施加它们所谓的特殊关切。国家资源为投资家的冲突提供了一个核心领域,并且,所谓的与国家的寄生关系——开创这种关系的是非埃及籍(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等)资本家一代,他们先于阿卜杜和他的“民族”同胞——正是形成时代的埃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部分。这种情形让人想起许多同时代的场景,包括印度尼西亚的场景,在那里,一个“由各个资本家派别组成的集团”,通过对国家资源持续不断地侵占而出现了。^②

像其他地方的商界一样,埃及的企业家认识到,他们在市场中的生存取决于减少或消除竞争的能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至少经历了两个(通常是关联)的过程。首先是通过政治活动,特别是发展与国家机器的战略行动者或部门的关系,这在本章已详细记述。其次是通过资源

① Richard Robison, "Authoritarian States, Capital Owning Classes, and the Politics of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Indonesia", *World Politics* (1988): 52-74; 65. 虽然有可能想象行业竞争对手例如通过重新分配来自所有国家合同的收益的份额来达成对市场的垄断的情况。

② “那么主要的本土资本主义面临的政治任务是什么? 首要的是确保在印度尼西亚运营的资本主义势力集团中的一个有保证的地位。鉴于资本的日益国际化,控制资本所有权和投资决策的一个自主的和独立的本土资产阶级的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Richard Robison, *Indonesia: The Rise of Capital* (North Sydney: Allen & Unwin, 1986), p. 364. Springborg, *Mubarak's Egypt*, 提供了一个关于“寄生的”当代埃及资本家的广泛批评的例子。关于一项扩展的批判,见 Robert Vitalis, "Imagining Capitalists: Ideologies of Class and Client in Egyptian Political Economy", *al-Jadal*, 1 (1991): 54-83.

集中,这是一个由资本家的组织助推的形成集团的过程。即使是资本家组织起其他的制度化形式,这些相互竞争的投资者联盟所采取的集体行动仍然持续着。实际上,这些联盟的制度化,往往很可能优先于政治利益表达的替代性行业形式(例如,产业联合会)的运用。原因有二。第一,许多市场的高度寡头垄断结构,减少了对明确的行业内部协调的需要。^①第二,这些跨行业的商业集团在不同的市场中为控股做出协调决策和集中决策。权力和决策的核心是集团,而不是特定的行业子公司。

我已用这些埃及的历史资料来说明,关于资本家阶级“碎片化”“无组织”和“虚弱”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或没有启发价值的,当这些描述是从一种特殊类型的对“发展”进行长时段的比较——历史分析中抽取出来时,尤为如此。当然,在这一叙事传统内,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几乎每一个工业化案例,都会涉及资产阶级“软弱性”问题——这是在非常具体的意义上界定的,比如葛兰西用“霸权”字眼来界定。^②然而,大多数研究埃及商业和政治的理论家,似乎认为这种“阶级使命”是真实的,并且通过 198 特定的利益集团、组织和政党等是可以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而不是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这些观念。很显然,这些隐喻对制度、策略和资本家权力的性质而言,所遮蔽的可能与所揭示的一样多。

①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利益团体或通过经济集中的商业合作策略在功能上似乎是等效的。” Philippe Schmitter and Wolfgang Streeck, “Research Design to Study the Associative Action of Business in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of Western Europe”, 未出版的手稿, n. d., p. 17.

② Peter Evans and John D. Stephens, “Studying Development Since the Sixtie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Society*, 17 (1988): 713 - 745;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非国家的一段时空：“长十九世纪”^①期间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迁

雷萨特·卡萨巴

引言

以下引文来自一本于18世纪结束时写成、1820年在伦敦出版的著作。^②这本书分三卷记载了希腊水手阿纳斯塔修斯在奥斯曼帝国的环地中海省份的冒险活动。事实上，这本书不大可能是这位水手自己写的，但它显然基于作者的亲身观察。这段引文是阿纳斯塔修斯与他的朋友斯皮里迪恩驶离罗兹海岸时的一次对话：

“如今社会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那么，地球上还有没有一小块地方，让那些不喜欢社会偏狭规矩的新生人找到一个可以退而享受与生俱来权利的空间？或者说，如果在鞑靼的荒野地带或美洲的荒

① “长十九世纪”(Long Nineteenth Century)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提出的一种历史划分法，将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作一个时代阶段。霍布斯鲍姆为此写了《革命年代：1789—1848年的欧洲》《资本年代：1848—1875》和《帝国年代：1875—1914》，全面记述了“长十九世纪”的时代风云变化。相应地，霍布斯鲍姆称1914—1991年(苏联解体)为“短二十世纪”。——译注

② Anastasius: *Memoirs of a Greek*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20).

漠地带还有此类避难所的话,那么,无论如何,社会不是早已垄断了使自身摆脱迷津的所有手段,以至于获得这些幸福住所变得几乎不可能吗?在我们怀疑社会机构的危险权力之前,难道我们不该带着马车,或者船只、签证与护照,连同强健的体魄,乘着还没被他们剥夺,尽快躲进哪怕是人迹罕至的沙漠吗?他们切断了我们的爪子,他们剪掉了我们的翅膀,然后带着嘲弄的微笑咆哮:“可怜的被束缚的鹰啊,如果你还能飞,就请飞走吧!”穷人只有经历生死考验才能逃避社会。我被告知,在每个地方,穷人甚至都不敢勇敢而诚实地接近它们。在一些国家,他必须暗中把自己偷运出这个世界,并靠着伪装踏上旅程,唯恐自己的躯体不堪负担不安分的灵魂!”

世界上任何一个曾经不得不与国家官僚机构打交道的人都会对阿纳斯塔修斯对个人活动所受限制的怨言产生强烈的共鸣。然而,有意思的是,阿纳斯塔修斯不是将这些干预归咎于“国家”而是社会,这对我们理解奥斯曼社会与帝国之间的关系有启发,它与许多现代理论家的理解大相径庭。

通常,多数人对奥斯曼历史及其分期的研究结论,都是从他们对国家的聚焦推导出来的。在这类文献中,帝国官僚机构所经历的考验和磨难,是被用以确定奥斯曼历史重要转折点的基本素材。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总是国家的起起落落,扩张收缩,以及,最重要的是,国家不仅在自身机构而且在社会的现代化中扮演领导角色。阿纳斯塔修斯扭转了视角,把社会视为已“铺开罗网”的实体。即便我们只找到最少的证据证明他是正确的——奥斯曼社会各部分确实在调节他们自己的存在中发挥重要作用——也足以让我们质疑支配了奥斯曼—土耳其研究的国家中心范式的准确性。这一发现将显示,奥斯曼国家权力的范围和效力确实受到真实而有效的限制,并且,这些限制大多源于中央政府影响范围之外的那些因素。本章循着这一推理路线,探究这样一个非国家领域是否在

“长十九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出现过。^①问题不是重要的活动是否发生于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外。相反,问题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变迁中,国家权力的内容和性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个领域的限制和界定。

从非国家领域视角研究奥斯曼帝国的转型,与其他方法相比多了几个优势。首先,聚焦于源于国家部门之外的变化,让我们在这段历史进程中揭示新的动力元素。在旧框架的前提下,“变化”只有当其来源于中央国家领域时才被讨论。源于国家之外的行动,或者那些不受国家管束的人们,通常被解释为危机的预兆,或者好一点,被解释为需要由中央政府来“处理”的骚乱。由于受到这一框架的影响,奥斯曼研究的多数主题都聚焦于制度变迁问题,或者分析国家在抑制或解决某些骚乱和麻烦事方面的有效性。

用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研究奥斯曼(和非欧洲)历史,一直是将两个所谓非西方社会的迷思引入这种历史编纂学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迷思是文化决定的奥斯曼“停滞”;另一个迷思是,人们认为一连串的缺失(尤其是缺少一个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可以解释该社会的停滞并突显该社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本质区别。^②然而,仔细探究就会看到,停滞与其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现实特征,不如说是统治者努力实现的一种目标或理想。归根结底,这是一个由精心挑选的精英阶层统治的社会系统,这一精英阶层把不在其直接监督之下的任何运动都看作是对帝国辖区福祉的威胁,并努力控制它。毫不为奇,当依靠这个行政精英阶层的记录档案时,我们这些现代理论家也往往将安宁和稳定看作是“正常”的、甚至是理想的事态。就这样,我们都成了一项坚持让其部分臣民闭嘴的知识工程的合谋者,或用埃里克·沃尔夫的话说,“没有历史”的知识工程的合谋者;这个工程恰好与统治者在他们与臣民发生联系时所优

① 在 *The Age of Empire* (London: Pantheon, 1989) 一书中, Eric Hobsbawm 把 1789 年至 1914 年这一时期称为历史学和知识学意义上的“长 19 世纪”。

② Bryan Turner 的 *Man and the End of Orientalis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8) 仍然是研究中东社会的主流社会学范式的最好范本。

先考虑之事完全合拍。^①

只要接受由“国家”所发明的范畴并把其中所包含的特征视为正当，人们就会相信，在奥斯曼帝国，国家确实是权力的唯一来源。然而，从历史角度看，任何一种作为机构的“国家”发展，和作为一个霸权制度的“国家”的发展，总要同时考虑它与非国家领域的接触和关系。没有后者，我们就不能概念化前者，也看不到两者之间基本的强制关系。事实上，关于缺失中产阶级或市民社会的观点，与其说反映了这种实体或空间的不存在，不如说反映了国家强权对它们实际的清除或强烈的清除愿望。

本章聚焦于研究三个不同领域，这三个领域虽然不在中央政府直接影响范围之外，却有助于制定特定的改革措施，更重要的是，也有助于塑造 19 世纪变革中的奥斯曼帝国国家权力的总体形态。第一个领域涉及贸易和生产组织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与世界经济不断扩展的关系背景下。经济关系的扩展，对许多近东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方面我们讨论的重点集中在地中海东部的港口城市，这些地区在 19 世纪成为日益活跃的商务活动中心和新兴资产阶级聚居地。尽管这一领域的扩张大多独立于中央政府，但它存在的影响可

① 近几年，在奥斯曼历史编纂中存在着通过将来自非国家舞台的新要素纳入分析领域以克服其中一些局限性的努力。这些著述都揭示了在像工作组织、产权机构、家庭内部关系和贸易集团及其在奥斯曼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上的许多重要的细节。与这些问题并行的，是一项去开发接近历史材料以便沉默可以被打破、新的声音可以被听到以及另类诠释可以被提出的新方法的努力正在进行。请参阅文章 Çağlar Keyder and Faruk Tabak, eds., *Landholding and Commercial Agriculture in the Middle East* (Albany, N. Y.: SUNY Press, 1991)。还可见 H. İslamoğlu İnan, ed.,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Donald Quataert, *Social Disintegration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81–1908: Reactions to European Economic Penetr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Kenneth Cuno, *The Pasha's Peasants: Land, Society, and Economy in Lower Egypt, 1740–185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Amy Singer, “Peasant Migration: Law and Practice in Early Ottoman Palestine”,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 No. 8 (Fall 1992): 49–66; and Karen Barkey, “The State and Peasant Unrest in Early 17th-Century France and the Ottoman Empi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no. 6 (December 1991): 699–715。

以从官僚机构所采取的再组织化措施中来观察,也可以从此间奥斯曼政府所签署的国际协定的内容中来观察。这些公务活动通常被解释为奥斯曼政府提高其国际合法性的尝试,也被解释为重申其对分化势力、尤其是帝国偏远省份的分化势力进行控制的尝试。就我的行文目的而言,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措施被认可的程度,甚至是官僚机构努力适应这些扎根于非国家领域的社会成分的程度。

关注的第二个领域涵盖了人们的各种流动(季节性的、特别是长途迁移)。当时,也可能更早,这些流动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为帝国经济组织的一部分。对农民和工人高度流动性的恰当评价,对于了解奥斯曼帝国的空间和身份观念、边界确定以及统治的性质和有效性,都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从官方的角度说,帝国统治者对这一不受监管的人员流动是反对的。作为他们对安全、国防和税收关切的延伸,政府官员总是试图阻止人们遗弃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这一部分讨论 19 世纪这种干预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功。我在这里还聚焦于 1858 年的重大土地立法,以此观察持续存在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如何影响这项法律的各项规定,以及,这项法律是如何反过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领域,涉及 19 世纪期间席卷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主义、宗教和宗派运动。这里,我的关切点不是这些运动的组织及其活动领域,也不是奥斯曼政府对它们的政治性和官僚性回应。我用的是多少有点不同的方法,希望以此证明,即便土耳其改革的政治话语在形成过程中刻意避开非国家领域,但是后者对前者仍然有塑造作用。在汇集其各股民族主义话语的过程中,奥斯曼土耳其的知识阶层和官方一直致力于同对奥斯曼国家重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对话,不管这些人是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还是穆斯林宗派分子。在对话过程中,他们的目标不是说服塞尔维亚人或希腊人,而是要人们相信他们是中立的一方,他们的主张是“拯救”帝国正确的、公正的及符合逻辑的方式。

包含在这三个领域当中的实践、关系和制度的汇合,一起构成了正在瓦解的帝国中的一个独特的非国家领域。研究这些现象的关键,不仅

在于获取新信息,而且在于探索出一种与我们的主题有关的新思路。在特定条件下,我们必须强调非国家领域的重要性,必须强调这个领域与作为奥斯曼帝国活力所寄的政治结构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从分析和历史的角度看,我们需要明确,在奥斯曼帝国,源自非国家领域的各种进程约束和塑造了政治当局的权力,而不仅仅屈服于中央政府的压力,或任由其拿捏。

城市、商业和社群

从历史上看,在奥斯曼帝国,像塞萨洛尼基、伊兹密尔、特拉布宗、贝鲁特和亚历山大这样的港口城市提供了各种团体可以在其中相对不受政府持续密切监管的环境。形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是奥斯曼政府为了鼓励地中海流域的贸易持续进行,已经让这些地方的行政地位变得模糊了。这些城市大多与地中海其他地区有着悠久的密切联系的历史。尽管该地区各地之间的上述联系早于奥斯曼帝国的出现,但是这些联系 211 在奥斯曼统治之下依然密切,并为这些城市赢得了“自由”港的美誉。^①

在 18 世纪中期以后,将这些港口城市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的经济纽带加强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被改变了。结果,其内部和周边地区甚

① 关于伊兹密尔,见 Daniel Goffman, *Izmir and the Levantine World, 1550 - 165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0); Elena Frangakis Syrett, *The Commerce of Izmi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thens: Centre for Asia Minor Studies, 1992)。关于 Salonica, 见 Nicolas Svoronos,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Salomoniqu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53; 关于特拉布宗, 见 Uner Turgay, "Trade and Mercha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Trabzon: Elements of Ethnic Conflict", in Benjamin Braude and B. Lewis, ed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Empire*, vol. 1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2); 关于贝鲁特, Leila Fawaz, *Merchants and Migra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Beiru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关于亚历山大, Daniel Panzac, "Alexandrie: Evolution d'une ville cosmopolite au XIXe siècle", *Annales Islamologiques*, 14 (1978): 195 - 215; Michael Reimer, "Colonial Bridgehead: Social and Spatial Change in Alexandria, 1850 - 188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0 (1988): 531 - 553; 还可见 *Special Issue on Eastern Mediterranean Port Cities*, *Review*, 16, no. 4 (Fall 1993)。

至更加脱离中央政府的密切监督。这些进展也为各种社群,尤其是非穆斯林社群,提供了扩大财富和影响力的新方式。在这方面,1840年之后的时期尤为重要。

在1840年到一战之间,奥斯曼经济经历了显著的扩张。在此期间,以1880年的价格为基准来衡量,奥斯曼的出口增加了9倍,进口增加了10倍。^①港口城市的发展更为可观。它们的人口翻了几倍,进出港的海上交通登记大幅增加,其中的大部分城市不仅成为来自本国腹地的人们的天堂,而且成为地中海其他国家地区一些人的避风港。作为港口,这些城市发展的主轴是参与对外贸易。值得注意的是,与奥斯曼帝国通常保守的总体贸易平衡不同,港口城市保持了积极的平衡。例如,仅在1840年到1876年的36年间,相比于奥斯曼帝国6940万英镑的总赤字,伊兹密尔的贸易产生了1660万英镑的总盈余。^②在更早的时期,这些港口曾经更多地充当来自亚洲的货物中转站。但到了19世纪,从这些港口出口的大多数商品都在其附近制造。正是在这些年里,布尔萨的丝绸和伊兹密尔的棉花最终取代了波斯丝绸和安卡拉马海毛,成为从伊兹密尔港装运的主要出口产品;黎巴嫩丝绸成为贝鲁特港的主要出口商品;埃及棉花占亚历山大港贸易的大头。数据显示,奥斯曼帝国各地的农业生产显著增加,也反映了上述变化。换句话说,这些港口城市不但成为泛地中海贸易系统的主要交易点,而且逐渐成为它们各自所属地区经济繁荣的中心。

在这些商业活跃地区,生产和贸易的扩张产生了大量的新财富。实际上,与俗见相反,大多数财富留在了创造它的地方。例如,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利润转移、个人储蓄、进口支付以及由中央政府及其包税人征课

① S. Pamuk,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uropean Capitalism, 1820 - 19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② 见 R. Kasaba,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lbany, N. Y.: SUNY Press, 1988), and Pamuk,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uropean Capitalism*.

的税收,都可能成为这些财富被转出该地区的主要渠道。在这些渠道中,利润转移和个人储蓄并没有吸走在安纳托利亚西部产生的大部分新财富。在19世纪上半叶,除了投资铁路,外国资本尚未有重大投资,要知道,在1870年代之前,投资铁路并没有那么有利可图。是有一些以家族关系为主的个人资金流到地球的远方。但是,这种关系让财富朝各个方向流动,在这个早期阶段这个渠道本身不可能造成资金的净流出。事实上,考虑到在19世纪历史进程中有超过200万移民流入奥斯曼帝国,人员的流动很可能产生了资金净流入。对像伊兹密尔和亚历山大这样的港口城市而言,净流入更是确定无疑的,它们对地中海东部地区所有的人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① 212

进口支付也不会使财富大量外流。如上所述,港口城市在与外部世界的贸易项目中一贯盈余。此外,尽管大部分进口贸易凭赊账进行,但是这里的出口商们坚持以现金即时付款。结果,进口支付会经常拖欠;这样,在任何时候,出口贸易所获得的净收益,甚至可能会比外贸数据所显示的更大。

至于税收,港口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总是中央政府国库的最大贡献者。然而,在19世纪,这些地方税收的增长率似乎一直没有跟上该地区商业活动的膨胀率。^② 至少从其表面上看,当时港口城市及周边地区从奥斯曼帝国不断扩大的贸易中所产生的财富,一直没有大量流失。

就这样,财富留在创造它的地方,它的不断增长部分落入了私人腰包,因为19世纪的贸易几乎完全通过私人渠道组织和进行。从生产地点开始,一定程度的土地集中早就出现。但是,获得土地所有权的省城名流或者军事和文职官员,很少并且只在一些地区直接掌控了在他们的

① 关于人口流动,见 Kemal Karpat, *Ottoman Population, 1830-1914*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② 根据最佳估计,1872年在伊兹密尔大约3700万库鲁作为捐税被征收。在1879年,伊兹密尔的捐税估计大约相同。然而,刚好在1870年和1876年之间,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农业生产量增加了约20%。Kasaba,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96。

土地上进行的生产。大多数情况是,由于人员少,也出于其社会地位和社会背景,这些地方精英不得不通过转包、租赁和分包的方式来耕种土地。因此,无论所有权的性质和范围曾经可能是什么,几乎在每个地方,实际的生产单位事实上都是那些与真实或名义上的地主签订租赁合同来耕种小块中块土地的农户。出现这种局面的一个重大背景是,到19世纪,中央政府已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对土地所有者和耕种者的诸多控制。因此,租户、农民和地主,当他们彼此互动以及与商人和政府官员互动时,便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安全和自由。

213 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诸如税款包收人、旅行商队、商人—放债人、批发商代理人 and 经纪人、出口公司或者政府官员,生产地点与区域市场和港口城市连在一起。在这些群体中,流动的商业债主处于特别有利的位置,因为他们能够在内陆活动,能够维持必要的联系,并能够在内陆协调货物的流动。随着贸易的日益增长,这些团体在商业网络中获得了深远的势力和影响。在他们的成长和扩张中,这群人在政府政策和外国干预面前保持着独立,并因此与非国家领域在奥斯曼帝国中的崛起密切相关。

由非国家领域的成长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对奥斯曼帝国内部不同民族和宗教团体的相对地位有重要影响。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赫然崛起,这种崛起最重要的是以牺牲犹太人的利益为代价,某种程度上也牺牲了穆斯林的利益。^[1]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希腊人作为国际性的代表族群成员、作为地中海东部的海员、流动商人、欧洲公司代理人、零售商和银行家而变得十分显赫。在奥斯曼帝国那些商业活跃地区,他们供职于所有的贸易和金融部门,并且成

[1] 见 Traian Stoianovich, "The Conquering Balkan Orthodox Mercha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 no. 2 (1960): 234 - 313; A. Ihsan Bagis, *Osmanlı Ticaretinde Gayri Müslimler* (Ankara: Turhan, 1983); Stelios Papadopoulos, *The Greek Merchant Marine* (Athens: Central Bank of Greece, 1972); Braude and Lewis, ed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Empire*; Gerasimos Augustinos, *The Greeks of Asia Minor*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为帝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的固定中间人。因此，相比于亚美尼亚人、犹太人、黎凡特人或外国人，希腊人主导了像安纳托利亚西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这些地区日益成长的非国家领域。

希腊人显要地位的获得及增长方式，不仅表现为对奥斯曼政府的独立，而且表现为其对欧洲各国政策的独立。希腊人并不把他们的出人头地归功于外国势力的帮助，而是归功于他们在地中海东部的分布方式。他们在该地区广泛分布，由此组成一个通向四面八方的自然渠道构成的网络，也为他们提供了利用国内和国际市场开放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希腊人最终从外部获得的支持，是他们异军突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事实上，当英国人最初进入安纳托利亚西部时，他们在希腊人社区或任何其他当地社区，并没有遇到天然盟友。情况远不止如此。英国人最初的计划是用自己的代表来削弱当地社群，失算以后，就转而安排其他（较弱的）社群的成员（如犹太人社群）取代，而犹太人被认为更容易控制。

导致中间人势力和影响力日增的很多活动，要么源自港口城市，要么集中在港口城市，这进一步抬高了这些地方在非国家领域中的地位。在 19 世纪后半叶，同时代的观察家已经将伊兹密尔港描述为“安纳托利亚的城市女王，爱奥尼亚的王冠，亚洲的宝石”。^① 扫视一下该港口和其他港口非穆斯林居住区的生活，就可以看到城市存在的所有要素。这里有报纸、学校、专业协会、社交俱乐部和政治组织，都由地方委员会管理。^② 相比于港口城市产生的引力场，以及促使沿海地区发展的力量，资源 211 和财富朝相反方向的流动就显得很弱并且影响也很小了。而夹杂其间的无休无止的强盗行为（趁火打劫、抢劫和绑架），不仅干扰了贸易，而且，更重要的是，促使一度聚集于沿海地区的财富在内陆更广的区域再分配。因此，在 19 世纪中叶繁荣背景下，奥斯曼帝国的港口城市成了实实在在的的特权地区，成为各种非国家领域的种种行为、关系和流动的舞

①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7 December 1853.

② 见 Tuncer Baykara, *Izmir Sehri ve Tarihi* (Izmir, 1974), p. 110. M. A. Ubicini, *Letters from Turkey*, vol. 1 (London: John Murray, 1856), pp. 249–250.

台或聚集点。

奥斯曼政府改革帝国行政所采取的大多数措施,都是在这一总体背景下出台的。在这些措施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焦点:一方面,总体目标是通过完整保留官僚机构的特权地位以维护帝国的统一;另一方面,至少有部分官僚日益认识到,环境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奥斯曼政府必须融入而不是扭转这些变化,才能维持自己的地位。与其他看法不同的是,这两条思路不是在分离的政策中得到反映,也不属于官僚体系中两个不同的“阵营”。多数时候,它们都体现在同一政策之中,这使得这些政策从外表看根本就是矛盾的或完全无效的。同样,我们也看到,同一个人,无论他是在野还是在朝,会对手头遇到的问题而持截然相反的看法。这种不协调的结果,导致那些恰恰享有对现代土耳其崛起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之盛誉的政策举措,也被其他学者认定为其多半是维护传统帝国政治的。^①

通过恢复帝国政治最初宗旨以拯救帝国的全部动力,都可以归功于重要政治家接受熏陶的文化环境。尽管这种“文化”的信条历时弥久且深入人心,但它们现在处于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环境之中,官僚阶级的权力和动力都遭到严重削弱。官员们很快就会发现,要履行职责和养家糊口,他们必须融入已经把帝国团团围住的经济网络之中。在执行公共事务和运作私人事务中寻求金融大佬的帮助,是实现融入的一个办法。从苏丹^②开始到官僚机构的最高层再到最底层,各级官员都聘请了私人银行家为其服务。结果,这一占据主导地位的非穆斯林团体,获得了接近最有影响力的奥斯曼行政权力中心的特权机会(不过是非正式的机会)。同时,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列强签订的商业条约,为奥斯曼国家融入
215 区域和全球经济网络开启了更为正式的另外途径。从这个角度审视,便

① 将 Bernard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与 Halil İnalcik, “Sened-i İttifak ve Gülhane Hattı Hümayunu”, *Belleten*, 28 (1964) 相比较。

② 苏丹,某些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的称号。——译注

会看到,19世纪奥斯曼帝国接近于欧洲国家及其制度的日益开放性特征,来源于由各种团体和关系所构成的非国家领域加诸中央政府权力之上的种种限制。与这些张力相比,此间西方思想的输入和传播在塑造奥斯曼政策的基调中,更多地扮演了辅助的角色。

除了追求保守与改革的双重目标所具有的内在矛盾之外,特定的改革政策也因它们得以制定的背景而变得更加复杂。作为多种势力经常竞争和冲突的结果,其中一些政策的最终形式,与当它们单纯地反映官僚精英的意志和期望时差异巨大。例如,在1840年到1867年之间,奥斯曼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步骤来修改和重新设计省级行政系统。^①从一个角度审视,通过赋予中央政府更多的权力、最重要的是赋予其任命省级领导者的权力,这些举措确实涉及行政结构的再集权。但在这里看来,我们把这些措施看作重新划省并使省界更加合理,废除包税制并将征税的权利授予任命官员,规范民事机构以禁止政府官员滥收税费以代替工资收入,以及通过国籍和护照方面的法律。

然而,恰恰是省级改革和行政改革过程,还包含了一些深谋远虑的举措,它们相当于对各省的多元团体独立权力的认可。例如,一些当地名人被任命到政府职位上,并且,在有了新成立的省议会之后,富裕家庭的成员有了参与地方政治的舞台。这些议会或咨询机构,是通过复杂的选举体系被建构起来的,这使得它们具备了某种程度的代表性,并提高了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②同时,还采取了一些步骤以确保非穆斯林加入并参与省议会。经过在巴尔干地区的一个试验阶段之后,议会在大多数省份以及省以下的每个层级上都建立起来了。然而,这些行政改

① Roderick Davison,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136 - 171; İlber Ortaylı, *Tanzimatdan Cumhuriyete Yerel Yönetim Gelenegi* (İstanbul: Hil Yayınları, 1985).

② Ortaylı, *Tanzimatdan Cumhuriyete Yerel Yönetim Gelenegi*, pp. 33 - 45, 67 - 91. 还可见 Stanford J. Shaw, "The Origin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the Ottoman Empire", in R. B. Winder, ed., *Near Eastern Round Tabl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9).

革思路,并没有真正导致权力从中央向各省继而向非国家领域的下移。一方面,这些议会一旦建立起来,就被纳入一个新的等级序列之中,其中那些较大行政单元的议会比那些较小城镇的议会更有权威。^①结果,出现了一个新的官僚等级体系,它与旧官僚体系并驾齐驱而不是取而代之。事实上,这些宣称具有“代表性”的议会,赋予奥斯曼帝国政府某种程度的合法性,从而使其得到巩固。省议会议员的选举过程极为复杂——它的设计是为确保穆斯林占多数,即使像安纳托利亚西部这样的地区也要如此。本来,像这样的地方,若以人口构成为选举基础,这种“确保”谈不上合理的。作为这些改革的一部分,像伊兹密尔和贝鲁特这些新兴城市,也被设为省会城市,其意图是把它们与再集权的中央政府拉得更靠近一些。

奥斯曼政府与欧洲列强在 19 世纪签订的“友好与自由贸易条约”(Treaties of Friendship and Free Trade),是官僚机构发现其自身所追求的目标具有内在矛盾的又一个范例。^②表面上,这些条约旨在向外国商品开放奥斯曼市场,限制或废除由中央政府及其地方代表所制造的贸易垄断,并且,最重要的是,可以让英国帮助受到围攻的奥斯曼政府来对抗包括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在内的总督的反叛。不可否认,欧洲列强有点胁迫奥斯曼国家同意签署条约的意味,毕竟条约主要是为帮助扩大英国新工业产品的海外市场而设计的。不过,就奥斯曼政府一方而言,也有自愿参与与合作的成分,这样才能使协议成为现实。在国内权力斗争中,奥斯曼帝国将这些协议视为吸引外部帮助并由此削弱各省某些势力强大的团体的经济实力的一种手段。事实上,条约约定的贸易自由化,被证明是对像穆罕默德·阿里之流的地方官员和封疆大吏地位的重大打击,因为他们靠的是贸易垄断收入来供养其经济组织和军队并维护其独立地位。但是,在 19 世纪特有的背景下,自由贸易一旦被制度化,奥

① Davison,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p. 147.

② R. Kasaba, "Treaties and Friendships: British Imperialism, The Ottoman Empire and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4, no. 2 (1993): 215-241.

斯曼政府在实践中就没有别的选择了。最后,奥斯曼帝国的对外贸易大幅度增加,英国成为奥斯曼政府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是,随条约而来的某些后果,就完全超出奥斯曼政府的预见和预期了。首先,贸易额的增长恰恰直接提高了早已成为非国家领域主要部分的中间人和商人团体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奥斯曼帝国的一些非穆斯林臣民获得了外国政府的治外法权保护。这种特权极大地提高了商业活动的安全性和帝国中非穆斯林团体的整体地位。

在奥斯曼政府当局追求其具有内在矛盾性的政策之时,非国家领域内的各部分和各团体,也在界定并捍卫各自的利益和行动领域;他们通常自行其是,或不顾中央政府在做什么。例如,1819年在伊兹密尔发生的骚乱,主要是由新富的希腊商人组织的,以反对地方教会及其领导人的教权。^①然而,很快地,商业界分成了两拨人,一部分只服务于地方市场,另一部分则涉足对外贸易。前者为他们的事业团结地方行会成员,并倾向于教会统治阶层所鼓吹的保守立场;后者则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新学派——The Gymnase Philologique。该学派被认为是势力日增的希腊社群中更具国际视野的商人的象征,专门从事现代哲学传授,以此替代教会的保守教义。这个事态表明,非国家领域可以成为自主行动的场所,也说明了把非穆斯林社群视为未分化的整体是不得要领的。 217

在另一个例子里,当中央政府召集各省代表在伊斯坦布尔开会征求对省议会的意见时,包括非穆斯林社群领袖在内的地方名人,都将这一举动视为向平民赋权的一个策略。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地方精英们安排亲信参会审议。^②当初省议会成立之时,这些地方显要人物要么直接、要么通过他们的亲信,迅速在其中占据位置。因此,在多数情况下,省议

① 这一解释来自 P. Iliou, “Luttes Sociales et Mouvement des Lumieres a Smyrne en 1819”, in *Structure Sociale Developpement Culturel des zones sud-est Europeennes et Adriatiques aux XVIIe-XVIIIe siecles* (Bucharest, 1975), pp. 296–315.

② İlber Ortaylı, *Tanzimatdan Cumhuriyete Yerel Yönetim Gelenegi*, pp. 43–45.

会没有成为改革工具,反而成了中央和地方利益代表之间争斗的场所,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变成了反对改变现状的各种改革提议的有效屏障。

1858年黎巴嫩发生的内战也可以追溯到帝国非国家领域里的变化和分歧。在这里,冲突的关键点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穆斯林包税人团体以及基督教商人和农民,对被迫将他们刚提高的收益的一部分交付给国家当局或在外地主表示愤慨。^① 以大马士革和黎巴嫩内战的骚乱为标志,经历几年的不稳定期后,骚乱在黎巴嫩被赋予特殊的行政地位后结束。除了包括一种多元群体借以积极参与省级行政管理的机制之外,在黎巴嫩建立的新体系也成为1864年即将在奥斯曼帝国大部分地区付诸实施的行省法(Provincial Law)的一个范本。^②

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例子来证明,中间商人团体中的不同部分是如何积极且直白地在彼此互相抗衡、在反对当地穆斯林社群、包括在违抗中央政府的代表中提高自己地位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非穆斯林的中间人在与中央政府打交道时都避免直接对抗,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奥斯曼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中一直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像囤积资金、抢购农作物、诱惑农民合作、躲过审查成立新的银行分支机构、在家族内部短距离长距离转移资金这些巧妙的手法,证明比直接抵抗手法能更有效地抵制中央政府的侵犯,从而捍卫自己的新的活动空间。

19世纪奥斯曼帝国所颁布的法律、法规、法令和条约,以及中央和省级政府所采用的手段和途径,并不是互不相干的措施。它们是长期再组织化过程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们的进展是累积性的。其中一些法令保留到共和国时代,甚至迄今仍然有效。奥斯曼国家当局在采取再组织化措施过程中被迫适应不断扩大的非国家领域,意味着无论是多么间接,非

^①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Methuen, 1981), pp. 166-173.

^② Davison,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p. 143.

国家领域的各种势力和各种关系在这些措施的起草和实施中都起到了形塑作用。正是在这种递归关系背景下,伴随着非国家领域的不断扩大,帝国官僚机构向奥斯曼—土耳其国家的转型发生了。

把讨论局限于港口城市或非穆斯林商人的地位、他们与官僚关系的变化之中,只是呈现奥斯曼帝国非国家领域强化的部分图景。尽管贸易是帝国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商人,尤其是大商人,拥有超过其人数比重的重要性,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他们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充其量是一个可观的“少数派”而已。因此,只从他们的角度来呈现非国家领域,只会对奥斯曼帝国社会产生一种扭曲的印象。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我现在扩大聚焦点,把影响奥斯曼帝国内部跨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劳动者的流动方式的变化考虑进来。

土地和劳动力

奥斯曼帝国的农业生产若没有实质的扩充,港口城市的崛起和中间商不断增长的财富便难以维持。人们曾多次试图估算帝国农业生产的总量、尤其是某些商业活跃地区农业产量。这些研究都显示,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农业生产多多少少都在持续增长,尤其是需求旺盛的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时期,增长率特别高。^①研究一下产量是如何扩大的是挺有趣的一件事。一则没有证据表明耕作土地的规模有重大变化,再则从19世纪早期到中期,农业生产技术也没有重大变化。^②固然,通过包税和其他方式,土地所有权有所集中,但这并不必然带来耕作方式的变革。大部分新“所有者”通过利用现有的租赁和分成方式开发其

① Donald Quataer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Ottoman Turke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1 (1980), pp. 38–55; Pamuk,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uropean Capitalism*; Kasaba,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② Charles Issawi,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urk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 206–210.

219 所持有的土地,而不是将其转换成种植园。在人均耕地大小没有任何重大变化、现代工具一直没有得到应用的情况下,农业产量绝对增长的唯一可能因素,是既有资源的更集约利用或人口的净增长,才会使大规模增长成为可能。事实上,在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人口确实增长了。^①这一增长部分是因为鼠疫的消退、大规模战争之间较长的和平间隔以及特别是在港口城市周围繁华地区人口出生率的整体提高。此外,沿海地区也受益于多个地方穆斯林难民的流入,这些地方要么是割让给其他国家,要么是在19世纪期间获得独立。

但是,人口的增长和来自被割让地区的移民,并不足以解释奥斯曼帝国农业生产的膨胀。前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并不均衡;后者直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前并未真正开始,在1870年代之前并不明显。要解释农业生产的增长,我们还需要关注帝国领土内既有劳动力的季节性迁移和长期迁移模式。最为重要的是,正是奥斯曼农民的流动,才使得对现有资源的集约利用成为可能。

19世纪的奥斯曼农业依赖并利用外来劳动力不足为奇。农业领域总是需要使用临时工,因为通常来说农活在不同季节分布不均。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这些迁徙流动的人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为了在新的繁荣地区工作,他们愿意长途跋涉。例如,据英国领事估计,1860年生活在艾登省的99.17万人中,有11万人是“流民”。^②劳动力流动的明显增加,很容易被归因为港口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繁荣经济所产生的拉力。这无疑是在维持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并不能解释劳动力流动增加的根源。毕竟,如果说集约种植和季节性迁徙的某种结合是农业产量显著增加的关键,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开始产量会增加进而对被认为

① Justin McCarthy, *Muslims and Minorities: The Population of Ottoman Anatolia and the End of the Empire* (New York: NYU Press, 1983). Karpat, *Ottoman Population, 1830-1914*. Issawi,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urkey*, pp. 17-19.

② Great Britain, Public Record Office, Foreign Office,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O 78-1533; 277-278.

是这种增长的先决条件的流动劳动力产生“拉力”。显然,流动劳动力是奥斯曼帝国农业生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远不是一个事后调整的因素,或只是扩张时期的一个特征。

集中审视 19 世纪这个扩张和紧缩交替进行的时代,我们可以辨别 220 出为农业提供源源不断人力资源的流动劳动力的几种不同类型。首先,在持有土地的小农与那些持有土地并在城市地区谋生的人之间存在有规律的劳动力交换。以这种方式推进的劳动力集中,从一开始对奥斯曼经济的活力和弹性就是至关重要的——对农业部门尤其如此。早在 18 世纪,当农村地区 and 沿海城镇出现新的机遇时,这种交叉流动就加剧了,其范围扩展到更广阔的国土。奥斯曼的人口登记表明,早在 1830 年代,在西部和南部的沿海城镇,人们很容易就会碰到来自遥远东部省份的“外来工人”。^①

第二种流动类型看起来要比第一种组织得更好。从 17 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商业繁荣地区的地方名商巨贾,组织了大量来自周边地区的年轻人到他们不断扩张的土地上工作。在没有组织化招募的一些地方,人们也会独自来到这里寻求就业机会。^②

第三种包含了大量由部落组织的人群,他们在高地的游牧与低地的农耕活动中季节性流动。这一群体一年一次的流动种植活动,是他们区

① 奥斯曼的人口登记资料存放于伊斯坦布尔的首相府的档案室里。它们是在“Maliye Cerride” (ML. CRD) 的分类之下。客籍工人的例子可在编号为 2, 80, 92 的文件里找到。还可见 Alain Duben, “Turkish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10, no. 1 (Spring 1985): 75 - 97; Kemal Karpat, *Gecekondu: Rural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 2; Caglar Keyder, “The Cycle of Sharecropping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Small Peasant Ownership in Turkey”,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0, nos. 2 - 3 (January-April 1983): 130 - 145.

② 这种流动的例子也可在奥斯曼人口登记资料中找到;例如, ML. CRD 31, ML. CRD 298 (见注 ①)。还可见 Gilles Vernet, “Ayan de la Région d'Izmir et commerce du Levant”, *Etudes Balkaniques*, 12, no. 3 (1976): 71 - 83; Tuncer Baykara, “XIX. Yüzyılda Urla Yanmadasmıda Nüfus Hareketleri”, Osman Ökyar and Halil İnalçık eds., *Türkiye'nin Sosyal ve İktisadi Tarihi* (Ankara: Meteksan, 1980), pp. 279 - 286. Augustinos, *The Greeks of Asia Minor*, pp. 11 - 32.

别于那些更广为人知也时常被人混淆的“游牧民族”的重要标志。奥斯曼政府当局为这些人取了一个特殊的名号“库纳尔听差”(那些离开土地的人)并制定隔离政策来监管其流动。有些情况下,这些部落的冬夏季牧场之间的距离非常远,超过数百英里。比如,有报告说,有个部落一直在阿达纳—阿勒颇地区(今天位于土耳其南部和叙利亚北部的一个地区)和远至安纳托利亚西部的艾登之间转移。^①库纳尔听差部落沿着他们的祖先世代走过的相同路线,就像列队游行一样,以一种有序的方式移动。通过他们的流动及其所涉及的大量活动,这些团体构成了帝国经济组织中的关键纽带。^②

除了团体流动之外,还有一批通常为了寻求政治庇护或经济利益而独自长途迁徙的人。乡村地区的世袭做法和产权分配并不总是能够适应人口增长或经济波动。^③因此,在人口增长或社会经济整体动荡时代,年轻人很可能选择离开以暂时或永久地逃避义务。特别是安纳托利亚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好像总是有过剩的人口随时准备离家出走,对乡下老家没有丝毫的牵挂。例如,在19世纪,受雇于伊斯坦布尔码头的大部分搬运工,就是来自东部省份的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同样,几乎所有在伊兹密尔外国领事馆里的信差和警卫,都是库尔德人。

从农户成员到俄罗斯战争难民,所有这些人群的显著动力,都要归因于那些奥斯曼政府无力控制的力量。例如,农民如果决定集中他们的资源或加倍他们的经营活动,那是因为他们准备在地区市场销售增量产品来增加收入。同样,商人动员家庭关系在奥斯曼边境来回运输他们的商品和财富,是因为货物转移有利可图。许多库纳尔听差和游牧部落的世代周期性迁徙,是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包括奥斯曼当局对他们的统

① Cengiz Orhonlu, *Osmanti İmparatorlugunda Asiretlerin İskant* (İstanbul: Eren, 1987), p. 71.

② 见 Rhoads Murphy, "Some Features of Nomadism in the Ottoman Empire",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8 (1984): 189-197.

③ Alain Duben, "Turkish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 82, 92.

治政策的起起落落。

很长一段时间,每一种流动类型都为农民提供了保护自己不受中央政府管束和征敛的有效方法。然而,在18世纪以后,奥斯曼政府试图撒下一张天罗地网,限制和约束个人穿越从中欧延伸至汉志省的广阔领土。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运用军事手段,强迫人们服从定居命令。政府感到处理库纳尔听差部落问题最为棘手,尝试种种方法,恩威并施,想让他们改变季节性迁移的习惯,最后还是无功而返。政府采用的一种策略是武装某些部落,将他们编入奥斯曼军队,然后用他们对抗敌对部落。其中的案例包括:1691年梅利的尤罗克人被编入伊弗拉达法提汗部队(*The Evlad-a Fatihan*)的特殊部队;1860年代在平定安纳托利亚南部暴动中利用的费卡伊伊斯拉希耶部落(*The Fırka-i Islahiye*);1890年代,哈米迪耶库尔德人被组织起来,编入军队。^①在更普遍的层面上,整个奥斯曼帝国晚期和共和国早期,一系列运动被组织起来,让各类群体在帝国不断萎缩的国土上流动、移居和安置。就像行政改革一样,中央政府在实施很多政策时,不得不倚靠当地的强势人物,如省级统治者、城市贵族和酋长等等。这些人物多数通过掌握当地的一支固定和稳定的(因此是可靠的)劳动力来获取既得利益。但鉴于劳动力相对稀缺,他们也希望能够吸收边远地区的人力,或者,换句话说,有机会调动他们。得益于他们在省里各级政府和议会中新近获得的职位,这些地方的达官贵人能够影响这些有关迁徙方式、所有权和农业雇工的政策文件的执行。就这样,每种不同的迁徙方式都成了实施改革的国家与正在变化的社会之间竞争的一个领域。因此,人员流动提供了一种研究国家形成与社会建构之互动的有用视角。

最后,奥斯曼帝国作为整体所推出的许多改革措施,比如与安置人民有关的措施,受到的地方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至今对其真实目的是

① Cengiz Orhonlu, *Osmanlı İmparatorluğunda Asiretlerin İskanı*, p. 4; Cevdet Paşa, *Tezâkir*, vol. 1 (Ankara: Türk Tarih Kurumu, 1986), p. 7; Earl Percy, *Highlands of Asiatic Turkey* (London, 1901), p. 131.

什么还没有达成共识。^① 例如, 1858 年土地法典 (the Land Code of 1858) 据说是为了保护小农家庭, 但未能提出对个人占有土地多少的限制; 它承认土地私有的观念, 但赋予田地开放的概念, 而且对农民在“他们的”小块地皮上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作出诸多限制; 也许最重要的是, 它没有对手头持有大量土地的农民提出任何调整原则。结果, 农民与大地产所有者的关系任由个别化处理, 取决于帝国内部不同地区的环境变化情况。例如, 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 政府试图禁止公共所有权 (*mush'a*), 但是没有办法执行这样一个彻底的措施。像 *mush'a* 这种所有制体系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并根植于当地习俗中。这些制度的某些方面, 像轮流所有权, 很难向一个局外人解释。这样, 除了调节农业种植之外, *mush'a* 还是支撑和保障乡村社区的有价值的手段。同时, 不同类型的公共所有权或多或少对移民开放, 在某种意义上既容纳外来者也使得本地村民可以离开。此外, 一些社区可以在不同类型之间来回变换, 这使得外人更难干预。^② 最后, 像其他措施一样, 1858 年土地法典变成人皆可欲之物; 它没有改变或扭转任何东西, 但为地区的不同转型提供合法外衣, 而区域性差异正是国家首先要啃的硬骨头。

同样, 在经济和行政重组中, 许多处理土地的措施以渐进累积的方式推出。经过少量修改, 1858 年法典仍是奥斯曼帝国及其主要继承者土耳其规范其土地所有者和土地耕作的主要法令。这导致 18 世纪之后从奥斯曼土地上进化而来的产权关系和实践的长期存在。对于那些原属于奥斯曼帝国、现属于土耳其的地方来说, 这不仅意味着小农经济的进一步扩大, 而且意味着迁移模式和迁移渠道的长期存在。

向农产品市场注入大量资金的当地中间人, 部分失去产业愿意长途

① 将 Omer Lütfi Barkan, “Türk Toprak Hukuku Tarihinde Tanzimat ve 1271 (1858) Tarihli Arazi Kanunnamesi”, in *Tanzimat* (Istanbul: T. C. Marifet Vekaleti, 1940), pp. 1–101, 与 Haim Gerber,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87), pp. 67–90 做比较, 就能看出这一点。

② Owe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orld Economy*, pp. 256–259.

迁徙的人,以及仍然作为重点生产单位的小农户,在 19 世纪期间被一起编入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中。对我们的研究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组合以独立于中央政府的面目而出现,但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国家的变迁而发展,并在 19 世纪期间奥斯曼政府制定的重组政策上直接或间接地打下深深的烙印。

223

国家和非国家领域的意识形态

源于非国家领域的关系和过程对国家政策形成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贸易和生产领域,而且延及思想和文化领域。某种意义上,这是最难研究的一种关系,因为这两个领域似乎经常代表着彼此完全隔绝的两个世界。对非国家领域的任何关键团体来说,罕有机会单独或通过组织来积极介入塑造整个帝国的政策或直接参与奥斯曼—土耳其国家正在进行的转型。多数时候,他们的干预从本质上看是间接性和防御性的。这正是奥斯曼帝国—土耳其社会转型的一个重大悖论。那些在非国家领域很有实力的团体在政治方面持续沉默,所采取的是类似于最近在不同社会背景下被描述的“弱者的武器”手段。^① 这种不协调致使许多新老学者认为,在奥斯曼帝国和中东的转型环境中,市民社会是缺位的。尽管通过提出一些本质区别来“解释”这一异常现象在策略上比较便利,但这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只不过是重述问题转移了焦点而已。

至于被公认为对非国家领域具有塑造作用的强势团体为什么没有公然参与政治行动,有几个具体的历史原因。首先,奥斯曼帝国官僚的改革取向,打开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缺口。从 18 世纪开始,帝国政府逐渐放弃了许多用以确保民众顺从其权威与合法性的古典准则。帝国不再是人民的保护者、帝国疆域的守护者、实质上保守的伊斯兰教义的维护者,这些构成了奥斯曼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帝国现在首要的

^① 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愿望似乎是按照现代性、西方主义、世俗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重组帝国。随着奥斯曼官僚成了改良旗手,他们似乎打破了与人民的社会公约。赛里夫·马尔丁(Şerif Mardin)曾将由此造成的现状描述为局限于政界的改革话语与越来越退让保守的社会话语之间的一个分歧点。鉴于两个层面的实质性差异,非国家领域的任何部分都很难撕破缺口、影响政治进程。^①

况且,非国家领域中的每个团体都包含着来自不同领域的社会性甚至地域性的分化因素。简言之,在移民群体、各省名流和非穆斯林商人的内部或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以促使他们采取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以实现共同构想的奥斯曼—土耳其国家理想。事实上,如果说所有这些团体存在共同主张的话,那便是他们对于一个弱国家的不明言偏好:国家不要干预他们生产、贸易和迁移的“自由”。在此背景下,阿纳斯塔修斯在本章开头的抱怨就变得更有意义了。更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一背景观照下,那些关于坦志麦特改革与非穆斯林买办利益之间所谓相容性的观点,就显得不合时宜。^②

最后,妨碍非国家领域共同政治行动长期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一些中间商和地方显贵是在地方层面上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朝不同方向追求各自的地方自治或民族独立。很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上述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持续软弱。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政策目标的普遍分歧不单是对奥斯曼社会中的非穆斯林而言的。奥斯曼劳动力大军中常年移民的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就激烈反对出于征税目的而要求他们定居的政策。1845年,奥斯曼军队就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重新夺回因抗议坦志麦特改革而被库尔德人队伍占领的凡城。^③与之类似,在卡尔巴拉,已事实上获得自治的什叶派,就曾与试图强推集中训令改革运

① Serif Mardin, “The Just and the Unjust”, *Daedalus*, 120, no. 3 (Summer 1991): 113–129.

② 见 R. Kasaba, “Was There a Compradore Bourgeoisie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Western Anatolia?” *Review*, 11 (1988): 215–228.

③ FO 78/614, 13 June, 10 July, 13 August, 10 October, 1845.

动的奥斯曼军队打了一场血战。^①

尽管国家领域与非国家领域之间的沟通渠道少之又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官僚精英所宣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非国家领域完全不相干。^②且不论其他,后者提供了一个清晰而合适的反对目标,帮助官僚精英认识到他们任务的紧迫性。此外,在反对非国家领域内部出现的各种观点时,如果没有其他理由,官僚们不得不汲取这些敌对主张的某些要素和某些方面,而不是一味地反对、否定和(希望)取代它们。

追踪这两个领域之间所展开的无声对话的方式之一,是把逐渐出现的激进世俗主义作为 20 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条目来加以审视。在 19 世纪,宗教界对官僚改革的反制变得日益明显;当时,不仅历史上不满逊尼派统治者的什叶派,还有逊尼派本身,都已加入了苏菲派兄弟会,召集他们的弟兄反对政府的统一训令。这些社群围绕对伊斯兰教义的不同版本的地方性解释而组织起来,这种差异在近东有着悠久的历史。19 世纪,在许多改革措施看上去过于迎合欧洲人的口味之时,他们的支持度上升了,他们的反抗特征也更加突出了。不满的核心是坦志麦特政府没有把臣民当作“统一共同体”并且忽略了自身职责。^③相反,政府似乎助长了某种等级制和社会结构,而后者在伊斯兰教里显然没有根基。225

最初,官僚机构面对宗教反对也左右为难。在 19 世纪大多数时间,

[1] Juan R. I. Cole, "Mafia, Moh, and Shi'ism in Iraq: The Rebellion of Ottoman Karbala 1824-1843", *Past and Present*, 112 (1986): 112-143.

[2] 对在其形成时期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进行广泛阐述的两个重要思想家是 Yusuf Akgura 和 Ziya Gökalp。见 Yusuf Akgura, *Uc Tarz-ı Siyaset* (Ankara: Türk Tarih Kurumu, 1976, rpt. from 1904 ed.); Ziya Gökalp, *The Principles of Turkism* (Leiden: E. J. Brill, 1968, rpt. from 1924 ed.). 关于 Akgura, 见 Francois Georgeon, *Türk Milliyetçiliğinin Kökenleri* (Ankara: Yurt Yayınları, 1986)。关于 Gökalp, 见 Taha Parla,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Ziya Gökalp* (Leiden: E. J. Brill, 1985)。关于一般的、历史性的描述, 见 Niyazi Berkes,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Montreal, 1964), 以及 Serif Mardin, *Relig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Turkey* (Albany: SUNY Press, 1989)。

[3] 见 Serif Mardin, "Freedom in an Ottoman Perspective", M. Heper and A. Evin eds., *State, Democracy, and the Military: Turkey in the Eighties* (Berlin, 1988), pp. 23-35.

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领袖认为,有可能建造一个新的“奥斯曼国家”并获得帝国所有臣民的效忠,不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到了19世纪末,巴尔干各省典型的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的不断胜利,迫使官僚精英反思上述设想。他们中间一股有影响的势力,仅仅把改革措施聚焦于帝国的穆斯林臣民,提倡利用宗教来团结穆斯林奥斯曼人,同时把奥斯曼国家的权力和影响力延伸到亚洲。这种想法也很快被放弃了,因为奥斯曼国家在肥沃新月地带、在自己的阿拉伯—穆斯林臣民面前遇到了难关,更别提统一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梦想了。到了20世纪初期,土耳其文化成了拯救奥斯曼—土耳其国家仅有的选择了。这股思想最初起源于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难民中间。因此,它隐含着吸引中亚突厥语民族支持和参与创建泛突厥帝国的可能性,但最终它只在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区域——安纳托利亚半岛赢得支持。^①

作为超越这些阶段的统治意识形态,它不仅变得难于妥协,而且直接与所有其他意识形态特别是非世俗的宇宙论相冲突。事实上,新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固执地把自己界定在刻板的世俗之中的方式,可以被视为其感受到来自伊斯兰教(特别是苏菲反对派)的威胁、因此也是后者实力日增的一个信号。事实上,到1920年代,随着多种民族主义竞争的消退,苏菲兄弟会成了土耳其非国家甚至反国家的主要的、很可能是唯一的组织形式。不足为奇的是,新生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首当其冲的也是最为艰巨的挑战,就来自兄弟会的圈子。在短期内,土耳其国家能够把大部分运动赶入地下。但是政府仍然担心他们的活动。以至于在1960年,当最有名的苏菲派领袖之一——白第五札曼·萨伊德·努尔西(Bediuzzaman Said Nursi)逝世并被葬在土耳其东部时,他的尸体被掘出并用军用飞机运往土耳其西部,被重新埋葬在一个无名坟墓里,防止成

^① 需要注意的是,从一开始,驱逐出境就作为处理那些不想参与这一项目者的一种可能方式而被提出。见 Ahmet Ferit, “Bir Mektup”, in Y. Akcura, *Uc Tarz-a Siyaset*, p. 49.

为圣地。^①

226

结论

奥斯曼—土耳其国家和社会背道而驰的轨迹表明，正是形式上强化奥斯曼—土耳其国家权力的改革过程本身，也在挤压着这个国家获得认同的范围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组织得更好、更有效也更“现代”的奥斯曼—土耳其国，实质上变得更“软弱”。如果社会各团体、阶级和组织能够在总体安排中自我建构以表达和促进自身利益，那么被这些实践包围并最终塑造的国家，也有可能实质上变得强大。在我看来，19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样的系列实践在奥斯曼帝国发生过，但是它们未能涵盖并改变国家。

至此，把这个问题放在比较层面并质问为什么晚期帝国和早期共和国都没有尝试过为盘踞在非国家领域中的各种团体打开政治参与的真正渠道，可能是有益的。假如当局这么做的话，就会使奥斯曼政府切实变得更加强大，就像裴宜理在本书第六章所讨论的中国的转型那样。阐述这两个帝国历史发展差异的所有原因超出本文的范围。如前所述，其中有些原因与在奥斯曼帝国中发展起来的非国家领域的性质和特点有关。我们切不可忘记，奥斯曼—土耳其的精英刻意回避来自非国家领域的压力。在奥斯曼帝国后期和共和国早期，有关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特意排除而不是容纳许多以非国家领域为实力基础的团体——因为非国家行动者和团体的持续缄默，使军事—官僚精英更容易作为独立集团、甚至作为阶级来表达和发展自身的利益。

在 19 世纪历史进程中，官僚们在改革奥斯曼帝国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制度来看，到 19 世纪末奥斯曼政府确实胜任对辖下领土的更好管理。有些税收得到中央任命的领薪官员的评估和征收；国家机构

^① Mardin, *Relig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Turkey*, p. 101.

变得更分化并且每个机构的任务分工也更明确;编纂的法典日益增多,其条文也更加精确;军队彻底职业化,有了规范的招募和训练模式;新成立的学校支撑着中央政府的文官和军人两支队伍,培养未来的部长和指挥官。在机构改革中,官僚们将其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际领域的一连串偶然情况。首先,他们所感兴趣的帝国行政权力再集中,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帕默斯顿勋爵领导制定的近东政策完全吻合。^①其次,在19世纪末,德国在近东日益增长的利益给奥斯曼帝国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开辟空间提供了新的杠杆和机会。^②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随后土耳其—希腊战争的特殊环境,允许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官僚精英排斥并最终消除非国家领域的两个最突出群体: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成了土耳其境内剩下的唯一少数民族;自那时起,他们就进行着反对土耳其国家的不间断起义。

正是军事—官僚精英在巩固奥斯曼国家方面的显著成功,使土耳其成为20世纪50、60年代现代化研究的最热门话题之一。^③但是,本书所采用的长时段视角显示,这一成功是在政治和经济日益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背景下实现的,并且,这种成功几乎只限于国家统治的外在层面。诚然,军队、警察和法院似乎都更有效也更集中,但是国家大厦缺乏承载其日增的权力的坚固基础。没有任何改革措施曾经尝试着真正授权给中央官僚机构影响国家领域之外的团体或机构。

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在帝国晚期和共和国早期,力量的形式扩张持

① 对在帕默斯顿领导下的英国外交政策的经典解释,见 Charles Webster, *The Foreign Policy of Palmerston*, 2 vols. (London, 1951)。Frank Edgar Bailey, *British Policy and the Turkish Reform Mov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2), 是对这一重要关系的第一次彻底的分析。关于这些问题最近的研究,见 C. A. Bayly, *The Imperial Meridian*, London: Longman, 1989。

② I. Ortaylı, *Osmanlı İmparatorluğunda Alman Nufuzu*, İstanbul: Kaynak, 1983; U. Trumpener, *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 1914 - 191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③ 例如,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C.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续伴随着实质虚弱，成为国家的固有特征。直到 1950 年，才有重大的转折使得土耳其国家权力得到实质强化；当时，大众阶级，尤其是农民，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被纳入政治过程。^[1]但那是另一则故事了。

[1] 见 C. Keyder, *State and Class in Turkey* (London: Verso, 1987); R. Kasaba, "Populism and Democracy in Turkey, 1946-1961", E. Goldberg, R. Kasaba, J. Migdal, eds., *Rules and Rights in the Middle Eas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3), pp. 43-68.

后殖民非洲的农民—国家关系：接触与脱离的模式

迈克尔·布拉顿

引言

当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危机的核心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深深的隔阂。国家精英与农业生产者——可以说是非洲社会行动者中政治关联性最大的两个类别——在对双方都有利的国家发展计划中彼此还没有充分接触。时至今日，两类群体还未就国家精英对政治生存的要求与普通非洲人对经济福利的渴望之间达成实际共识。

因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后殖民时期的历史，实质上是一场悬而未决的政治斗争：一方面，政治精英希望在分散的、多数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群之上扩大国家权威；另一方面，农民坚决要在自己的生活领域中保留自主的权力。这些群体之间的斗争集中于早期现代经济发展的经典问题上：谁来生产农业盈余？谁来配置这些盈余？在什么条件下配置？

本文的观点是，国家—农民的斗争之所以在非洲国家仍然僵持，是因为两者中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力资源来解决它。国家和农民组织在宣示政治自主权方面都更加得心应手，但要建构政治能力，就没有那么顺

利了。谁都征服不了对方。因此,他们之间更常见的互动结果是彼此的政治脱离,而不是为达成共同目标而齐心协力的密切接触。

但是,我们不应给后殖民时期非洲的国家—社会关系绘制一幅过于好斗或悲观的图景,从而忽略了有助于化干戈为玉帛的因素。虽然精英和农民都试图将各自的政治自主权最大化,但是各方都不情愿地发现,扩大政治自主权只有在相互依存中才能实现。国家精英受制于财政收入需要,无论是为发展型国家的新兴机构提供资金,还是要满足更加巧取豪夺的治理方式的资助需求。政府官员自然想扩大财源,但往往发现不得不重新依靠从农民那里榨取脆弱且不稳定的收入。因此,政府面临的挑战是,是否向农民阶级中生产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妥协。农民从他们自身角度,努力通过商品生产和非农就业所产生的现金流来提高他们的家庭福利。在这样做时,他们总是遭遇国家机构对市场的垄断或管制。因此,生产者必须评估,利用政府基本服务的收益是否大于服从公共管制的成本。 232

因此说,国家行动者和社会行动者之间是一对模糊、矛盾、爱恨交加的关系。国家行动者试图通过把计划愿景强加给社会以改变社会,但从长远来说,他们若不在社会成员中寻求合法性,就不可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对社会行动者来说,他们憎恨公共管制,但作为获取国家管控的大量资源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有时也愿意接受管制。这种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辩证关系,是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动和活力之源。

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这种爱恨交加的关系,在非洲各种乡村组织里上演。本章探讨的是支配非洲农村政治经济的农业生产和市场销售组织。在非洲国家独立以前,国家政策制定者就已经开始试图规定农民的生产活动,例如,通过建立商品生产计划,让农民生产者种植经济作物用于出口。甚至在农产品还没有完全进仓入库的地方,政策制定者就已经颁布法律和法规,强制独立小农的农产品只能通过官方销售局和合作社出售。

作为一种选择,通常是为了反制政府的举措,农民们一直努力建立

自己的农村组织。例如,他们创建了非正式的贸易网络以满足本地需求或绕开低效的官方渠道将农产品卖到全国和国际市场去。在独立小农户已经深度卷入农产品营销网络的地方,他们有时还组建政治协会以维护和发展他们的团体利益。

无论农村组织是由国家还是由社会行动者发起成立的,政府官员和农民生产者都力争将其据为己有并影响它们。因为农村组织存在竞争,所以它们的运行并不总是如创立者所愿。国家针对贫困农户所发起的生产计划有可能会被地方层面的精英群体所俘获和榨取。以独立自主的社会运动作为起点的农民协会,可能最终会被国家在农村的分支机构所笼络收
233 买。实际结果取决于农民和国家各自所动员的权力资源之间的平衡。

本章第一部分提出一个框架来帮助分析这些国家—社会关系。这一框架采取权力分析的形式,当中主要的解释性因素是有组织的社会行动者的(接触或脱离)政治活动以及(政治自治和政治能力的)权力资源。具体来说,我的问题是:国家官员和其他社会团体是彼此吸引,还是互相躲避?他们在此过程中所凭借的权力资源是什么?国家和社会同时提出的政治动议是彼此加强,还是相互削弱?

本章的第二部分将后殖民主义时代非洲政治的演变解释为国家—社会关系变动的一个序列。这一四阶段的序列是一种概念性建构,是从国家和社会行动者对另一方所采取的接触或脱离的主动性推导出来的。它是许多不同国家经验中的核心趋势的凝练,因此可能与任何特定国家中所发生事件的年份不尽相符。其要点如下:起初,在民族独立的余光照耀下,政策精英和农民通过双方都参与的国家倡导的商品生产计划,提出了一个共同的政治议程。随着经济规划者通过供销合作社在农村努力扩大国家的管辖范围,农民生产者对这些机构带来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成本感到非常失望,并撤回了对国家的支持。再后来,随着农民将自己自主地再组织到非正式贸易网络之中,国家遭遇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结果是国家和社会的相互脱离。最后,虽然许多非洲国家的政治关系仍然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有一些地方自治的农民协会尝试着发起一种双

向赋权的与国家的政策对话。

组织权力分析

社会中的国家

政治研究包括对社会行动者所追求和使用的权力的研究。权力——确保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能力——在单独行动时难以获得。为了增强权力行使的可靠性，人们必须与他人联合起来；因此，权力是在政治组织的框架内得以累积和行使的。因为权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它往往内化于数量有限的此类组织。

政治组织结构可能或多或少是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尤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非正式的政治部门范围广泛。一些组织的非正式程度可能会很高——例如，种族或阶级运动，或个人人脉关系——最好把它234看作是社会势力。而在另外的情形下，目的性强的行动者可能会建立专门组织，它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有一个包含了领导层、工作人员和一般成员的行政结构。通过这些正式的组织，他们朝着一套明确的政治目标实施行动计划。

在所有的政治组织中，国家是最大、最正式和最有势力的。然而，国家只是众多组织形式中的一种：它是社会内部的一种组织，与其他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政治组织共存互动。现代国家的独特之处在于，控制国家权力的精英通过宣称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来规范社会行为而寻求霸权。^①一种语用学的定义，将国家机构界定为更宽泛的政治组织所属于的类别，相比于以国家为中心的定义方法有很大的优势。社会中的国

① Joel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96. Victor Azarya, "Reorder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corporation and Disengagement", in Donald Rothchild and Naomi Chazan, eds., *The Precarious Balance: State and Society in Afric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8), pp. 3-21.

家视角有助于让研究者体认到,政治权力有许多位点,而不只位于由国家行政机构把控的政治顶峰上。如果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决心把自己组织起来,那么权力就能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外集聚起来并被用来反制过度的政治集权。总之,国家精英不会自动享有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必须通过与一大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政治组织的竞争角逐来获取。

如果权力的配置是政治竞争的结果,那么国家—社会的关系就必然是不确定的。国家精英的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占优势,但其他社会行动者的集体偏好有时也会占主导。国家可能会不顾社会强烈反抗进行统治,也可能会在社会成员的默许认可下进行统治。同样,非国家行动者可能通过明确提出不容讨价还价的诉求而一意孤行,或是调整他们的偏好来迁就国家精英的喜好。因此,虽然国家—社会的互动经常导致冲突,但是这些互动同样也能达到彼此互惠、组织化调适和双向增益的效果。因此,研究的任务是确定在何种条件下,国家和社会行动者声称独享(有时候是分享)政治权力。

政治主动行为:接触和脱离

当政治行动者寻求影响其他人的行为时,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接触。当他们没有这种要求,或是想方设法躲避别人的这种要求时,我们可以将他们的行动描述为政治脱离。该专用词来自比较政治学新近出版的一本著作,它质疑以国家为中心的“接触范式”的普遍适用性。^①唐纳德·罗斯切尔德(Donald Rothchild)和内奥米·哈占,尝试着把非洲

① Victor Azarya and Naomi Chazan, “Disengagement from the State in Africa: Reflections on the Experience of Ghana and Guine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 (1987): 106 - 131. 还可见 Albert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Goran Hyden, *No Shortcuts to Progress African Development Management in Perspective* (London: Heinemann, 1983);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Michael Bratton, “Beyond the State: Civil Society and Associational Life in Africa”, *World Politics*, 41, no. 3 (1989): 407 - 430.

非正式的政治和经济活动概念化,提出“以脱离替代吸纳”。^①

本章将这些思想拓展到一个系统的比较研究框架中。政治主动权 235
表现为四种基本形式,划分的依据是政治行动者最初的动机以及他们在
社会中所处的位置:

国家发起的接触是指国家精英所采取的专断式的规范社会行为的努力。这种类型的政治主动权包括国家疆域的平定、法律法规的颁布以及集中计划经济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努力等在内的行为。

国家发起的脱离是指国家精英在公共权威影响受限时的收缩。这种收缩明显地表现在诸如对解放区叛乱的让步、法定管辖权向传统或宗教权威的让渡以及经济活动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等方面。

社会发起的脱离是指普通公民撤离国家权威领域或以其他方式逃避服从官方指令的行动。其实例包括难民外逃、对民事和刑事法律的普遍漠视以及黑市交易。

社会发起的接触是指公民影响公共资源分配或控制国家权力的集体行动。其实例包括投票、游说、申请庇护、政治抗议以及武装抵抗。

权力资源:自主权与能力

国家和社会行动者所采取的政治行动不完全是随意的。在政治行动中做出接触或脱离的选择,以及这些举措成功的可能性,都受限于行动者获得权力资源的机会。因此,我们必须揭开权力本身的构成要素。对当代国家的种种争论显示了权力所具有的两个基本维度:政治自主权和政治能力。

自主权意指社会行动者不受他人主张的约束而采取政治主动行为的范围。从国家方面来说,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将自主权定

① Rotheild and Chazan, eds., *The Precarious Balance*, pp. 124 - 148.

义为政治精英“制定和追求目标”的能力,这些目标“不只是社会团体、阶级或社会的需要或利益的简单反映”。^①就国家以外的领域而言,自主权的概念适用于任何社会组织的成员都力图确定一个受保护的领域并在其中做出独立决定的地方。只要一个组织的成员的利益可以顶住外在压力而驱动一项独特的政治行动计划,就可以说该组织是自主的。

能力是指实施政治决策的资质。斯考切波再一次仅仅针对国家,将能力定义为“落实——尤其是遭遇强大的社会团体现实的或潜在的阻挠时,或面临严峻的社会经济环境时——官方目标”的手段。^②显然,政治能力的概念也适用于任何组织,而不论它运作的领域所在。当一个组织拥有完成某件事情所需要的全方位资源——人力的、财政的、物质的、强制性的和象征性的——时,能力就存在。就政治组织而言,政治支持的象征性资源尤为重要。虽然在短期内,领导者可以单凭强制手段实施政治计划——并在实施中只使用物质奖励——但从长远看,他们必须通过提升共同价值观来使领导权合法化。

当前关于国家的文献往往模糊了政治自主权与政治能力之间的区别。埃里克·诺德林格(Eric Nordlinger)根据其中一个范畴来衡量另一个从而混淆了这两个概念。他认为“国家把自己的偏好变成权威行动时,就是自主的”。^③乔尔·S.米格代尔提出“‘谁制定规则’的问题……引导我们探究国家能力的核心要素”,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自主权是否和怎样使能力成为可能。^④斯考切波最清楚这些概念之间应有的关系:“国家能力的解释与国家自主制定目标的解释密切相关,因为国家官员

①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eusch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9.

② 同上。

③ Eric Nordlinger, “Taking the State Seriously”, in Myron Weiner and Samuel Huntington, eds.,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p. 361.

④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p. 397.

最有可能凭借所掌握的手段来做事。”^①总之，分析家看来都同意能力划定了自主权的界限。

然而，政治自主权和政治能力从解析意义上看，是社会组织的不同特质，也应该被这样看待。自主权回答了“谁发起”的问题，而能力告诉我们“是如何执行的”问题。自主权指的是行动者为组织设定目标的过程，而能力则表示目标实现的手段。这些属性是独立的：虽然它们经常同时出现并彼此加强，但这不是必然的。一个组织可能筑起足够的神圣政治空间，俾使领导人能够做出独立决策；但是，与此同时，它可能无法调动必要的资源来执行这些决策。相反，一个组织可能有大量的资源，但可能无法动用这些资源，因为它可能受制于像选举这样的程序而无法设置独立的目标。

就政治权力的积累而言，自主权优先于能力。政治斗争最基本的议题涉及目的而不是手段。一个享有自主权的组织的领导人，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可以在政治争端中设置议程。即使他们不能单方面确保争议议题的结局，但有自主权的组织领导人至少拥有消极权力，不支持发布权威命令的任何要求。相比之下，一个有相当大的能力但是缺乏自主权的组织，其领导人可能会发现他们不得不完成一项不是由他们自己做出决定的政治行动。因此，能力不能代替自主权，反之亦然。事实上，自主权是典型的“弱者的武器”，任何社会组织至少能够以此摆脱政治竞争。

如果说政治自主权是小型社会组织的秘密武器的话，那么政治能力就是国家的支柱。换句话说，政治能力在众多组织的不平衡分布中更有利于国家。不要忘了，韦伯对国家的著名定义，指向国家对基本的强制性政治资源的排他性垄断的要求。至于汲取和累积其他重要的人力、财政和物质资源方面的能力，国家也是出类拔萃的。然而，有趣的是，在与象征性资源这种赋予机构持久的普遍价值相关的市场里，国家精英遇到巨大的困难。事实上，如果不能通过定期选举和经济业绩获得合法地

①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p. 16.

位,那么国家对强制性和生产性资源的垄断就会成为套在国家脖子上的沉重负担。在垄断性的国家机构表现不佳的情况下,政治合法性很容易流向社会中的其他组织,到那时,这些组织随时准备利用民众的支持争取获得影响力或权力。

因此,政治自主权是权力的基石;它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斗争的漩涡中心。它为接下来的段落分析提供了一个起点。虽然大多数研究国家的学者都详述了国家的自主权,但是阿尔弗雷德·斯特潘更精微的分析表明,公民社会中机构的自主权是影响政权机关中国家精英成功的一个因素。^①例如,社会中的一个组织,它的存在使其成员的利益与其他公民团体成员和国家精英阶层成员的利益区分开来。从经验上说,国家和社会行动者都不曾把自主权的最大化做到在做决策时能够完全不考虑外部因素的地步。至多,他们各自具有相对的或部分的自主权,虽然国家和社会领域之间的界限可能会持续拉锯并不断转换。正如艾伦·伊萨克曼(Allen Isaacman)所说,“重塑(这)部分自主权的斗争和谈判”,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斗争的主要地带”。^②

缺乏能力的自主权:非洲的组织

在非洲的环境里政治组织的自主权和能力到底有多少?对这一问题,让我们依次参照农民和国家组织来探讨吧。

农民一只脚站在家庭经济内,另一只脚站在更广泛的生产、交换和权威体系里,因此他们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就变得模糊不清了。作为农耕者,农民管理自己劳作的土地,使用家庭劳动以满足他们大部分生产需要,他们在政治上拥有潜在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农民也生产少量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并因此易受那些盘剥经济盈余的局外人的支配,这种

① Alfred Stepan,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84.

② Allen F. Isaacman, "Peasants and Rural Social Protest in Afric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 1, Series 1 (1989): 3.

盘剥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通过使用国家权力。

非洲是一个农民社会的大陆,平均大约 70% 的人口从事农业。^① 238 农业是基本的生存方式,因为在非洲农村,赚取非农收入的机会不多。农村家庭只是部分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并且,非洲农民的阶级界线相对并不明显。还是有少数的例外——特别是在降水量大的高地地区——在那里,非洲农村社会,被拥有土地的农民资产阶级与没有土地的租户和无产者阶级所撕裂。在多数情况下,阶级形成的过程没有完成,造成农村人口只是“半资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内部的最主要区别存在于自给自足的人们和从市场化的农业盈余赚钱的人们之间。对本文而言,这种区别很重要,因为正是第二种群体,即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者,最经常与国家农业部门接触互动。

获得土地和控制家庭劳动是农民政治自主权的根源,俾使非洲农民得以“保护关键资源并反抗……压迫,实施个人补救措施”。^② 在各种外部强加的限制内,非洲农民已经能够做到“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何时生产以及生产什么”。^③ 最具企业精神的生产者都经历过特伦斯·兰杰(Terrence Ranger)所谓的“农民的选择”,也就是从农业商品生产中获取收入,同时保持获得土地和劳动力的渠道并坚持独立做出农事管理决定的权利。^④ 换句话说,农民的上层已努力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市场,同时规避国家对规范和整顿农业生产的努力。

农民生产者虽然享有自主权,但他们一直没能建立拥有足够的实力代表其政治利益的组织。在非洲独立期间,农民没能及时增加自身在民族主义者联盟中的分量,他们的角色很大程度上限于为以城市为基础

① World Bank, *Sub-Saharan Africa: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le Growth: A Long Term Perspective Study*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89), p. 277.

② Isaacman, “Peasants and Rural Social Protest”, p. 3; Hyden, *No Shortcuts to Progress*.

③ 同上。

④ Terrence Ranger, *Peasant Consciousness and Guerilla War in Zimbabwe: A Comparative Study*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85), p. 25.

的中产阶级政治领袖提供大批的追随者。农民在反抗殖民主义斗争中所起的领导或催化作用仅仅通过对农业规制或土地普遍匮乏的地方的抗议表现出来。在后殖民时代,农民在政治上被遣散了,分散到家庭、社区、移民和城市领域之中。分散化的农民安置模式、农村居民低下的受教育水平以及他们对非亲属关系“陌生人”的普遍不信任,所有这些都不利于集体政治行动。农民中间真正冒出的一些组织——如农业工作组或储蓄社团——往往着眼于解决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且限于地方,视野狭隘。

239 现在将视角转向非洲国家。它同样享有政治自主权,特别是对农村社会而言。非洲国家用的是一套外来的政治体制,最初是从外国移植来的。在殖民时期,政府官员享有不受限制的决策范围,他们将欧洲的法律和法规强加给非洲社会。通常在不考虑大众意愿的情况下,殖民当局就决定划分国界、通过对农民征税增加财政收入以及强迫农民进行经济作物生产等。虽然说殖民政府如果没有当地人的辅助便明显没有在各地推行政策的政治能力,但是,在新成立的国家舞台上,它行使着几乎绝对的权力。

在去殖民化时期,国家的自主权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断层线暂时被打破了。在获得自由的最初时期里,新的非洲政治领袖们感到有义务满足那些当初因其美好生活的承诺而动员起来的民众的要求。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由于他们缺乏实现广大农村发展的资源,也由于他们逐渐品尝到了权力果实的美味,新的政治精英重申了国家的优先地位和自主权。他们通过破坏选举和立法制度并引入一党专政和军人政体,重新恢复作为社会规则提供者的权利。在一些国家,个人独裁者独断专横的命令把自主决策变成一门下流的艺术。

与此同时,国家的政治能力衰退了。从一开始,国家机构就因缺乏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人员而陷入瘫痪,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殖民当局从未培训过非洲人的参政能力。独立之后,公共服务的快速非洲化通常伴随着有专业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人才的流失。此外,非洲的政治领袖恰

恰在其技能最短缺的地方着手实施国家干预：即，对经济生产的综合规划与管理。随着国有企业的崩溃——在农业部门以及其他部门中——他们的失败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基础。

因此，在后殖民时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两类普遍的制度条件渗透着国家—社会关系。所有的组织——无论是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还是建立在社会其他地方——都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相对的政治自主权；第二，有限的政治能力。尽管所有的组织都是不成形的并缺乏资源，但自主权仍允许它们老练地规避那些超出它们能力所及的政治要求。正如下一节所示，在非洲，国家官员和农民生产者已采取主动，在农业部门里采取合作行动，互相接触。然而，大部分这样的行动都未能成功，无论是经济层面的增加出口收入和家庭收入，还是政治层面的国家和农民组织双向赋权形式，都是如此。这些令人失望的结果，不仅可以追溯到非洲所有类型的组织实施计划的有限能力，还可以追溯到这样的事实，即不论是国家还是社会，政治行动者都足够独立，都可以脱离对方，躲进小楼成一统。

240

非洲的农民—国家关系模式

国家精英和其他社会行动者同时采取政治主动以获得有利的政治结果。实际的结果——如果有一方获胜，是哪一方？存在妥协吗？——是由在这种遭遇战中各方的实力对比决定的。

如果结合具体的案例，政治结果的分析将会富有成效。案例最好是单个国家中具体的国家机构和农民组织。作为初步的尝试，本章剩余的部分，对后殖民时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各国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哪一种占主流，取决于国家精英和农民的政治主动行为是相互强化的还是相互冲突的。后殖民时代以在政治接触上的共同努力为开端，但是这一令人愉悦的步调一致，很快就被成效更少的互动模式所代替了：起初是农民开始撤退并脱离，

尔后是国家开始撤退并脱离。直到最近,我们才偶尔看到有组织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民重新接触市场和国家领域的努力迹象。

国家与社会接触:生产计划

独立之后,国家的政治能力很快就出手用在农村控制生产提供服务。借助于外国的技术和财政援助,国家的政治能力达到了高峰。经历了民族主义动员而余兴未消的农民,非常乐意赋予他们的新统治者以合法性,并期待着抓住发展的第一批果实。因此,国家计划者与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民的利益一致,都支持已经规划好的农业生产计划。此类计划阐明的农村组织形式,是内部的社会行动者与外部的国家双向接触带来的。

尽管生产计划是由农业部、土地安置委员会或半国营公司发起的,可是它们却采用农民生产的形式。与国营农场农民是拿工资的工人不同的是,生产计划围绕小农狭小地块制定,农民同时继续享有自己的土地。其典型的形式是安置计划,罗伯特·钱伯斯把这个计划界定为“一种在明确的土地单位中引导变化的组织化努力”,这种努力包括“人口的转移、计划与控制因素”。^① 在非洲,安置计划大小不等,大到苏丹在 180 万英亩土地上安置超过 100 万人的巨型的杰济拉计划,小到只牵涉不超过 100 英亩土地和一些小农户的微型方案。这些计划包括以下一种或几种目的:土地改革、难民救济、经济作物生产、土壤保护、灌溉或农业机械化。

241 生产计划最初始于殖民地时期,到 20 世纪 60 年代成了非洲国家发展计划者手中的一件有利工具。从国家角度来看,它们提供了一个可控环境,以此引入技术革新,提高经济作物产量,增创外汇收入。通过把稀缺投资集中到有潜力的区域,计划者一度期待看到农业能够被重组和现

^① Robert Chambers, *Settlement Schemes in Tropical Africa: A Study of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pp. 11, 39.

代化。从社会角度来看,安置计划之所以对农民有吸引力,是因为他们被承诺可以得到生产性资源——无论是地产、耕地、附属物或者信贷服务,通常都是以补贴率衡量的——而这些东西在农村腹地一般是得不到的。由于这些计划可以使农业生产变得有利可图并为农民提供生活水平提高的机会,所以说农民们都有加入其中的强烈动机。事实上,在热带非洲,农业生产计划经常被超额预订,等着申请的名单远远超过可供地块的数量。

然而,生产计划给农民带来的经济机会,却是以丧失政治自主权为代价的。这些计划是由相关国家机关任命的管理人员操纵的,他们与加入计划的农民在收入、教育和地位上有巨大差异。钱伯斯说:“明确的地域边界、物理隔离以及‘臣民’社区,(赋予)管理者一种地位,俾使他很可能轻易地把自己看作对定居者拥有统治权的首领。”^①与计划的制定和运作有关的重大决定,落到了农业官员手里:例如,佃农选择的标准、土地所有权的安排、作物及生产方法的选择、支付产品的手段以及佃农代表选举的规则。国家管理者试图依照生产过程的技术要求来规范佃农的行为,如依据灌溉计划适时分配用水,按照机械化方案有效使用拖拉机。他们的命令得到实施惩罚能力的支持:口头和书面警告,法律诉讼,甚至赶出安置计划。

冲突通常发生在官方的目标与农民的利益不一致时。例如,佃农希望可以在安置地与原来的社区之间自由来往;而管理人员却要限制旷工。计划管理者还要求佃农服从土地利用、牲畜喂养和作物管理方面的指示;但佃农想方设法逃避执行,经常是为了将时间投入到私人经济活动中。管理人员偏好一种井然有序、整齐划一的感觉,出于行政便利而设置安置模式;佃农却希望一种松散的、有生机的安置模式,购置一些便利设施以方便社会交往。

^① Robert Chambers, *Settlement Schemes in Tropical Africa: A Study of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p. 157.

在国家与社会行动者之间围绕生产计划的斗争中,农民处于非常不利
 的地位:他们的组织化程度不如国家机关,不仅牺牲了政治自主权,而
 242 且缺乏政治能力。正是生产计划所牵涉的人口流动或挑选“好”农夫的
 事实,意味着社会关系——小规模组织的凝聚力——被打断了。参与计
 划的农民与家乡社区隔离了,彼此之间也孤立了。虽然从社会阶级的角
 度看,佃农是同质化的,但在文化上却通常是异质化的,混杂着不同种族
 背景的人,彼此之间很难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妇女的地位被削弱
 了,尤其是被切断了与可相互支持的网络的联系。再引一次钱伯斯的话:
 “至少在移居的早期阶段,移居者还必须忍受人际交往的匮乏。”^①

权力资源的错置,意味着相互接触导致国家的支配地位和参加生产
 计划的农民的从属地位。被安置机构拉拢的社会组织——例如,佃农顾
 问委员会——主要充当管理人员的宣传者的角色,以及传达管理计划运
 行规则的渠道。在某些情况下,佃农顾问委员会被指派去负责制定或批
 准纪律处分,包括将佃农从计划里赶出去,由此保护了管理人员,使其免
 于直接受到非议。将社会组织拉拢到计划中的目的,是使政府官员腾出
 精力专注于解决技术和经济效率问题。这样,在容纳了比殖民时期家长
 式结构更高程度的民主代表的同时,后殖民时代非洲的生产计划还造就
 了技术型和官僚型的组织文化。在集中制定的规则范围内让农民参与
 决策,成功实施的生产计划成了非洲农村中国家构建社会关系的最好
 例子。

各种形式的农村组织都遭受内部矛盾的困扰。从国家角度来看,安
 置计划代价高昂:作为特殊项目,它们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并勾画了
 非常清晰的框架;然而,与此同时,它们占用了稀缺资源,耗尽了国家在
 服务供给上的能量,而其结果并不总是富有成效。那些宏伟的计划——
 如加纳的沃尔特河定居点和坦桑尼亚的试点村庄聚落——因此是观察

① Robert Chambers, *Settlement Schemes in Tropical Africa: A Study of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p. 175.

惊人失败的首选对象。

从农民的角度来看,计划的吸引力取决于佃农挑选和组织生产是否被认为是自愿的。移居家庭很容易想起强制耕作的殖民制度,有时会认为自己是政府的临时雇员。生产计划管理者经常发现,“惩罚通常比奖励更容易广泛应用,奖励本质上只适合相对少数的人”。^[1] 对于进入这些计划的农民来说,政治自主权和政治结社的机会减少了。因此之故,这些计划很容易夭折。这样说来,特定生产计划的寿命长短,主要取决于 243 农民是否认为获得经济服务或农业收入的特殊机会超过了政治自主性丧失的代价。

国家接触/社会脱离:供销合作社

由于非洲的国家精英从未有足够的政治能力把生产计划覆盖到农村,他们转而采取其他农村组织形式来接触农民。供销合作社代表了一种松散的国家—社会关系形式:生产者不参与移居计划,继续在独立的小块农田上耕作,农业官员不直接监督生产,只负责剩余农产品的处置。由农业部或总统办公室下属的专门政府部门管理的供销合作社,是非洲国家在农村所采取的最常见的组织化政治行动方式。

管理者推动建立了一种官方的农业合作社网络,以此为基础带动农民政治参与和自我管理。合作社被认为应该遵循开放与自愿加入、内部民主问责和利润共享的原则。与商业公司(追求利润)的目标不同,此类合作社需要在利润最大化与成员福利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在非洲国家的实践中,合作社成员的决策权是受到限制的,不仅受在市场上保持经济竞争力需要的限制,而且受国家强加的管理要求的限制。非洲的合作社几乎都不是生产集体。绝大多数都集中于像农业投入分配或农产品销售之类的服务功能上,偶尔也提供其他服务,如产

[1] Robert Chambers, *Settlement Schemes in Tropical Africa: A Study of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p. 182.

品加工、银行信贷和保险等。

最初由殖民政权开始采用的农业供销合作社,在独立后的一段时期内数量激增。例如,在1961年到1977年之间,肯尼亚的农业供销合作社农民成员数量从20万增加到近100万。^①在赞比亚,卡翁达总统于1965年发起了一个颇受欢迎的项目,该项目给那些愿意组织和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民提供现金补贴。^②国家和农民在合作组织中似乎有共同利益:“小农户被合作社所吸引,是因为他们把它当作改善自身命运的首选方式……政治领导者被合作社所吸引,是因为他们把它当作一个在国家直接采取经济活动与……调节私营企业经营活动之间的折中方案。”^③

回顾起来,后殖民时代非洲的合作运动由于大有好处而发展过快
244 了。虽然有大量的合作社注册在案,但是它们的存在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或高度制度化。选举产生的管理委员会由地方政治精英把持,而他们对自己的经济收入比对广泛增加农业收入和成员的社会福利更感兴趣。许多新的合作社都是无所作为或不能自力发展的,甚至有利可图的合作社也受困于领导和专业技能的缺乏。它们太经常遭受管理不善、行为不端和内部冲突等问题的困扰了。

面对这种不良局面,政府对合作运动的政策从推广转向巩固。到独立后第一个十年结束时,中央政府开始行使直接干预的权力。虽然对合作社的重组是从铲除腐败的角度对其进行辩护的,但国家干预总归违反了全体成员民主治理的原则。部长们终止了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并任命了新的官员,掌握了财务账本和资产,强迫各社团合并组建联盟。在某

① Torben Bager, *Marketing Cooperatives and Peasants in Kenya* (Uppsala: Scandanavia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1980), p. 25.

② Stephen Quick, "The Paradox of Popularity: 'Ideological' Program Implementation in Zambia", in Merilee Grindle, ed., *Politic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45-52.

③ Crawford Young, Neal Sherman, and Tim Rose, *Cooperatives and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Politics in Ghana and Ugand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1), pp. 215-216.

些情况下,没有正当理由就开始推行这些措施,目的是尽力防止地方领导人积累独立的权力基础。加纳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恩克鲁玛在 20 世纪 60 年代镇压了他在阿散蒂可可合作社中的政治对手;他的继任者一开始还容忍它们,但后来在 1977 年就正式取缔了合作社。

国家干预通常聚焦于合作社组织的高层,因为国家政治领导人没办法对地方社团进行细致的指导。国家通过供销合作社对农民的控制同样也限于周期性的危机形势。

由于国家缺乏直接监督自耕农的能力,国家领导人越来越严重依赖于间接的政策措施,比如农产品市场的行政管理。^① 农业供销合作社成了监管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作为全国商品营销委员会的代表,农业合作社在基层所执行的是关键政策措施,即强化从农村提取农业盈余的基础。作为该委员会的法定代表,合作社履行了“调节”商品的垄断权力,执行固定价格和质量等级标准,从支付给生产者的款项中扣除贷款还款和其他收费。

在这些情形下,供销合作社就成了国家机构的延伸。农民是否忠诚于这种组织形式,关键取决于农产品交易的条款。如果在生产成本方面能够得到公平价格的话,农民便会乐于参与合作事业。合作社运动在肯尼亚和科特迪瓦这样的国家最为兴盛,在那里农民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卖出产品,而且不用扣除苛杂的行政费用。在这些地方,出口作物的回报 245 高于在市场上买卖的粮食作物,农民都自愿重新配置土地和其他农业资源,以生产出口产品。

因此,对农业供销合作社的农民成员来说,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在面对国家和合作社本身的费用扣除时,是否能够获得一个有吸引力的收入。即使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农民的支持也不是全心全意的。托本·拜耳(Torben Bager)在研究肯尼亚基西的一项农业供销合作社项目时

① Robert Bates,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c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p. 11–61.

发现,只有18%的成员出席大会,而有24%的成员不知道谁是合作社的所有者,41%的成员声称希望他们的社团能独立于合作社,因为他们被扣除的费用太高了。^①农民关注的其他共同问题包括农作物款的拖欠、扣除费用的用途不够透明以及委员会成员或工作人员对基金的滥用等。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成员不可能把供销合作社当作他们自己的物业,而是——或许更恰当地说——当作半官方机构。

在非洲,只要在农业供销合作社被当作产生公共财政收入工具的地方,农民通常选择撤回自己的支持。抵制以“日常”形式开始。农民使用合作社的贷款购买非农产品和服务;他们将合作社供应的肥料用于粮食作物而不是经济作物;或者他们躲避偿还贷款。他们知道,营销委员会或农业金融公司往往缺乏对叛逆行为实施惩罚的意愿和能力。在极端情况下,农民完全离开官方市场,并寻找新的营生方式:或是放弃经济作物的生产,回到以前自给自足状态,或是像在下一节所展示的那样,通过建立非正式的贸易网络以绕开合作社。失去农民信任最可能发生在国家或地方精英为了自身利益私吞组织财产的地方。当这一切发生时,农民就会“用脚投票”,给合作社留下一副空壳子”。^②总之,他们脱离了。

国家与社会的脱离:贸易网络

当农民从合作社和官方管理的市场中脱离出来时,他们便寻找替代方法来获取商品,以维持家庭生产和消费。他们力图重建起与农业市场和其他市场的联系,只要这种联系是在国家控制范围之外就行。在继续践行退出国家领域这一选项的同时,生产者组织了自己的独立贸易网络。他们努力构建一套替代的交换关系,“钻制度的空子”。他们帮助建立或直接参与了“经济活动中多种多样的形式,有称为第二经济的、平行经济的、非正式经济的、地下经济的、黑色经济的或不正

① Bager, *Marketing Cooperatives*, pp. 81-85.

② Young et al., *Cooperatives and Development*, p. 222.

当经济的”。^①

在范围和形式上，贸易网络涵盖了从临时性的乡村市场到有组织的跨国走私的链条。由于这些网络是被设计用来躲避国家的，所以是社会 246 组织中一种明显的自治形式；不过，由于它们是建立在面对面关系基础之上的，往往缺乏组织能力。进一步讲，由于非正式网络抢夺了国库的赋税收入，因而也导致了国家能力的下降。最后，非洲各国政府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减少对农村的管控，并允许用社会自主行动权和社会机构代替有计划的干预。总而言之，贸易网络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脱离的条件下兴盛和繁荣起来了。

第二经济的爆炸性增长成为后殖民时代的非洲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之一。它包括了所有那些在没有被官方记录的情况下发生并且使国家丧失财政收入的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的某些部分可能是非法的，如跨越海关边境的走私或贿赂政府官员，但其他的经济活动可能单纯只是反社会的，例如囤积稀缺商品以获取利润。早在 1970 年的扎伊尔和塞内加尔，咖啡和花生的非法出口贸易所获得的收益，都超过了本国中央销售局的年度交易总额。到 1980 年，加纳和乌干达第二经济的规模如果不是超过、估计也接近官方的国内生产总值了。

农民对第二经济的参与是建立在可从生产如食物、鱼、野味和出口作物的可交易商品中获得财富的基础之上的。在生产者不再信任官方市场运作的情况下，农业可以部分地去商业化。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间，许多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者削减或放弃了出口作物的生产，以应对全球性或地方性价格下滑和生活消费品短缺。生产者的撤退，如果没有到自给自足的地步，也到了只生产粮食作物的地步。结果之一就是农村市场的食物比城市市场更充裕。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开始将粮食发送到在城镇的家庭成员手里，以换取在农村很难得到或很昂贵的物品，如化

^① Janet MacGaffey, *Entrepreneurs and Parasites: The Struggle for Indigenous Capitalism in Za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2.

肥、煤油或食用油等。这种交换是否对小生产者有好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在城乡贸易中处于关键的中间人位置。多数情况下,商人迅速调整自己的定位,以从非官方市场中谋取利润。

珍妮特·麦克戈弗雷(Janet MacGaffey)描述了一个有趣的案例:在扎伊尔北基伍省南德地区,在亲属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重要的长途贸易组织。^[1]该网络始于年轻的南德人初次合伙种植走私咖啡之时——通过顶在头上、以自行车和货车运输——穿过乌干达边境线,那里的产品价格更高,并且生活消费品也比扎伊尔丰富。他们取得了丰厚的回报,特别是在1976年全球咖啡价格意外上升之后。在乌干达,咖啡直接和汽车、零配件以及工业制成品等以物换物,而这些产品都运回了扎伊尔出售。在这些地方所赚的利润,接着再投资到合法的企业(最突出的是咖啡种植园)、城市房地产和批发市场中去。南德现在是贸易侨民的聚居地,他们控制了来自基伍省农村的干豆和新鲜蔬菜,通过基桑加尼的地方贸易中心,向首都金沙萨配送。按麦克戈弗雷的说法,他们是新兴商业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这种阶级地位的获得不应该归功于国家官员,而应归功于社会中的独立生产基础。

非洲公民大规模地自主从事有组织经济活动的事实,对国家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国家在领土边疆地区的统治尤其薄弱。因为非洲的国境线是依据社会群体的民族认同而人为划分的,所以边境地区通道众多,很难管制。亲属之间的贸易经常是跨境贸易。更糟糕的是,非洲的政治精英在征收所得税上一直苦于行政能力有限,因此国库收入就越发依赖于从进出口贸易中提取的费用、关税和利润。当贸易主要靠非法的或非正式的网络来经营时,这类税收就很难征收;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尤其是很珍贵的外汇收入减少。就这样,建立在社会基础上的贸易网络的出现,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

[1] Janet MacGaffey, *Entrepreneurs and Parasites: The Struggle for Indigenous Capitalism in Za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43-164.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构陷入瓦解的边缘。公共预算的缩减导致了公共服务和管理活动的中断,在乡村外围尤为严重。公共管理者发现,政府工资的滞涨赶不上通货的膨胀。缺勤沉重影响了行政效率,因为政府雇员要离开他们的办公桌,花时间去寻找食物和其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许多公务员最后认识到,他们的家庭前景在第二经济中会更光明,因此他们就开始“兼职”做另一份工作或进行小额贸易。在城市,几乎所有的居民都修建了家庭菜园,还有些人回到田地上谋求生计。随着人力资源和财政资源日益减少,国家精英的意志和国家机构的能力不可避免地涣散了。鉴于“官方法律规范的框架……没有信誉了”,^①国家精英除了让渡更多的规则制定权给社会行动者,别无选择。国家自身开始脱离社会了。

也许有人会认同尼尔森·卡丝菲尔(Nelson Kasfir)的说法,国家与第二经济是互相渗透的。^②虽说如果没有与政府官员勾结在第二经济中是不可能做成事,但这并不能作为国家方面具有强大的剩余控制权的证明。当政府官员接受贿赂而对非法活动熟视无睹时,他们不是在扩大而是在弱化国家的权威。当官员从事私下囤积和贸易时——即使只是通过亲属、中介和雇员——他们也就认可了自己的行为是不受法律命令约束的。国家官员参与第二经济,实际上意味着在一系列更引人注目的社会需要面前,国家的正式结构分崩离析了。²⁴⁸

国家的脱离在那些政府对经济实施了一揽子结构调整改革的非洲国家里被正式化了。这些改革包括如下一些或全部措施:消除行政管控以支持市场价格,解散亏损的国有企业,削减公共部门就业人数,以及为私人交易者进入农业市场提供机会。麦克戈弗雷不无讽刺地指出,第二经济按照近似自由市场原则运行;因此,“世界银行(在非洲)为化解食品生产危机所推出的一些步骤早已在运行了!”^③农民的非正式贸易自主行

① Azarya and Chazan, “Disengagement from the State in Africa”, p. 130.

② Nelson Kasfir, *State and Class in Africa* (London: Frank Cass, 1984), pp. 84–103.

③ MacGaffey, *Entrepreneurs and Parasites*, p. 140.

动与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的交加影响因此是一致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导致国家从社会中紧缩、撤退和脱离。

国家脱离/社会接触:农民协会

国家的撤退给国家和社会之间留下了组织空白。在一些非洲国家,这一空白被不稳定、甚至暴力所填充;而在其他国家,这一空白被新的、更受欢迎的农村组织形式所填补。

农民协会就是这样的一种农村组织形式,经由它,以社会为基础的行动者再次主动接触国家。农民协会的标志在于它的自主性,在于它是农民成员自发签约成立的自愿团体。它通常是个正式的组织模式,在其分化的结构内配置专门的功能,并且有着以成员自身可调动资源为基础的执行能力。

正式的志愿团体不会在小农生产者分散社群的社会背景下自动或频繁地产生。它的成立有几个必备的先决条件:农业部类中的互惠观念和集体行动传统;诸多强烈的共同经济利益,经常使农民欣然从事特定商品生产;有适用的经济利益合作模式,例如,前移民殖民地上的大型商业农民联盟;以及有利的经济环境,借此,农业盈余可以以高于家庭的利润出售。实践中,这意味着应该有开放合法的市场和高效的农业机构,这是那些已着手经济调整改革的非洲国家正逐步满足的条件。

农民协会的出现,是由于个体家庭在单独进行“农民选择”时面临着
249 诸多困难。对从农产品销售中寻求收入的小农户来说,商品流通中的规模经济效益通过彼此联合是最容易实现的。有进取心的农民组建社区为基础的团体,是为了解决像高昂的技术改良或田地与市场之间运输线路的不安全这类的共同问题。解决问题采取的形式是农业投入中的大宗采购或农业服务的集体承包。另外,小生产者经常发现自己在第二经济中的运作成本很高。他们无法充分利用市场机会,因为非法交易的成本高昂;需要加价、贿赂以及冒着被起诉的风险。第二经济使小生产者

不得不溢价购买并削价出售。因此,他们有时决定重返官方市场,并在那些市场里努力调整对他们有利的价格。

在一些非洲国家,有进取心的农民领袖主动将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合并,组成区域性或全国性的协会。这些组织通常采用联邦制结构,成员选举代表组成更高一级的机构。在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有很多区域性的农民协会,向地方政府委员会反映成员的诉求,并在一个被称为 G-S 协会的跨国网络中抱团互联。在津巴布韦,有一个叫作津巴布韦农民协会(ZFU)的全国性小农协会,代表中小规模土地耕作者。在肯尼亚,种植农民与大型商业运营商合作组建了一个全国性的游说团体——肯尼亚全国农民联合会(KNFU)。KNFU 周围团结着一大批特定商品会员协会,它们涉及谷物、乳制品以及最重要的咖啡。

这些组织承担着改善成员农业服务递送的功能。这涉及直接的商业活动:成员支付费用并雇佣人员来管理信贷、保险、信息、投入、运输及加工服务。在肯尼亚,农民组织处理的商品的价值,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40%。由于这些组织在制定公共政策的国家层面经常出没,他们在政治上也有所作为,向政策制定者传达种植农民的声音。^① 政府控制农业部门最有力的政策工具是商品定价。在肯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相比于任何其他问题,农民组织更经常发出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倡议。一些组织(例如,肯尼亚全国农民协会)的领导人支持放开对所有农产品价格管制,而另一些组织(例如,津巴布韦农民协会)的领导人则更偏向于维持对生产投入和运输的财政补贴。农民成立组织所牵涉的其他问题还包括土地分配、可用信贷以及农业营销委员会的逾期付款。

非洲农民组织使用各种不同的策略进行政策倡议。在塞内加尔,瓦隆人联谊会和其他区域协会采用的形式是通过地方的人际关系网络和联合行动,与政策制定者进行非正式的面对面接触,而津巴布韦农民协

250

① Michael Bratto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Africa: Can They Influence Public Policy?"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1, no. 1 (1990): 87–118.

会则通过正式提交给内阁的政策立场文件(例如,有关土地改革的文件)来补充游说渠道。赞比亚合作社联合会(ZCF)对政府采取的是一种合作态度,例如通过答应政府的要求以换取从国家那里接手精选的农业营销服务,而肯尼亚种植合作社联合会(KPCU)则直接与政府对着干,在政府试图恢复对咖啡销售付款的行政控制时,号召会员抵制咖啡交易。

这些农民政治再接触的努力,结果怎样?很难将农业价格政策的变化直接归因于小农在前移民殖民地——这些地方继承了有利于生产者的价格机制——的游说活动。但是,当农产品供应短缺——比如,由天气异常造成的——时,津巴布韦种植玉米的农民和肯尼亚种植咖啡的农民,已经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价格或付款上的优惠。其他农民政策的成功也值得一提:例如,苏丹的杰济拉佃农协会在1979年成功地调整并迫使政府延缓执行一项旨在对农民用于种植口粮作物的土地和水收费的计划;1984年,津巴布韦农民协会的前身为其成员赢得了津巴布韦政府土地改革计划中选择加入安置计划的资格。肯尼亚全国农民协会在1989年说服肯尼亚政府为小农提供了季节性贷款保险并核销了他们的坏账。

农民协会在政策改革里获得的成功与其政策倡议的策略之间,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刚才提到的成功案例中,这些组织都使用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方法,时而对抗,时而合作。当然,要了解农民协会的政治潜力,我们必须回到上文对国家与社会组织的权力资源的讨论上。农民协会的自主权没有问题,因为它们通常一开始就是作为自主的实体而存在的。但是,即使通过广大会员和民主问责赢得合法地位,农民协会仍然面临着组织能力的问题。它们对抗不了国家,除非其成员控制了国家所依赖的某种像外汇来源这样的战略资源:如同肯尼亚的咖啡,苏丹的棉花。类似地,农民协会不会使用政策倡议的正式渠道,除非它的政策分析能力提高了,堪与政府的能力媲美或能弥补其短板。

因此,非洲农民协会在政治接触中的主动作为,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推动公共政策改革。通常,农民发出的微弱的政治声音,没有被

躲在官方法规和官僚机构背后的防御性政府所理睬。通过协商机构允许农民在公开谈判中有一席之地的农业决策,少之又少。正如一个全国 251 农民领袖无望地宣称的那样:“政府不采纳私人建议。我们的影响是表面的。法律应该提供一个谈判程序。”就像他所看到的那样,农民协会面临的挑战,是怎样确保已经脱离社会的国家机构的回应和调整。

结论

本章提出了一个框架,用来研究以社会行动者的政治主动行为(接触或脱离)和源于社会组织的权力资源(自主权和能力)为基础的国家社会关系。这一框架已应用于分析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精英和农民生产者之间复杂的爱恨关系。这些社会行动者团体互相吸引,因为其中没有一个团体能够独自实现其经济目标;它们也互相排斥,因为都有维护决策自主权的政治愿望。

农民—国家关系的某些模式,是在对社会组织的分析中得出的,并通过(比较)相似的类型得以明确表述。非洲的国家精英仅仅在农村有限且是特许的小块区域内才成功引导了农民生产(生产计划)。通过价格控制和市场组织来影响大部分土地耕种者行为,这种官方努力失败了(供销合作社)。相反,通过采取躲避或绕开国家机构的应对机制,农民学会了在市场上自谋生计(贸易网络)。在少数情况下,农民建立了正式组织以获得农业服务,或在农业政策上对国家施加压力(农民协会)。

宽泛地说,每个模式都可以说是作为之前模式所遗留问题的一个结果而出现。例如,因为国家计划者无法将中央管理的生产计划覆盖到整个农村,所以他们不得不采取松散的农村组织形式,即鼓励独立的小农加入到供销合作社。接着,供销合作社让农民承担了过高的制度成本,使农民最终摆脱了它们,并以私人贸易网络取而代之。再后来,法外经营带来的种种不利,驱使许多农民重新进入政治领域,这回他们决定依

自己的偏好来修正规制市场的规则。

这不是在推销一种荒谬透顶的主张：后殖民时代非洲每一个地方，农民—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都循着一条单行道。在一些国家，生产计划和供销合作社持续兴旺，尤其是那些特殊的出口商品。农产品的国际走
252 私在非洲一些地区比在其他地区更盛行，取决于跨境价格的相对差异。农民协会一直是农村组织的一种例外形式，即使在那些存在这种形式的地方，它们通常与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更加密切相关。鉴于所有的实证案例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将来对农民—国家关系的深入研究，必须不仅按国度和历史分期，而且要按农业生态区和农民社会阶层来分解进行。

然而，总的来说，可以从研究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谁寻求改变谁？谁获胜了？达成什么样的政策和组织调整？对于后殖民时代的非洲来说，一般的结果是，虽然在一些国家，农民农业生产者新兴阶层已进入资本主义市场，但相对来说政治转型非常少见。后殖民国家仍然停留在外来制度移植没有扎根本土的状态之中；被隔绝在其农村小块土地上的农民，仍然未被纳入国家政策制定的主流。总体上，双向影响的缺乏，起因于国家内部和农民阶级内部的组织虽然都拥有政治自主权，但都缺乏政治能力。权力资源的这种组合意味着，每一方的组织都更擅长于采取政治撤退的回避策略，而不是热心于推进结构转型。因此，非洲政治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相互脱离的普遍景象。当前，国家—社会关系中互惠性的缺位，既是非洲大陆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表现，也是原因。

然而，并非一切都不可挽回。鉴于国家—社会关系的每种模式都充满了内部张力，社会行动者总有空间以发挥一定程度的政治主动性。非洲国家的撤退既制造了障碍，也创造了机会。虽然它使政策制定者远离公民问责的要求，但是国家发起的脱离也开辟了新的领域，民间组织借此可以成长和巩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可以在非国家的社会领域里积攒足够的实力，赋予他们自己的组织一种新的政治能力。通过这些组

织,农民或许最终能够采取强制性主动行为,俾使形成回应大众需求的国家政策。通过这种类型的政治接触,社会行动者将为政府当局增添合法性,进而促进一种相互赋权的建设性过程,这不仅将强化社会,而且将巩固国家。

接触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社团生活^①

内奥米·哈占

公民社会与国家—社会关系

非洲国家独立的第四个十年，恰逢这个大陆上的人们对社团生活重燃兴趣之时。注意到非政府组织数量和种类的观察家们，把它们当前的勃发视为非洲政治生活重组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②然而，社会组织的

① 本文得到了位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致力于和平进程的哈里·S. 杜鲁门研究所的支持。Galia Zabar Friedman 和 Nurit Hashimshoni 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援助。还要感谢关于“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这一主题的两个专题研讨会的参与者，感谢他们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② 见 Michael Bratton, “Beyond the State: Civil Society and Associational Life in Africa”, *World Politics*, 41, no. 3 (1989): 407–430; Samir Amin, “La Question Democratique dans le Tiers Monde Contemporain”, *Africa Development*, 14, no. 2 (1989): 17; 以及 Goran Hyden, “Governance and Liberalization: Tanzan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此论文发表在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tlanta, August 1989。

宏大理论与可靠的经验证据之间还有一个巨大鸿沟。^①因此,用于研究这些现象的概念工具已经超越了国家—社会二分法的知识限制就不足为奇了。

占据了公共团体与国家机构之间中间地带的公民社会概念,已被引进来填补这一空白。首先作为一个连接概念,公民社会“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指代一种据推定超出国家正式机构之外但未必摆脱与国家所有联系的社会现象”。^②这个术语至今还未被宽泛地当作社会的同义词,但在非洲背景下它早已被概念化了,被交替作为国家巩固的先决条件、国家权力的关键制动(因此与国家持续对抗)、国家利益与地方利害关系间的一个有益中介或一个社会机构的混合物——这些拥有正式结构的机构之间彼此互动,促进或阻碍治理和经济发展——而使用。^③

① 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笼统使用主要以论文形式出现。例如,除了见 Hyden, "Governance and Liberalization", 还可见 Goran Hyden, "African Social Structure", in Robert Berg and Jennifer Whitaker, eds., *Strategies for African Develop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52-80; Robert Fatton,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Africa", 论文发表在 the Thirty-seco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Atlanta, November 1989; 以及 Michael Bratton,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NGO Relations in Africa", *World Development*, 17, no. 4 (1989): 569-587。与此同时,有大量的关于个别组织的微观研究。对于社会组织,尤其是中间层次的社会组织被忽略了,这创造了一个带有不良理论和概念影响的实证真空。

② Dwayne Woods, "Civil Society in Europe and Africa: Limiting State Power Through a Public Sphere", 论文发表在 the Thirty-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Baltimore, November 1990, p. 1。

③ 例如,公民社会的不同概念可见 Jean François Bayart, "Civil Society in Africa", in Patrick Chabal, ed., *Political Domination in Africa: Reflections on the Limits of Powe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1; Robert Fatton, "Bringing the Ruling Class Back In: Class, State and Hegemony in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20, no. 3 (1989): 253; Goran Hyden, *No Shortcuts to Progress: African Development Management in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assim; and Larry Diamond, "Introduction: Roots of Failure, Seeds of Hope", in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frica*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88), esp. pp. 20-23。关于不同的分类,见 John W. Harbeson, "State,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in Africa: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论文发表在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September 1990。

对社会、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多元分歧观点,不仅反映了对非洲公民社会的定义和范围缺乏清晰认识,而且显示了下述观点所具有

256 的内在局限,即把公民社会的结构与组织,简单视为国家—社会互动的不同模式的明显产物。这种要么让社会对抗国家、要么社会与国家合作或共谋的概念视野,不可避免地

对政治领域产生了一种机械观点,既忽略了人文景观的网状结构,也忽略了社会交往的流动性质。

国家的形成与公民社会的出现是相关却又不同步的。社会中的国家框架要求我们对研究具体化的公民社会的重视程度,至少要与研究国家——作为社会中的一种组织,声称要

为所有人民制定约束性规则——的巩固等量齐观。^①实际上,“显而易见,国家在政治理论中的当代回溯多是围绕着国家权威组织与社会组织(尤其是集体行动组织)之间的关系建构的。”^②这个论断在非洲背景里尤其真实。在20世纪非洲大陆丰富的历史进程中,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一直在丰富的社会画面里同时(虽然是分别)被塑造。

但是,如果说近年来对国家研究的关注力日益精细入微的话,那么对公民社会动力学的关注很难说投入了同样的精力。本章的目的是勾勒一种方法来分析非洲公民社会的形成及变动过程,并探讨其对理解非洲大陆的国家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表象的意义。

研究的起点是假定国家和社会都既不是单一实体也不是有机实体,而必须被分解来看以便追溯和理解其演进动态。^③国家包含一套复杂的机构,它们在不同层级的人事代理中运行着。同样,组成社会的各种社会力量包含涵盖了各种各样的运动、网络、小型单元和正式组织,它们在规模、范围、目的、构造和资源上大相径庭。并非所有的

① 关于国家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概念,可见 Joel S. Migdal, “Strong States, Weak States: Power and Accommodation”, in Myron Weiner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eds.,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87), p. 396.

② Bert A. Rockman, “Minding the State-Or a State of Mind?: Issues in the Comparativ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tat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3, no. 1 (1990): 28.

③ 这些观点的详细阐明可见 Joel S. Migdal 的章节,也可参见本论文集的其他章节。

社会联合体都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一些组织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另一些则不然。公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但又与国家相联系：那些没有体现超越自身直接关切的狭隘联合体、那些只顾自身目标缺乏国家观念的狭隘团体以及那些完全被国家机构所控制的组织，都被排除在公民社会领域之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在多元环境中互相接触，为控制和妥协而持续争斗。发生在这些空间里的不断变化的互动，塑造并且重新界定了国家机构和社会力量的性质，产生了一个持续进行相互转化的动态格局。^①

公民社团为这种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组织环境。这些中层团体被视为从概念上既不同于先赋性或基层的社会力量，也不同于围绕国家发展 257 的政治团体。它们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的间隙里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在这些框架内部，各种人类学的、象征性的、物质性的和政治性的议题被争论被商讨，权力要么被聚合，要么被重新分配，或者被分解。^② 因此，对那些专注于阐明“处于不同社会代理机构层级的人们孜孜以求动员和组织各种资源、联盟和观念以应对不断变化环境”的方式的研究者来说，它们是关键节点。与此同时，这些公民社团是不同层面的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的场合，并“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在其中做出明确决策的机构和领域”。^③ 这些社团和机构一起组成了公民社会结构构件，在有组织的具有规范边界的环境中（与国家相反，后者建立的是此类活动的纵向中心）平行连接起多层次的不同利益和群体。

对中间社会组织的关注为把事物处理置于政治分析的核心（而不是

① 这一论点的简要总结可见 Joel S. Migdal, “The State in Society: Struggles and Accommodations in Multiple Arenas”, *Stat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Newsletter*, 13 (Spring 1990); esp. 2-3.

② Sara Berry, “Coping with Africa’s Food Crisis”, manuscript, Boston University, 1987, p. 1.

③ Jane Guyer, “Perestroika Without Glasnost”, in Carter Center, *Beyond Autocracy in Africa* (Atlanta: Emory University, 1989), p. 148.

作为其结果)提供了机会。如果说国家—社会的关系真是递归的话,^①那么特定国家、社会和政治动力的准确特征在这些环境中就既是互动的结果也是互动的原因。从这个观点看,经济生活、社会结构和国家机构就受到发生于中间社会组织中的各种独特类型交流的性质所限制。^②这个“社会交织物……是政治生活的质料”。^③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透镜,透过它可以追溯不同的体制形式下政治关系的变迁及其外在表现(它反映了组织化联接的性质和幅度的变化)。^④

政治活动在不同层面发生并反映不同的交流内容。^⑤这些交流结果可能导致全面的转型、社会的国家整合、大部分国家机器的社会化控制或者多种模式的国家—社会脱离。^⑥从这个角度看,广义上说,政治就是

① Shaheen Mozaffar, “The Policy Dimension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Africa”, 论文发表在 the Thirty-seco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Atlanta, November 1989, p. 6. 还可见 Shaheen Mozaffar, “Putting the State in Its Plac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Africa”, 论文发表在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September 1990。

② Naomi Chazan, “State and Society in Africa: Images and Challenges”, in Donald Rothchild and Naomi Chazan, *The Precarious Balanc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8), p. 338. 还可见 Otwin Marenin, “The Managerial State in Africa: A Conflict Coalition Perspective”, in Zaki Ergas, ed., *The African State in Transi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7), pp. 61–85。

③ 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7。

④ 见本论文集中弗郎西斯·哈根皮安的章节。

⑤ Naomi Chazan and Donald Rothchild, “Corporatism and Political Transactions: Some Ruminations on the Ghanaian Experience”, in Julius E. Nyang'oro and Timothy M. Shaw, eds., *Corporatism in Afric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Practice*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esp. pp. 180–181. 还可见 Larissa Adler Lomnitz, “Informal Exchange Networks in Formal Systems: A Theoretical Model”, manuscript, Mexico City,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1988, and Larissa Adler Lomnitz and Claudio Lomnitz Adler, “La Representación Simbólica del Poder: Política, Ritual y Símbolo en la Compañía Presidencial del 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de México”, manuscript, Mexico City, 1989。

⑥ 见本论文集中乔尔·S. 米格代尔的章节。

社会中的谈判、斗争、妥协和资源权力再分配的过程。^①

那些致力于理解非洲公民社会的人,所面临的基本分析任务是研究民间力量是如何集聚并被转化为政治的。从检视自愿性公民社团兴起的动力以及它们汇成既与国家联系又与国家分离的公民社会的程度入手来应对这一任务,有助于解开迷津。鉴于我们所采用的是“行为历史社会学”这一扎根现代非洲不断变化环境中的研究方法,^②在后文我们将初步(显然是十分简要的)尝试着通过检视四个历史阶段期间非洲中间社会团体及其互动来回答这些问题。这四个历史阶段包括:殖民阶段、后殖民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阶段,以及当前经济和政治秩序重构阶段。

这种宽泛的概述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是,非洲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国家形成的过程是同步的:公民社会的范围和程度是衡量国家特性所达程度的重要标准;公民社会的多种形式是非洲大陆不同地区国家类型的性质及种类的关键指标。^③独立的头30年,许多非洲国家呈现表面强大实质无能特质,这种组合证明了此间公民社会的脆弱性。^④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共生关系,是对权力及其在弥散的社会空间中的一体化整合或分散化整合的易变性的认可。^⑤因此,国家的权力、自主权和能力是公民社会相对自主权的函数。

这在非洲环境里尤为真切。近期非洲历史中国家建设的两个关键阶段(去殖民化时期以及1980年危机之后),同时也是社团活动充满生机的时期,这表明社会组织不仅对政府的施政做出反应,而且也适应形

① 这一路径的另一个优点是,其允许在支离破碎的社会中或在国家是虚弱的或丧失能力的情
况下研究政治的多种方式的存在。关于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见本论文集里裴宜理的文章。

② Jean-François Bayart, *L'État en Afrique: La Politique du Venue* (Paris: Fayard, 1989),
pp. 19-31.

③ 感谢迈克尔·布拉顿在这一点上的独特见解。

④ 这一点在本论文集是由阿图尔·柯里在谈及印度情况的章节里提出的。

⑤ 我比较喜欢本论文集里迈克尔·布拉顿在他所写的章节里提出的“爱恨交加的关系”这一说法,因为它更好地表达了他试图捕捉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关系。

势并因此在特定环境下对权力的建构和分配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样,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社团活动新形式的诞生,一些非洲国家从日常消费的资源转移负担中解脱出来,同时也使它们对新近赋权的社会团体更加负责。

因此,当前维持政府民主形式的能力“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生活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进一步赋权,而不是国家及其代理机构的行动”。^①如此看来,权力结构的重新安排既是不同领域里多元行动者动态互动的结果,也是国家机构政策变动或能力变化的结果。非洲政治生活的具体特征就是这些不断变化交换的结果。这些交换推动转型的可能性,取决于公民社会的扩张和组织化。^②

非洲公民社会的动力学分析

殖民阶段

与全球其他地方相比,非洲的社会组织可能更依赖群体归属和团体行动。沦为殖民地以前的非洲政治,是围着范围和组织复杂性差别很大的归属性、功能性团体运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是社会认同的必然结果。缺乏良好的政治传统,公共事务管理的安排就取决于社会群体之间的谈判以达成复杂的规则。实际上,“非洲对人类历史最独特的贡献正是这样一种文明艺术,即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非常平静地生活着”。^③

259 然而,殖民主义大大改变了这一景象。政治边界的重新划分以及外来统治的强加,催生了二元社会的出现:殖民统治依赖于庇护体系的发展,这种体系建立在复杂的个人权力等级知识基础上;与此同时,促成一

① Adigun Aghaje, “Mobilizing for a New Political Culture”, 论文发表在 th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Nigeri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August 1990, p. 45.

② 这一点是在谈及前工业化社会时提出的,可见 Marc Howard Ross,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in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21, no. 1 (1988): 73-74.

③ Bayart, *L'Etat en Afrique*, p. 58.

个新兴的(尽管受制的)公民社会围绕着殖民机构逐渐出现。

非洲的殖民中期阶段,恰逢组织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所有地区迅速扩展。^①人们加入社团不仅因为他们出生在那里,还为了增进利益,为了提高在社群中的地位,以及应对新的陌生环境。^②

新型组织(不夸张地说,总共有数以百计的不同形式的团体)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包括自愿社团,从种族组织,到亲属团体、信用联盟、殡仪协会、体育俱乐部、文学社团、妇女组织、大龄男女社交圈、青年运动团体和互助会,再到文化组织和娱乐社团,等等。^③第二类是各种职业组织,包括生产者合作社、商人协会、手工业行会、专业工作者协会、酋长组织、工人运动组织以及大多数地区都有的(通常受到严格限制的)工会。^④第三类是由各种宗教组织构成的,不仅指各种(传教士的和独立分类的)教会和穆斯林兄弟会,还指由宗教机构为迎合其信徒的需要而建立的混合团体。^⑤在很多农村地区,一批传统的和以新社区为基础的协会也蓬勃发展。^⑥

① 该分析基于来自许多国家的充足的证据。限于篇幅,很少的参考资料在这里被用于具体的案例研究。然而,关于总体概述,可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James Coleman and Carl Rosberg,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ropical Af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p. 318-339.

② Naomi Chazan, Robert Mortimer, John Ravenhill, and Donald Rothchild,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88), pp. 72-74.

③ 见 P. C. Lloyd, *Africa in Social Chang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9); Kenneth Little, *West African Urbanization: A Study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Social Chang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Thomas Hodgkin,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Afric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7); and Chris Allen and Gavin Williams, eds., *Sociolog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Sub-Saharan Af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2).

④ Elliot J. Berg and Jeffrey Butler, "Trade Unions", in Coleman and Rosberg, *Political Par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ropical Africa*, pp. 343-381.

⑤ Margaret Peil, *Consensus and Conflict in African Societies: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London: Longman, 1977), pp. 235-239.

⑥ 在许多农村地区,小的民粹主义运动出现了。这些组织没有试图在地方一级之外扩大它们的活动,并且与其他类似构造的团体很少发展联系。关于相关分析,可见 Martin Kilson, "Anatomy of African Class Consciousness: Agrarian Populism in Ghana from 1915 to the 1940s and Beyond", in I. L. Markovitz, ed., *Studies in Power and Class in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1987), pp. 50-66.

大多数新成立的团体都立足于城区,最初是由新生的精英发起的,这些新精英为城市移居者提供服务并开放向上层流动的机会,但他们自己也严重依赖殖民机构。尽管一些社团是受欧洲社团组织的激发建立的,而其他的则来源于非洲习俗传统,但它们的出现与殖民国家机构的引进是平行的,各自在与殖民机构的关系方面地位接近。因此,在许多方面,无论其组织如何受限,规模如何小,在每块非洲领土上,它们都构成了新兴公民社会的内核。

这些团体努力实现三个主要目标。首先,它们力争满足成员的需要。这些成员很多是移民,在从农村生活到城市生活的适应过程中寻找就业、住房和支援。因此,它们的活动大量集中在获取、控制和分配资源上。^①一些组织(尤其是教会)拥有外部资金来源,使得它们具有很大的操作机动性(五旬节派和诸如安息日会的千禧年信徒团体及其在非洲建立的教派分支就是如此)。其他团体(尤其是专业工作者组织,例如法律
260 和医学协会)向其成员收取会费,不过这取决于他们在殖民地获得赚钱的机会。还有其他组织(农民合作社,工会)自己控制了土地或者劳动,在某些情况下,也能扩大自身物质自主权的范围。

其次,新兴社团关心新的社会背景下自身地位的建立与维护,它们扩充成员,建立行为规范,设计参与、决策和领导轮换机制。为此,中间组织在团体巩固、在成员中树立权威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就这样,像尼日利亚的伊博国家联盟、西非的哈里斯特宗教运动或肯尼亚的东部非洲协会等社团,都建立了精巧的组织结构(经常是仿效西方模式的),通常由相当复杂的内部机构组成,包括了委员会、决策会议以及官员挑选的详细规定。^②对遵守团体既定规则的成员给予奖励,对那些不愿遵

① M. K. Schutz,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Functions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West African Cities", *Human Relations*, 9 (1977): 803-816.

② 关于部分基于组织复杂性的分类,可见 James S. Coleman, "Nationalism in Tropical Afric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8, no. 2 (1954): 104-126。关于详细的案例研究,还可见 James S. Coleman, *Nigeria: Background to Nation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照规定的成员施以惩罚。重点还放在招募新成员上(他们几乎都来自一个由受过西式教育、谋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个人组成的小阶层,这个阶层被吸引到殖民地大都市),放在让新成员遵守社团创始人所制定的行为规范上。^①

在社团与社团之间,这些内部导向活动的成功程度差异极大。某些特殊社团的制度化程度对自身的凝聚力、自主权和潜在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种族联盟、专业人士组织和大多数宗教团体,都成功地建立了各级分支机构并有一定的延续性,而许多服务性和福利性的社团以及一些从外地迁移来的青年社团,一直都很混乱。很明显,那些能够给予成员归属感、让他们融入一个高效的群体网络、为他们提供共同愿景、协调他们的活动并在殖民结构中争得一席之地的社团,同样能够获得一些组织性、象征性和动员性的自主权。^②

第三,这些社团寻求彼此互动并能与更大范围的经济、社会的、行政、政治的甚至是国际的实体互动。^③在殖民地非洲,社团交往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团体资源的多少,而且取决于其他社会力量或殖民国家所拥有的技能和财物。在这个结合点上,由生产性活动带来的投资剩余模式,为交往的方向和内容提供了一个重要指南。^④在非洲许多地方,以城市为基础的社团在基层寻找采购货物的直接来源,同时也致力于教育的长期投资,以此作为一种确保进入殖民国家轨道的手段。

在非洲殖民地的大部分地区,这些交往主要发生在从地方一级到殖民地国家一级(有时超出殖民地国家)的一个纵轴上。一些中间社会团体——尤其是宗教社团和民族社团——与地方选民建立了密切联系,但

① 关于在自愿协会中这些问题的一般讨论,可见 Milton Esman and Norman Uphoff, *Local Organizations: Intermediaries in Rural Development*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81-100。

② Peil, *Consensus and Conflict in African Societies*, p. 32.

③ Richard Hodder William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s of Tropical Afric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4), p. 164.

④ Berry, *Fathers Work for Their Sons*, p. 5.

社团之间互相竞争,也与不同类型的团体争夺与殖民当局沟通的渠道。因此,尽管交往形式本身是不平等的,但公民社团在社会交往中还是占据了一个界限清晰的(尽管十分狭小的)中间位置。内部交流方式不可避免地涉及某种程度的服从和融合。社团生活在安排、容忍、排斥、逃避、默许、无声抵抗或通过这要素的某种组合中繁荣起来。^① 公民社会的范围因此既是离散又是包容的。多个组织的成员重叠和一些组织的功能多元(如在青年运动组织中)促进了各团体之间一定程度的沟通,但这些沟通通常缺乏连贯性和广泛性。

这个时期公民社会的规模小,凝聚力弱,推动塑造了殖民国家既不稳定又冷漠疏远的形象。用布拉顿的话说,^②英国和法国建立的国家机构拥有很大自主权,但能力很有限。它们可以利用物质奖励或强制手段确保服从,但是它们没有能力获得象征性或社会性的支配地位。殖民国家与非洲社会的疏远,使殖民列强更加不愿培育能够作为沟通和互动渠道的非洲经济资产阶级。聚集在新社会团体中的新生管理精英,很难胜任这一角色。

这些框架里的正式秩序结构是碎片的、分散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统治者绕过公民社团,依靠地方合作者精明老到的工作,在严格划定的地方社会建立直接统治。他们采用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提取和分配模式,这种模式限制了日益明显且据称是互相排斥的地方集体之间的权利变动。^③ 英国(也包括法国的许多实例)通过当地支持者进行统治,并像这些强人依赖殖民国家一样依赖于他们的持久支持。^④

通过引入传统并将其正式化,殖民统治者不但削弱了他们自身的渗

① Victor T. Le Vine, "Parapolitics: Notes for a Theory", 论文发表在 the Thirty-seco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Atlanta, November 1989, pp. 17-20.

② 见布拉顿在本论文集的那一章。

③ 我要感谢莎拉·贝莉的这些见解。她当前对在国家过程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的比较研究工作保证了这些要点得到进一步详细阐述。

④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41.

透能力,而且加剧了以庇护为推力的殖民政府与当时正在成长的公民社会之间的脱节。¹在地方一级,强人对手之间为获得殖民地中央当局青睐和控制殖民国家资源也斗得不可开交。这些殖民地交往结构的内在矛盾,在构成公民社会的中间社会团体与实施外在控制的行政机构之间,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冲突。

参与社团活动为社会流动、新思想交流、领导力训练、在国家领域中 262 的参与以及日积月累之后对殖民执行的反抗,都提供了机会。在很多方面,这些组织构成了前政治网络(*prepolitical networks*),以殖民地国家为参照框架。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都在这些环境下接受政治教育并获得社团提供的政治支持。公民社团是紧接一战之后就开始的反殖民运动赖以形成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去殖民化可以被看作是同殖民地国家合作的公民社会赋权过程。

在非洲的大部分地方,殖民统治者与大众政治运动之间的对抗多是短暂的、相对平和的。在这些情况下,虽然公民社团的增加是反殖民组织兴起的前提,但是一旦殖民列强原则上同意转交权力,来自这些团体并寻求地方支持的民族主义领袖就会努力控制大众运动并节制大众的诉求。²在这种背景下,合法性的建构没有其他的基础。只有在反殖民斗争持久而强烈的地方(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中间社团和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关系的强化才会牵涉到一些制度建设,并因此持续到独立的早期阶段。

如果说非洲当年是带着强大的公民社会进入殖民时代而时常没有国家的话,那么,到外国统治时期结束为止,公民社会的关键要素经历了一个国营化的过程,接管了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权。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¹ 公民社会与原始社会之间的区别受到了在彼得·艾克的开创性文章中的公民与原始公众之间的区分的启发。可见 Peter Ekeh, "Colonialism and the Two Publics in Africa: A Theoretical Statemen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7, no. 1 (1975): 91-112。

² 关于自愿协会在民族主义斗争中的作用的详细比较研究,可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Ghana and the Ivory Coast* (Paris: Mouton, 1964)。关于调整过程的分析,可见 pp. 107-121。

中间社会组织的衰弱也不是什么意外。因此说,“去殖民化在整合程度很低的、异质性的而且通常是多元的联盟之间及其内部,开启了争夺控制国家机器的新斗争。这一过程的动力学塑造了随后的变化进程,包括统治阶级形成的轨迹。”^①

公民社会并入殖民管理当局的方式,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性质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一些国家,独立前夕争夺国家权力的内部竞争非常激烈(加纳、喀麦隆、乌干达),反对派一直维持其社团网络的活动。故而,精英阶层在这些情况下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在其他国家(科特迪瓦、肯尼亚、坦噶尼喀、赞比亚),反对派软弱无力,而且新的领导层相当团结。在这些情形下就能做出许多努力,使社会组织去政治化并控制它们的活动。公民社会被有效地嫁接到行政机构中去并经历了一个收缩过程。在另一组国家里(尼日利亚、扎伊尔),民族地区的领导人在国家一级掌
263 权,迫使其对手在地区据点里巩固自身。因此,不管真实的情况如何,不仅社会组织的可见度下降了,而且它们的利益也被重新界定了。

非洲公民社会兴起过程的第一阶段恰逢一批群集在新兴城市周围的社会组织的创建。鉴于殖民背景下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权力分离以及行政—社会平行网络的创建,这些组织逐步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源以接管殖民国家机器。在独立前夕,这一转变给中间层留下了局部空间,预示着一个社会交往不确定性和波动性时代的到来。

后殖民阶段

通过庇护网络的完善,以及催生了威权政体的法团主义政策的实施,非洲独立头20年表现为以城市为基础的行政社会的巩固过程。在去殖民化期间,殖民地根深蒂固的庇护体系的政治化,有助于国家机构

^① 见本论文集凯瑟琳·布恩的章节。

的重组以及社会交往环境的本质变化。^① 尽管许多中间社会团体在权力转移中保留下来并且还建立了新团体,但随着地方性的基层社团以及政府控制全国性组织的大量增加,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在社团层面所维持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民间组织退居次要角色。它们的衰弱既使得国家机构直接面对并承受了来自某些社会利益集团的压力,又促成许多没有与国家攀上关系的独立小飞地里的其他社会企图聚合在一起,从而一方面导致国家自主性的下降,另一方面导致整个非洲大陆国家权力的实质衰退。

中间社团的持续性在多个领域里明显表现出来,在专业人士的社团里特别明显。在每一个非洲国家,专业人士社团已大量扩散,同时还冒出许多新的组织(例如,律师、医生、教师、护士、会计、大学讲师、工程师、银行家、承包商的专业组织)。以前受到严格限制的熟练工人和商人现在组织起来了,一旦行动遇到限制,那么它们就经常更改名称(但是不改变组成成分)。宗教活动也扩大了,资助福利事业和青年团体成了此间社团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教和独立的教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信徒,并在非洲大陆的许多地区形成了新的教派。^② 穆斯林社团组织也开始出现。伊斯兰教福利会和宣传团体遍布西非各地,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重要兄弟会和激进教派活动的复兴。^③ 许多服 264
务、休闲、互助和信贷方面的社团,在独立时代仍然活跃。卫生组织和像红十字会、保护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支持团体、圣约翰救护协会或各种各样的难民救济委员会等国际非政府组织(NGOs)的地方分

① 关于此间非洲国家的政治(而不是结构的)特性的意义的一项精彩讨论,见 Catherine Boone, "State Power and Economic Crisis in Senegal", *Comparative Politics*, 22, no. 3 (1990): 341-357.

② 从众多描述中选取一例,可见 Burgess Carr, "The Church in Africa", *Africa*, 40 (1971): 58-59.

③ Christian Coulon, "Le Réseau Islamique", *Politique Africaine*, 9 (1983): 68-83, and Guy Nicolas, "Islam et 'Constructions Nationales' au Sud du Sahara", *Revue Française d'Etudes Politiques Africaines*, 165-166 (1979): 86-107.

支机构也加入进来。^①像网球、马球和高尔夫球等多元化娱乐团体被引入各国首都。一直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足球,也呈现出新的势头,国内联赛和非洲锦标赛兴起了,现有俱乐部被制度化了。

并非所有的中间社会组织都是从殖民地时期延续下来的。学生社团毫无疑问是独立之初出现的最重要团体。成熟大学的建立,伴随着每个校园里充满活力的(往往也是高度政治化的)学生组织的建立(加纳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尼日利亚全国学生联合会尤其显眼)以及各种学生专业社团(如辩论会、合唱团和就业指导协会)的建立。^②妇女组织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它们将其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社会福利运动和创收活动之中。^③事实上,在许多像坎帕拉、阿克拉和卢萨卡等城市地区,性别取代年龄成为决定地位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④

后殖民时期中层社会机构继续立足于主要城市。但它们的扩张与成长取决于是否有能力招募新成员并在规模较小的城市地区扩建分支机构。不同于过去,现在的新移民很少被吸引到既有社团(他们经常拥有精英光环)行列,农村地区的居民也不容易被吸纳到社团网络之中。^⑤

① 关于非洲西部图景的详细描述,可见 Willard R. Johnson and Vivian R. Johnson, *West African Governments and Volunteer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0)。还可见优秀论文 Aili Nari Tripp, "Local Institutions and Grassroots Party Dynamics in Urban Tanzania", 论文发表在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tlanta, September 1989, p. 5 等处。

② William John Hanna, "Students", in Coleman and Rosberg, *Political Par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ropical Africa*, pp. 413-445.

③ Kenneth Little, *African Women in Town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从许多优秀的案例研究中择取一项,可见 Rayah Feldman, "Women's Groups and Women's Subordination: An Analysis of Policies Towards Rural Women in Keny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27-28 (1983): 67-85。

④ 至于这些案例研究的其中一项,可查阅 Claire Robertson, *Sharing the Same Bowl: A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Women and Class in Accra, Ghan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⑤ Sandra Barnes,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a Metropolis: The Case of Lagos, Nigeri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18, no. 2 (1975): 75-88, and Sandra Barnes and Margaret Peil,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 in Five West African Cities", *Urban Anthropology*, 6, no. 1 (1977): 80.

因此,虽然公民社团在这一时期数量增加了,种类增多了,但其规模未必扩大,相对重要性也未必增强。

相比之下,在城市移民区和地方一级,小规模草根组织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期间则获得实质性扩充。这些基层组织包括大量地方改良社团、工艺品商店、治安协会、小规模妇女合作社、辅助社、唯灵派和具象派、古兰经阅读协会、祷告会、同乡会、社区青年协会、工作队以及传统的娱乐团体。^① 这些小规模特殊网络,尽管很少企图扩张到地区以外,但在调节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② 推崇基层社区,不仅提高了这些草根组织的吸引力,而且通常也符合那些地位不稳的、关切并阻止跨地区利益聚合的统治者的意图。

实际上,在国家层面,领导人发起成立了另一套全国性社团机构,力 265 图控制那些被视为政治动荡主要来源的重要社会势力(工会、学生、妇女)。^③ 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新成立的统一组织(农民的、工人的、学生的和妇女的组织)意在取代现有的社团并执行特定的功能性任务。^④ 这一趋势在社会主义取向政权(几内亚、马里、坦桑尼亚、恩克鲁玛治下的加纳)中最为明显,但这种工会则遍布整个非洲大陆。^⑤ 在其他国家,一项替代策略受到追捧:创建联盟组织,把大量在相同领域运行的社团(例如,专业工作者协会、全国教会理事会、妇女工作局、全国青年委员会、全

① 有关详情,可见 Richard Sandbrook, *The Politics of Basic Needs: Urban Aspects of Assaulting Poverty in Africa* (London: Heineman, 1982); Hyden, *No Shortcuts to Progress*; 以及一项具体的案例研究, C. K. Brown, "The Ghanaian Rural Youth: Resourc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Ghana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 no. 1 (1978): 26-46。

② Barbara Thomas, *Politics, Participation and Poverty: Development Through Self-Help in Keny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5), p. 5。

③ 布恩在本论文集她的章节里提到,这是一种“殖民”和“驯化”的形式。

④ 关于一项在非洲背景下的社团主义的讨论,可见 Nyang'oro and Shaw, *Corporatism in Africa*; for a definition, consult Thomas Callaghy, *The State Society Struggle: Zai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6。

⑤ Yves Person, "Les Syndicats en Afrique Noire", *Le Mois en Afrique*, 172-173 (1980): 22-46。还可见 Richard Sandbrook and Robin Cohen, eds., *The Development of an African Working Class* (London: Longman, 1975)。

国体育联合会)聚集到一起。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这些举措的结果是极力在步调极端不一致的组织化场域中强加法团主义结构。

如此一来,虽然社团领域变得比过去更加多样化,但独立社团被覆盖了,它们的操作自由度受到严重限制。“对自治社团和公共农场试验的压制,应该不会令人意外。非洲国家是不安全的——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上——他们的领导人惯于把任何他们无法控制的组织都视为直接威胁。”^①

后殖民阶段社团类型和水平的多样性,意味着社团生活的情景不仅在功能上而且在空间和组织上开始分化。值此之际,规模、场所、会员、目标、能力和持久性上的巨大差异凸显了社会领域里不平等的滋长。社会团体呈纵向分布,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互动的内容和方式。

公民社团和地方社团在与其他组织和官方机构交流中,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进取和逃避)。第一个也是文件最详细记载的是恩庇-扈从关系。在独立后的几年内,多数非洲国家竞争性政党政治的中断以及对中间社团施加的限制,意味着地方社群与国家组织之间几乎没有相互关联的制度化机制。个人化网络逐渐填补了这一空白,而且,在不同国家,新的中介组织、经纪人和密使团体监视着物品交换,以保合规。^② 交往的庇护模式特别容易导致行为扭曲、精力分散、是非颠倒和贪污腐化。^③ 它们经常在敌对派系中间滋生激烈竞争,同时大大增加政治维持成本。^④

第二种方式的实用性和可取性远远不足。中间社团和一些地方团

① Michael Schatzberg, *The Dialectics of Oppression in Zai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5.

② Chazan et al,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Africa*, pp. 172-177.

③ Richard Joseph, *Democracy and Prebendal Politics in Nigeri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econd Republic*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把这一过程描述为非洲政治的贿赂化,虽然在最近的文献里经常被用作腐败的同义词,但是贿赂主义在更经典的韦伯式的意义上,也是中央控制的松动和国家资源匮乏的一个标识。

④ Rene Lemarchand, "The Dynamics of Fac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Africa", in Ergas, *The African State in Transition*, pp. 149-165.

体极力采取退缩策略,封锁来自上级对自己的不利影响,并以特定群体价值观为后盾,维持巩固自己的强力管理。^① 强调自主权并限制团体接触的地方主义,不仅阻碍了对公民社会形成非常必要的横向沟通,而且限制了外部机构渗透的影响机会,迫使官方机构不得不大力培育个人联系,从而强化了庇护纽带。后殖民时期公民社会,就其存在的范围而言,往往是在这些庇护式和特殊化的社会空间之外的有限领域里聚集起来的。^②

不同团体之间的竞争,首先围绕着争夺会员展开,经常通过采取各种极为不同的办法来满足其潜在成员人性化的、物质性的、象征性的和情感性的需要。较小的基层组织和宗教团体在这点上比国家支持的团体(其功利性吸引力并非不足一提)更成功,^③ 因为在这些情况下,互惠和信任成了社会交流的基础。^④ 获取资源的问题同样招致对抗。地方团体和农民享有少量的对某种资源的自主控制,但在资本和设施方面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同其他组织或强大庇护者之间的联系。资源获取渠道的问题在中间社团尤为突出,因为它们掌控的资源很少。它们要么依赖外部渠道,要么依赖已经成为分配资金和专门技术渠道的组织联盟,而后者更加引人注目。如此一来,它们被迫与法团主义社团开展某些接触,更常见的是做出妥协。

① 关于这一动态的三个精彩的案例研究,可见 Goran Hyden, *Beyond Ujamaa in Tanzania: Underdevelopment and an Uncaptured Peasan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John Dunn and A. E. Robertson, *Dependence and Opportunity: Political Change in Ahafo*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and Sandra Barnes, *Patrons and Power: Creating a Political Community in Metropolitan Lago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关于一个案例研究,可见 Margaret Peil, *Nigerian Politics: The View from Below* (London: Cassell, 1975),他有力地指出,社会空间尤其出现在中级社会团体里。

③ 这种张力得到了极好的讨论,见 Bjorn Beckman, *Organizing the Farmers: Cocoa Politic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Ghana* (Uppsala: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1976) and Richard Jeffries, *Class, Power and Ideology in Ghana: The Railwaymen of Sekondi*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④ Goran Hyden, "Governance: A New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论文发表在的 Thirty-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Chicago, October 1988。

不可避免地,这些冲突还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形式。许多中间社团(不过地方性或全国性的很少如此)要么寻求影响政策,影响决策者的构成,或在极端情况下,推动权力关系结构的根本改变。^①事实上,诸多中间社团对独立政治角色的诉求,不论多么微弱,都成为非洲独立头20年的一个标志。

不同层级社会组织之间的多重对抗,很明显影响了它们之间交流的质量。中间组织和联盟组织之间的关系(诸如市场化的妇女合作社和政府支持的妇女联合会之间,或学生运动和国家控制的学生社团之间),在大多数国家中是激烈冲突的。与国家支持的团体并存的中间组织的数量越是庞大,这些斗争就会越激烈和持久。这种模式起初在工会和全国劳工联盟的情况中开始显现,二者之间争斗不休。^②相同的态势出现在学者的专业社团之中,尤其在乌干达、肯尼亚、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加纳这些国家。^③在农民和生产者协会之间,以及在20世纪70年代各种类型的宗教团体之间,这种模式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许多后殖民环境中,这些冲突不但象征法团主义政策的局限,还象征着霸权主张的缺陷和社会交往的不稳定特征。

267 另一方面,基层组织与中间社团及更广泛的社会机构之间的互动方式更加扑朔迷离。诚然,与地方官或与上级组织的常态关系复制了其他环境中的斗争。但在许多情况下,基层组织倾向于规避彼此之间的以及

① Naomi Chazan, "The New Politics of Participation in Tropical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14, no. 2 (1982): 169-189.

② 关于一般分析,可见 Berg and Butler, "Trade Unions" (pp. 367-370), and Robin Cohen, "Resistance and Hidden Forms of Consciousness Among African Workers" (pp. 18-22),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19 (1980)。其中一项精彩的案例研究,可见 Jeff Crisp, *The Story of an African Working Class Ghanaian Miner's Struggles* (London: Zed Books, 1984)。

③ 见 Joel Barkan, *An African Dilemma: University Students in Ghana, Tanzania and Ugand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还可见 Naomi Chazan, "The Manipulation of Youth Politics in Ghana and the Ivory Coast", *Genève-Afrique*, 15, no. 2 (1976): 38-63。

与官方机构之间的不必要接触。^① 另外,尤其在地方促进团体中,一些社团更喜欢加入与国家机构合作的体系架构之中,因为他们认为政客有责任满足社区的需要并且更容易受来自底层直接压力的影响。这在定期举行选举的一党执政政权(坦桑尼亚、肯尼亚、赞比亚、科特迪瓦和喀麦隆)中更加突出。^② 基层组织和中间社团之间的联系往往更为分散:贸易网络和家庭关系提供了一些交汇点,^③但全方位的联合只有在严重的政治压力面前才会出现,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加纳和乌干达就出现了这种情况。^④

由此,在各个国家,互动几乎都只是纵向发生的。在地方一级和中间层面的横向联系几乎不存在。更重要的是,地方社团与官方支持的全国性组织之间的联系,严重限制了中间社团的运作范围。情况经常是,它们发现被自己的组织联盟所冻结。^⑤

这些趋势有助于解释后殖民时代非洲权力聚集和分配的结构。粗略地讲,在国家一级似乎同时发生了两种不同的过程。第一,通过庇护体系传送有选择的社会需求的国家变得更易渗透。将官员与地方团体联系起来的个人网络的巩固(主要是在农村地区),使不同级别的行政机构官员对他们赖以合作和支持的庇护人的需求特别敏感。行政机构的相对自主权因此遭到侵蚀,能力也受到了严重削弱。^⑥ 另一方面,依赖不

① 见 Jean-François Bayart, "La Politique par le Bas en Afrique Noire", *Politique Africaine*, 1, no. 1 (1980): 53-82.

② Hodder-William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s of Tropical Africa*, p. 166. 关于一系列强调一党执政国家的庇护联系的优秀的案例研究,可见 Fred Hayward, ed. *Elections in Independent Afric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6).

③ 见 Berry, *Fathers Work for Their Sons*, p. 57.

④ 一项关于加纳的中级团体和大众组织的联合的讨论,见 Naomi Chazan and Victor T. Le Vine, "Politics in a 'Non-Political' System: The March 30, 1978 Referendum in Ghan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22, no. 1 (1979): 177-208.

⑤ 组织自治和政府控制的策略,及其对公民协会运作空间的影响都得到了深入的分析,见 Bratton,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NGO Relations in Post-Colonial Africa".

⑥ 这与凯瑟琳·布恩在本论文集里她的章节里提出的论断相同。至于一个相反的观点,可见 Robert Fatton, "The State of African Studies and Studies of the African State: The Theoretical Softness of the 'Soft State'",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4, nos. 3-4 (1989): 170-187.

同排斥与包容模式的政权,在面临许多社会压力时变得更加独立。特定政权的社会基础越狭窄,它们就越不负责任;^①社会基础薄弱的那些领导人(最值得注意的是乌干达的伊迪·阿明、赤道几内亚的马西亚斯·恩圭马、中非共和国的让-贝德尔·博卡萨以及利比里亚的塞缪尔·多伊),也就因此转而采取高压政策。因此,许多国家不能形成独立于支持者压力的决策领域,而威权政府发现,穿透社会团体的防护铠甲越来越困难。^②

后殖民主义秩序的社会结构也同样模糊不清。大型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权,但其能力日增,实际上成为国家机构的延伸。同样,一些中间社团和地方团体也参与其中,而另一些社团虽然独立,但对其狭隘的组织范围之外的目标,则无能为力,^③因为这些微弱的独立性被极其耀眼的法团主义进程所掩盖,因此它们对公民社会的维持功能(诚然是非常虚弱的)已经被忽略。^④

因此,后殖民时期出现的国家-社会关系,未必是一幅强大的社会联合以对抗只能进行分散化控制的虚弱国家的画面;相反,在不同情形下,分化且实力不均的社会组织或捕获国家、挣脱国家机构、替代其空白的场景,或反而屈从于国家之威严外观。那些有着最严密保护层免遭社会直接压力的政权,可以保护技术官僚精英,使之不受政治要求的羁绊。

① John Lonsdale,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in African History", in Patrick Chabal, ed., *Political Domination in Africa: Reflections on the Limits of Power*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26 - 157.

② 关于这种困境的讨论可见 Joshua B. Forrest, "The Quest for State 'Hardness' in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20, no. 4 (1988): 423 - 442。那些将非洲国家看作具有过度自主性的人与那些坚持其嵌入式特征的人之间的辩论近年来变得尤为激烈。可对比 Fattou, "The State of African Studies and Studies of the African State", 与 Robert Price, "Neo-Colonialism and Ghana's Economic Decline: A Critical Assessment",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18, no. 1 (1984): 163 - 193。我的立场是,这些辩论将政权自主性与国家混淆在一起,而国家,除了少数例外以外,还没有被证明是具有自主特性的。关于一个更全面的分析,可见 Naomi Chazan, *An Anatomy of Ghanaian Politics: Managing Political Recession, 1969 - 1982*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3)。

③ Frank Holmquist, "Defending Peasant Political Space in Independent Africa",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14, no. 1 (1980): 157 - 167.

④ Bratton, "Beyond the State: Civil Society and Associational Life in Africa".

并积累一些行政能力。对被托马斯·柯那吉(Thomas Callaghy)形容为无处不在的“后殖民综合征”的绝缘程度是政权持久性的一个标志。^①但即便在这些情况下,国家本身的地位仍然是脆弱的,证明了虚弱而分散的公民社会(不管单个社团的规模和实力如何)是与失效的国家密切相关的。

非洲独立头 20 年的政治演化,都围绕着以不同组织利益为基础的分合不定的联盟之间的冲突展开。尽管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受制于威权统治并因此受困于公私界限的持续模糊,^②但他们的表现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在一些国家(科特迪瓦、马拉维、肯尼亚),精英的团结维系着官僚政府形式,但破坏了公民社会的聚合。在其他国家(尼日利亚、加纳、乌干达),团体之间的竞争,引发了精英派系的深层分裂和政权更迭——通常是通过军事政变。在乌干达、中非共和国和赤道几内亚以及(也许烈度稍弱)扎伊尔、几内亚和多哥,20 世纪 70 年代被高度压制的威权政权不时被打断。^③在这些国家,对社团生活的压制以及老到的地方规避机巧技术的运用,产生了极为古怪的个人化政府形式,行为反复无常是其典型特征。而在许多地方,种族和职业联盟维持着新传统主义政体(尼日尔就是其中值得一提的实例)。

然而,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些新族长制的制度安排明显不能再无限期维持下去了。庇护政治不仅导致了政权不稳,而且侵蚀了国家自主权,到一定时候还会弱化国家能力。^④如果说公共机构的特点是集权

① Thomas M. Callaghy, “Lost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in Ghana, Zambia and Nigeria”, in Joan M. Nelson, ed.,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cy Choice: The Politics of Adjustment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57–319.

② Rockman, “Minding the State”, p. 48.

③ Samuel Decalo, *Psychoses of Power: African Personal Dictatorship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④ 关于政权不稳定的讨论,可见 Chris Allen, “Staying Put: Handy Hints for Heads of State”, 论文发表在 the Symposium on Authority and Legitimacy in Africa, University of Stirling, May 1986。关于国家能力侵蚀的讨论,例如,可见 Larry Diamond, “Class Formation in the Swollen African Stat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25, no. 4 (1987): 567–596。

和无能的组合的话,那么相比之下,公民社会的特点就是分散与分歧的混合体。围绕利用和控制的竞争,既无助于推进社会团结,也无助于推进发展目标。非洲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就此遭受着一个明显的收缩过程。公民社会的小型化伴随着国家的僵硬化。

危机阶段

在独立的第二个十年结束时,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急剧恶化,政治关系的不确定性特征日益明显,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供给状况改善无望。虽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结构的离散程度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①但所有国家的人民都不得不寻找新路自谋生计,当时的情形是,可选择的余地很小,机会急剧减少。

在这种条件下,国家机构和社会网络都经历了一个内爆过程:活动范围和整体结盟的范围都萎缩了,人际交往的结构被破坏了。国家领导人为推卸大部分人民的物质福利的责任而煞费苦心。随着官方去交往化进程的加剧,^②社会团体努力发展出了更多有效的自我救赎机制。经济和政治危机与公民社会地方化和原子化(在严重的地方)同时发生,急剧放大了治理问题。

在这个时候,社团生活经历了重大的结构重组。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地方一级,到处都能看到公共社团成倍增加的迹象。企业的、信贷的、银行的和易货贸易的团体与新福利协会、互助会、教育倡导协会以及自卫团体齐头并进建立起来。以尼日利亚奥约州的爱迪尔社区为例,超过

① “低谷因素”的核心地位在托马斯·柯腊吉的近期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讨论。见 Thomas M. Callaghy, “Toward State Capability and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Lessons for Adjustment”, in Joan M. Nelson, ed., *Fragile Coalition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New York: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1989), pp. 115–138。

② Pierre Jacquemont, “La Destatisation en Afrique Subsahariennes: Enjeux et Perspectives”, *Revue Tiers Monds*, 29, no. 114 (1988): 291–299。

50 个信贷协会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登记注册。^① 在尼日利亚其他地方,有报告说萨拉·贝瑞和乔尔·巴坎及其合作者更多地投资于以公共关系为根基的广大社会网络。^② 在加纳,大量的地方社团出现在农村地区和大城市的贫民区。在坦桑尼亚,地方自发精神被激发出来,弥补政府服务的失败。“因此,危机开辟了新的经济和政治空间,能够切实发挥作用的自愿组织在其中成长壮大,社区层面尤为活跃。”^③ 在肯尼亚,利益团体在不断扩大的非正式领域中、并围绕这一领域显著增多。^④

这些不同地方自发精神的兴起,所反映的对官方机构并非不足取的怀疑、恐惧和嘲讽,^⑤ 主要应被归因于在严峻的贫穷局面下满足基本

① 见 Jane Guyer, “Experience of Government and Issues of Governance in a Rural Area: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Ibarapa, Oyo State”, 论文发表在 th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Nigeri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August 1990, p. 29. Guyer 继续提到:“随着作为首领的现任官员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这种‘传统’机构可能提供政治空间和保护,在其中新的社团和地区组织在农村地区可以出现,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被排除在外。”(p. 30)。

② Sara Berry, “Coping with Confusion: African Farmers’ Responses to Economic Instability in the 1970s and 1980s”, in *Working Papers in African Studies*, 141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Center, 1989), p. 5; Joel D. Barkan, Michael L. McNulty, and M. A. O. Ayeni, “Hometown Voluntary Associations, Local Develop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Western Nigeria”, 论文发表在 the Thirty 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Baltimore, November 1990.

③ Tripp, “Local Institutions and Grassroots Party Dynamics”, p. 42.

④ Jennifer Widner, “Interest Group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in Kenya’s Informal Sector: Cultural Despair or a Politics of Multiple Allegianc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4, no. 1 (April 1991): 31 – 55, and Alan Fowler, “The Role of NGOs in Changing State-Society Relations”, 论文发表在 the Thirty 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Baltimore, November 1990, p. 4.

⑤ 大众政治文化的几个案例研究最近强调了在非洲的许多地区的民众与官场脱离的程度。有关概述,可见 Naomi Chazan, “African Political Cultures and Democracy: An Exploration”, 论文发表在 the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September 1988. 还可见 Thomas Callagh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Zaire”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1987), and Ernest Wilson,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Nigeria”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1988)。

需要的具体努力,而这一点与以往同类事业并不相同。^①之所以强调社区场合与社区层面的组织多元性,与短缺、基本商品的匮乏、受阻的渠道以及寻求对官方机构施加影响中的挫败感直接相关。^②因此,虽然社团导向的活动激增,但是立足地方社团建立跨地域的努力却很少。

这种组织重新定位的关键受害者是国家支持的联盟组织和单一化的法团主义结构,它们几乎在社团舞台上消失了。那些维持下来的组织(如一些工会、学生社团和妇女团体),从它们的主张和活动看,都明显变得更加自主了。在肯尼亚、扎伊尔和尼日利亚,这些团体带头反对威权政府,在布基纳法索、利比里亚和加纳,它们帮助组织民粹主义倾向的暴力政变。^③

甚至那些种族、职业、娱乐和休闲等的中间社团也都萎缩了,但经济的和宗教的网络却扩大了。这一时期的宗教复兴,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中表现抢眼。随着精神的、圣灵降临的和神赐能力的运动在许多国家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教派势力大增,主要集中在尼日利亚北部(麦塔特斯尼运动, Maitatsine)、塞内加尔和萨赫勒地带。既有的教会和经验丰富的穆斯林兄弟会所展现出来的多元性,尤为引人注

① 这一点的提出者是 Jeffrey Herbst, "Migration,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and State Consolidation in Africa", *African Affairs*, 89, no. 355 (1990): 183-203.

② 这一点在我分析这一时期的加纳时得到了强调。见 Naomi Chazan, "Liberalization,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Space in Ghana", 论文发表在 the Thirty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Chicago, October 1988.

③ 有关对加纳研究的更多细节,可见 Donald I. Ray, *Ghan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6)。有关布基纳法索的研究,可见 Rene Otayek, "Burkina Faso: Between Feeble State and Total State, The Swing Continues", in Donald B. Cruise O'Brien, John Dunn, and Richard Rathbone, eds., *Contemporary West African Stat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3-30.

④ 有关来自加纳的证据,可见 Kwesi Jonah, "Crisis and Response in Ghana" (Kingston, Jamaica: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April 1989), p. 34.

目。这种多元性证明它们的内在多变性以及应对环境变化的突出适应性。^① 相同的模式可见于贸易网络中,它找到了绕过官方限制的方法并经常成功地建立起独立于国家控制的商业新渠道。^② 围绕着第二代运输联合体、生产者合作社和分配网络,兴起了企业家的、信贷的、银行的和易货贸易的社团。^③ 新的区域市场发展了,并且拼凑出灵活的机制来应对基本商品的日益短缺。就这样,在 20 世纪 80 年代非洲危机的早期,志愿部门伴随着自身的本土化成长起来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社会组织(主要是社区类)的活动重点是关注一套生存策略的实施。^④ 这些策略首当其冲的是大规模介入非正式经济。复杂的第二经济成了商品分配的核心通道以及小制造业和小规模农业生产的重要环境。^⑤ 第二,大规模的移民(在非洲内部及以海外为目标)增加了。第三,许多人构思出精神性和社会性的手法来凑合,采取的是从宿命论到麻木不仁的种种态度。最后,在一些地方,随着地方社群做出退出选择,自我封闭的机制也被激活了。^⑥

① 见 Jean-François Bayart, "Les Eglises Chrétiennes et la Politique du Ventre: Le Partage du Gâteau Ecclesial", 论文发表在 the Thirty-seco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Atlanta, November 1989.

② 有关细节的文献,可见 Gracia Clark, ed., *Traders Versus the State: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Unofficial Economi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8). 还可见 Chaire Robertson, "The Death of Makola and Other Tragedies",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17, no. 3 (1983): 469-495.

③ Willard Johnson, "Notes on 'Community Governance', 'High Politics' and Informal Governance by Aid Agencies", in Carter Center, *Beyond Autocracy in Africa*, pp. 14-19.

④ 有关这些技巧的一项概述,可见 James C. Scott, "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 in Forrest D. Colburn, ed.,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London: M. E. Sharpe, 1989), pp. 3-31.

⑤ 关于这一现象最好的案例研究可见 Janet MacGaffey, *Entrepreneurs and Parasites: The Struggle for Indigenous Capitalism in Zaïr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⑥ 我在本文中并没有详细阐述这些活动,因为我已在其他出版物上详细地记述了它们。见 Naomi Chazan, "Patterns of State-Society Incorporation and Disengagement in Africa", in Donald Rothchild and Naomi Chazan, eds., *The Precarious Balance*, pp. 121-148. 还可见 Victor Azarya and Naomi Chazan, "Disengagement from the State in Africa: Reflections on the Experience of Ghana and Guine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 no. 1 (1987): 106-131.

这些应对机巧要成功实施,非常依赖与处境类似的团体之间的横向互动,而互动的主要渠道是连锁商业网络。因此,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分配体系,特定团体有必要维持与生产者、食品商、运输商、贷款协会和
271 道贩子的关系。^① 这些联系必须立足于某种程度的妥协以及仲裁机制的建立,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例如,在乌干达,贸易团体雇佣了武装警卫以保护产品不受组织严密的劫匪的侵犯);^②它们未必导致全国范围的联合行动。

在这些状况下,纵向接触的重要性下降了。鉴于对官方指令的规避和接触的最小化是新的互动渠道的根基,因此旧的以国家为基础的庇护网络遭到了破坏。等级化接触往往被小型化的横向联系所取代,而这些联系是通过以本地商人和企业家为轴心的新的庇护形式得以巩固的。^③ 本地社团活动突出显示了自力更生技巧的活化作用,让人不由想起殖民时代所采用的无声反抗策略。^④ 这些措施有助于进一步限制官方机构早已虚弱的渗透能力,后者实际上已经主动缩减了对地方项目的拨款与在教育、福利方面的介入。

在这些环境中,国家结构的自主权和能力都被进一步削弱;君不见,在整个非洲大陆,官方的舞台都在明显地缩小。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被降到了最低程度,不同层级之间社会互动的交流几近停止,起初小范围的相互脱离变得越来越普遍。权力被分散到庇护网络之中,而这些网络缺乏自主权,能力也有限。在此语境中注意到这一点至关重要,亦即,虽说危机催发了非洲地方社团的复兴,对生存技巧的强调以及许

① 该系统在一个国家运作方式的描述,可见 Gracia Clark, "Price Control of Local Foodstuffs in Kumasi, Ghana", in Clark, *Traders Versus the State*, pp. 57-80.

② 非正式经济的一些更暴力方面的讨论,可见 Nelson Kasfir, "State, Magendo, and Class Formation in Uganda",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21, no. 3 (1983): 90-110.

③ René Lemarchand, "The State, the Parallel Economy,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Patronage Systems", in Rothchild and Chazan, *The Precarious Balance*, pp. 149-170.

④ 关于这些策略的一个很好的描述,可见 A. Adu Boahen,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oloni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63-81.

多新组织的狭隘性和小规模,并没有赋予公民社会以关键的组织资源和物质资源,俾使之扩大规模或控制这个节骨眼上冒出来的新型社会经济空间。结果,国家和社会机构都被嵌入范围有限的狭小领域之中。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公民社会的重新界定和巩固所需的象征性和人文性地基已经铺就,但几乎见不到公民社会大厦的影子。^①

秩序重构阶段

非洲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达到了顶点,当时,干旱饥荒合力围攻,灾难局面席卷大陆。^② 在绝对短缺四处蔓延的局面下,着眼地方的生存策略捉襟见肘。大多数非洲国家事实上已经破产了,面对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多数国家已经束手无策。^③

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都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应对危机,这使它们越来越依赖于外部流入。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大多数非洲政府都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附加条件,采取全面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并实施结构调整计划(SAPs),以换取大量的资金注入作为回报。^④ 这些计划背后的推力,推崇私有化、官方价格管制的减少、对地方生产商的奖励、财政紧缩、征收政府服务的用户费,以及最重要的是,对农业部门投资和附带的精简官僚机构的重视。与此同时,社会组织的制度化能力,不仅通过官方计划、而且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资金和商品的大量直接转移方式提高了。^⑤ 这样,就在非洲国家采纳新古典经济政策 不

① Bratton, "The Politics of Government-NGO Relations in Africa", 使用完全不同的术语,在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的非洲的社团生活中指出了类似的问题。

② 到目前为止,对在非洲的贫穷问题的最佳分析是最近 John Iliffe 的研究,见 John Iliffe, *The African Poor: A Histo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③ Richard Sandbrook, *The Politics of Africa's Economic Stagna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④ 关于结构调整方案的第一阶段的分析评估,可见 The World Bank, *Sub-Saharan Africa: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le Growth*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89)。

⑤ Ann Drabek, ed.,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The Challenge for NGOs", Special Supplement, *World Development*, 15 (1987): 2。

管多么不情愿——的同时，自愿团体的资源增加了。

经济调整和结构重组时期，为社团生活（特别是中间层）的进一步扩张打好了舞台，俾使公民社会的身影重新出现在舞台上；这次，它的外形已经与去殖民地前夕的基本面貌不一样了。外援社团成长的强劲势头，不仅带来进一步的制度化，而且培育了外援社团的多元化，这对 20 世纪 90 年代政权的重新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最重要的发展发生在中间社团：公民协会——像专业人士的、学生的和妇女的团体——经历了复苏，同时外援式中间组织加入社团行列。在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肯尼亚、加蓬和扎伊尔这些政治分化严重的国家，公民自由协会、人权协会、政治论坛、全国性的福利和服务组织以及消费者保护团体建立起来了。这些机构不仅为所谓的非洲社团生活名副其实的大爆发推波助澜；^①它们还在社团领域注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政治楔子，迫切要求保障基本人权，提倡全面民主化改革。^②

在地方一级，既有的草根社团持续运作，并得到大量新兴志愿发展组织（VDOs）和家乡改良社团的支持，培育了一批支持者，服务于为全国范围提供福利和自助的项目。^③作为回应，许多政府在努力对社团再度施加少量控制时，试图复活法团主义结构。这样，在尼日利亚，1987 年成立了一个社会动员理事会（DSM），意在使当局发起的运动与社会行动相

① Tripp, "Local Institutions and Grassroots Party Dynamics in Urban Tanzania", 在东非记录了这一过程。至于尼日利亚，可见 Adebayo O. Olukoshi, "Associational Life During the Nigerian Transition to Civilian Rule", 论文发表在 th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Nigeri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August 1990, esp. p. 1 ("no period has been as vibrant associationally in Nigeria as the period since 1986")。

② Larry Diamond and Oyeleye Oyediran, "Military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Nigeria", 论文发表在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September 1990, p. 31。

③ Johnson and Johnson, *West African Governments and Volunteer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esp. pp. 5-24。

协调。^① 在加纳,政府努力重建起对工会代表大会的控制。在肯尼亚、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学生活动都受到了限制。在扎伊尔和喀麦隆,对已有教会的监督加紧了,^②并且,在非洲大部分地方,学生、工人、农民和妇女行动的法人主义模式被恢复了。 273

这些多重举措带来的结果是当代非洲社会组织数量和异质性都增加了。制度生活的多元化是可资利用的政治空间(无论是人为设计的还是默认的)存在的首要证明,也是社会结构多元化的首要证明。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组织发展都必然有助于公民社会的巩固。自愿活动的扩张需要一种识别度更高的方法来分析它们对社会秩序建立的贡献。

近年来,非洲社会组织在多个层面运作,活动内容和目标都丰富多彩。那些拥有整体主义目标、努力满足成员所有需求并因此要求他们绝对忠诚的团体,实际上是故意与公民社会理念唱反调的。因此,一些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民族社团、狭隘的网络或意识形态运动,要么忽视国家,要么寻求取而代之,丝毫没有为超出它们特殊范围的理念或利益留下余地。看来,过分在意局部的泾渭分明的利益(往往通过密集的制度形式得以强化),滋生了一种与公民社会的构建背道而驰的倾向。

不同组织的内部结构及其动员人力和物质资源的能力,同样影响了它们在公民社会中的功能。以本地成员为主的团体在吸引新成员方面已经表现不错,但在实现目标方面总还有欠缺。有跨国联系的非政府组织通常能够控制资源,但缺乏支持者以实现自身目标。^③ 总的说来,即便社团的自主权比起它可调用的资源来说对公民社会的活力更加重要,^④但二者的某种结合看来才是关键。另外,不同社团内部所培植的规范(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对长时间维持有序的公民参与至关重要。

① Agbaje, "Mobilizing for a New Political Culture", pp. 5-6.

② Bayart, "Les Eglises Chrétiennes et la Politique du Venue".

③ Pearl T. Robinson, "Transnational NGOs: A New Direction for U. S. Policy", *Issues*, 18, no. 1 (Winter 1989): 41.

④ 见本论文集集中布拉顿的章节。

社团的取向及其结构的多样性,已反映在它们采用的一整套日益丰富的策略之中。许多地方组织,尤其是那些在地理上远离首都的地方组织,继续采取自我封闭、往地方退缩或逃避的技巧。农村和城市的草根社团,也用更加隐晦的方法表达它们的立场,包括麻木、冷漠、伪装和嘲弄。许多团体参与了非法活动,一些团体甚至使用公开的策略,如静坐示威、游行和请愿。根据各自特殊的目的,团体的策略被设计出来,以支持、配合、利用、逃避、挑衅、对抗或接管官方机构。

自愿团体与政府机构在此间的互动,发生于所有层级的接触之中; 274 它不仅包括控制权之争,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包括围绕多种形式和解而进行的谈判和协商。^①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其中的许多互动还十分重视新兴的非正式部门。这一领域的经济活动包括微观行业和小型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本地市场的复苏、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变以及新的分销网络的创建。^② 到 80 年代末期,最富有成效的经济活动都集中于非正式部门。与此同时,某些社会计划被福利性和服务性组织接管了,包括卫生、住房、治安以及医疗和教育的重要方面。^③

在这种背景下新一代精英开始出现。像许多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创业者要么没法与国家建立必要的联系,要么无法依赖国家的资源。^④

① 见 Donald Rothchild and Michael Foley, "African States and the Politics of Inclusive Coalitions", in Rothchild and Chazan, *The Precarious Balance*, pp. 233-264.

② Lillian Trager, "A Re-Examination of the Urban Informal Sector in West Africa",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21, no. 2 (1987): 238-255. 关于一个案例研究,还可见 Cyril Kofie Daddie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formal Sector in Ghana Reconsidered: Notes Towards a Reconceptualization", manuscrip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African Studies Program, 1987.

③ Pieter Van Dijk, "Collabo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 4 (1987): 117-121.

④ 该团体将资源从国家舞台引向在平行经济中的企业,这项建议的提出,可见 Fatton, "The State of African Studies and Studies of the African State", and Irving Leonard Markovitz, "African Capit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frican Entrepreneurship in Senega", 论文发表在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August 1990, p. 1. 其他研究,例如可见 Tripp, "Local Institutions and Grassroots Party Dynamics in Urban Tanzania", p. 19, 声称在非正式部门中获得的利润似乎也再次被投进了这一领域的企业里。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历史进程中,资源积累和阶层分化只得另辟蹊径,并且一直发展(通过公共部门的削减加快了),催生了一个经济中产阶级,并使之开拓了一片独立于领薪工人的空间。^①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出现了明显的社会不平等(这与紧缩措施的实施有莫大关系),^②但是聚集在中间社会组织里的精英共享许多利益,并拥有一些实现其利益的手段。

但是,如果说中间层级主要围着非正式经济实现了高度联合的话,那么在地方一级,宗教团体和服务团体的自主权经常受到官方制裁,由此产生了相当严重的社会分裂。而在国家的核心地带,合作和冲突仍十分明显。

自从采纳结构调整计划以来,社团活动的多样性也影响了社会交流的形态。各个社团在开拓自己独立的行动领域并自主积累物质性、社会性和象征性资源的同时,它们也偶有交会,谋划更广的横向交流网络。因此,一些纯粹的地方组织,如促进会、农民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要么建立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联系网,要么调整与邻近社团的关系,以处理关联问题。某种社会利益聚合在此过程中发生了。同时,一些官方控制的社团机构通常为回应成员要求,让自己从国家控制中解脱出来。随着跨越二级市场和官方市场之间的交易的扩散,纵向和横向的交易在中间社会组织中交汇,形成一种新的既不是国家控制也不隶属地方的象征性关系。^③经新经济计划而有所缓和的城市偏见以及非洲大陆多数地方城乡之间贸易条款的逆转,都强化了这一趋势。

在某些情形下,在地方团体和全国性社团(无论多么不情愿、多么零

① 请再次参阅 MacGaffey, *Entrepreneurs and Parasites: The Struggle for Indigenous Capitalism in Zaire*, 以获得详细资料。

② 结构调整计划的社会结果现在受到了相当仔细的研究。关于强调这些计划造成社会差距的两项案例研究,可见 Tade Akin Aina,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SAP", 论文发表在 the conference on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Nigeri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August 1990, and Jonah, "Crisis and Response in Ghana".

③ Fatton, "Bringing the Ruling Class Back In", p. 257.

275 碎)周围的中间阶层人口数量的逐步增多,俾使这些社团将经济和文化问题转化为更有效的政策诉求。^① 那些有能力施加影响的组织,其形象逐步建立起来了。这些社团有分散的支持者(不论规模如何),它们被赋予发达的参与结构、某些资源和专业技术以及一个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核心。所有这些社团看来与货币经济都有联系,其成员都经历过某种商业化过程,它们还拥有跨越城乡分离的沟通渠道。

这些过程的结果已经促使社团生活有一定程度的集聚并孕育了立足地方机构和资源的公民社会。^② 社会组织的巩固,连同自发积累渠道的增长(通过非正式部类活动的明显偏好的声张而不是生存策略),促进了社会沟通交流。出版社在东部、西部和中部非洲的广大地区大量涌现,政府钳制媒体的努力也与日俱增,这些都是自主信息网络蔓延的迹象。结果是,各自为政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小环境,被鲜明的规则拢在一起,并从文化上用特定的价值加以塑造。

然而,社团领域网状扩张未必伴随着国家机构的撤退。^③ 很重要的方面是,公民社会的加强对提高国家自主权和能力也有影响。从结构上看,社会和国家层面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社会团体和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呈现出两种主要形式。一方面,很多国家在理解关于社会分工的问题上取得了一些默契。公民的、地方的和经济的社团比过去有更高的地位,国家机构则继续在自己的领域内运作。另一方面,新形式的冲突浮出水面。寻求对社会活动的官方控制继续出现在重构秩序阶段,有时导致了社会团体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严重冲突。像尼日利亚和苏丹,政府操弄的民族与宗教特殊主义

① 有关一项极好和精妙的案例研究,可见 Jennifer Widner, "The Discovery of 'Politics': Smallholder Reactions to the Cocoa Crisis of 1988 - 1989 in Côte d'Ivoire", 论文发表在 the Thirty-thi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Baltimore, November 1990。

② Frantz Telmo Rudi, "The Role of NGOs in the Strengthening of Civil Society", *World Development*, 15 (1987): 121 - 127。

③ Shuc, *The Reach of the State*, pp. 125 - 152, 使这一点在谈及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时很有说服力。

与新近流行的公民权理念争锋相对。^①此外,在赞比亚、扎伊尔、刚果(布)、科特迪瓦、尼日利亚以及1989年和1990年的利比里亚,受到结构调整计划(SPAs)严重不利影响的城市团体与政府势力发生冲突,突显了充满活力的社团生活与社会不平等所引发的政治不稳定所能相容的程度。这样,(政府)改良后的退出选择权的运用,伴随着(社会)发言权的增加。^②由于社会团体和国家机构各自在全国范围内自行合作,所以在非洲,摆脱国家就是重新确认其性质的自由。^③

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已经为社团活动的扩张和国家机构的加强铺平了道路;然而,这次危机并没有为调节它们的互动提供指引。显然,在276许多非洲国家,制度化趋势对权力定位和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进展意味着,原先在社团网络分散和国家庇护网络被制度化时(就像在独立之初那样)有可能被强加的霸权制度,已经难以为继了。

由于应急权力设计的性质更多是立体的而非纵向的,所以权力定位的再分配已经提醒人们需要一种新型政治上层建筑——它尊重各种自主空间并以新方式与它们交织并存。最近以来,基层和中间阶层的要求直接集中在想方设法减少政府干预上,集中在抵御而不是利用国家上。^④随着对获取国家资源兴趣的减弱和消除限制压力的增加,政治事态的演变可能正在抛弃抽取原则,这些原则支撑了非洲30年的威权统治。在这些情况下,存在着民粹式的、地方性的和民主性的选项。

① 本论文关于在尼日利亚的一项解释,见 Daniel Bach, "Managing a Plural Society: The Boomerang Effects of Nigerian Federalism",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27, no. 2 (1989): 218-245。

② 见 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③ Cl. Hyden, "Governance and Liberalization: Tanzan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 7。

④ Guyer, "Experience of Government and Issues of Governance in Rural Africa", p. 21。这一点也得到了 Tripp 的着重强调,见 Tripp, "Local Institutions and Grassroots Party Dynamics in Urban Tanzania", p. 18。

然而,有关政治改革的多数讨论围绕着自由化和可能的民主化前景。^①看来,就像1960年,1990年标志着非洲政治史处于一个十字路口。1960年,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超过一半的国家经历了某种政治变革,最著名的是多党竞争制的引入。^②至于1990年的开端是否也构成了非洲政治秩序变革的一个转折点问题,在未来几年很可能会得到细究和讨论;但公民社团在此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则是无可争议的。“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力量的兴起,转而赋权于公民社会,强化了问责压力。富有成效的问责进而成为民主的关键。”^③

当前政权重新定位的要求已经集中在秩序重构的四个重要方面。首先涉及一些规范性和概念性重估。先前非洲的形式民主统治实验总体上已经失败。^④在非洲多个国家,正在进行着有关非洲民主政府观念的特殊形式的争论。正如一位观察家评论所言,这是为了重塑民主以适应当代非洲特殊的背景。^⑤争论不仅在尼日利亚、加纳和贝宁——在这些国家,民主化努力已经导致官方组织了对政治前途的讨论——这些国家表现得最为充分,而且在其他像肯尼亚这样自由化已被预先阻止的国家,争论也取得进展。其成果是,中间社团提出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民主

① 关于在非洲的民主化的相当大量的文献近年来出现了。Richard Sklar 的开拓性工作引发了讨论,见 Richard Sklar, “Democracy in Afric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26, nos. 3-4 (1983): 11-24, 及他随后的文章 “Development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 no. 4 (1987): 686-714。Larry Diamond 一直致力于推动这项讨论。见 Diamond et al.,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frica*。

② 这些事件被巧妙地描述和分析,见 Michael Bratton and Nicholas van den Walle,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Africa”, in Goran Hyden and Michael Bratton, eds.,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in Africa*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91)。

③ Babacar Kante and Crawford Young, “Democracy in Africa and the Senegalese Elections”, 论文发表在 the Thirty-seco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Atlanta, November 1989。

④ 一种观点认为,非洲的民主比迄今为止所提到的更坚固,见 John A. Wiseman, *Democracy in Black Africa: Survival and Revival*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0)。

⑤ Bayart, “Civil Society in Africa”, pp. 124-125。有关这一反思的一系列有趣的见解,可见相关文章,这些文章载于 Peter Anyang, “Ny’ongo, ed., *Popular Struggles for Democracy in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1987)。

政治建议。

第二,政体的重新界定打开了对合适制度安排的研究空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强调恢复多党竞争。在1989年和1990年,许多一党执政国家屈从于由社会团体联盟施加的公众压力,解除了多党竞争禁令(包括科特迪瓦、贝宁、莫桑比克、多哥、刚果、扎伊尔和赞比亚)。在这些国家及其他国家,人们还提议建立多种监控手段,确保政府更负责任,保障司法独立,保护社会多元性,以及培育辅助性(subsidiarity)。^①然而,这些标志自由化的多党主义步骤,经常被利用来阻挠更深刻的民主化要求。

政权重新定位的第三个要素已体现在结构层面。在经济自由化和国有企业撤出投资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启动了权力下放的进程,并探索联邦和邦联制度安排的可行性。^②例如,在加纳,地区一级选举在1988年和1989年初举行;从表面上看,这是在国家一级重新商讨政治游戏规则的一个前奏。^③类似的实验也正纳入其他国家的计划之中,比如,为尼日利亚第三共和国拟议的宪法,就包含了将权力下放到地方一级的重要条款。

政权重构的第四个方面是由外部力量发起的,强调关注治理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金融机构和主要捐助国开始将持续经济援助

① Larry Diamond 和 Harvey Glickman 已就民主化的这些方面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有关的不同文献,见 Carter Center, *Beyond Autocracy in Africa*。还可见 John Dunn,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and Good Government in Post-Colonial Africa", in Chabal, *Political Domination in Africa*, pp. 158 - 171。欧美法学界认为,辅助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是现代联邦制国家依法治国的一条基本法律原则,它的优点主要表现在自决性、灵活性、保护地方身份、保持多样性。辅助性在本质上是决定由哪一层次的权力主体行使权力的方法,它虽然发端于联邦主义政体,但有着更为广阔的适用空间,在存在权能划分问题的多层权力体系中均可适用。见雷益丹:《论欧盟条约中的辅助性原则》,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译注

② David Booth, "Alternatives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Research Issues for Tropical Africa", *IDS Bulletin*, 18, no. 4 (1987): 23 - 30.

③ Republic of Ghana, *District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Modalities of District Level Elections* (Accra: Ghana Publishing Corporation, July 1987).

与政治安排变化挂钩。国外机构强加的政治条款,不仅引发了关于经济改革和政权重建关系的重要讨论,^①而且重新提出政治制度与行政效能之间的关联问题。

对政权重构的关注得到许多公民社团的支持;这是近年来非洲国家经济复苏和社会重建的内在组成部分。政治事态之所以一直集中于政体变革,是因为它们是国家—社会关系新形态的操作性和概念性表述的关键。如果说国家—社会的互动一度以抗议不公和精英霸权为主要特征的话,那么当代非洲有关政治变革的话语,与目前世界其他地方的相似之处,则集中在民主化的不同概念上。这些争论已经被用于今天非洲大陆的经济危机上:“非洲民主的统治形式并不是在发展的道路上可以被随便接受或丢弃的华而不实的东西。相反,它们是发展所必需的。”^②

自愿社团因此成为助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政权重构的多种力量之一。然而,尽管社团有助于削弱中央集权主义并为地方利益诉求的表达提供框架,但并非所有的社团都有助于公民社会的构建,而后者是民主的和公正的政治秩序结合的一个前提。

278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公民社会与国家一样脆弱。20 世纪 80 年代的普遍危机对许多国家造成的影响是,破坏了后殖民主义社会交往模式,并为社团的复兴创造了条件。在这些趋势包含中间社团复兴的地方,都伴随着国家能力的界定和再强调,突显了当代非洲公民社会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密切关联。这些过程对政治事态的演变是否带来转型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从政治角度看,20 世纪 90 年代在国际上越来越

① 对这些问题中的固有问题的总结,以及对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定序问题的分析,可见 Thomas M. Callaghy, “Political Passions and Economic Interests: Comparative Reflections 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ogics in Africa”, 论文发表在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August 1990。

② Michael Ford and Frank Holmquist, “Crisis and Reform”, in Naonü Chazan and Timothy Shaw, eds., *Coping with Africa's Food Crisi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88), p. 234.

边缘化并越来越依赖外部资源的非洲，^①正处于其去殖民化的第二个阶段，也正专注于一场正在进行的独立斗争之中。

公民社会与国家巩固：一些启示

在上文中，我们一直努力通过考察中间社会组织及其与社团生活和国家机构的关系来审视非洲大陆的国家—社会关系。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已经能够厘清一些与非洲公民社会的定义、产生和转型相关的关键点。首先，我们从这一讨论中已经十分清晰地看到，公民社会只是复杂而多元的社团场景的一部分。使那些融入公民社会的社团与其他社团区别开来的东西是前者的局部性：它们虽与国家分开，但又与国家接触。这些网络不企图为既存问题提供全部解决方案（像一些宗教组织所做的那样），它们也不企图俘获国家（像一些民粹主义团体那样）。因此，它们占据了一个概念上——虽然不总是方位上的——中间地带，培植着各种横向和纵向的关系。

其次，更精确地定位公民社会兴起的条件是可能的。社团的生命力与新机遇的开放、官方机构的自觉变革、经济或政治危机的爆发或其他联系机制的崩溃等所产生的流变状况有关。许多非洲社团是作为脱离国家的一种渠道或作为抗议国家镇压的一种手段而兴起的。实际上，那些有助于公民社会精细化的团体是在两个重要的节点上兴盛起来的：在国家控制受到挑战时（在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国家专有权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难以维系时所产生的反抗背景。然而，一方面是公民社会的出现与垄断势头同步松懈，另一方面是退出选择权的终结，二者之间看来存在某种关联。不论是中央集权主义（诱发民粹主义）还是国家衰败（引发地方主义），都阻碍了公民社会的成长。

^① Thomas M. Callaghy, "Africa and the World Economy: Caught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in John Harbeson and Donald Rothchild, eds.,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1).

279 第三,要培植公共生活所需的特殊环境,与国外形势和国内趋势有关的各种因素的特殊结合显得特别重要。虽然公民社会只能在逃避机会被堵塞以及官方机构的强制性能力不再确保服从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但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沟通渠道的扩展和共同经验的积累。在这个过程中,商业化无疑起了作用,但随之而来的社会阶级自主权——由多元社团利益的集聚演化而来——的强化所起的作用也不遑多让。为了维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些团体互相需要,也需要国家。反过来说,非洲的经验充分证明,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社会阶层的出现,或者如果它们接管了官方机构,那么国家就不可能长时间正当地发挥功能。

第四,国家与公民社会相互依存的一些原因已经阐明。国家作为社会中的一种组织,只要它能够赢得其他社会团体的认可,是有可能声张其核心地位的。为了做到这一点,除了实体消灭之外,国家必须为社会团体留下活动空间。公民社团,正是由于自己的局部性,才会支持国家而不是挑战国家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和公民社会(以多种形式)相互强化、相互赋权。

最后,在不同的国家类型与政权形式之间存在紧密关系。公民社团缺位则威权政权出位,一如排他性和整体性社团对民主政府所构成的严重威胁。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近期政治史在提示:不要以为所有的社团活动都有民主倾向;与此同时,真正的公民社团(它的局部性结构特质要求规范性节制)对各种民主形态的巩固不无助益。

在本文的研究中,社会秩序的形式和国家构造的性质被当作是社会不间断交流的明显结果。这种方法把人们的研究从对结构的普遍关注转移开来,重新强调有必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追溯社会团体与国家机构之间的互动过程。除非公民社会的各种特征都得到准确辨别,除非公民社会制度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得到更认真推究,当代国家的外在形态多半不能得到恰当判定。

这些过程对政治趋势的研究有重要的延伸价值。近年来对社会学和社会动力学的忽视——由于对政治经济的关切、制度的成见以及对现

实的象征性重构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把握政治模式和解释政治生活形态的快速变迁变得越来越难。理论挑战因此更加紧迫：如果没有中介概念可以沟通意识形态的、结构的、经济的和行为的现象，那么就不可能创造出解释框架，借以捕捉当代发展的复杂交织现实。 280

如同当今世界许多地方一样，非洲正经历着对盛行的政治游戏规则的全方位重估。它近来的经验，虽然几乎不可能像欧洲、部分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所发生的那样引人注目，但它的意义和启示一点也不逊色。几乎可以肯定，这些从近来非洲发展的切近分析中得来的经验，对于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类似进程能够产生重要的启示。但要充分理解这些动态过程，有必要彻底修正概念方法和理论取向。本章已经努力为这种更彻底的反思给出某些合理的交互式指南。

第四篇

结论

第十一章

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竞争与妥协

293

阿图尔·柯里 维维恩·苏

社会中的国家的研究方法

最近对国家重新燃起的智识兴趣,对比较政治学领域做出了有益的间接贡献。其中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低收入国家政治和社会比较研究的复兴。由于超越了 20 世纪 70 年代现代化理论家之间以及依附理论家之间流传下来的那种可悲的聋子式对话的辩论,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众多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已经成功地“将国家带回”到第三世界国家研究之中。^① 然而,社会科学

① 这里指的是 Peter Evans et a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其他最近的以国家为中心的著作的一个不完整列表大概包含如下: 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Ellen Kay Trimberger, *Revolution from Above: Military Bureaucrats and Development in Japan, Turkey, Egypt, and Peru*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s Books, 1978); Robert H. Bates,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John Waterbury, *The Egypt of Nasser and Sad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wo Regim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Richard Sandbrook (和 Judith Barker), *The Politics of Africa's Economic Stag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Atul Kohli, (转下页)

经常发生的情形是,在一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可能会引出其他领域更新的也更具挑战性的研究问题。新近的国家导向的研究看来也没能免于这个家族遗传病。

进而言之,这种探索研究进路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通病是,误将分析性观点当作经验性观点。比如,涉及国家至上的一般分析性观点,很容易导致下述谬见:在低收入背景下,国家总是并且不可避免地是可观察到的最重要的社会行动者。按此逻辑,接下来的研究进路便会从国家作为擅权的利维坦的观点推演开来,这几乎成为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的通病。事实上,在上述地区,实际存在的国家极少取得如此巨大的优势,那些被归为真正巨人类别的国家往往被证明不过是残废的巨人。因此,本书抛弃了严格的国家主义研究取向;代之以另一种研究框架,聚焦于国家与社会的多元互动。²

由乔尔·S. 米格代尔所作的开篇绪论,便提出了这个框架。在接受权威与社团之间或者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析性区别的同时,该框架强调
294 了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联。作为此处收篇的论述起点,米格代尔的框架中所主张的三个概括性观点,值得重述。首先,将国家分解来观察是重要的。处于顶层的国家权力很少是铁板一块的,对其内核进行仔细解剖是必要的。也许,这条真理早已被广泛认可。然而,我们想额外强调的是,将研究聚焦于国家底层——远离首都——以及底层与首都之间的联系,对我们理解国家

(接上页) *The State and Poverty in India: The Politics of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eter Evans, "Predatory, Developmental and Other Apparatuses: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on the Third World State," *Sociological Forum* (Fall 1989): 561-587; Stephan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d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本书的编者们在他们最近各自的著作中一直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努力。例如,见 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Joel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and Atul Kohli, *Democracy and Discontent: India's Growing Crisis of Govern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内部权力的分配,以及国家制定实施具体政策议程的能力,助益良多。

其次,记住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通常是模糊的这一点很重要。尽管对国家与社会作分析性(及简洁性)区分是必要的,但我们的研究必须仔细辨别:国家与社会的实际关联或交织有多少交汇点?其多层的关联或交织的形态(结构的与观念的)如何?在国家—社会之间复杂的联系、重叠和包含关系中,其主流关系所呈现的诸多特性,对于切实理解中低层政治行为都十分重要,在那些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感知上都没有确切区分的地方,这一点尤为重要。因此,如果我们要深入地把国家理解为既嵌入又相对独立于其他运行着的社会力量的话,就需要对国家—社会联系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秉持审慎的研究敏感性。

最后,与前两个观点相关的是,本书所倡导的分析框架,不论应用于描述性的研究还是分析性的研究,都十分自觉地意识到其中的“递归关系”,换句话说,国家—社会互动中的相互转化的特性。将焦点倾向国家的发展能力上,可能适用于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但是对大多数低收入国家来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影响往往是双向的。这种影响的双向性主张,对国家能力的集中研究需要辅以对特定国家社会背景的考量。这种主张反过来带来两种分析性启示。

第一,它将我们的注意力重新转回一些更传统的政治社会学问题,例如:国家权力的社会决定因素是什么?坦率地说,这种聚焦可能带有一些自身的分析问题。例如,它对现实中严重影响国家—社会关系的国际因素和国际变量,可能难以做出解释,也无法给予足够的重视。^①然而,

① 就像以本书撰稿人为代表的大部分作者所欣然承认的那样,这在以国家—社会为研究焦点或以社会中的国家为研究焦点的著作中,都是观察的盲区。就冷战(长时间改变不了的国际僵局)期间第三世界政治进行思考和写作的老一辈的现代化学者,如果他们倾向于忽视某些国际变量,那么还可以原谅。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伴着“依附理论”长大的。而撇开我们对那一思想的主体的个人评价,我们倾向于想当然地认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外部环境在理解第三世界政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如果有人需要提醒的话,那么事实已经再一次向我们强有力地展示,国际舞台上的突然的急剧转变 (转下页)

值得明确注意的是,这种政治社会学方法,不必回到结构—功能主义或更加封闭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权力模式上去。正如接下来的部分将要更加详细地探讨的那样,我们的框架的初始假设是完全不同的:在韦伯式的精神指引下,我们避免将社会变革概念化为单向度的、朝着一个已知终点的过程;我们一开始也明确了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性区分,即使我们要求特别注意二者的联系以及经常性的“递归式”互动关系。^[2]第二,我们所强调的对国家的社会背景的理解,通常会提出新的涉及重大政治意义的社会变迁的研究问题,比如公民社会中(甚至是在低收入背景下)民间社团生活演变的性质、范围及过程。

这种分析方法调整的诸多好处,总会在实际的经验研究中发现它们有没有引起共鸣。因此,本书的实证研究篇章既受这个总体框架的启发,也有助于阐明这个总体框架的应用性。这些篇章在自己的论述中自治,这里毋庸赘言。本章总结的目的是双重的。首先,我们设置了一些一般性问题,力图将本书及其十位撰稿人的工作放到一个更大的学术传统中。第二,我们在概括性的中间层次上——亦即,介于总体框架和具体的实证研究之间——回顾和讨论了本书的素材,以此从总体上集中关注本书所做出的一些重要的分析性和主题性贡献。

(接上页)(并且也有长期的更微妙的变化)可以对第三世界中的国内事务(包括国家—社会的互动)产生深远影响。显然,冲击外部和内部变量之间的恰当平衡的分析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设计更多的跨时间的案例研究而得到改善。但最终,第三世界的“社会”和它们的“国家”将需要被构思和理解易渗透的实体——不仅彼此面对面是易渗透的,而且和各种跨国力量之间也是易渗透的。我们对国家—社会框架的这样一个后依附研究途径的修改留待随后的努力。

[2] 关于这一韦伯式的立场是如何与众不同的,以及为什么其在政治社会学中比其他主要的理论传统,即结构—功能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更可取,见 Reinhard Bendix, *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Conclusion。还要注意的,虽然主要关注国家—社会的关系,但 Bendix 对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国际影响是很敏感的。

知识背景

我们目前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方法，深受先前那些涉及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学术争论的影响。^① 西欧国家由农业向工业政治经济的大变革，触发了许多大胆的、然而也是冲突的学术解释。例如，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都寻求将欧洲变革的性质概念化，以解释其动力，预测其未来，并识别历史变迁中的英雄与恶棍。这三个早期思想家对于后世研究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既有强化，有时也有误导。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使他将资本主义视为推动西欧大转型的驱动力。^② 事实上，作为经济生产体系的资本主义，在带来经济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也要对工人阶级相对悲惨的命运负责。马克思期望这种相对悲惨的命运的发展会催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当这样的革命并没有实现时，他的一些追随者——开始是 20 世纪初年的列宁，之后一直延伸到今天仍然活跃的依附论理论家——断然地将分析的重点，从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转移到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对海外市场和产品无休无止搜刮，以力挽利润率下降的颓势上。

① 论据是不同的，但这一部分确实借鉴了早些时候在阿图尔·柯里的“序言”中呈现出来的一些材料，见 Atul Kohli, ed., *The Stat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比较政治学专家可能希望跳过本部分，因为它回顾了熟悉的材料。其主要贡献是，追溯我们的知识谱系，回到了韦伯和其他古典思想家的更加均衡考虑的理解。

② 对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学著作的总结回顾，见 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art 1, and Raymond Aron, *Main Currents in Sociological Thought*, 2 vols. (New York: Anchor Books, Doubleday, 1965), 1: 145 - 236。对马克思著作研究，有一本优秀的专著，见 Shlomo Avineri,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涉及目前讨论的马克思本人著作的节选，见下列选集，Robert C. Tucker,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 (New York: Norton, 1972)：“German Ideology, Part I”，110 - 166；“Wage Labor and Capital”，167 - 190；and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436 - 525。

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积累和人力剥削的革命戏剧性场景,在涂尔干眼里则是人类迈向其工业社会未来的漫长而特别孤独的旅程。^① 由于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史念念不忘,涂尔干关注的是这场旷日持久且漫无头绪的转型对工业时代欧洲的稳定及“社会团结”的影响。涂尔干指出,工业化导致生产和分配工作的专业化,并因此导致社会劳动分工的日益精细化。社会角色的分化进而破坏了前工业化社会的文化统一性——被涂尔干称之为“机械团结”——因为这种统一性是建立在人们扮演相似的角色并具有相似的世界观基础之上。专业化产生了个人主义,它导致了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社会价值与社会态度。多样性和社会价值体系整合性的缺位,由此进一步威胁到社会团结。

涂尔干对西欧社会大转型的研究聚焦于工业化进程、伴随这一进程而来的劳动分工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价值体系变化。在涂尔干著作中,这一转型的图景是一个明确的有始有终的过程。前工业社会的机械团结缓慢地被替代,并走向工业社会的“有机团结”;过渡时期中间阶段的特点是失范和可能的社会崩溃。在后来的理论家的著作中,涂尔干所描绘的这一图景,首先启发了著名的“传统”和“现代性”二分法的构想,其次激发了“现代化”观念——问题丛生的转型过程。

马克思与涂尔干关注点的不同,可以在许多方面作比较和对照。然而,他们在分析欧洲转型时共享的两个方法特性,与本书主题的关系尤为密切。第一,两人都认为他们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在其他社会经历这样的转变时——在适当的时候它们会这样——其内部的社会动力将会与起初在西欧几个国家里观察到的情形类似。第二,两位理论家都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结构间

^① 对涂尔干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回顾是有益的,见 Giddens (In. 6), Part 2, and Aron (In. 6), 2: 11-118。有关涂尔干的研究的优秀论著,见 Robert Nisbet, *Sociology of Emile Durkhei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关于涉及目前讨论的涂尔干自己著作的节选,见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esp. Book 1, chs. 1-3, sec. 7.4, and the Conclusion。

题上。

对涂尔干来说,就像对马克思而言那样,大转型的戏剧性场景并不发生在国家领域,而是发生于社会之中。在他俩看来,国家和政治处于正在发生的大转型过程的外围。虽然他们都对国家有所关注,但他们都将国家的行动和社会的政治主要看作是更加基本的社会经济转型分化的动态反映。这些视角无论对于研究西欧工业时代有多大好处,但它们 297 对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的一般性价值已被证明是有限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中政府的角色和行动,远比马克思和涂尔干所观察的案例要重要得多;这一历史事实本身就需要一个更加平衡的国家—社会视角。

相比于马克思和涂尔干,马克斯·韦伯不仅对其理论的普适价值没有那么雄心勃勃,而且对于政治与社会的互动更加敏感。^① 韦伯关注的一个核心课题是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在西欧而不是在其他地方生根发芽。他研究了世界上许多宗教,认为宗教教义对“现世”、或对世俗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观点溯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选择性亲缘”,为未来的研究者留下了许多重要的方法论遗产:前现代文化和社会结构对一个社会是否会自然地演变成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传统—现代性框架和马克思主义框架)有重大影响;因为在社会行动者的动机与他们的结果难料的行动之间通常有一条鸿沟,所以社会变革的推进,可能不会被参与者所理解(与“理性选择”相反);对社会大转型作理论分析的最好方法是提出具有时空局限性的问题(与宏大理论叙述相反)。

韦伯的政治社会学论题,涵盖了现代国家的兴起、权威和合法性模式、领导功能以及作为典型的“合理性”组织的官僚制性质等问题。在德

^① 对韦伯关注的总结回顾,见 Giddens (fn. 6), Part 3, and Aron (fn 6), 2: 219-318。对韦伯政治学和社会学著作研究的优秀著作,见 David Beetham, *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Politic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4), and Reinhard Bendix,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New York: Anchor Books, Doubleday, 1962)。有关韦伯的政治社会学著作的节选,见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esp. chs. 3, 4, 7, and 8。

国统一重大历史背景观照下,韦伯关心的是德国在政治经济上“赶超”更先进的英国。在研究诸如此类的“现代”问题中,韦伯被自然而然地导向关注如何开拓国家团结与集中局面的问题,关注政治领导人的创造性作用问题。韦伯的著作与当代比较研究的持久相关性,部分缘于类似政治问题的持续出现,甚至到了20世纪下半叶仍然出现。

新近致力于“找回国家”的比较研究者,通常也正是建立在韦伯的这部分贡献之上的。但应该记住的是,韦伯对政治的社会决定因素与国家功能结构同样敏感。对韦伯来说,现代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归根结底不是国家的生长,而是理性的扩散。现代官僚化国家的崛起,应该被理解为这种更大的朝向社会重构和重组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韦伯明确将市场看作一个权力冲突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把“市场状况”看作是助长个人和群体不平等的“阶级状况”的决定力量。因此,在韦伯看来,社会群体和国家的权力,持续受到市场中权力分配变化状况的影响。最后,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在其著作中,韦伯将相当大的注意力放在地位和主观认同的问题上;在他看来,地位和主观认同使享有共同信仰的人转变为权力群体,并常常因此决定性地影响和塑造社会权力的实际分配。本书正是建立在韦伯这一更全面也更平衡的对国家—社会的诠释之上。

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主导了19世纪西欧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①在20世纪上半叶,现代化和发展问题尚未得到广泛研究。^②在此期间,西方学者主要关注两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大部分前欧洲殖民地成为主权国家、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时,这两个全球性变化的汇合再度引发了对发展问题的极大学术兴趣。新近政治社会学对发展问题的研究旨趣已经经历了三波

① 由于韦伯的一些主要著作是在世纪之交之后出版的,所以像在这里使用的“19世纪”这一术语包括一战前出版的作品。

② 约瑟夫·熊彼特、托斯丹·凡勃伦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一些著作,当然算是这种概括的例外情况。

或“三代”：对传统、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关注；对依附关系中殖民主义遗产延续的关注；对“找回国家”的关注。每一种研究方法都对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做出了宝贵和持久的贡献。然而，每一种研究方法也都有分析上的侧重——现代化和依附研究方法偏向于理解政治的社会决定因素，而国家中心的研究方法则侧重于审视社会变革和社会连续性的政治性—结构性根源。

现代化方法。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学界发表了丰富多样的关于现代化和发展的著述，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批判性的（有些是同情性的）评论。^①可以说，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太多了，因此这里只需稍许介绍就够了。塔尔科特·帕森斯围绕“社会系统功能”概念构建一般社会理论的雄心，为这一脉的学术努力提供了理论启示。^②帕森斯将所有社会都设想为由互动部分组成的系统。社会系统的构成部分是各种行动者，他们被赋予各种角色和社会地位，分享一个共同的文化取向。由于文化常常倾向于界定群体身份（“内部人”与“外部人”），以共享文化为特征的社会体系往往是相对自足的。此外，由于社会系统往往是持续存在的，某些共有的系统维持功能有助于一代又一代人传承共同的文化取向。帕森斯正是以此论证为基础，试图确定社会诸系统的共有的“模式维持”功能；他希望其他人最终都能以此基础来进行不同社会的结构—功能分析。

① 有关这些评论的节录，见 Reinhard Bendix,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considere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9 (April 1967): 292 - 346; Samuel Huntington, "The Change to Change", *Comparative Politics*, 3 (April 1971): 283 - 322; Mark Kesselman, "Order or Movement?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s Ideology", *World Politics*, 26 (October 1973): 139 - 154; Andre Gunder Frank,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London: Pluto Press, 1971); Tony Smith, "Requiem or New Agenda for Third World States", *World Politics*, 37 (July 1985): 532 - 561; and Gabriel Almond, *A Discipline Divided: Schools and Sect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1990), esp. ch. 9.

② 下面的讨论所建立的基础，见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Macmillan, 1951), esp. chs. 1, 2, and 7.

299 像涂尔干一样,帕森斯试图为社会系统设计一个分类方案。就像涂尔干那样,由此产生的概念是二分法的:所有的社会,要么是传统的,要么是现代的。因为社会系统是由相互依存的各部分构成的,传统的与现代的社会系统都可以通过共存性和共变性的“束”来界定。例如,现代社会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成就取向、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功能分殊以及角色分化来表征。相比之下,传统社会的特点可能是先赋取向、劳动分工稀缺以及角色融合。帕森斯认为,这种类型的方案将有助于对所有的社会系统进行分类,并由此为一种更具动态性的现代化理论提供基础。

帕森斯的抽象公式对比较发展研究的学科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不容否认。浸淫在这种演绎性十足的社会学研究旨趣中的人们,一旦其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的成果最终出炉,那么国家的角色,在政治科学领军人物那里,就被削弱了,从属于某种被理解为社会的“模式维持”的“基本需要”的玩意。这样一种概念化政治的简约模式,其影响十分明显。我们可以以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为例。虽然他最近发出不同的腔调,^①但阿尔蒙德当年主张,“政治系统”是社会系统中执行“社会整合”和“适应”功能的子系统。^②政治就是其当下的所作所为,政治曾经的所作所为是帮助社会整合与调适。尽管阿尔蒙德正面引用了韦伯的著作,但是他的基本政治概念却走向了韦伯曾严厉反对的倾向:一种根据政治行动的目标来定义国家的倾向。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这一概念化政治的模式甚至在逻辑上都很难产生一个平衡的公式化表述,人们借此原本能够认清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为条件的互动过程的。

对这些主题及与之相关的主题,还可以有更多的探讨。^③但说得再多,不外乎如下要点:大量的研究现代化的著作被维护“社会团结”的规

① 见 Almond, *A Discipline Divided*, passim.

② 见 Almond's "Introduction", in Gabriel Almond and James Coleman,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esp. p. 7.

③ 除了上页脚注②中的参考文献,更充分的讨论,见 Atul Kohli, "Introduction", in *State and Development*, esp. pp. 9-14, 并密切注意其脚注。

范性议题所触动,同时,它们多数也倾向于把政治条件视为社会经济变革的衍生物。对社会经济发展不稳定后果的关注,灵感来源于19世纪的学术关怀。我们还记得涂尔干曾经描述的法国,私人创业的活力迅速推动了工业化的社会动荡。对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这种社会经济变革的不稳定后果是如此重大,理应置于学术探究的核心地位。

然而,将这种研究模式推广应用到当代的问题上,就伴随着这样的推断:20世纪的发展中国家,将经历基本类似于那些在19世纪处于“发展中”的西欧国家所面临的过程和风险。这一推断尚未得到证实。事实上,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力不是企业家,而是国家。实际上,企业家创造力的相对不足,恰恰是解释这些社会长期不发达宿命的一个关键变量。毫不奇怪的是,在这些情形下,国家行动者往往将自己的角色视为实现突破——准确地说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一员。这些国家行动者专心一意推动社会变革进程,要的是急速行进,而不是和谐融洽。然而,与此同时,许多战后独立的后殖民国家,(在追求社会变革时)最终既受到国内和国际力量的两面夹攻,又长期处于不稳定和无效率之中。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同时存在着国家占主导地位(从控制资源和掌握决策的意义上来说)但发展效能不佳两种倾向。对此,我们应该怎么解释才是最好的呢?这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并非这一问题的所有方面在这里都能解决,但有一点无疑是明确的: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将政治和国家主要看作是一种受仍然是“更基本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影响和决定的、无法集中关注一些最突出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的因变量。

依附理论视角。在20世纪60、70年代,第三世界多股民族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汇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尖锐批判现代化理论的思想阵营。激进的批评者发现,现代化研究方法不仅在实质性解释发展中国家问题上有欠缺,而且在方法论和意识形态方面也有不足。在实质性问题上,依附理论导向的批评家不同意现代化理论流派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的论断。这些批评家把欠发达理解为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与亚非拉殖民地人民之间对抗的产物。殖民主义本身孕育了不发达。继而,在形式上承认主权之后,持续存在的经济依附关系又致力于维护新殖民主义。当代的这些依附关系,就像以前的依附关系一样,维持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优势,也维持着不发达的第三世界的劣势。

除了不赞同现代化理论视角中有关实质性问题的观点之外,依附论的倡导者们推崇不同的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他们发现,现代化理论在方法论上是非历史的、完全形式主义的。他们主张历史导向的学术研究,其理论推断的基础是,整个经济,特别是作为跨国支配和依附关系的资本主义,具有首要地位。从意识形态上看,他们斥责现代化理论学者为掩盖西方继续支配和剥削第三世界的企图提供学术外衣。相比之下,他们认为自己是捍卫第三世界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自由。^①

像现代化理论方法一样,依附理论的方法对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研究做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有价值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1)它认识到当代发展中国家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过去西方工业化国家存在差异;(2)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世界经济状况对当代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压制上;(3)它集中关注在系统的发展研究中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

随后的批评如潮涌现,正如我们所预期的一样,批评同时指向依附理论存在的诸多问题。早期依附论声称,第三世界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会产生负面的发展—不发展,现在这个观点几乎消失了。修正后的依附论认为,依附性发展在世界经济的诸多约束中仍是可能的,这一点很好地弥补了早期依附论中虽合逻辑框架但有缺陷的思想。依附

① 关于发展的依附研究途径的优势和弱点,也已经在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例如,见 Gabriel Palma, "Dependency: A Formal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or a Methodology for the Analysis of Concrete Situations of Under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6 (1978); and Tony Smith,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Literature", *World Politics*, 31 (January 1979): 247-289。然而,这里不是评论这些问题的地方。这里我们只能重申对于本书来说重要的一些主题。

取向的研究方法在现在的著述中仍是重要的一脉。然而,通过诸多研究所发现的越来越清晰的一点是,各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及其选择的政策,也要为发展的“成功”与“失败”承担很大的实际责任。^① 发展活力的差别——一些有效而一些不那么有效——正是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的,不单是国际因素所致。

然而,对国家机关和政治活动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认可,有可能削弱依附论框架本身的说服力。事实上,这一困境突显了由马克思主义所激发的大量的第三世界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亦即,政治解释的逻辑最后势必还是化约主义的。尽管国家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中已被广泛认可,但是这种作用的不同解释都有一个盲点:它们坚持认为,这一现象所反映的势必不是政治精英的利益和目标,而是特定经济主体的利益和目标。如果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那一定是“波拿巴主义”情景下的结果。在这一情景下,社会形势不支持建立一个明确的阶级领导权,政治权威以重要的调解者身份现身。如果国家采取的是将国内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的政策,那一定反映了阶级平衡发生了有利于那些世界资本主义利益代言人的变化。而政治组织的变化,特别是朝向威权主义的变化,一定是由经济变化需要维持和再造资本主义导致的结果。

我们在这里不争论这些具体命题的准确性。我们的观点更具一般性。继承现代化理论传统和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已经发表了诸多深刻的洞见。而且,正如接下来的部分所提出的那样,本书大量地吸收这些见解,把它们纳入到自己选择的研究框架中。然而我们认为,在政治研究中,人们在尽量利用社会决定论逻辑时,不能走得太远。这个逻辑是有限度的。在发展过程中,国家—社会关系中的许多问题,只有放弃了 19 世纪那种政治的进化论和社会逻辑的学术旨

① 有关涉及“成功”的文献回顾,见 Robert Wade, “East Asia’s Economic Success: Conflicting Perspectives, Partial Insights, Shaky Evidence”, *World Politics*, 44 (January 1992): 270–320。有关“失败”的并行讨论,见 Sandbrook, *The Politics of Africa’s Economic Stagnation*。

趣,才能得到更好的分析。

找回国家。对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的不满引发了众多的反应,其中许多在理论上是混乱的。不过,某些论证逻辑比较统一的反对声,是由那些对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将政治降为社会经济变量的倾向不满的学者发出的。这些学者在各自的发展问题研究中以不同的方式努力恢复政治自主性的重要意义。^①

对伸张政治自主性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解释方式。首先,应该从独立意义上理解政治变量,因为那些控制国家权力的人,处在能够做出具有深远社会经济影响的决策地位上。尽管这些决策有时可能反映的是其他强势势力——国内的或国外的——的利益和压力,但它们通常所体现的是国家机关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国家行动因此是政治性的选择。虽然选择总是受制于各种约束,但它们终归是选择。这样,国家对社会干预模式就能从经验上加以分析,以便人们理解为什么特定的发展策略或选择被采用——更重要的是——理解政治选择对所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后果。

政治变量具有自主意义的另一种含义与政治传统通常所表现出来的连续性有关。政治文化和结构并不是社会经济变化的应声虫。例如,威权主义价值观和结构,并不会仅仅因为教育的普及和中产阶级的崛起就轻易转型。政府当局作为和不作为的模式,以及发出政治命令及其强度的模式,因此可能既是目前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也可能是以往政治的产物。

很明显,这些研究论断并没有带来新的学术增量。不过,它们推动了一批认可“国家主义”的论著的出版。我们这本书可以被看作是对国家主义研究路径的延续和对话。我们的一项主要的研究论断是,一些国家主义论著在强调政治的自主性方面走得太远了。这一论断得到本书几乎所有论文的支持,而且本章接下来还要进一步探讨。如果说现代化

^① 参见本章第一条注释。

理论和依附理论错在社会经济决定论方面，那么国家主义著作则错在政治决定论方面。我们的研究追根溯源到韦伯那里，主张代之以一种更加平衡的国家—社会视角。

一般主题

从整体看，本书的论文可以被解读为讨论三个相互关联的国家—社会主题或问题域：低收入社会中，国家建立统治合法性的能力和推进社会经济计划的能力；在这些低收入环境的政治活动中，多元社会力量（如社会阶级和阶级派别，正式和非正式的公民联合会）的作用；可能促进或阻碍国家与社会相互赋权的环境。这些论文对进一步分析每个问题所做的贡献需要再详细探讨。不过，在探讨之前，三个概括性评论或说明是必要的。

这三个问题域所研究的对象，尽管互有关联，但也互有区别。对第一个问题即国家权力的研究，有助于把重心放在国家既是一个自变量（不同的国家能力造成的影响）又是一个因变量（国家能力不同的决定因素）的考量之上。相形之下，对新旧社会势力问题的研究，将注意力从国家转开，投向整个社会的变革。第三个核心问题域是对国家与社会同时强化前景的理解，正好处于其他两个问题的交汇点上。一旦采用国家中的社会视角来研究，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把握能力就会增强，这正是本书的主张。

本书所提及的三个核心命题的相对“新颖性”各有千秋。比如，国家能力的问题在过去十年无疑受到大量的学术关注。这一命题的讨论范围广泛，从刻画非洲国家的萎靡不振，评价其明显的“低能”，到解释一些成就斐然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的情形——国家权力明显的“高效”。无论如何，本书的几位作者主张，在如此广泛的社会背景下研究国家能力，完善并深化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即为什么只有一些国家在其政治经济任务上获得成功，而其他许多国家没有成功。对第二个主题，

也即在低收入环境中社会势力的作用问题,关注度正日益提高。本书中有关社会阶层角色的历史学论文,把阶级研究从历史哲学中分离出来,从而为如何研究商人群体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力注入了新鲜见解。

304 至于社团生活的活力与公民社会的兴起,本书则凸显了目前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意义,对它有回应、有贡献。第三个主题——国家与社会相互赋权——迄今尚未得到太多关注。本书的研究,决不是最后定论。相反,它只是一个开端,我们期望通过我们的倡导和阐述,能够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做出贡献。由于放弃了国家—社会对立——它造成了对权力冲突的误导观念,把国家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冲突看作是零和博弈——的研究取向,本书的几位作者受到激发,提出替代性的问题,即在何种条件下,国家精英和社会势力追求其目标的能力都能够加强?

最后,从总体来说,我们应该注意,有个累进性或时间性的维度,把本书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按特定次序联系在一起。许多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那些摆脱了殖民统治的非洲和亚洲国家,一批民族主义精英掌握政权后,摩拳擦掌,发起“发展”其社会的深远计划。一些努力结出果实,其他则没有。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怎样才能对不同国家建立统治并发起变革的能力问题做出最恰当的解释,就成为本书研究的一个重要关切。对其中的许多国家来说,只有在战后第一阶段之后——只有在那些国家引领的发展取得或多或少“成功”的努力之后——其他许多社会势力才会有回应,它们在公共领域中有时充当更积极进取的角色,有时扮演更消极阻挠的角色。在不同的低收入国家中,尽管国家与其他社会行动者之间具体的抵制和合作模式存在极大差异,但是一个总的趋势,一波清晰的第二次浪潮,一种需要学术关注的“新政治”,伴随着更加显著的社团政治行动或非国家主导的政治活动的出现而形成了。那么,最后,随着国家精英和社会团体走上控制权力资源的正轨,随着二者都积极地追求各自的目标,一系列重要的、甚至更新的问题就摆上了研究议程:是否有条件(在持续贫困的环境中)促使国家和其他社会团体或势力都被赋权?是否有条件促使二者相互赋权?这些

条件是什么？还有，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会不会打开它们尚未进入视野的前景？

国家：自主性、能力与合法性

由弗朗西斯·哈根皮安、维维恩·苏、凯瑟琳·布恩以及阿图尔·柯里在本书所写的那些关于能力、合法性的四章，直接涉及低收入背景下国家权力的问题。虽说每篇文章都涉及一些国家权力之外的主题，虽说其他一些章节也涉及国家权力问题，但这四章的核心主题是分析国家实现其目标的能力。虽然它们都聚焦于国家，但都或多或少对当下学界所持有的下述误导性的“国家中心”观念做出回应：认为国家在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认为国家机构的性质是理解国家影响社会变革的关键要素；认为某些国家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并且，这种“独立性”要么是“国家力量”的基础（如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要么是“国家虚弱”的根源（如一些非洲国家）。 305

哈根皮安和苏对上述观点做了最为纯正的“修正主义”解释，他们都认为，传统上被理解为“强大的”和“有效的”国家，仔细审视之下会发现有着重大的局限。在第二章，哈根皮安认为，巴西的军人政权（1964—1984）并不像经常被用以解释巴西例子的“官僚—威权主义”或“依附发展”理论模式所认为的那样，是“合理的”并且“有效的”。相反，现在反思起来，巴西军方摆脱传统政治中庇护主义和两极分化的民粹主义的政治计划根本就没有成功过。为了解释这一失败，哈根皮安将我们带离了看似现代理性的政治金字塔顶端，进入政体内部，深入区域政治和地方政治层面。

巴西军方曾卷入一项“阶级计划”，旨在产生高增长，与此同时抑制左派和工人阶级。就像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一样，高压和酷刑并没有给巴西军方提供无限的执政资源；他们迟早都需要一点统治合法性的油彩。鉴于其强烈的威权政治偏好，也鉴于其政治经济计划明显的阶级性，合法性无论如何都不是军政府容易得手的饰品。最终，恢复某些合法性的

需要,致使巴西军事统治者允许一轮相对自由的普选,让候选人竞争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中的席位。由于巴西多数国民在政治上尚未被动员起来,深陷于嵌入国家的庇护权力网络之中而不能自拔,军方势必要顾虑到,单凭自由选举,不能推动产生阶级类型的社会分化和政治行动。事实证明,这种顾虑是十分正确的,但1974年选举的结果,却给军政权的统治形式带来另一个重大问题。政府支持的政党在选举中表现得相当糟糕,因而把军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的现实暴露无遗。

306 哈根皮安的研究显示,军政府为应对不得不加以正视的合法性落差威胁而采取的下一步策略,是努力强化地方传统精英的势力。军政府希望,这些精英将动员他们的追随者来支撑政府不断下降的人气。然而结果却是吊诡的:“传统政客”权力的扩充,是以牺牲“理性官僚制”为代价的。因此,20世纪80年代最终实现向平民政体过渡时,地方的这些传统政客,在新生的“民主”政体中再次处于十分有利的权力掮客的位置上。

如果说哈根皮安成功地揭示了军事统治者实施政治变革的有限能力的话,那么,对巴西威权政体的其他修正主义解释,同样将这一变革试验的经济失败的原因,追溯到军政府对合法性的需要上。^①人们注意到,这种源于有限国家权力的政治经济失败的新图景,与早期对巴西军政府的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早期的解释不仅认定这些统治者的权能是他们当初上台的主要原因,而且认定,威权主义与技术官僚的结合,正是导致一种新的发展类型——依附性发展——出现的原因。^②

在第三章,苏在其对中国的重要案例所做的重新解读中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毛泽东时代党一国的权能所及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她把国家统治能力的日趋下降,主要归结为国家与社会之间脱节的鸿沟

① 见 Albert Fishlow, “A Tale of Two Presiden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isis Management”, in Alfred Stepan, ed., *Democratizing Brazil: Problems of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83–119.

② 例如,见 Fernando Enrique Cardoso, “Associated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Alfred Stepan, ed., *Authoritarian Brazil: Origins, Policies and Fu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42–178.

的日渐扩大。中国革命之后新生的党 国成功地实施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发动深层次变革的这种能力，部分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的效用，即共产党将众多的社会团体动员进政治领域。因此，共产党早期在中国社会内部创造了新的权力资源。随着取胜的革命党逐渐控制了国家结构，国家与社会之间通过政党建立起来的牢固联系，使新生政权有能力发动像土地改革、集体化和工商业国有化这样深刻的社会工程。

然而，在苏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革命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经历了一个“细胞化”过程。中国式农业集体化的强行推动，对个人迁徙自由和跨行业跨区域商业贸易的强行限制，产生了众多小而散的细胞式的社会经济单位。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小型生活和劳动单位被最大限度地调整，以适应国家武断的经济计划 and 政治性程序性要求，国家与鲜活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纽带日渐松弛了。生活工作在这些被有效隔离的单位中的干部和群众，经常采取欺瞒手段来应对来自国家的接二连三的指令。结果，地方政治被重构，地方保护及个人庇护的网络和派别逐渐发展成为新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一道显而易见的鸿沟出现了，一方面是国家不厌其烦地推出基于非人格的阶级分类的先进公共话语，另一方面是基于地方性欺瞒和庇护的不那么高尚的地方政治现实。就这样，高度集权的政府发现，越来越难以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计划的实施，动员起真正的社会支持，即使它在鼓动具有惊人的社会能量的群众运动方面仍有一定的能力。因此，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当年发动社会革命运动无往而不胜的那个组织良好、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逐渐蜕变成一个沉迷于意识形态说教而几乎缺乏任何超出党-国机器本身之外的真正的社会基础的政体。 307

与哈根皮安和苏的观点相反，布恩和柯里在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并不试图修正国家性质的主流形象。相反，他们对非洲和印度的国家失灵，重新做了解释。例如，布恩在第五章中，反对将非洲国家的“不适状态”的原因归咎于这个大陆上国家权力的“叠加”性质。相反，她认为，许多非洲国家治理能力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家精英对农业社会的过

度索取。

布恩将国家盘剥社会模式的根源追溯到殖民地时期。她认为,非洲殖民地国家形态设计的目的,就是从小农经济中提取盈余。许多非洲国家由于没有土地贵族,就为地方“强人”的间接统治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强人”自己成为连接寄生性殖民国家与小农生产者之间的剥削链条的关节点。

按布恩的说法,后殖民国家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模式。在众多非洲新国家中,一个新的政治阶层出现了,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随着对国家运行的控制力的加强,他们加剧了对农民的盘剥。就像殖民时期一样,由于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依然不成气候,那么要代表新政治阶层来盘剥农业剩余,就需要使用赤裸裸的政治权力。不论在首都还是在地方,强人统治的现实,是维系以权威为基础的剩余盘剥所面临压力的表现。然而,在现代环境中,在可持续增长的理想在国民经济与国际“发展”话语中已然是一种常态的背景下,人们看到,非洲体制被一种深层次的矛盾所困扰:持续压榨农民的话,经济切实增长的前景就会变得暗淡,并且只会进一步削弱非洲本土统治者的权力赖以存在的资源基础。就这样,低增长和政治脆弱性彼此依赖。

如果说布恩发现的是非洲国家病态背后的社会逻辑,一种与生产盈
308 余的分配系统有关的逻辑,那么,在第四章中,柯里也看到了印度日益增
长的治理危机背后的社会逻辑,一种与非洲不同的逻辑。对柯里来说,
关键的变量是印度村庄既有的权威模式的崩塌。新经济形态的出现,民
主政治的扩展,削弱了高高在上的高级种姓群体或其他“大人物”的权
威。这种变化,使得印度古老的统治模式——借此,来自国大党的国家
领导人与政权中低层次“大人物”之间业已形成的以庇护为基础的联
盟——复兴的空间几乎没有了。相反,新的自由流动的政治资源——众
多政治团体提出的要求——的出现,为民粹主义政治和个人魅力型统治
创造了条件。

这种统治确立之后,个人魅力型民粹主义统治者不仅在政体去制度

化方面越行越远,而且在解决紧迫问题方面并不是十分得力。此类领导人并不觉得需要建立政治制度;像政党这样的机构的规则和程序给个人魅力型领导人的自由裁量权带来种种限制。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政党的话,领导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之间,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就会一直很脆弱。选举获胜靠的是笼统的非操作性的承诺,而要把这些笼统的承诺转化成具体政策,就会非常困难。重大的政策决定反复遭到大量的反对,甚至是遭到前支持者的反对,如此一来,政府的政策动议同样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犹疑不决。政策失败反过来为其他民粹主义挑战者铺平了道路,从而延续着集权和无能的周期循环。

概括起来,这四篇聚焦国家的研究论文,对盛行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取向提出了两项重要的修正。第一,哈根皮安和苏的论文显示了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是“强大的”和“有效的”国家,实际上是如何受到重重限制艰难运转的。比起印度或者某些非洲殖民地后殖民国家,军人把持的巴西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要显得“有效”得多。尽管如此,哈根皮安的论文和苏的论文所透析的意义也是很可观的。如果说,在深入研究之后证明,通常被认为是统摄性支配性的“现代”国家的影响所及只能在它们对各自社会的实际掌控范围之内的话,那么,在这些国家以及在多数低收入国家中,还有众多的非国家的社会力量影响了并且仍在影响着社会变革的进程。虽然“找回国家”的研究旨趣因此可能对比较政治社会学做出重要贡献,但同样至关重要的是要记住,一直以来,社会变革的大量情景是在反制国家并且一些重要方面是在“超越”国家的社会领域中发生的。

第二,在这四篇论文中所提及的那些限制国家能力的因素,也给我们留下了类似的整体印象。这些论文中,没有一篇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国家的“强大”或“虚弱”是诸如集权化程度、技术官僚的能力或与社会的绝缘—隔离(“自主性”)等这些国家属性的主要因变量。相反,这些论文 309 呼吁人们关注这样的事实,即,单纯聚焦于国家属性会带来大量无法解决的分析悖论:集权化看来总是与无能相伴而行;技术官僚的能力对解

决国家合法性问题近乎毫无办法；国家相对于社会团体的“自主性”，可能是国家“强大”的来源，也可能是国家“虚弱”的根源。

然而，一旦解释是历史和具体的，一旦分析的主要对象从国家属性转为国家—社会关系，此类悖论也就消失了。比如，拿印度来说，同时存在的集权与无能倾向可以被理解成是政治社会日益分化的因变量。其他国家亦是如此。像军方控制下的巴西，技术官僚的才干诚然能够增强国家追求从技术层面来看正确的经济政策的能力，但对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却无能为力；国家迟早都要在各级地方层面吸纳权力掮客，从而使一些权力管理非常传统的形式，内化于表面上已经是现代—理性甚至威权式的国家躯干之中。最后，这些文献所透析出来的那个被过分夸大的国家独立于社会的“自主性”概念，要么是一种幻觉，要么是一个几乎没有价值的范畴。就拿非洲来说，布恩认为，国家与社会表面上的分离，是别有用心的压制社会组织以攫取社会盈余的统治谋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产物。至于中国，随着党—国所实施的激进的改造政策和计划造成社会的“细胞化”，随着在此过程中原有维系国家与社会的合法且有弹性的联系的断裂和弱化，它对自己力图统治的社会的领导和管理能力下降了。

社会力量：阶级派别、联盟和团体

采取社会中的国家的研究视角，意味着除了考虑其他要素之外，需要在国家能力与各种社会力量在塑造低收入国家的政治中的作用之间，尽力做出更加平衡的考量。进而，为努力保持这种平衡感，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那些我们在第三世界诸多案例研究中已经很熟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概念化范畴。本书由雷萨特·卡萨巴、裴宜理和罗伯特·维塔利斯所写的三章，在这一重新概念化社会力量的努力中做出了特别突出的有益贡献。这三章的研究都是历史取向的，并且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社会阶层的政治角色上。但是，这些论文所采用的“阶级分析”，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一些标准命题大异其趣。

310 三位作者反对将预定的历史角色赋予特定阶级的倾向，同时也拒绝

了近来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阶级政治研究中普遍提出的“为什么不”的问题。为什么一些社会中的工人阶级没有成功地组织起来挑战资产阶级统治并推翻资本主义？为什么一些社会中新兴资产阶级没能成功地建立和巩固现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阻止这些阶级承担其适当历史角色的特殊“弱点”是什么？本书作者们强调，诸如此类的问题很明显也很不幸地陷入决定论的窠臼，其立论基础是一种撇开历史上大量有意义（且很重要）的偶然性事件的单向性的社会发展论。此类问题要求我们根据“它们不是什么”而不是“它们是什么”来分析低收入国家中的阶级。出于同样的逻辑扭曲，这导致我们不是根据特定历史条件行为，反而是根据它们的不作为来理解阶级。卡萨巴、裴宜理和维塔利斯分别采取差别很大的框架来开展研究。

在第六章，裴宜理以所掌握的上海工人阶级政治几十年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新政权成立前国民党领导下的各种城市社会势力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城市社会势力所扮演的角色的强烈反差。她一开始就承认，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已是四分五裂，同时也特别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已被分解成许多不同的次级团体和派别。不过，她拒绝承认这种阶级内部的分化必然造成阶级“软弱”的说法。她认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阶级的内部分化未必意味着它在“政治上无能”。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的不同部分，甚至是一个四分五裂的阶级的不同派别，都很可能与国家行动者或组织产生重要而有影响力的联系。这些联系并不总是意味着一个特定的阶级派别简单地“俘获”国家。事实上，更常见的情况是，一旦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运动（或各种国家构建运动）有机会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共同奋斗，没有一个合作者可以从这一安排中完全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通过这种伙伴关系，合作各方无论如何都会发现，自己的资源和选项受到十分深刻的影响甚至改变。因此，只要认真对待那些虽小但地位关键的阶级派别的政治潜力，只要深入研究在特定历史环境下通过与国家的其他社会势力的实际联系，那种潜力是如何实现或者为何没有实现，我们就能够既更多地了解国家—社会互动

的主导模式,又更多地了解那些互动模式的“递归”或相互转化的诸多方面。

311 裴宜理解释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各自为何以及如何从上海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中吸引劳工支持者。很早的时候,工人们就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出两党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上的显著差异——一个强调激进的阶级斗争策略,另一个强调合作的阶级利益调和策略。但是,诸如个人技能水平、老乡关系和工作经验等因素,在吸引工人倾向于哪一党方面,可能比意识形态本身更重要。共产党更多地在祖籍为南方省份的移民中的熟练技工里吸引支持者,这些技工是同业公会和老乡会的成员,通过这些组织,他们在反对雇主以追求更高的工资待遇、更多的工作主动性的集体行动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相比之下,国民党往往从半熟练工人、工场新手中吸引支持者,这些人多数来自北方。这些新手不仅缺乏培训和工作保障,而且缺乏行会精神和熟练技工的共同经验。他们在就业市场的竞争中更容易依赖于地下帮会,也更依赖于与雇主的良好关系以在混乱的时代保住他们的工作。

随着他们被纳入各自政党的劳工运动计划之中,随着他们的需求和目标被融入两党的政治纲领之中,这些分化的社会群体便负有不同的社会组织使命和倾向。国民党劳工组织逐渐演变成把劳工、工头与街头混混、毒品贩子和“可敬的”高层商人及政客联系起来的精巧的恩庇—扈从保护网。而共产党的劳工组织,依托强烈的车间和小单位的团结风气,则是由众多小型基层组织构成的。这些小型组织,依靠行会传统,被联接成一个大型的保护工人福利的激进工会。某种程度上说,这两种类型的劳工组织在政治上都是有效的。但是,一旦有机会掌权,它们的政党所追求的变革的方向和速度,也因此受到限制。国民党的帮派基础及其贪图收益和政治回报的庇护系统,使政府难以接触上海工人阶级的其他阶层并从中吸引支持者。共产党人与中国劳工精英的结盟,以及它所崇尚的小单元团结的价值观,导致1949年之后的政府将单位(小单元)的理想不仅奉为职工福利的基础,而且奉为所有城市社会生活的基础。各

式各样的单位的既得利益，特别是那些国有工业企业单位的既得利益，在国家面临一浪接一浪的工业战线新招募生力军的问题时，明显成为合理的政策创新举措的障碍。不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共产党政权，都受到了其早期与特定工人阶级派别的互动和联系性质的约束——在组织能力和政策回应方面。裴宜理由此推论：要将统治强加给高度分散的社会，新政权必须与那些接受它的社会势力达成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可能将国家禁锢在那些优先关系之中，最终抑制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312

在第七章，维塔利斯仔细考察了 20 世纪 30 年代埃及的商业冲突和政治，其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命题和研究结论跟裴宜理对中国工人阶级政治的研究十分类似。维塔利斯虽然一开始就承认第三世界资本家内部阶级分化的重要意义，但他拒绝接受这样的命题：这种分化必然是民族主义者和买办阶层之间的。他也拒绝这样的预设：阶级内部分化必然导致阶级“软弱”和政治无效。类似地，维塔利斯认为新近对第三世界市场和政治研究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商业是如何俘获国家的——也不以为然，认为它过于简单化。他认为，我们应该反过来设想，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都是分化的，它们之间的互动高度复杂，随市场波动和政体变动而不断变换。其结果可能不是一方直接“俘获”另一方，尽管商业集团确实经常有能力引领政治过程，使之对自己有利。

在埃及，国家和资产阶级都被分成许多竞争性的联盟。当时，参与国务的关键角色包括华夫脱党及其各派政治领袖，埃及国王及其宫廷政客，以及或公开或隐蔽的后殖民时代英国残余的利益集团和社会名流的代表。在另一边，关键的资本家参与者被组织到十分广泛和多样化的相互竞争的投资者团体之中，包括农业的、企业的和工业的利益集团和控股股东的复杂网络。在为贷款、补贴、特许经营、合资协议、咨询服务和合同方面——大部分这些特权机会都由埃及的国家机构来分配，这些相互竞争的商业团体在埃及经济发展中，“为控制市场、工业和整个行业”而斗争。虽然国家机构处于分配机会或消除对立的投资者团体机会的位置上，但这些机构很难说在这些有组织的企业界中间拥有多少自主

权。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要获得成功,显然需要那些分化的商业团体提供组织能力和资本。而对商业团体来说,也依赖于国家,因为只有国家才能提供各种资源和优惠条件。正是因为它们是分化的,并且各“方”都致力于理性追求自身利益,这样在国家舞台上,围绕着重要的商业交易,充斥着大量的政治阴谋。

313 资本家的联盟寻求的是在政界的影响力,以减少或消除对立联盟的
市场竞争;国家行动者的联盟寻求的是它们在商界的支
持,以操纵政治结果、消除来自敌对派别的权力竞争。为了说明当时商业政治的范围和风格,维塔利斯很详细地探讨了几个历史上的例子,同时也描绘了一个整体的画面。事实证明,商人是有效的政治行动者:围绕着激烈竞争的投资企业的各种阴谋,至少是一届埃及政府垮台的关键因素,并且也在塑造那个时代的政治活剧目——实际上,塑造根本的政治走势——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维塔利斯强调,新兴资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从本质上讲,市场上不同商业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竞争性质,是它们与国家互动的竞争策略的自然反映,也是相互冲突的政治目标的反映。但是,维塔利斯并不认为这种阶级内部的分化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形式。他倒是认为,阶级内部政治分化的突出形式,很可能受它们在其中竞争的并且它们的社会关系深嵌其中的市场结构的特质的严重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寡头垄断的结构化市场中,主要的商业利益集团往往合并成大型投资集团和投资网络。此类多元联盟倾向(并且适合)从事的非常大胆的集体性(和竞争性)行动,不仅在分化的国家机构内部的日常政治活动中留下印记,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埃及国家建设的整个过程中留下痕迹。一旦市场的结构被改变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也会重构,并且,资本家也会采取不同类型的战略,这些战略对国家建设和政治变革过程的影响也会不同。

维塔利斯为我们浓墨重彩描绘的埃及资本主义和政治的壁画中,“国家”与“社会”相互拥抱,充满激情,亲密无间——尽管痛苦常相伴。

然而,在第八章卡萨巴为我们编织的华丽的奥斯曼挂毯中,“国家”与“社会”并没有拥抱;尽管它们彼此款款凝视,被对方深深吸引,但它们总是无法相拥。在他们努力重新思考社会力量之于国家关系的动力学问题时,裴宜理和维塔利斯都近距离地,就好像用显微镜观察社会组织的肌体,以揭开其构成的阶级派别、联盟和团体。相比之下,卡萨巴则从观察对象那里后退一步,目的是看清土耳其政治史中社会构造及其演化的更长久更宏大的过程。

为了研究 19 世纪奥斯曼帝国变迁过程中的国家—社会的互动,卡萨巴选取了社会演化的三个领域:第一,与奥斯曼经济体日益商业化相联系的生产和贸易组织的变化;第二,导致农民和工人日益扩大的地域流动的农业和就业变化;第三,历史演进过程中帝国出现的民族主义、宗教、宗派意识和运动。卡萨巴认为:“这三个领域所包含的实践、关系和机构的集合,共同构成正在解体的帝国中一个独特的非国家领域。”卡萨巴所期待的正是“强调非国家领域的关联性”,因为他相信,正是在社会生活的这一领域与国家结构之间的关联中,可以发现奥斯曼帝国晚期历史中的“一个充满活力的重要场面”。³¹¹

认为社会力量只是简单地服从帝国现代化的愿景和意志,这是错误的想法。相反,卡萨巴坚称,“源于非国家领域的多元进程约束并塑造了政治当局所行使的权力的本性”。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帝国官僚体系向现代化的奥斯曼—土耳其国家的转型,正是在与日益壮大的非国家领域之间所建立的递归关系背景下发生的。

例如,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被社会中“出现”的非主流的宗教、民族和反国家意识形态“所塑造”并丰富的。按卡萨巴的说法,土耳其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一直在与其他民族主义进行“对话”。将自己对未来愿景的主张与周围其他想法进行区隔的努力结果,产生了将要维持土耳其国家现代化的特定类型的世俗民族主义。事实上,正是最后获得主流地位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所“坚持的将自己严格限定在世俗化层面”的特有方式,应该被理解为那些替代意识

形态的潜在威胁——即对潜在政治权力的威胁——的证言。被挫败的社会势力通常在其得胜方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尽管获胜者要么宣称这是自己的原创,要么——更经常地——轻易地将这些印记从公众视线中抹杀掉。

卡萨巴注意到,随着非国家领域日渐包含许多有影响的机构和团体,这些社会力量很少参加政治行动——不管是支持国家还是反对国家。虽然从实质上说,这些社会势力极其强大,但它们在政治上总体保持沉默,在与政治当局互动中采取逃避和防守而不是参与和干涉的策略。对社会力量错失良机,卡萨巴给出了两方面的解释。第一,这些特殊的社会力量几乎没有采取联合政治行动的合作基础。第二,转型中的奥斯曼国家本身,对政体中这些新力量的存在做出了反应,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改革措施,以应对和化解那些潜在的政治威胁。但是,国家的改革措施从来就没有真正打算赋权给任何在非国家领域中具有潜在挑战性的团体和机构。相反,国家的改革措施,要么挑拨这些团体彼此对抗,要么将它们拉拢进国家权力系统内部进行合作。卡萨巴总结道,这种应对非国家领域社会力量的模式,导致国家机构扩张,并不可避免地放大了国家能力和控制的形象。然而,事实上,国家与各种大众运动、意识形态和组织是如此疏离,其强大的外表徒具误导性。奥斯曼帝国形式上的强大掩盖了其实际的虚弱。

社会势力:公民社团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嵌和脱嵌问题是本书另外两篇论文——即迈克尔·布拉顿和内奥米·哈占的文章——的研究核心。两位作者在其大胆的跨时间和跨国度比较研究中,都涉及非常广泛的发生在非洲国家中的、尤其是去殖民化以来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两位作者都向人们澄清了国家当局与公民社团双方之间互动的条件和模式。他们都聚焦于社团生活的组织和强度问题,卡萨巴正是以这种方式描绘了非国家领域的图景。接着,他们探讨了各自所认为的试验性—建设性国家—社会互嵌

以及防守型—祛魅化的国家—社会脱嵌所导致的一系列后果：这是一个时而充满希望时而令人沮丧的后果，刻画了许多非洲国家为争取经济和政治偿付能力的斗争特征。

在第九章中，布拉顿将他的研究限于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民—国家关系之内。在这些关系中，他勾勒了一个四阶段序列，一开始是互相接触时期，许多国家独立之后不久成立的新政府，通过国家现金资助作物生产和营销计划的机制，推动国家与社会的接触。在第二阶段，种植业农民往往对这些合作计划感到失望，因为其经济收益并没有实现，也因为这些合作组织更多地是被国家当局用来把触角伸到农村腹地的手段，而不是作为改善农民生计的工具。选择“疏远”国家的机构、计划和愿景的农民，也不再支持这些组织。在第三阶段，随着农民独立地组建自己的非正式或私人性的生产和贸易网络，所在国的经济日益陷入困顿时期。面临严重财政危机且无法或不愿承担如此多陷入绝境的农村组织耗费的国家，也选择了从农村生产者关联中脱离出来，允许农民在生产和市场中自谋生路。最后，虽然非洲许多地方的国家—社会关系仍然停留在相互脱嵌的状态下，但还是出现了一些新局面。按 316 布拉顿的说法，一如我们前面所见，那就是进入了试探性的重新接触的第四阶段，在国家机构与社会团体之间，或多或少汲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开启了一种对话局面。布拉顿认为，整体序列模式的每个阶段的出现，都不是任意的或偶然的，而是符合逻辑的，都是对前一个阶段“悬而未决问题”的回应。

对布拉顿来说，国家—社会关系总体上被认为是具有争议甚至是高度冲突的。毫无疑问，这与他所研究的是农民团体这一事实相关，而无论在哪里农民与国家当局的代理机构都存在着严重的困扰。在布拉顿的论文中，社团生活表现为农村组织（生产组织、贸易组织等等）形式，它一方面是代表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是社会团体争夺的对象。之所以要争夺农民组织的控制权，是因为这种社会组织“是社会行动者用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工具”。双方冲突的目标是“拥有并运

营”政治自治体,因为它们“如果不”拥有此类组织的话,“便无从采取任何一种有效的政治行动”。一旦能够控制一个自治组织,“它们便处于一个能够成功发起脱离动议的很有利的位置上”。如果它们的组织也拥有政治能力的话,便可以组织一场旨在影响其他组织行为的“接触动议”。布拉顿解释了为什么在非洲环境下脱离的倾向更加强烈,因为大多数非洲农村社会组织“自主性”更强,而“能力”更弱。因此,不论是国家运营的社会组织还是社会运营的社会组织,一向更有条件采取逃避和政治撤退策略,而没有太多的能力去推广政治宣传,扩大影响力,或改变外界的偏好或行动。布拉顿就是从结构和知识两方面,解释了后殖民时代非洲长期以来农村社团生活与国家权力之间明显的习惯性脱嵌现象,如若不然,这种现象只能被理解为一系列悲剧性的丧失良机或失意现象。

在第十章,哈占也提出了一种国家—社会互动的四阶段序列模式。虽然它与布拉顿的序列并不完全一致,但也与他所描述的分期和过程有一些重要的相似之处。不过,她并没有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农民阶级或其他任何单一社会群体。相反,她探索的是适用于非洲整体公民社会的一般状况。在她眼里,公民社会是“公民团体与国家结构之间的中间地带”。虽然哈占也认识到,在非洲大陆,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脱嵌倾向,但她的论文的“主要论点”却指向某种不同的方向:她的旨趣是证明一种相反的倾向,“在非洲,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国家的形成过程并驾齐驱”。在她看来,国家与公民社会享有一种“共生关系”;她甚至大胆断言,“许多非洲国家在独立后的头30年里所具有的表面上强大而实质上无能并存的特征,证明了这一时期公民社会的脆弱性。”因为,“国家的权力、自主性和能力是……公民社会相对自主性的函数”。哈占认为,当公民社会机构有活力时,国家能力也会扩展;在随后的行文中,她断定,非洲大陆公民社会采取自主行动最多的时期就是国家建设最具活力的时期;由此证明,国家—社会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哈占强调,在非洲民间社团生活的多样性和重要性都得到增长的时

候,殖民地国家也正处于勃勃上升并巩固其统治体系的时期。这些新兴的公民团体最终成为反殖民运动赖以推进的支架。哈占评论道:“从这个角度来看,去殖民化可以被看作是与殖民地国家结伴而行的公民社会获得赋权的过程。”但是随着公民社会经历国有化过程并走上了控制国家机器的道路,其结果是许多中间社会组织丧失了灵魂,也丢弃了目标,由此走向衰弱。大多数新建立的后殖民国家开始用它们自己成立的机构来填补社会裂隙。这些机构,其中许多是社团主义或社会主义类型的群众组织,被国家当局更多地用来牵制被视为政治动乱潜在来源的社会力量,而不是让它们从事建设性的社会行动。然后,按照哈占的说法,在这些组织创建之后,植入其中的某些调适性模式,极大地腐蚀了国家—社会的有效互动,并且,附带说一句,与苏(对中国)和柯里(对印度)所描述的一些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后殖民时代错综复杂的恩庇—扈从网络和庇护主义的交易模式,以及与此相伴的政治派别、政变和腐败现象,使非洲国家处处表现出对特定社会需求和利益的照顾,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与此同时,它也使这些国家远远不能有效而公平地对待真正的公共需求。同时,随着社会力量从各式各样可疑的国家代表和机构的交往中撤退出来,一种古老的倾向向地方主义的自我保护型组织得到了强化。这种倾向“限制了社区之间的接触”,并因此使得有效而活跃的公民社会单位不断萎缩。这样,国家和社会机构不仅脱嵌了,而且也弱化了。在一些国家,“特定政权的社会基础越窄,它们就越不可靠”。这些国家快速朝着“集权和无能”方向演化,经常导致腐败的、自我毁灭的个人独裁现象的起起落落;国家“自主性”因此变成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内涵的客套语——更多地导致掠夺性行为,而不是发展效力。同时,随着公民社会单位进一步碎片化或细胞化, 318 它们的社会权力也逐步受到削弱和压缩。就这样,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长期危机期间,非洲国家与公民社会不仅相互脱嵌,而且相互剥夺权力。

哈占接着证明,在最近一段时间——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附加条件”，即要求它们发放贷款给非洲国家以应付长期财政危机之前，这些国家必须采取彻底的经济自由化和结构性改革措施——我们已经见证了“立足地方机构和资源”的非洲公民社会的显著复苏。伴随这种复苏的是国家再一次能够抓住各种机遇，并学会利用这些机会拓展发展空间。哈占报告说，初步迹象是早前的那种国家与社会的共生关系可能再度出现。她发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公民社会的加强也有增强国家自主性和能力的效果。结构上，社会和国家层面的发展相互促进”。

在最后这一重要方面，哈占对非洲国家—社会关系根本性的相互强化性质的估计，与布拉顿所提出的包含更多冲突的互动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左的。但是，无论他们强调的差异是什么，这两章，连同前面所讨论的那些章节，对更大的理论目标——重新界定“社会”相关单元与“国家”之间的递归关系——的独特贡献上做到了步调一致。

本论文集集中的五篇以社会为中心的论文都倾向于采用这样的观点，即社会团体的政治行为及其权能，至少在局部上是依背景变化而变化的；也即是说，一个社会团体的政治行动及其影响力不是仅仅通过研究该团体在社会结构内部的相对位置就可以完全预测的。例如，社会阶层的实力大小并不仅仅取决于其对财产的相对控制。虽然财产很显然是一种潜在的政治资源，并且有产者通常确实能够在政治上便宜从事，但是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广泛的政治权力平衡却是可能的，甚至是可行的。与之类似，联合行动的水平与经济水平之间并不是简单地发生共变。把这五章内容联系起来阅读，便会进一步强化这样的观念，即在所有塑造社会团体政治行为的突发事件和情境变量中，国家本身的性质和作用往往被证明是最重要的。

例如，裴宜理和维塔利斯在研究中将社会阶级分解成各种重要的“派别”。裴宜理正是以此方式探究了中国工人阶级派别的行为。她发现，在各个派别政治行为差异性背后，既是各个派别的“前现代”起源的反映，也是当时统一的国家近乎瓦解的宏观大背景的反映。维塔利斯同

样表明，埃及商业团体的效能有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与国家当局 319 局的特定关系。卡萨巴的研究进路则有所不同，他不去关注阶级派别，而是将注意力放在更广泛的历史进程的作用上，这一进程日积月累，产生了独特的社会行动——既是结构性的，也是意识形态的——“非国家领域”，这一领域与国家当局同步发展。最后，布拉顿和哈占致力于分析普遍的“公民社团”，同时也分析了在公民社会诞生并与国家展开互动的条件下，公民社团 特定的结构、机会和学习进程。

那么，一种强调国家与社会相互转化关系的综合性理论方法，用作多样化的社会分析显然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我们对社会领域的行动应该怎么看怎么界定，绝不会受到这种研究途径的限制。相反，必须记住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社会团体的政治行为往往是依特定的环境而变的。虽然，主导性的国家形式、相对的财产途径以及基本的生产模式，确实为社会团体可能的政治行动提供了大致的边界，但是这终究只不过是边界的边界而已。因此，我们应该勇于以新的方式思考社会团体的实际的或潜在的权力以及我们所研究的社会动态变化。另外，以新的方式思考我们所研究的特定案例的实际动力，将有助于我们寻求更大问题的答案。例如，哪些因素决定了某些阶级派别具有重大影响而其他派别却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什么条件下“非国家领域”可以在低收入国家发展？哪些条件会激发或者抑制“公民社会”的生长？当新的社会团体实际接触国家权力时，使它们的行动及其结果对整个政体产生影响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新社会势力的出现是否最终导向政体民主化？其决定因素是什么？它们导向政治不稳定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或者，导致国家权威巩固和强化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赋权

这样的命题，即低收入背景下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进入相互强化（或相互赋权）的关系之中，是内奥米·哈占雄心勃勃且积极乐观地研究相对非结构化和多变的非洲国家与社会的论文最直接

的考量。不过,本书的其他几位作者,也分析了各式各样的政治结构在越来越松散的背景下国家—社会相互赋权的可能性问题。

例如,雷萨特·卡萨巴就谈到了奥斯曼帝国秩序的衰落以及 20 世纪现代化土耳其威权国家的崛起。“如果社会团体、社会阶级和社会组织自我建构的总体安排效果,能够表达和推进自身利益,那么就有可能使国家被此类实践所约束并最终所塑造,国家就能在实质上变得强大。”在卡萨巴看来,土耳其恰恰是失去相互赋权机会的样本。

阿图尔·柯里的研究背景是印度的大众民主,他同样探讨了相互赋权的可能性。他强调,恰恰是由于印度社会的日益分化——即使在政治权威体系受制于一系列非制度化的个人统治时期也是如此,让我们更加关注相互赋权的机制。相互赋权的现象——例如,国家权力和社会需求互相支持和强化的条件——取决于相应机构将国家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性。在印度这样竞争性民主体制中,这种机构必然是政党——组织良好、纪律严明的政党,能够为选民加工并提供替代性社会目标,而该目标又不背离一贯性的政策计划。随着相互赋权效果的彰显,此类政党出现在印度一些邦的地方政治中。但柯里揭示,在国家层面,趋势则相反——国家无能,社会受挫。

即便是研究共产主义中国这样高度结构化场景的维维恩·苏,也采用了相互赋权的概念,以界定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宏图中某些困境和某些机遇。虽然两种政体的环境和性质迥然不同,但是苏还是描述了毛泽东时代社会分化日益加深而国家无能日益强化的进程,这与柯里对印度政治轨迹的描述产生了某些有趣的共鸣。在中国社会力量和政治权威都处在一个相对衰弱的状态之下,任何相互再赋权的进展都主要依赖于将社会需求与国家权力联系起来的诸多机构的产生,这也是印度的经验。但是,印度竞争性选举的背景所需要的是建立基础广泛且有弹性的政党,而塑造中国政治背景的单一的党—国体制和独特的革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则需要创造一些完全不同的联系制度或机构。按苏的说法,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正在见证这样的兆头。此类体现在林林总总新

型社团主义风格的公民社团中的制度建构,现在已经冒尖并在中国政体的不同节点上扮演关键角色。

这样看来,在这几篇论文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赋权关系,既是作为一个有用的概念提出来的,也是作为一个实际的(虽然经常被错过的)政治机会提出来的。这些论文研究的对象,涵盖了现代化的威权政体、个人独裁政体以及民粹主义民主政体。因此,虽然有关相互赋权的条件与限度的诸多问题仍然存在,但是一些重要的一般性结论看来还是有保证的。 321

在界定低收入背景中的权力时,把它看作既有分配性也有集合性面相是有益的。在某种意义上,权力就像财富:它可以积聚,也可以被分解。既然社会中的少数人可能总是比别人拥有更多权力,那么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到底有多少权力在运转?有些社会总是比其他社会拥有更多的权力来界定并实现集体目标。在这一点上说得更多,可能使我们离题太远。就此说到这份上就够了:一个社会的权力资源往往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些条件如:国家“渗透和集中协调社会活动”的能力,^①社会团体的自觉水平和组织水平,以及最重要的,国家精英的目标和有组织社会团体的目标是一致的还是分化的。在高度分层的阶级社会中,这些问题将变得非常复杂,其中国家行动者往往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阶级结盟。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分配性资源——谁拥有的比其他人多——的权力,很可能主导政治话语。不过,不用深究,我们就能发现其背后潜藏着这样的问题:社会拥有多少集合性权力来实现其国家目标?正是由于我们过于关注权力的这个层面,部分地激起我们研究国家与社会互相赋权之条件的兴趣。我们对这一目标的贡献是初步的,但我们在思考中推进了一步,为将来的研究工作和理论完善开辟了一条光明之路。

① Michael Mann 将这描述为一个国家的“渗透性权力”。见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in John A. Hall, ed., *States in History*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6), esp. pp. 113–119.

共同的见解

把在时空和政体类型方面如此分散的研究论文集合在一起,必定带有某种差异性,甚至带有某种明显的松散性。故而,不顾累赘之嫌,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做个总结,重申所有这些作者都共同坚持的一些基本的研究取向以及各章节所探讨的一些共同主题。我们希望,这些研究取向和见解对其他人也有帮助。

本书的研究既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也不是“以社会为中心的”。我们是将国家和社会的形成及转变作为递归过程而不是自主过程来处理的。本书认为,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它们的社会;同时,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构建了它们的国家。本书有意驻足于国家与社会的交叉点上,并且聚焦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所发生的有条件的双向互动。

我们在使用国家—社会研究路径时充分认识到,它不是“新的”;类似的想法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韦伯那里。我们也承认,这种研究路径往往有待于那种付出艰辛努力、历史具体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可以慢慢累积具有更一般意义的成果。因此,我们没有妄称有什么轰动性的原创,也不敢说找到理解复杂的第三世界现实的新的理论捷径。相反,我们所提供的是一个平衡的参考框架。我们相信,它将有助于确定未来实证研究的方向,无论对国别研究还是对更广泛的比较研究都是如此。此外,我们还要指出,过去众多声称理论突破的研究路径,往往都走向死胡同。战后发展领域的思想史满是这种“范式转变”失败尝试的例子:政治发展理论、依附理论、国家主义等等,也许还有理性选择理论。夸大的知识产品差异可能带来短期的专业荣誉,但它不可避免地使我们的良好意图受挫。它带来的是时尚与虚假的开端,以耗费我们所有人的知识成本为代价,往往给我们的研究生带来最严重的折磨。

除了一般方向,本书提出了一些更具体的主题性的结论。其中有三个结论值得在最后重复一遍。第一,为什么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建立权

威和促进社会经济变革方面比其他国家更有效的问题，引起了研究发展的学者的极大兴趣。在过去十年，其中有些学者将国家效力追溯到所谓“自主性”的国家特质上。尽管“自主性”概念在这方面的著作中还有一些模糊不清，但其一般的含义似乎是，国家对社会的脱节或绝缘有助于国家精英完成其政治目标，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是如此。然而，我们的集体见解却与此大相径庭。在我们研究的几个案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日益脱嵌，并没有释放而是相反降低了国家深入社会、超越社会引导变革的能力。很显然，这方面需要更多的研究。国家效能很可能被证明具有这样的特征，不仅在不同国度之间，而且在同一国度内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政策领域，国家的效能也会不同。同样有可能的是，“效能”将被发现是一种微妙且复杂的混合结果——国家如何在吸纳一些社会需求的同时排斥其他社会需求。无论最终结果是什么，我们在这一阶段的可靠结论更多地是方法论的而非实体性的：对一个国家相对有效性的最好研究，主要不是去关注该国的组织特征，而是要去追溯国家与社会的联系方式，包括国家精英与主流社会阶级之间的联系方式。

对第三世界社会阶级实际政治角色进行重点研究，是本书的另一个突出主题。虽然实质性主张可以在本章的总结中找到（当然也可以详细追溯到各个章节），但我们对该主题研究的一般性结论，最好再次把它概括为一种方法论陈述。以往对社会阶级的研究，被与阶级导向问题相关 323 的一种特定历史哲学扭曲了。“为什么不”的问题——即，为什么阶级，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没有履行其历史使命——往往主导了研究议程。所不同的是，我们认为现在重要的是要研究（描述和解释）那些在劳动分工中处于相似地位的人的真正的、实际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行动。不必重申（虽然我们认为恐怕有必要）的一点是，社会行动者在劳动分工中所处地位，并不是政治联合的唯一重要的基础。单靠阶级不能决定政治行为。无论如何，围绕生产的社会关系十分重要，如果没有对基本的阶级关系以及相互竞争的社会阶层既往和当前的政治角色有一个清晰了解的话，那么对第三世界背景下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就难以令

人满意或者就是不完整的。

最后,人们在深入思考第三世界的未来走向时有两点几乎可以肯定。一方面,低收入环境中的政治精英,将继续采取国家干预的手段来塑造社会变革模式,另一方面,各种社会团体将继续要求在国家运作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故而,国家—社会的互动模式需要我们持续地研究和关注。在研究国家的最近著作中,国家—社会的互动常常——也许最经常——被构想为敌对的、斗争的、甚至是零和博弈的。本书的作者们承认,对一些社会团体或社会派别来说,这确实是对它们与国家互动性质的一个准确描述。但它并非总是如此。国家局部与社会局部之间的某些互动(或联系),能够并且确实有给双方带来更多权力的效应。当然,有些互动只对一方有利,而有些互动则相互削弱。还有一些情况是,国家行动者与特定的社会团体结盟以反对其他团体。

因此,本书所得出的结论建议,研究低收入国家社会变革的分析家们,最好要抛弃那种排他性的国家对抗社会的分析框架;我们希望人们谨记的其他重要建议包括:国家与社会的双向赋权;国家诸部分与社会诸部分之间的策略性脱嵌;统治联盟,亦即,国家行动者与某些社会团体之间的结盟,故意地(或无意地)牺牲其他社团。国家—社会之间互动的剧目至少是如此丰富多彩。

凤凰文库书目·政治学前沿系列

- 《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 孔繁斌 著
- 《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 王海洲 著
- 《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 [美]迈克尔·桑德尔 著 曾纪茂 译
- 《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 [英]斯蒂芬·卢克斯 著 彭斌 译
- 《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译
- 《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 [英]理查德·贝拉米 著 毛兴贵 等译
- 《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 [意]诺贝托·博比奥 著 陈高华 译
- 《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 [美]布鲁斯·阿克曼 等著 应奇 编
-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 [英]T. H. 马歇尔 等著 郭忠华 刘训练 编
- 《当代社会契约论》 [美]约翰·罗尔斯 等著 包利民 编
- 《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 [英]G. A. 柯亨 等著 吕增奎 编
- 《美德伦理与道德要求》 [英]欧若拉·奥尼尔 等著 徐向东 编
- 《宪政与民主》 [英]约瑟夫·拉兹 等著 佟德志 编
- 《自由多元主义的实践》 [美]威廉·盖尔斯敦 著 佟德志 苏宝俊 译
- 《国家与市场：全球经济的兴起》 [美]赫尔曼·M. 施瓦茨 著 徐佳 译
- 《税收政治学：一种比较的视角》 [美]盖伊·彼得斯 著 郭为桂 黄宁莺 译
- 《控制国家：从古雅典至今的宪政史》 [美]斯科特·戈登 著 应奇 陈丽微 孟军 李勇 译
- 《社会正义原则》 [英]戴维·米勒 著 应奇 译
-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 [澳]安德鲁·文森特 著 袁久红 译
- 《新社会主义》 [加拿大]艾伦·伍德 著 尚庆飞 译
- 《政治的回归》 [英]尚塔尔·墨菲 著 王恒 臧佩洪 译
- 《自由多元主义》 [美]威廉·盖尔斯敦 著 佟德志 庞金友 译
- 《政治哲学导论》 [英]亚当·斯威夫特 著 余江涛 译
- 《重新思考自由主义》 [英]理查德·贝拉米 著 王萍 傅广生 周春鹏 译
- 《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 [英]约翰·格雷 著 顾爱彬 李瑞华 译
- 《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 [英]乔治·克劳德 著 应奇 译
-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美]迈克尔·哈特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著 杨建国 范一亭 译
- 《反对自由主义》 [美]约翰·凯克斯 著 应奇 译
- 《政治思想导读》 [英]彼得·斯特克 大卫·韦戈尔 著 舒小昀 李霞 赵勇 译
- 《现代欧洲战争与社会变迁：大转型再探》 [英]桑德拉·哈尔珀琳 著 唐皇凤 武小凯 译
- 《道德原则与政治义务》 [美]约翰·西蒙斯 著 郭为桂 李艳丽 译
- 《政治经济学理论》 [美]詹姆斯·卡波拉索 戴维·莱文 著 刘骥 等译
- 《民主国家的自主性》 [英]埃里克·A. 诺德林格 著 孙荣飞 等译

《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 [英]乔·米格德尔 著 张长东 译

《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 [美]彼得·霍尔 著 刘骥 刘娟凤 叶静 译

《社会契约论》 [英]迈克尔·莱斯诺夫 著 刘训练 等译

《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 [澳]菲利普·佩蒂特 著 刘训练 译

《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 [美]罗纳德·德沃金 著 冯克利 译

《原则问题》 [美]罗纳德·德沃金 著 张国清 译

《社会正义论》 [英]布莱恩·巴利 著 曹海军 译

《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美]汉娜·阿伦特 著 孙传钊 译

《作为公道的正义》 [英]布莱恩·巴利 著 曹海军 允春喜 译

《古今自由主义》 [美]列奥·施特劳斯 著 马志娟 译

《公平原则与政治义务》 [美]乔治·格劳斯科 著 毛兴贵 译

《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 [美]罗伯特·A. 达尔 著 范春辉 等译

《论伦理精神》 张康之 著

《人权与帝国:世界主义的政治哲学》 [英]科斯塔斯·杜兹纳 著 辛亨复 译

《阐释和社会批判》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段鸣玉 译

《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 [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 郭忠华 编

《当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读》 应奇 主编

《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想象》 [美]安娜·M. 史密斯 著 付琼 译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 张亮 编

《第一代英国新左派》 [英]迈克尔·肯尼 著 李永新 陈剑 译

《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 [美]珍妮弗·皮茨 著 金毅 许鸿艳 译

《论战争》 [美]迈克尔·沃尔泽 著 任辉献 段鸣玉 译

《现代性的谱系》 张凤阳 著

《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 阎小波 著

《阿伦特与现代性的挑战》 [美]塞瑞娜·潘琳 著 张云龙 译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著 郭为桂 林娜 译

《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 [美]乔尔·S. 米格代尔 著 李杨 郭一聪 译 张长东 校

《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 张亮 熊婴 编

《仪式、政治与权力》 [美]大卫·科泽 著 王海洲 译

《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 王海洲 著

《论政治的本性》 [英]尚塔尔·墨菲 著 周凡 译